喇嘛杀人

——西藏人流亡四十周年专书

林照真著（内部发行）

作者简介

林照真，台湾屏东人，政治大学哲学系、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毕业。曾从事电视工作二年，于中国时报服务近十二年，现为中国时报社会关怀小组召集人。著有《中国人的悲哀》、《覆灭部队----日报白团在台密史》、《水的政治-----宋楚瑜与台湾水利》、《最后的达赖喇嘛》等。

正如众所周知，从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的汉民族当中正出现一股关注当前西藏问题的新趋势，来自台湾的新闻记者林照真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她出于对西藏问题的特别关注，曾先后多次专程前来流亡藏人所在地——印度北方喜玛诸尔邦的达兰萨拉等地，通过对许多耆老的亲身采访，特别是那些曾经历当代西藏历史上重要的事件的当事人，透过对他们进行口述重建这段曾经被淹没的历史。同时也对西藏问题的总体情势，特别是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发生在西藏的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种种真实情况做了深入了解。

林女士在了解西藏问题之诸多真实情况后，心有所动，并籍此为西藏人民抗暴起义四十周年纪念日著作。我对于林女士撰写这本书而付出的重大心力和她的敬业精神表示由衷的赞赏。

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或散居世界其他各国的许多汉族朋友们，通过对西藏问题的了解和研究，秉持公正的原则，对正义表现出的支持态度是特别值得赞赏的。鉴于广大的中国汉族同胞们对西藏或西藏人民真实的历史、现状、以及其他诸方面进行了了解或认识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本书的出版对于广大中文世界的读者加深对西藏问题之真相情况的了解必定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展望未来，期望能在中文世界中，就中国与西藏间关系的历史真实、现势发展、西藏文明的恢复与宣扬等见到更多的作品与研讨，相信对促进西藏与中国的相互了解与利益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们也期待能对目前在国内的和流亡国外的藏人之真实的现状和所处的困境、我们的想法与愿望、对未来的祈求以及为解决中藏间存在的冲突与误解等方面问题，秉持公正超然的立场，提供有益的建议。

最后，谨向本书的作者和广大的读者表示衷心的问后，祈众生幸福。

达赖喇嘛

一九九九年一月六日

（注：本文为西藏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翻译）

自序

——林照真

我在这本书全部完稿后，才开始写自序的部分，这时正好是达赖喇嘛为了要不要发表声明回应江泽民的“两条件”说，而弄得举世关注的一刻。果然，达赖喇嘛强调“自治、而非独立”的立场依然无法取得中国方面的信任，在四十年过去后，藏人流亡的命运无法扭转，两年来许多与流亡藏人接触的经验不时涌上心头，自己似乎更能体会藏人在角落中的暗泣。

西藏，对一个处于热带台湾的记者而言，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这些地方我没有去过，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向中国政府申请到西藏的采访计划到现在还是石沉大海，虽然到不了拉萨，

但我却在印度、尼泊尔等异国地区发觉西藏人深深的绝望。有许多年轻一代的藏人和我一样没有亲眼见过西藏，但我和他们不同，我毕竟站在台湾自己的土地上；西藏人不同，他们只是流亡者。

一九九七年初，达赖喇嘛访问台湾在台掀起一阵“达赖喇嘛热”，在这之前，我便因为要制作有关专题，得到报社的支持而到印度、尼泊尔等流亡藏人定居点去采访，当时也有不少媒体记者启程到印度采访，好多台湾记者都成了流亡藏人社会的稀客。

在那时，藏人也亲眼见识到台湾记者的厉害。有多次陪同台湾记者采访的“西藏通讯”编辑达瓦才仁说，他看到有的台湾记者在采访藏人悲惨的际遇时，难过得当场流泪；但也看到有的台湾记者故意穿上藏服，像个演员一样采访拍摄；也有记者在达赖喇嘛行经时，突然递出麦克风抢问问题，吓死了身边的藏籍与印籍警卫人员；还有的便是像我们这一类的记者，到处问，什么都想知道的记者。达瓦观察的不错，这些都是台湾记者的真实面貌。

藏人觉得更奇怪的是，他们的印象中台湾不大，但为何会有上百家的有线电视？而台湾的报纸也是这么发达。他们常会问：“叫自由时报是否表示报纸就自由？”、“叫自立的报纸言论是否就独立？”、“叫中国时报的是否就最中国？”面对这些有趣的问题我只得私下一一据实以告。

我记得第一次到流亡政府外交部去拜会时，很自然以自信的口吻自我介绍：“我是台湾第一大报的记者”时，外交部秘书长丹巴才仁一直在笑。我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笑，他告诉我：“你是第三个介绍自己是台湾第一大报的记者了。”原来，先我而至的联合报和自由时报记者也都同样这般自我介绍。

在台湾掀起达赖喇嘛狂热时，走在达兰萨拉街上都会踫到台湾的新闻同业，但从第一次热热闹闹的采访过后，但现在仍沉浸在西藏领域中的记者却已经不多了。只是，在达赖喇嘛热潮沉寂后，现在的西藏问题却因中藏对话可能展开，而进入一个关键的时刻。这时，反而更需要媒体记者居中扮演更多资讯交流、心情交换的角色。

我访问过很多西藏人，其中西藏“青年会”资探秘书长央金卓嘎的那一次访问至今叫我难忘。在达赖喇嘛已经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后，央金卓嘎侃侃而谈“青年会”所怀抱的西藏独立思想，在她身上西藏妇女传统服饰与穿著完全无法遮掩她独特的藏人本色。央金卓嘎的英文很好，谈吐不俗，看得出她在印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即使她的独特立场鲜明，也不会给人任何压迫感。

在侃侃的谈话中她的重点转到实际现况上，她说到：“每天早晨醒来，我就想到自己是一个流亡者，想到没有自己的祖国，没有发言权，在这里寄人篱下，自己的同胞都在受罪，想到这些就很伤心。”说时央金卓嘎的语气由坚定转为柔弱，且已忍不住饮泣、放声痛哭，一旁连日来陪著我四处拜访藏人的达瓦才仁也跟著哭红了双眼。他们二人的伤痛让我感受到藏人内心深切又无助的绝望。

我只能在一旁，静待悲伤的气氛渐渐淡去，但在我离开青年会、回到台湾多年后，却始终忘不了那一幕。我努力做一个冷静的记者，虽然我能在现场克制住眼泪跟著放肆，但却无法阻绝自己内心对藏人流亡命运的感叹。

藏人流亡的身影在黝黑肤色的印度人身边流动，已经度过四十年流亡命运的西藏人，很多人都已经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印地语，也有些经济条件较好的西藏人已悄悄入了印度籍、尼泊尔籍，成为异国公民，但是，多数藏人还是做著有一天回到西藏的梦。

走在达兰萨拉碎石路上，路旁扩音机响起：“中国军队侵略我们的家乡，我们一定要返回西藏”的歌，这首歌不知唱了多少年了，但西藏人还是回不去。扩音机也同样响起达赖喇嘛的录音带，达赖喇嘛说，西藏人不是野蛮落后的民族，但也不是很好。很多西藏人都有边走路边唱歌的习惯，蓝蓝的天空一群乌鸦飞过，这样的天空在他们的家乡也有。

深度探访西藏

然而，尽管西藏问题仿佛已成为世界的时髦，或是有很多人因为宗教经验而接触到西藏问题，但对于西藏问题仍然弄不清楚，这也是我一开始踫触这个新领域所遭遇的难题。西藏问题由何而起、藏人的痛苦由何而来、甚至至到今天，就连中国方面都还不断强调解放西藏农奴的功绩时，西藏人在中国解放军入藏后究竟发生哪些事，便成为追究当今西藏问题的一切根源。但这一段历史，却因为藏人接续而来的苦难与流亡，到现在仍是资料散落各地，没有完整的记载，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达瓦才仁说，达赖喇嘛不断鼓励藏人记下这一段经历而藏人困于流亡又做不到时，我突然认为那对我而言，其实是不错的报导题材。

我曾寻求某些支持，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响。无所谓，我决定以自己的经费、时间，再到
印度、尼泊尔去寻找更多的真实历史素材，达瓦才仁为了协助我所需的一切费用与器材也必须添购，同时间我们也希望能看到由他所执笔的藏文版问世。最后，我们以最刻苦的方式，用最少的钱去更多的地方，接触到更多的藏人。虽然我一句藏文都不懂，但中文极佳的达瓦才仁以最大的耐性为我克服这个困难。在每次好几个小时的采访中，都可以看到达瓦在一阵藏语交谈记录后，立刻为我进行中文翻译。

从访问藏人的经验中，也慢慢认识到这个民族。流亡厄运让藏人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
衰老，但他们十分友善，尤其当他们深信一个台湾记者可以替他们把西藏问题带到外面的世界时，他们很多话都会说。但是，面对四十多年前与中国解放军对抗的这段痛苦经验时，藏人却极少说自己打输的一面，即使历史事实却绝非如此，但他们似乎很希望这段口述历史能变成一部吉祥的历史。藏人在回述他们的历史时，都会尽量强调他们打死了多少个中国人，并缩小自己的死亡人数，这些都有待采访者明白后慢慢去克服。

但我也发现有些藏人由于在当时曾经为中国解放军当兵，或是在对抗解放军时曾经投降
保命，因此为免自己在流亡社会中无法立足，大都拒绝了采访，这样的心态使得仅能从手中的书面资料去了解中国军队当时的情形，而无法从藏人口中得知。

奇妙的探溯

另外，我做为一个汉人记者，由于对西藏历史的全然陌生，在一开始也必须花些功夫去
克服，有好几次都想打推堂鼓。有一次为了采访与美国中情局接触极多的拉莫才仁，从印度德里坐火车联系坐了三十三个小时才到大吉岭，车资是很省，只需几百块台币，但在火车上这段期间只吃得到饼乾和橘子，旅途时间漫长，一共有两次在火车上看到太阳爬升天亮的景致，我看著窗外印度一望无际的平原不断安慰自己，这样的采访对自己都是挑战。

连同报社采访在内，两年来我一共到印度六次、尼泊尔两次，肠胃经常被迫面临最严厉
的考验，但是西藏人所给予我的异国文化的冲突，却让我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好奇与兴趣。现在我已不太会拉肚子了，在印度，我住过一个晚上两百美金的房间，也曾住过一个晚上一百多台币的房间。我心里明白，这些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将来你能写出什么。

采访西藏人，是我一个非常奇妙的经验，对于这个虔诚信奉佛教的民族来说，像我这样
一个台湾人的闯入，对他们也是一个有趣的体验。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采访阿奈巴青，她是一个年老的尼姑，一九九七年采访她时，她已六十五岁了。她住的地方很小，里面有厨房、佛堂、还有几张卧床，另外达赖喇嘛的照片则四处张挂著。她在监牢内被中共关了廿一年，被抓的时候才廿六岁，其韧性相当令人敬佩。阿奈巴青透过达瓦才仁的翻译告诉我，她们西藏人什么都没有，原来在西藏时从来不觉得需要任何人来帮助她们，等到自己失去国家时，才有很多人同情她们。而一直以来，中国可以给钱让很多人来说话，但像我们这些台湾记者，本来可以去做其他的事，可是却花时间来采访，对此她代表西藏人表示谢意。然后，阿奈巴

青看著我说：“你肯定是个佛教徒吧！”达瓦半开玩笑地说，因为西藏人认为不信教的八成是个野蛮人。当达瓦告诉她我并不是佛教徒时，只见阿奈巴青瞪了眼说：“不是佛教徒，怎么会想帮助西藏人？”

而在采访西藏这段历史中，自然又会接触到沙场老将的西藏老兵。有一次我到达兰萨拉的养老院去访问他们，那一天正遇上一个老人去世，老人所有的财产被拿出来放在地上卖，东西大都已经破旧不堪，但又必须靠这些卖来的钱才有办法为他办理后事。几个老人坐在一旁闲聊，晒太阳，手上还拿著念珠，对他们而言，死亡并不是太远的事。

面对这群西藏老兵，我突然感觉到多年来的采访工作中，不知为何总与老兵关系密切。我曾经从中国老兵写了我的第一本书“中国人的悲哀”、后来又写到白团的日本老兵、再写到现在的西藏老兵，原来在中国老兵身上闻到尿酸味现在又在西藏老兵身上闻到。心中感觉到不同种族的人类因为战争而来的苦难都是一般，更特别会在年老时摧残我们。

其中，西藏老兵洛桑更秋在采访快结束时，难过地对我说：“我这一生中会四种武器，不论是英式、美式、俄式、印度式的各类枪枝我都会使用，但却一直派不上用场，自己原来是个喇嘛，后来变成士兵，但是喇嘛没有当成，仗也没有打成。”。他难过地说：“真不知这是什么样的人生？”

与活佛接触

此外，达赖喇嘛在接受我采访时也曾建议我，康与安多的许多寺院都被多次摧毁，中国解放军来时摧毁了，之前清朝赵尔丰来时也毁过一次，在青海一带也有马步芳摧毁寺院。但藏人在寺院第一次被摧毁后冲建，第二次被摧毁后又重建，等到一九五九年第三次便全部摧毁，达赖喇嘛认为这些历史应该要写出来。达赖喇嘛说，现在中国民族老是说英国人入侵西藏，英国人来西藏是坏的，中国人来了，却让西藏解放等。但英国人入侵拉萨时没有摧毁过一间寺院，中国人不管是叫作“侵略”西藏也好、或是“解放”西藏也好，却摧毁了很多寺院，这些应该做专门的研究，研究在半个世纪内，在某一个西藏人的生命中，中国人是如何有计划地摧毁这些寺院，这些应该写清楚。达赖喇嘛说，现在踫到康和安多的老人，他们常说中国人毁了多少寺院，对藏人有多大的影响，这些事情现在更应该让下一代和未来的中国人知道，但必须是没有虚假和编造的历史，这极为重要。

我很遗憾，在这次的采访中，却无法找到太多如同达赖喇嘛所建议的采访对象，加上我这次的采访重点是放在中国部队入藏到逃亡将近九年的藏人抗暴过程，对于寺院被摧毁的素材有很多来不及搜集。但是，“喇嘛杀人”的现象却让我感受强烈。

曾有一次我在藏人开的小餐馆吃饭，因为头顶上的蚊子不少，我习惯性地伸手出去打，并发出清脆的手掌声。这时，坐在一旁已还俗的喇嘛用手遮住脸，苦恼地问我：“打倒了吗？”我注意到他的表情，故意回答：“没有”时，他的态度才转为愉快，但我真的不敢让他知道，蚊子的尸体正在我的掌心上。但是，当我感受到藏人不杀生的一面时，却又同时发现，他们的家乡抗暴时，都会沾沾自喜地谈他们曾经杀死了多少中国人；我在访问中得知许多游击队员原先是个喇嘛，这样的情形很多，甚至有的喇嘛当了指挥官，还可以做到一面念经、一面下令把犯罪者拖出去宰了，这对我这样背景的人心中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于是我才会由此入手，去了解以喇嘛杀人为脉络所衍生的西藏问题。

几次访问达赖喇嘛的经验也非常有趣。做为记者，我们被教导要与受采访者平起平坐，哪怕他是个总统；现在我得说，哪怕他是个活佛，都一样。

第一次访问他时，不知为什么，录音机录音的按钮突然跳了起来，我吓了一大跳，脸上恐怕同步显露出惊慌之色，只见达赖喇嘛先做出要我不要慌张的手势，并且马上停止谈话，好让我有时间调整录音机。而原先预计仅有半个小时的采访，也在达赖喇嘛的同意下延长为

一个小时。喇嘛保佑，我终于完成第一次有关达赖喇嘛的专访。

访问结束后，达赖喇嘛总会习惯地站在一定位子上，接受拍照留念，那种感觉好像是接受影迷合照般的熟练。现在每每看到当时的照片，我都会回想起他曾有的善意。

除了第一次的生涩外，以后他都会流露熟悉的打招呼方式，有时是轻拍脸颊，有时却很用力的拍打你的背。第三次专访他时，他一直流露出疲态，在旁的助理也一直暗示时间差不多了，但因为牵涉到江泽民"两条件说"的敏感话题，再加上只要访问的问题具有挑战性，达赖喇嘛都会乐于接招，绝不逃避。因此，我看到他挥手对一旁助理表示没有关系，他要我继续问，但是却开始脱鞋子、脱袜子、然后又换上托鞋、抓抓背、再继续做答，整个采访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他的态度，让我感受到一个大人物的诚恳，也让我体会到一个朋友的亲切。我能在一句藏语都不懂的情况下对藏人进行大量口述历史并完成这本书，最要感谢的是两年来一起为这本书努力的藏人伙伴达瓦才仁。他的中文佳、民族意识强、更重要的是他的真性情。他帮助我认识到更多的西藏历史素材，更帮助我在极短的时间内进入西藏问题的核心。也要谢谢达拉朋措扎西、拉莫才仁、然楚阿旺、嘉乐顿珠等许多接受采访的藏人，多么无私地提供我第一手素材。

谢谢达赖喇嘛为这本书写了序言，这说明他对西藏历史的重视，以及对本书的期待。而在报社，我要谢谢杜念中对我撰写这类文章的支持，以及英文采访上给我的帮助，让我还有一点信心去拯救自己的破英文；我还要谢谢好友倪炎元经常协助我进行多角度思考，以及不断加油打气；要谢谢工作伙伴摄影好手陈孔顾在印度、尼泊尔的患难相助，以及提供本书的许多好照片；另外，也谢谢摄影记者游智胜为我翻拍许多西藏历史照片；谢谢英文极佳的萧羡一在英文资料上曾给我的协助；谢谢在台湾中文一样好的藏人贡嘎经常为我做翻译；更要谢谢我哲学系的学长薛中立，他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与第二个读者，几次修正后都给我很多逆耳的建议，才让本书能够有所进步。

谢谢我的家人，他们永远是我温馨的后盾。

最后，我要谢谢联合文学出版社，让我觉得关心西藏问题其实并不孤独。

正文摘录：

一会儿，我听到隔壁喊著："母子俩，坐不住了，我们一块儿逃吧！"我母亲是个跛子，我才六岁，那里走得动，我母亲喊："你们逃命吧！我们母子俩是走不动了。"又在灶旁缩了一会儿，实在待不下去，帐房已被子弹打得破破烂烂，母亲一手拄著拐杖，一手牵著我，冒险往外跑，当我们母子二人一拐一拐的走到帐房外时，只见我们雇主一家九口人全部死在一块，在一堆牲畜尸体旁，无一幸免。

我们母子俩一拐一拐的往河边跑，我们住在平原上，只有河边有凹地可躲藏，我们找到一个水沟，躲在里面。我母亲脱下我的一双藏靴，把我装到她的藏袍的怀里，也不知何时，我就在母亲的怀中睡著了。睡梦中，听到母亲在摇我，说："中国人来了，中国人来了。"我惊醒时，见河对岸有两个中国士兵，一人牵著一马，一人平端著一枝枪，站在距离我们五十公尺的地方，也不瞄准，只是平端著枪射击，打一枪，就再拉一下枪栓。

我母亲向他苦苦哀求著："阿爸罗罗！（西藏安多方言，表示乞求）我们是一个老妇和一个小孩，不要杀死我们，求求啦！保佑啊！"求了许久，那人仍不停地、不急不慢地向我们母子俩射击。一会儿，可能母亲已经绝望了，不再乞求，将我从怀中取出，为我穿鞋，并将五世嘉木祥的照片也塞在我的靴子中，用靴带绑住了。这时母亲的脸上滴下几滴血，当时她已经不能说话，张著嘴，头向后仰著不动，我拼命叫著："阿妈"，又摇著我的阿妈，河对岸那个中国人见我母亲已死，也返身走了。

喇嘛杀人

目录

第一章

现在的人几乎无法想像，四十年前（一九五九年）的三月十日，会是西藏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当今所有的西藏问题都要从这一天谈起。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由于中国西藏军区在这一天邀请达赖喇嘛前往营区看戏，藏人怀疑中国将会藉机拘禁达赖喇嘛，一旦达赖喇嘛去看戏就再也回不来了，因此一再要求达赖喇嘛不要前往。

在这之前，西藏东部的整个康区已经战火连天，西藏康巴、安多人为了抵抗中国军队入侵，已经在广大的草原上进行了无数场游击战斗，鲜血把家乡的江河染成红色。藏人的装备与组织训练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比，节节败退来不及喘气的西藏游击部队已经退到西藏的西部来。

在金沙江以西的西藏西部地区，原本是“一国两制”的保护区，不料也在后来续演东部的血腥战斗，无数藏人躲入丛林中进行最后的捍卫，更多的藏人只能带著绝望的心情颠沛流离，在人烟稀少的西藏土地上已经望不见毁败的故乡，拉萨成为他们最后的寄托。

拉萨是藏族的圣地，在这个西藏首邑之处有他们最崇拜的达赖喇嘛，是他们的再世活佛，平时藏人就常在这里绕塔礼拜，现在受了中国人的欺压，更希望在这里找到最终的安慰。但很多藏人都亲身经验到，当时的中国人经常会藉著开会或看戏名义将人拘禁，在西藏东部地区有很多藏人都因此一去不回，但仁慈如达赖喇嘛却丝毫不了解中国人的诡计，所以许多藏人自动聚集起来，决心阻止类似的悲剧发生在他们的活佛身上。

[/font][font=宋体] 那一天，超过一万以上的拉萨藏民聚集在达赖喇嘛的行宫罗布林卡前，内心焦急又愤怒。他们不停高喊著：“中国人滚回中国去”、“西藏的主人是藏人”等口号，震耳的怒吼让在行宫内的达赖喇嘛终于放弃去中国军营区看戏的计画，但这个群众行动同时也促使中国各路军队从现地开始向拉萨集结，汉藏对峙局势随之升高，拉萨被推到战争的边缘。

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九年，中国军队逐步扩散之后，整个西藏大致上已为中国所严密控制，对达赖喇嘛而言，几乎可说已无片土安全之地，但因为拉萨情势愈来愈紧张，流亡成为这个年轻活佛无法抗拒的劫数。

七天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化装流亡到印度，接著有近十万名西藏人跟著逃

出来，除了天上的青天与脚踏著的土地外，流亡的西藏人一无所有。

逃亡前，达赖喇嘛最后一次来到他的经堂，在他的宝座上坐下，翻阅一本置于座前叙述佛陀教导的书，看到了释迦佛要弟子们勇敢的章节。

然后，达赖喇嘛阖上书，加持了这个房间，关上了电灯。没有人认出他就是达赖喇嘛，这个人身著传统藏族士兵的服装，戴一顶帽子，背了一枝枪。

达赖喇嘛说："这是我第一次把释迦牟尼佛的袈裟脱下来，穿上俗人的衣服，心中觉得非常的悲哀。"

当时护送达赖喇嘛的达拉朋措札西（以下简称达拉）提到，达赖喇嘛和他一起逃出，因为他是警卫团团长，常常在巡逻，达赖喇嘛跟在他的后面，乔装是他的保镳。达赖喇嘛平时穿袈裟，但那晚他穿著藏服，戴一顶帽子，背一枝枪，就走在他的后面，别人可能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巡逻人员。

达赖喇嘛没有时间携带不是十分必要的东西，他们必须在黎明之前远离拉萨。噶伦（指内阁官员）们携带了噶厦（西藏政府）的印鉴、办公室的印章、以及一些碰巧放在罗布林卡行宫内的文件。达赖喇嘛所能带的只是两、三件换洗的喇嘛法袍。

所有要走的人一共分三批，达赖喇嘛的母亲和姐姐都打扮成康巴族的男人，她们和达赖喇嘛的弟弟第一批走，达赖喇嘛第二批走，其他的噶伦和经师殿后。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卑微的士兵，达赖喇嘛第一次在没有人民列队欢迎的情况下，走出自己的行宫罗布林卡。

达赖喇嘛的心情一直非常痛苦，虽然他极不愿意离开，但由于情势所逼又不得不离开。达赖喇嘛不知道，现在他离开，什么时候能回来？他正在离开西藏，但他的人民却还在西藏。达赖喇嘛一路上对这些事一提再提，不愿离开，可是，也没办法。

流亡的史诗让西藏人痛苦地吟唱至今，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他的前世一样，终不可免地须在流亡中遥视自己的西藏子民，两世达赖喇嘛的痛苦都是来自避也避不开的邻邦－中国。

然而，当时这个出亡计画究竟如何策画进行，一直是个历史秘辛，几个秘密策画人从未透露当时行动的内容，第一手的资料也未曾对外公布。如今，透过当时包括帕拉、尼乌夏与达拉朋措札西等数名秘密策画者的口述历史资料，逃亡行动的真相才得以一一揭开。

根据当时噶伦尼乌夏回忆指出，从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藏历二月一日）早晨西藏人民涌到罗布林卡后，噶厦三名官员先到罗布林卡，然后到中国西藏军区司令部对中国人解释达赖喇嘛不去看戏的理由，回来再向达赖喇嘛报告经过，一直到十七日逃亡前，前后共七天的时间里，根本没机会回自己的家，而且白天不思饭食，晚上又睡不著，虽然不觉得惊慌，但也不知要如何是好。

达拉则表示，在三月十六日那天，噶厦内部其实还没有决定达赖喇嘛第二天就要离开，但随后中国军队共射击了两发炮弹，都落在罗布林卡的北边，发射的地方来自布达拉宫附近，后来知道他们是在测试大炮的距离，西藏政府本来的担心因此更加深了一层。

十六日清晨，尼乌夏曾经特别回到布达拉宫，收拾在新年和法会时佩戴的金护身符等珍宝，他顺便从布达拉宫屋顶用望远镜观察，看到中国军队的驻地一如往常，还在汽车站院内晒衣服，一片寂静，看不到有任何作战准备的样子。

他在宫内祈祷后回罗布林卡，没想到中国部队就在这个时候开炮了。一发炮弹落在罗布林卡达丁不变宫的后面烂泥中，另一发落在院墙外附近，中国军队的炮击使噶厦突然处于紧张中，也因此促使了做出出行的决定。尼乌夏说："我们噶厦坐镇罗布林卡，每天开会商讨，各级官员都在，期间我们穿著平民的服装每天前往罗布林卡四周巡视各部守军，同时为了指挥军队也成立了指挥部。出行的当天晚上，还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罗布林卡内院，乘早已准备好的卡车到德吉林卡更德林（拉萨寺院名称，但主管喇嘛也叫更德林）的房间。我们的出行人民并不知道，坐卡车也是为了防止让他人发觉。"

在出走之前，噶厦大部分官员在罗布林卡待了七天左右，最后大家认为达赖喇嘛继续留在罗布林卡是很危险的，必须出走，换言之，十六日炮弹攻击事件发生后，才做出出走的决定。出行路线和细节是由达赖喇嘛侍从官帕拉一人负责，帕拉于是制定了一个出行计画。帕拉回忆说：“当时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恶化，因此再继续这样留下去，后果难以承受，加上我们再这样待下去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了，因此讨论多次的结果是要在某天突然出行，在此之前都不能传扬出去。

由于绝对不能公开出行，因此必须在做好内外保密的同时做好准备，而如果准备的人太多就会像谚语所说的：“未抓住麋鹿而漫山全是猎狗的叫声”，因此必须慎重布置，尽可能的如俗语所说的：“既不惊动母鸡又能取出鸡蛋”。因此，有关的准备最好由一人负责，由是噶厦让我全权准备出行事宜，于是，我决定了制定一个出行计画。

当时因已确定出走，就出走的路线和时间等等商讨了许多次，最后请乃穷护法降神谕，再根据神谕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外出，有关出行的方式和路线、内外保密等准备工作，由噶厦下令落在我身上。

为了保密，做准备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政府虽有许多骡马，但如果使用这些骡马将有可能泄密。当时更德林有许多骡马，我便要更德林将所有马匹先赶到雅鲁藏布江以南等待。

更德林已派了所有的马匹先行渡过雅鲁藏布江等待，又由于罗布林卡无法骑马排队而出，因此准备到时将布达拉宫山下军械库的武器，由卡车乘夜运到罗布林卡散发给人民时，乘机实施出走计画。

当时，罗布林卡以南没有中国人的兵营，是个乾净的去处，从那儿前往山南的途中要经过拉萨河的然玛冈渡口，为此我派了札什兵营代本（西藏最高军衔，相当于团长）札西巴拉等率部分精锐持精良武器前往占据然玛冈渡口和渡口对面的夏嘉噶波山头等。

在天刚黑时两位经师、噶厦、西亚（藏人称达赖喇嘛家族的人为亚西）、以及负责达赖喇嘛食、寝、供的三总管等，用去运武器的卡车从罗布林卡送到更德林的房子中，车上主要的有达赖喇嘛、总堪布噶仲、警卫团团长，我自己则通过罗布林卡南门向然玛竹卡渡口进发，先步行一段时间后，然后为达赖喇嘛骑马出行而准备了乘骑，这事是由军营连长噶桑占德负责派遣。

在噶厦出行时，由于不便著黄僧装而著俗装，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可以动身，在上述准备妥当后，也向噶厦做了报告，在此之前，罗布林卡各门甚至一些水沟也派遣了政府僧俗官员与军人、人民等担任守卫，并在罗布林卡附近对来往人员进行搜身检查，晚上噶厦和我等出去巡视时，会有守卫喝问：“是谁？”并以手电筒照射观察。

为了防止泄密，在达赖喇嘛出行前的一天，我们召集守各门的人员，对他们说：“我们晚上出来巡视时，如喝问是谁并以手电筒照射的话，敌人的特务说不定就在那里，可能会被发现，因此从今晚开始我们出来巡视时，除了双方从声音办别以外，不许用手电筒照射。同时，明天将派汽车前往布达拉宫山脚运武器，对卡车也不必检查，可以让他直接去。

而且在达赖喇嘛未出行前，我们即将达赖喇嘛的厨师、餐具以及有关器具先行送到然玛竹卡，因为达赖喇嘛的食物不能出问题，所以让他们在头上顶著佛祖照片、发誓绝不向他人泄露点滴。这名厨师在临走时还说：“我就这样走掉大厨不会追查吗？请向大厨说一声。”我说：“这样乱的时候谁会追查？”但后来我向大厨也谈了这些人是我派去的。

在此之前，我又让色拉寺堪布（高僧）派十余名可靠的僧人装成替我念度母经，且一直驻札在罗布林卡里面待命。”

所有的准备事宜都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当时参与的达拉曾忆及，从位于罗布林卡的寝宫出走时，达赖喇嘛正在进行乘觉法事，他和帕拉以及两个警卫在经堂门口等候，为防起疑，他还将随行的两个警卫先遣回，达赖喇嘛从经堂出来前往罗布林卡南门时，另有总堪布（高僧）加入，一行共四人，当时达赖喇嘛著普通装肩上扛著一枝步枪，装成警卫士兵。

一行人出南门时，正好与派去河对岸侦察枪声的人相遇，他们询问去向，达拉说去巡视，他们要求一块去，由于与达赖喇嘛同行，为防泄密，帕拉说：“我们不必如此愚蠢，一个人可以去的地方却去那么多人，彷彿在告诉人我们在这里。”在他说话的同时，达拉和达赖喇嘛从帕拉后面溜过去了，后来帕拉才再赶上。

十七日晚上七、八点左右的时候达赖的两位经师、工作人员、噶伦及达赖喇嘛的亲人等共计将近一百人，分三批走不同的路离开罗布林卡。当时有一点月亮，刮著风，离开时就怕惊动附近老百姓知道。

到然玛竹卡时，达赖喇嘛骑马出行，前后左右都是西藏士兵与民间游击队“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的人。到了南嘉贡附近，达赖喇嘛虽想休息一下，因为该地没有人家、又未带垫子，不忍让达赖喇嘛坐在地上，于是又往下一站南嘉冈溪卡出发。

一路上天气都极为恶劣，不但下雪又下雨，非常寒冷，到南嘉冈溪卡时，帕拉见寝室已经准备好，达赖喇嘛准备要休息，但却没有被子。这时帕拉看到达拉的马鞍上有一条毛毯，心想达赖喇嘛不披毛毯会著凉。达拉说，他已在上面跨过，想来已不洁，不适合给达赖喇嘛用，但除此没有其他衣被，于是帕拉取下来拍了拍，围在达赖喇嘛的腿上，让达赖喇嘛睡一会儿。这段期间，噶厦和两位经师一直未到，帕拉等人担心中国人追过来，于是又急忙起程，当时已是凌晨四点。

第二天下午，噶厦的其他人也已赶到，当晚住在冉蔑寺院，达拉说，因为他已有七天没有好好睡觉了，那天虽然没有被子，但仅是围著一个僧人的法衣就沈沈地睡著了。

如此达赖喇嘛一行人就慢慢来到琼结，通过雅隆到隆孜宗、措纳、到芒芒，最后到了一个叫曲顿玛的印度边防处。帕拉并且对一路上的护卫事宜做了说明：

“从罗布林卡出行前，札什兵营的代本巴拉等官兵被派去守卫夏嘉噶波山和然冈渡口，做好了一切准备，其后达赖喇嘛从罗布林卡通过然玛竹卡到印度为止，负责警卫的是上述那些警卫和札什兵营的官兵，负责驮运的有在罗布林卡装成给我念母经十余个僧人。然后到了然玛竹卡（已是山南四水六岭的势力范围），就有四水六岭部的更噶桑丹、罗桑益西，四水六岭的部队都列队持旗，隆重护送。”

然而，在达赖喇嘛离开罗布林卡时，一开始并没有计画要到印度，就只是想著要离开，先过雅鲁藏布江，渡了河后再进一步与中共谈，这是因为觉得过了河比较安全，总是有一条河隔著，没有想要到印度。

但出行后第二天，噶厦等人商讨后认为最合适去的地点是印度，可是担心在边界被阻，于是决定先派一个可靠的人赴拉萨向印度领事馆提出要求。

后来帕拉派哲康堪琼到位于德吉林（在藏语为幸福林园之意，为一林园名称，印度代表处就设在那里）的印度代表杰巴处，提到中国和西藏已处于紧张关系，达赖喇嘛可能被迫需要出行，出行期间西藏还会与中国人谈判，如果谈不成，达赖喇嘛出行的地方除印度外别无他处，因此请印度代表杰巴就此向印度政府报告。

印度代表杰巴的回覆是，他们需要知道出行的时间、地点，因此需要帕拉亲自走一趟德吉林。但帕拉因为担心自己可能受到监视而再将诉求重提一次，请他务必向印度政府报告。最后，杰巴同意向印度政府报告，如此，西藏政府在未出行前就已先和印度打了招呼，但印度方面尚未就此给予答覆。

尼乌夏也说，刚开始的计画不是要直接去印度，他们原以为四水六岭有很大的势力，因而企图据守山南地区（指拉萨南部、雅鲁藏布江以南到印度边境一带），并先将西藏政府的首都设于隆孜县，打算暂时在隆孜县住下，再立即向西藏各地宣布，要求同心协力抗击中国人的攻击。但至琼结时，传来拉萨发生战争以及中国军队正向山南进发的消息，于是宣布建立新政府后只待了一天便起程前往印度。当时若非武器优劣悬殊，他们寡不及众而未能守住，一度曾有在山南停留抗击的打算。

达拉则说，当时没有计画到印度，但西藏政府计画到隆孜县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后来据消息说中国部队在山南增加兵力，也在后面跟踪，因此才有到印度的想法。

到了贡噶县，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名义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班禅喇嘛，一封是给留在中国西藏军区内的另一噶伦阿沛阿旺晋美，请他和中国谈，不要用武装的力量对抗西藏人民，要好好谈。达赖喇嘛离开是不得已，不能不离开，请中国不要用武力对付西藏人民。

最后达赖喇嘛一行人到了芒芒、前面有一叫曲顿玛的地方，是一边防站，他们不知能否在曲顿玛直接越界到边境，于是提前派了派仁希帕拉与噶桑土登前往联系，要他们一得到回音即刻禀告。

当天晚上噶桑土登返回芒芒传来印度政府的话说："请达赖喇嘛前来，印度政府已准备好接待。"于是当达赖喇嘛一行人到了曲顿玛时，已有印度官员和地方县长等表示欢迎，门达旺的县长请达赖喇嘛入帐篷，在场的士兵也致敬，令逃亡的一行人感觉彷彿做梦一样。

当时的噶伦协色说："这不会是乃穷法王的幻术吧！"由于门大旺已有极佳准备，大家休息了三天。

达赖喇嘛能够有惊无险地逃亡到印度，事后其实连随行官员回忆起来都觉得奇怪，当时西藏到处都是中国特务，但不知为何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而且逃亡过程中惊险万分，有一次甚至几乎是与中国军营擦身而过，那是他们步行两三公里到拉萨河边的然玛竹卡渡口，过河往西走了一段路，这期间便与位于罗布林卡以西诺堆林卡中中国军营隔河相望，逃亡队伍再往西走了一段路后翻过洁拉山，就大致脱离中国军队控制的范围了。当然如果中国军队召来追兵，达赖喇嘛还是有危险。

尼乌夏后来回忆说，他不知道为何中国军队一直没有发现他们，因为在出行期间，虽然他们一直说随行的官兵要分批运行，但是四水六岭的六、七十骑却一直和达赖喇嘛挤在一起，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听。尼乌夏说：

"随行的官兵虽分批运行，但四水六岭的六、七十骑却一直和达赖喇嘛挤在一起，对他们说："不要这样，要远远分散，如此如有追兵也好布署，像这样一块走对达赖喇嘛是极危险的事。"但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听。例如，到措纳时有飞机来，当时下雪，一片雪白，我们在雪山中，有一个康巴人竟以枪瞄准，我急忙说请不要这样。当晚我说，你们不能这样，今天来了飞机已发现了我们，明天出行时说不定会前来轰炸，因此你们不能挤在一起随行，我们应将队伍分成几股前进等。

第二天出行，天空一片晴亮，我心里想著不会有飞机来吧！不停地向空中张望，幸亏未来，那时敌人不知被什么蒙住了头所以没有发现我们，否则与敌营是相当近的。在雅鲁藏布江这边南行时，河对面敌营中灯火辉煌，但随行的士兵对此不仅不谨慎，还在队伍中呼喊，如说不是这条路等，并打手电筒，我说不要这样，但没有人听，从那点看中国人似乎会知道，但他们摸不著头而没有来，否则怎么打得过啊！"

达拉也说，当时那些四水六岭的首领在途中都布置了军队，并说有一、两百人，但在一些地区却只有五、六人，那么危险的处境现在想起来都害怕。

但达拉认为，达赖喇嘛出行是亏了三宝的佑护才平安无事

然而，对于这段西藏人极为珍视的历史记忆，中国却提出截然不同的版本。尽管西藏方面自认是因聂仲（秘书）帕拉的秘密计画，以及达赖喇嘛伪装成功才得以逃出中国魔掌；但中国方面出版的一些书籍却把整个事件解释为是因为毛泽东故意放人，所以达赖喇嘛才能够离开西藏。

曾在西藏军区政治部宣传处任职的吉柚权，在他个人所著的"西藏平叛纪实"这本书中就提到："当时的军区领导谭冠三得知拉萨局势变化，已离开文工团，回到军区司令部。谭冠三立即将噶厦发动叛乱情况向中央及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军委立即将西藏的情况电传正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得知西藏噶厦政府发动叛乱的消息后，并不吃惊，微微一笑说：“果然等到了今天。”毛泽东并于十二日电报指示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叛乱集团的策略是：“在拉萨搞叛乱，将我军驱走，这一批人实际上已与中央决裂。”

而西藏工作委员会当时的工作策略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以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如果他们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挡。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毛泽东对噶厦叛乱集团外逃敞开大门。”

而且，吉柚权还在该书中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老大哥苏联，在获知西藏叛乱后，从十日起将苏联的卫星不断调整在西藏上空飞行，给中国中央不断提供西藏叛乱集团的军事行动状况，为中国中央、中央军委对付西藏叛乱武装制定措施和方案提供了可靠依据。

同时间谭冠三也召集工委和军区领导，分析拉萨情势，制定应急措施。中途收到毛泽东的指示后，谭冠三立即通知山南（仅有泽塘是唯一解放军据点，其他多是四水六岭护教军）、亚东（位于西藏与印度边境）部队及各边防哨卡，如发现达赖及其叛乱集团外逃，一律不许阻挡，放他们出去。

吉柚权的这些说法其实相当夸大，令人不得不怀疑。在有关苏联调整卫星一事，不但技术困难，而且卫星之可调整次数很有限，就算可以，代价也是很高，四十年前的苏联有没有这个技术与条件都值得怀疑，就算有，又是否愿意做调整，其实都是很大的疑问。

再者，所有中国方面的记载都提到毛泽东的“放人政策”。当时的西藏军区副司令李觉也在事后回忆到：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夜，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准备离开河滩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里，凭藉月光看著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萨河南岸渡人……。”

此外，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他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有些想法和考虑，常出乎一般人预料。一九五九年，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负责解决“西藏叛乱”，当时达赖被围困在布达拉宫内。毛泽东发电报给西藏工委和张国华，因为电报抄告各省、市委，他当时正是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因此看了这份电报。

许家屯说，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上要张国华部队主动让出一条路，并指定这条路由布达拉宫经何处，直到中印边境，让达赖喇嘛撤退到印度去。电报很详尽规定了张国华要如何做，什么时候开始，佯攻什么地方等等。这样达赖喇嘛果然逃到了印度。

许家屯认为，这样的指示，出乎他们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识之外，毛泽东这个考虑，是因为达赖在西藏人心中是个活佛，活抓固然不好处理，击毙更不妥。他认为这是毛泽东的考虑过人之处。

许家屯的回忆记录相当令人吃惊，这似乎是可以证明毛泽东有意放人的明显证据。但令人不解的是，当时张国华本人在北京、并不在拉萨，拉萨主要领导是第三号人物谭冠三，因此，毛泽东在下这道指令时，为何是给张国华、而不是谭冠三，则似乎有违常理，也与“西藏平叛纪实”的内容不相符。

而且，更让人无法置信的是，按照许家屯的说法，等于说毛泽东将最机密的战情电报广发天下周知，这种做法相当违背常理。同时，毛泽东人远在北京，如何能指挥战场现地什么做、什么不做、如何做、何时做的战术性细节行动？也是极不合军事常识的。

“西藏平叛记实”的作者是中国高阶军官，虽然他在查阅当时资料上有一定的便利条件，甚至还可以说是较权威的，但对此的叙述却也很混乱。例如书中提到三月十六日下午，谭冠三的信到达赖喇嘛手中，达赖喇嘛写了第三封回信，第二日（十七日）逃离拉萨时，该书中说到：“谭冠三刚收到达赖秘密传来的信，正在考虑如何伺机将达赖挟来军区，他担心时间拖久了达赖会有危险或被叛乱集团挟持外逃，根本没有想到达赖在今天（指十七日）晚上离开

了拉萨。

自从拉萨形势变急后，西藏军区情报部派出情报小组到拉萨各渡口、重要交通路口潜伏观察敌情。

潜伏在拉萨河南渡口的情报组，十七日深夜发现几百人从拉萨河涉水上岸到南渡口，上岸后往南而去。但没有想到会是叛乱集团的首要人物达赖和他的亲属。

三月廿日凌晨三点四十分，一五九团副团长吴晨在拉萨河南渡口与叛匪打响，..谭冠三立即将此情况上报中央及中央军委，并汇报达赖喇嘛可能逃离拉萨，中央立即将此情况点转给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军委要求西藏军区把叛乱武装死死吸引在拉萨，等增援部队进藏时对其进行合围，将噶厦叛乱集团彻底、乾净、全部歼灭在拉萨。”

换句话说，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时，中国在西藏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谭冠三，不仅根本没有想到达赖喇嘛会离开拉萨，甚至在考虑援救方案。当达赖喇嘛离开拉萨三天后，谭冠三给中国中央的报告中还只是不肯定的估计达赖喇嘛可能已经离开，当中国军队炮轰罗布林卡时，书中谈到谭冠三担心达赖喇嘛还在里面，但中国西藏军区情报部部长认为已不在，理由是十七日夜晚有五、六百人携械过河，只有达赖喇嘛才需要出动如此多人等，分析虽有理，但解放军部队居然能面对数百人的携械行为，却全然无动于衷的说法，也令人无法置信。

中国的报告中曾经特别强调持械一事，关于这点若根据达赖喇嘛警卫团营长索南札西在其所著“一个藏军老兵的一生”所言，就可得知中国所指的可能是这些断后的藏军，只是人数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多。索南札西写到：“藏历二月八日（三月十七日）达拉叫我准备一百余名精锐，说如果达赖喇嘛需要出行时可以为后卫。我于是挑选了勇敢、机灵又可靠的一百廿五名官兵，告诉他们我们要去占领然玛冈渡口附近的山头，叫他们准备二至三天的口粮。当晚十时，达赖喇嘛离开罗布林卡，十二时，我率领一百廿五名官兵随后跟进，在内吾宗一直待到凌晨为止，这时见河对面的中国军队吹了起床号，不久敌军出来做体操，与平时一样毫无异状，显然没有发现达赖喇嘛已经离开拉萨。”

不过，同样在“西藏平叛纪实”这本书中，还特别针对在拉萨发射的两枚炮弹做了解释。书上说，因为叛乱武装曾经连续三次向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进行挑衅性射击，密集的枪弹打坏了该站许多门窗，气焰非常嚣张。

该站的经济警察雷惠山对叛乱武装的这种抗衅非常气愤，没有请示任何人就用六 0 迫击炮还击了两发炮弹，炮弹落在罗布林卡北面围墙以北两百到三百米处爆炸，虽未杀伤叛乱武装人员：“但叛乱武装以解放军开炮射击为藉口，又以保护达赖安全为理由当晚深夜挟持达赖从拉萨河南渡口逃向山南方向，叛乱武装的上层集团六百余人随行。”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分析，当时中国军队也许从一开始就怀疑达赖喇嘛会出逃，但达赖喇嘛真正离开那天，他们说不过是看到几百人离开而已。

但这些说法实有太多疑点，以公安进行炮击一事而言，当时的共产党军纪甚严，军官在前线岂敢无令而行？而且，如果中国早已料到达赖喇嘛会出逃，无论如何推想，看到大批人群一定会上报反映，当时都没有这些动作却在事后做这些说明，很容易让人认为，其实中国军队在当时事前完全无法掌握达赖的行踪。

而在许多中国有关记载中，对于达赖一行人的出行队伍都是以六百人称，但当时陪在达赖喇嘛身边的西藏政府警卫团团长达拉却表示，事实上出行者一共分成三队，只有几十人、不到一百人而已，达赖喇嘛决定离开罗布林卡时，噶厦政府已在拉萨河的山腰都布置了西藏人的军队，来保护达赖喇嘛。人是几十个人陆续通过，那条路常有当地人通过，七、八人，五、六人，但不集在一起，后来就是这个办法才通过的。

离开罗布林卡有一段路是走路，后来达赖喇嘛骑马到拉萨河岸，然后又坐渡船离开河岸，在此之前，都是在晚上行动，晚上有风吹，有一点月光，树叶交叉成各种形状，让人怀疑有没有中国军队的埋伏。过了拉萨河就有人接应，就都是藏军了。

达拉指出，当时中国应该已料定达赖喇嘛可能出走，为了抓达赖喇嘛，在西藏拉萨河旁边布置了很多西藏军区的情报人员，一有情报马上就传到西藏军区，但深夜二、三点时，有带马的人将近一百人离开河畔，情报人员想这些人绝对不是达赖喇嘛，没想到这一行人正是达赖。

有关达赖喇嘛逃到印度中国并未阻挠的说法，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认为，毛泽东完全是"打肿了脸充胖子"的说法。嘉乐说："毛泽东讲大话，如果他老早知道此事，达赖喇嘛就出不来，也不会有今天西藏的问题了。中国不可能随便把达赖喇嘛放掉，这些话是骗人的，毛泽东已是骑处难下，因为达赖已过到山南，不是他的控制区了，除非他派飞机来轰炸，飞机来轰炸也不一定炸得到达赖喇嘛，听说那时有两枚大炮打罗布林卡，但没打前达赖喇嘛已经离开罗布林卡了。

所以毛泽东才骗人，说是他叫达赖喇嘛走的，这是说假话。不要说毛泽东，就连新华社社长许家屯都说他晓得这件事，真是开玩笑！当时很少人知道这件事，连我都不知道，达赖喇嘛离开到山南后有我们的通讯人员，我才知道达赖喇嘛已经离开，所有人都不知道。

共产党在开玩笑，毛泽东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如果他可以消灭，他一定会做这样的事。"

嘉乐顿珠所指的通讯员之一的阿塔也说，（在达赖喇嘛到了山南之后）他每天都以发报机与美国联系，告诉美国护送的状况。

究竟是因为毛泽东的计谋、还是佛祖三宝的保佑才让达赖喇嘛顺利逃出?B 在战争边缘的拉萨，这个历史谜点到今天依然无法解开。由于山南在当时几乎已全是"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的势力范围，达赖喇嘛一旦逃到山南，要顺利到印度几乎没有任何困难。然而，虽说当时达赖喇嘛是乔装出行，而且行前属于高度机密，但因须做各种逃亡准备，因此消息可能难免走漏。

例如，帕拉等人必须事先与四水六岭的军官进行联系，以便在山南时进行护卫措施，应该已有相当数目的人知道出行计画。而且，就算不知道具体离开的时间，很多人都已猜到达赖喇嘛不得不走的可能。

如达赖喇嘛的警卫团营长索南札西是出亡的当天早上才知道的。而被中国称为"叛军总司令"的拉鲁才旺多杰（原来的昌都总管）则在中国出版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中谈到，他是在达赖喇嘛走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拉鲁回忆说：

"藏历二月二（三月十一）日，我到罗布林卡颂经堂参加会议，三日会议迁到布达拉宫脚下的雪印刷厂召开，会议选出我和其他四人为总司令，侍卫代本达拉朋措札西又来请示是否要占领然玛冈山峰，我向下属询问了具体状况，派人给功德林拉章（拉章是活佛官邸）稍去了一封极为重要的短信，并要求派两个人到然玛冈山佯装拾柴，观察解放军有没有占领山峰。如果没有，便从渡口抽调百余人去占领。

六日，罗布林卡侍卫军里的一个昌都人，名叫甲央索巴的告诉我，昨晚开了头人会议，要求备好所有马匹，我想，可能是达赖一行准备到外国去了。

九日上午，我派佣人米玛去打听，但罗布林卡各个大门均由藏军把守，禁止任何人出入，我估计他们已经走了。

十日上午，粮仓职员僧官强佐罗珠群沛告诉我，达赖喇嘛一行已于八日晚启程前往印度，罗布林卡中的精锐卫教军也走了一半。"

由此可知，就连前噶伦、卫教军总司令拉鲁都不知道达赖喇嘛出行一事，事前他都是猜测。负责策画出行事宜的帕拉也提到在出亡期间，曾有人当面问他达赖喇嘛离开罗布林卡的事，他无奈也只好装傻以应，帕拉说：

"至南嘉贡附近，天气很冷，达赖喇嘛说是不是休息一下，因该地没有人家，又未带垫子，因此我不忍让达赖喇嘛坐在地上，便说我去找一户人家，当时我正在牵达赖喇嘛的乘骑，我让代本达拉替我牵马后扬鞭先行，到一户人家问此地情况，对方说最好是到南嘉冈溪卡（贵

族的庄园）去。

我们到了策木林所属的这个溪卡已点灯，在门边安置下马凳，上面铺毯子等，总之做好了一切准备，溪卡的人们对我说：“见到您很是高兴，达赖喇嘛出行了吗？”我佯装不知地说：“达赖喇嘛出行吗？”对方说：“觉登大喇嘛来此说，达赖喇嘛出行与否都要做好一切准备。”我说我不知达赖喇嘛是否出行，对方又问：“那您去那里？”我只好说：“来看看。”

既然藏人中已经广为猜测达赖喇嘛出走的可能性，那么中国军队应该也已有此警觉才对，在中国的想法上，一开始可能认为因为罗布林卡受到拉萨群众团团围住，达赖喇嘛应该还在里面。但不管中国部队的炮弹轰炸是有意还是无意，由于炮击必然造成极大的惊吓，中国官员应该很容易就可推论出，炮弹虽然未命中目标，但受到围困的达赖喇嘛已心知非得设法逃亡不可。

然而，就算中国军队内部已经获悉达赖喇嘛出走，但也未必就能掌握达赖喇嘛的行踪。而且当时达赖喇嘛身上并没有穿著袈裟，中国军队有没有能力识破达赖喇嘛的乔装，也是一个问题。目前以各种资料推敲来看，几乎可以断定，达赖喇嘛在急促间做出出走的决定，在时间上很可能比中国预期的要早，在达赖喇嘛顺利逃出后，中国方面只好以“故意放人”的说法来自圆其说；也因为这样，中国方面很多“目击者”口中的人数与真实出入过大，想来多半是出于想像吧！

回顾这段历史，西藏人基于民族自尊，绝不愿相信自己的领袖是在中国的窃笑偷窥下离开；而中国方面力图平叛，没想到最后竟让“达赖集团”溜到海外，造成今日难解的西藏问题，频频受到国际谴责，毛泽东虽然赢了“里子”，但却重重输了“面子”。到了九 0 年代以后，中国方面一切对外言论齐一口径的说法，不能说没有心理战的成份在内，但究竟有几分真实，还有待更多的直接证据。

在达赖喇嘛离开后，拉萨终于像东部其他部落一般，进入战争的暴风圈。

中国部队不断轰炸拉萨城市和寺院，拉萨战役终于爆发。

拉萨战后，中国部队终于用武装力量“解放”了西藏。对此达拉说，中国提到达赖喇嘛是他们故意放的，他认为没有这个可能，因为事后得知罗布林卡死了很多人，中国军队还去翻那些尸体，看看是不是达赖喇嘛，表示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可能在炮击中身亡，但他们看了好几具尸体，都说不是达赖喇嘛。

从此，达赖喇嘛已经顺利逃出的消息在藏人口中流传，西藏人心溃散，从拉萨到印度的路上到处都是逃亡的藏人，内心完全绝望。但达赖喇嘛却没想到，他们的逃亡会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就连远在欧洲与美洲的人们都想知道达赖喇嘛是否平安的消息。

更没想到的是，这次出亡，却接续出四十年流亡岁月的辛酸无奈，达赖喇嘛说：“当时除了逃跑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假使我留下来，也不能为我的人民做点什么，中国人最终会捕获我。我所能做的就是到印度去要求庇护，为我的人民保存著不灭的希望！”

第二章 和谈

一九五 0 年一月，莫斯科时间凌晨两点钟，莫斯科给北京打了一个电报：“支持北京解放西藏”。

达赖喇嘛的警卫团团长达拉朋措札西说，他曾经看过这么一个机密文件，毛泽东在当时徵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得到的答覆是，假使武力解放西藏，苏联承诺将完全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打败国民党后，同年十月一日便宣布要解放台湾与西藏。但当时只说要解放台湾和西藏，并未说要用武力解放。后来毛泽东结束莫斯科的访问回到北京后，就计画武力解放西藏。

在西藏内部，却依然是青康藏高原上封闭自主的农牧社会，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回忆

说，当时西藏内部的情形很复杂，西藏社会非常封闭，这不是一、二年的封闭，是几百年的封闭，以致非常的保守落后，不要说知道世界的情形，连中国大陆的情形也不知道，还有印度的情形也不清楚。

嘉乐说，西藏人和外国人很少有接触，只有少数的几个英国人在拉萨设了一个商务办事处，还有尼泊尔、国民党政府也有一个办事处在那里，除了这三个办事处外，西藏人很少和外面接触。

藏人不太了解外面的情形，也不了解中国大陆的变迁有多大。像是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革命后、到国民党发展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后又发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然后国民党到台湾等，这种情形藏族人不太清楚，根本不晓得解放军会突然解放西藏。

然而，西藏人民在国民党主治中原期间，却已先经历藏区遭致割裂的痛苦，从元朝就有的“大西藏”概念，在一九二０年初期，由于西藏正规军与中国军阀作战失利，西藏军队一路败退，战败后西藏被迫签署“冈托协议”，明定金沙江以东为非藏人区。原有的大西藏被缩小为仅包括金沙江以西与六个藏人地区等西藏自治区的范围。换言之，青海省三分之二、以及四川、甘肃、云南等藏人地区全部被划在藏人自治区之外。许多被划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西藏安多、康巴人心中甚为不平，他们认为自己也是藏人的身分不容抹煞。

当时，西藏政府在昌都的总督拉鲁还曾计画乘中国内战之际，收复玉树（现青海省玉树州），阿沛上任后，明确告知西藏政府，藏军无力收复玉树。

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西藏政府外交部给中国政府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要求归还被占领土地（指青海和西康等），毛泽东于是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中国解放军已著手进行各项准备，当时主力军准备从西北出发，本来是以彭德怀的西北军为主力，再配合邓小平和刘伯承的西南主力。后来考虑到战略地位的问题，于是变成以西南主力、西北配合，战斗路线则是从康定前往昌都。

内战过后，国民党军队很快从四川、甘肃、云南等地退出，那里的国民党军队逃的逃、降的降，从一九五０年三月到八、九月，甘孜等金沙江以东地区已无国民党军队，因为甘孜一带也没有西藏的军队，共产党很容易就把甘孜一带控制下来，金沙江以西虽有藏军和民兵约两万人，但西藏人也未想到共产党来会有什么后果，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很容易就控制了下来。

从一九五０年一月起，中国西南军政委员会开始著手让邓小平与刘伯承将共军引进西藏，进军工作主要是由十八军负责，约有三万余兵力。十八军的军长是张国华，军区政务委员是谭冠三。

因为有这样的战斗计画，西藏政府为了应付这个状况，由昌都沿线遂行做战准备，当时昌都地区的总督是拉鲁次旺多杰（简称拉鲁），拉鲁是东部西藏总督，驻扎在昌都，他还训练西藏的军队，西藏正规军约有一万多人，正在准备中国部队来时要如何防范、攻击。

当时有一名英国无线电操作员陪伴在拉鲁身边，不久，拉鲁拍电报到拉萨，向西藏政府报告中国已调来强大军队，聚集在东部边境一带，很明显有进攻西藏的企图。当这个警报传到拉萨时，噶厦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他们明白，西藏正面临著有史以来，来自东方最严重的军事威胁。

然而，西藏却没有武器与人力来抵御入侵，以维持其领土的完整，唯一能做的做是立即向几个大国申诉，希望他们能及早劝阻中国。于是，共有四个代表团被派往英国、美国、印度、和尼泊尔。在四名代表离开前，紧急电报已经从拉萨发出。

这几个国家的回覆却令西藏大失所望。英国政府虽然表达了对西藏人民深切的同情，并表示遗憾，但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以及印度已获得独立，他们爱莫能助；美国政府也是同样答覆，甚至拒绝接见西藏代表；印度政府也阐明不会给予军事援助，但建议西藏不要武装

抵抗，而应进行基于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条约”的和平解决方法去谈判。西藏人因此明白，在军事上他们是孤立无援的。

“西姆拉会议”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正式宣告西藏独立后，中国、英国、和西藏三方代表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针对中藏间长期来的边界争议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从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三日起到一九一四年的四月廿七日，由三方政府充分授权的谈判代表进行与西藏主权密切相关的各项协商，最后终于签订了草案，称为“西姆拉条约。”

这项条约明白规定“中国将保证尊重西藏的完全自主”、“中国在西藏依旧拥有宗主权（而非主权）”；同时，西姆拉会议还将西藏分成两个区：在东区的康区为“内藏”、在喜马拉雅山高原中部及南部的“外藏”，中国虽可以在内藏继续拥有些影响力，但不能干涉外藏行政事务。另外英国方面则赋予可以直接与西藏谈判有关边界和商务的权力。

在三方签署这项条约后的第二天，中国政府便拒绝承认这份草案。

但是，当西藏面临来自中国强大的军队入侵之时，内部又因为藏东新旧总督交接，使得对中国态度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由于东部西藏总督的工作有任期，拉鲁正好任期届满，在这关键时刻，西藏政府于是派阿沛阿旺晋美（简称阿沛）来接替总督的工作。当时西藏政府虽派阿沛替代拉鲁，但西藏政府认为当时的情况比较严重，也比较紧张，所以也希望拉鲁能暂时留在昌都，两个人一起工作。但因为阿沛说他可以承担完全责任，拉鲁最后还是离开昌都回到拉萨。

阿沛上任后，却改变了政策，他认为藏人的力量和中国相比悬殊太大,藏人对付不了解放军，就应用和谈的方式来解决。虽然当时西藏军队在金沙江以西打了一些胜仗，也杀了不少共产党军队，但后来因中国部队从德格、玉树、理塘、云林四个不同方向进攻昌都，在这种情形下，昌都就很难确保守得住。

而中国西南军区在四川全力筹划十八军进藏准备工作的同时，成立了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美、军副参谋长李觉和中央委员天宝等人组成的“前线指挥部”，并组成了南、北两路先遣队，北路先遣支队系五十二师一五四团、军工兵营等组成，主要取道雅安、泸定、康定等进入甘孜，南路先遣支队则系五师一五七团组成，取道雅安、泸定、康定、雅江、理塘、进入巴塘等。

当时最主要则是以从四川进攻的十八军三万人为主力，陈赓所部两个团由云南向昌都以南发起攻击，彭怀德所部独立支队由玉树直插昌都退向拉萨的后方要道，堵截后退的藏军。王震所部则由新疆向西藏西部阿量进发，四路进军，形成多路向心进攻的阵式。

昌都是一个交通要道，十月间当昌都快要落入共产党手里很紧张时，阿沛紧急通知西藏政府，说明情况严重，很快就会有危险。随后，中共部队的主力即南北两支先遣部队便不宣而战地分路渡过金沙江、怒江、和澜沧江。从十月七日开始，双方在昌都进行惨烈的主力会战。战斗于十月十五日结束，由于武器和训练技术居于劣势，藏军约七个代本（团）的五千多人横死沙场，西藏政府驻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被俘。

当时共产党解放西藏的口号是“我们不会动西藏人的一针一线，我们也会保护西藏人的风俗习惯、寺庙文化”，西藏人就想共产党也不会坏到那里去。共产党还有一个口号是：“藏人不管是僧人、官员与平民，以前有什么样的待遇，未来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原国民党统治区的藏人甚至想，这样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好嘛！心里上也曾经表现过一种支持的态度，在这种宣传下，虽有军队，但还是上当了。

总督的更换造成政策混乱让局势更无法控制，阿沛从一开始就有弃守昌都的打算，他很快就把他的指挥部搬出昌都，退到西部。因此，当一些藏军在前线打完仗退到昌都时，才发现昌都已为他所废弃，不得已只好焚毁昌都的兵工厂和军火库，以防落入解放军手中。

昌都战役是中国军队入藏后的首场大战，也是中国武力解放西藏的起点，西藏自此开展长达近廿年的武装游击战，苦难几乎就从这时候开始。

一九五 0 年十月，中国解放军“解放”了昌都。不久，阿沛再回到昌都，当时中国部队十八军五十二师的政委王其美前来欢迎阿沛，同时据说王其美还掉眼泪表示抱歉。

当时王其美说：“我们解放军为什么要进入西藏呢？就是为了要保护西藏人，不会有不好的念头，但在这期间，你们还是受了不少苦，因此我非常抱歉、难过。”王其美建议阿沛派代表去西藏政府，表明现在需要和谈，中国也愿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不用武力。如果不放心到北京，也可以到昌都来谈。

当时达赖喇嘛还未行使政治上的权力，但因昌都情况愈来愈严重，西藏政府与老百姓于是希望达赖喇嘛赶快即位，达赖认为自己年纪小，担当不了这个责任，但西藏政府与人民一再希望达赖喇嘛即位、摄政王辞职，加上神谕所示，于是，达赖喇嘛在他十六岁那年，接下了领导西藏政府的责任，西藏人也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达赖喇嘛身上。达赖喇嘛曾经说：

“在根本无法推卸、无法舍弃的情况下，我十六岁，便不得不肩负起西藏救亡图存的重责大任，坦白说，这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而言，可说是一贡极严峻的考验；尤其，论年龄、论学识、论问政治国的经验..，无论哪方面我都是非常不足的，反观中国官方却是暴虐蛮横。此一期间，我不但要居中协调，致力于与中国和谐共处之道，而且也要考量谋取西藏全民的幸福安乐。”

那时，噶厦已经把西藏危机向联合国申诉，在没有得到正式答覆前，达赖喇嘛必须设法与中国达成某种协议，以避免造成更大的伤害。于是，达赖喇嘛透过占领昌都的中国军队司令，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

达赖喇嘛在这封信中写到：“在我年幼期间，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曾经很紧张，但我如今承接了全部责任，真诚愿意恢复以往的友谊。”达赖喇嘛并且向中国要求，释放被俘虏的西藏人，并把军队撤出被他们武装占领的西藏地区。

与此同时，西藏政府对于当时的局势却愈来愈悲观，他们研判后认为中国大军随时会向拉萨进军，达赖喇嘛的生命甚至会有危险，因此请求达赖喇嘛能先离开拉萨到接近印度边境的亚东避难，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恐怕就得流亡印度。

达赖喇嘛心想，他的情形是否就像四十年前，他的前世－十三世达赖喇嘛般，因为中国入侵而被迫流亡。年轻健壮的达赖喇嘛拗不过众人的要求，因为对西藏人而言，达赖喇嘛的人身至为珍贵，于是，达赖喇嘛便做好暂时出走的准备。临行前，达赖喇嘛指定了噶伦鲁康娃和僧官罗桑札西二人为司伦（代总理）－全权代理达赖喇嘛负责西藏事务。

另外，更让达赖喇嘛惊慌失措的是：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定对西藏问题不加考虑，而且还是由于英国的发言而废除了此一议题。达赖喇嘛心里遭受到无比严重的打击，因为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主政时，也是英国把西藏视为独立主权而与西藏相互缔结协约，等于暗示承认西藏的独立，不料现在却在联合国大会中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清楚。

至此，西藏对中国的大军压境已是全无招架之力，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谈判了。当时西藏政府希望尽快和谈，也希望中国共产党和西藏的关系就像国民党时代的关系一样。而共产党当时虽不断宣传和谈，但在金沙江以东的军事情势却愈来愈严重，西藏政府也只好和谈，以解除当时紧张的情势。

西藏政府希望谈判地点能在拉萨或昌都进行，且西藏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必须在中国军队不再深入西藏的前提下，才能展开双方谈判。但是，驻印度的中国大使则建议西藏派代表上北京。

不过，西藏政府为何非指定阿沛阿旺晋美为谈判代表的策略相当令人不解，当时阿沛在昌都战役中为中国部队俘虏，所到之处都受到共产党的礼遇，等于是共产党笼络藏人的“样板”，可以想像其思想必然受到共产党相当程度的影响。但达赖喇嘛当时却任命这样一个人为主谈者，其考虑为何？还需要更多的解释。

除了阿沛阿旺晋美外，另外几名谈判代表分别是当时的财务部长夏噶巴、布达拉宫的重

要负责人图丹杰布、旺久德丹、与一名哲蚌寺的格西（藏文原意为善知识，亦指佛学造诣极高，有资格讲经说法、授课者）。图丹与夏噶巴分别是正、副领队，另外还有达拉朋措札西担任中文翻译，差仁晋美松赞为英文翻译，另外还有两个工作人员。那时还是一九五 0 年底，但因为没有签证，所以几名谈判代表皆无法成行。

北京没去成后，几个谈判代表就到亚东，那时达赖喇嘛已经先到亚东避难，在亚东又决定另派代表到北京和谈。最后从昌都出发的有阿沛与桑布丹增顿珠、堪琼图丹烈盟两名代表；另外从亚东出发到德里、经香港到北京的有索南旺堆、堪种图登丹达两名代表。同行的还有中文翻译达拉朋措札西、英文翻译桑都仁钦等。达赖喇嘛指定阿沛阿旺晋美为主要代表，另外四人则负责协助阿沛。

一九五一年四月底，当索南旺堆到达北京时，阿沛等已比他们先到两、三天了。到达北京后的第一个行程，周恩来欢迎西藏谈判代表准备了一个晚宴招待，晚宴上西藏代表与中国代表互相介绍，西藏代表下榻的地方就是北京饭店，和谈的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第二次和谈地点是目前的统战部办公室。

中国代表团的全权代表就是当时统战部部长与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另一名代表张经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主任；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是第三号人物，第四名代表是西南军区秘书长宋志远。

一九五一年四月廿九日，双方第一次会谈。李维汉首先开场白，他提到，很高兴以和谈为目的大家见面等话，并对西藏政府代表说明开会的时间、如何开会、开会的议题、过程，并要求双方一定要讨论。然后李维汉拿出一本记有十点的小书给西藏代表，要求以这十点为基础和谈。大意是说为了解决西藏人民的困难，不会带走一针一线、亦会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等共十条。

西藏代表也提出几点和谈条件：如承认共产党政府、希望保有像国民党时代的双边关系、已占领的地方请归还给西藏、昌都军队请撤退、边境地区不需要共军、西藏可以派自己的军队维持边境等。但中国根本不理睬，达拉朋措札西说，当时中国方面一直强调以他们提出的那十点来谈，根本不理睬藏方提出的要求。而对藏方而言，中国那十点在未占领昌都前，都已经宣传过了。

由于中国不理会西藏提出的几点，西藏代表不同意，坚持要以他们提出的五点为基础来谈。双方没有办法谈下去，李维汉表示一定要把十点记住来谈，并说十点中有任何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当天没有谈到什么，藏方提出的那几点也只好收下来了。达拉说，第一天李维汉所表现的态度非常好。

当时中藏双方谈判情形，在达拉朋措札西的回忆中原音重现。达拉说：“双方没有谈出什么结果，过几天就到了五一劳动节了。劳动节那天，中共安排阿沛阿旺晋美与我会见毛泽东，只有我们二人在主席台和毛泽东在一起，西藏其他代表就坐在下面。我们二人在主席台上等候毛泽东的来临，李维汉也一起来，后来并做了介绍。礼貌上阿沛二人也向毛泽东献了哈达，陪坐一旁的还有刘少奇等。

当时就坐在主席台上，台下有学生、工人、老百姓都在呐喊著“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并且放鞭炮、汽球、鸽子，有两个很大的汽球下面写著两个纸条，因为是中文，所以阿沛问我：“那中文写的什么内容？”我回答：“一个是“和平解放西藏”，一个是“一定解放台湾”。”

后来汽球飘来飘去，“和平解放西藏”的汽球飘到天安门的屋顶，卡在树上无法飘；“一定解放台湾”的汽球先也跟著飘了起来，然后又飘走了。阿沛问我，已经飘走的是“西藏”的那个、还是“台湾”的那个，我一看是台湾的那个，阿沛谈到：“台湾可能没有办法解放”，就说了这句话。

谈判继续进行，中国表示达赖喇嘛的权力不变；西藏政府官员过去若有联络帝国主义者，

将不咎既往，以后就不许来往。另外中国也谈到会尊重西藏的风俗习惯，并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陆续谈了在十点以外的好几项。

当时还谈到和平解放西藏后，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主席应由达赖喇嘛担任。当时图登丹达说："前两天你们不是说不改变达赖喇嘛的地位和权力，今天又怎么说军政主席由达赖喇嘛担任，这不等于改变他的地位吗？"

图登问了后，李维汉非常的生气，他用力拍了桌子，大声说："你们一定要听我们的，不可以随便讲话，我们那有说不改变达赖喇嘛的权力和地位的话？我们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他的态度非常的凶。

李维汉又说："我们是说和平解放西藏，并不是说武力解放西藏，你们听会比较好，如果不听也没有关系，你们要选择，你们是要和平解放、还是要武力解放？所有边境都是我们的军队，打一通电话就可以了。"

李维汉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们的，你们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如果待在北京，我们会好好招待；如果要回去，我们会负责你们的安全，会派人把你们送到中国与西藏边境。"

谈判中断，隔了几天，当时阿沛的胆量非常的大，阿沛说："那现在我们没什么话可谈，没办法谈下去了。"这是第一次谈判中断。

后来中国军队十八军联络部部长朋措旺杰来了，朋措旺杰是西藏西康人，小时候在重庆长大，他的舅舅是巴塘人，与国民党关系很好，在西藏人中，巴塘人是较注重中文的。朋措旺杰在重庆时就加入第三国际，与苏联有接触，但以前西藏人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在当时谈判破裂的情况下，朋措旺杰成为藏方与汉方的桥梁，他认为双方一定要谈判，在他促成下，几天过后双方又展开谈判。"

在谈判进行中时，十世班禅喇嘛正好从青海来到北京，并受到共产党的欢迎。当时中国除调集解放军进驻西藏外，另一方面又拉拢第十世班禅喇嘛，以致后来班禅喇嘛曾经写信给毛泽东和朱德，希望能够很快解放西藏。

十世班禅的认证过程一波多折，俗名为贡布才旦被"班禅堪布会议厅"确认为是转世灵童后，就曾经报请国民政府批示，但同时西藏噶厦政府却又访得另外两名灵童，因此坚持应依历史旧制，经由金瓶掣签以选定谁才是真正的灵童。由于双方坚持，只好各自报请中央裁示。

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希望先改善"班禅堪布会议厅"与噶厦的关系，因此一直未处理此事。一九四九年初，大陆全面撤守，蒋介石宣布下野，代理总统是李宗仁。南京班禅办事处处长计章美便趁机向李宗仁陈情，请免金瓶掣签，由于时局紧迫，李宗仁便同意其所请，宣布贡布才旦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并且派当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到青海西宁主持班禅的坐床大典，当时的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也参加了坐床大典。但是，这事是在西藏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

原本国民党本也有计画要邀班禅喇嘛到台湾访问，不料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李宗仁派关吉玉到塔尔寺去举行典礼，典礼后希望很快把班禅接到台湾，当时班禅喇嘛才十三岁。关吉玉走了后，国民党在四川重庆已经失守了，那时好多官员包括蒋介石都已经跑到台湾，李宗仁已经跑到美国了。

班禅喇嘛没办法，只好避居青海乡下，那边有一个班禅的庄园，但中国的彭怀德已到兰州，已经"解放"，马步芳也已逃到阿拉伯去了。班禅没办法，自然与共产党合作，于是共产党派人把班禅接到塔尔寺，后来班禅就在塔尔寺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是希望赶快解放西藏，中国就利用这个向西藏做宣传。

因此当班禅喇嘛到北京时，中国方面要求大家到火车站去欢迎，当时西藏代表团说他们并没有承认这个班禅喇嘛，所以不去火车站欢迎。中国方面说，就算团长不来，也可以派其他人，后来就派桑都仁钦、达拉等三人去迎见班禅喇嘛。

以后双方在谈判中也提到此事，中共提到国民党已经承认这个班禅，他们就继承国民党的政策，说他是班禅的转世。

达拉说，他们三个人去，是为了给中国面子，后来继续谈，中国认为班禅的问题必须纳入十条中，却遭到阿沛的反对。阿沛认为，在历史上有班禅曾经担任达赖的经师，但从未有班禅掌握西藏的政治权力。阿沛否认中国的说法。当时张国华提到："我们解放西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班禅的地位问题。"双方意见不同，谈判再度中断，这是第二次中断。

谈判中断后，双方各自用餐，后来中国的孙志远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就是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过去和好时候的地位要保持，希望藏方可以同意将此项列入条文，阿沛最后同意。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得不签署最后的十七条协议。

一九五一年五月廿三日，中国与西藏代表就解放西藏问题，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因为具体条文共有十七条，因此简称为"十七项协议"。这十七项协议内容如下：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究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的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地方人员参加工作，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份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西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这项协议最主要内容便在于中国同意西藏自治、但同时西藏应协助解放军入藏，等于承认中国在西藏拥有主权。这种体制在当时可能不易被了解，这却正是现在中国不断鼓吹的"一

国两制”的精神。换句话说，一般人以为在香港已经实施的“一国两制”是出自邓小平的发明，但事实上，就十七条协议来看，“一国两制”第一次实施地区应是在西藏。而中国与西藏间签署的“十七条协议”，正是北京在一国两制上的最初尝试。

然而，西藏代表在签署前并没有将具体内容报告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达拉说，未做报告是阿沛做成的决定，阿沛说：“我们不得不签，以后西藏政府与达赖喇嘛有什么惩罚，全部的责任就由我们来承担。”

达拉说，因为如果不听，中国就要用武力解放西藏，西藏的政治、宗教、文化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不得已被迫签了。

因此，当时人尚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却是从收音机北京广播电台播出阿沛的广播中得知的，听到广播的达赖喇嘛大吃一惊，觉得十七条协议比他想像的要坏的多，而且更具压迫性。虽然协议中也有些中国人的承诺，但是，因为达赖喇嘛内心有著国家主权独立地位已经失去的忧虑，尽管他个人强烈反对十七条协议，但却只能接受，唯一希望就是中国能够履行他们的诺言。其他方面，完全无能为力。

不久，中国驻拉萨代表张经武带著毛泽东的亲笔信和礼物，到亚东去拜见达赖喇嘛，并劝说他返回拉萨。痛苦的达赖喇嘛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回到拉萨，同年十月廿六日，中国解放军进驻拉萨。由张国华和谭冠三指挥的十八军二万人，在这纸协定的掩护下陆续入前后藏，新疆军区王震部的二军，则派骑兵团进军阿里。

当昌都战役在西藏响起第一声枪响后，西藏从此便一直笼罩在武力入侵的阴影中，藏人反而纷纷加入保卫家园的“反入侵”战争中，而“平叛”，则成了中国后来引兵入藏的理由。
一九五九年拉萨发生汉藏流血冲突事件后，等于双方都背弃十七条协议，这项和平协议也正式走入历史中。

从此，在青康藏那一块高原净土上，有关“反入侵”与“平叛”的争辩，没有一刻止息过。

第三章 汉人入侵西藏

“中国人来了！中国人来了！”

从中国入藏起，“中国人”竟然成为中国部队“当兵的”的代称，“解放军”、“共产党”也成了藏语中的新名辞。

有些藏人开始对这些新名辞加以注解；老百姓认为“解放军”就是“军队把绳子解开的意思”。而“共产党”就是专砍头上当官的，因为“共”是“头”、而“产”则是罚的意思。

然而，中国人内部打打杀杀，从国民党到共产党，西藏人却参不透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恩怨；藏人然楚阿旺在西藏东部的康区做买卖，他说，在中国人内战结束后，共产党来了，在康区的国民党军队没有打一枪一弹，他们把国民党旗帜降下来就升上共产党的旗子。

但是，共产党旗子换上没有几天，国民党的一个“田师长”来了，他领了军队过来，共产党又退了出去，但都没有相互交火，又升起国民党的旗帜。田师长到处发布告示，要大家来领东西，把共产党仓库里的东西、鹿皮全拿出来，到处分给老百姓，那时很多穷人都去领了。

大概过了十天左右，来了飞机，共两架飞机空投很多东西，有黄金、弹药、钞票，是国民党给田师长的补给，田师长不允许藏人出康定，所以他们也一直留在那里。国民党还要解放军俘虏全部套上国民党军装，变成国民党士兵。这样又过了三天左右，田师长又带了许多军队、约一万人往西走，准备向云南、缅甸方向跑，然后共产党又来了，但两边还是没有打。
共产党一来，就开始到处抓人，十几个一批、二十几个一批抓了以后，满街都是贴的布告，写的都是中文字，然后再把犯人三、四十人拉到飞机场旁，那里有一条长长的沟，远远看到

那些人被枪射死了。就这样天天杀，和国民党有关的被抓、被杀，持续了二十几天，当时有人抗议共产党杀很多人，二十几天后屠杀才停止。

西藏人知道，国民党已被共产党所取代，让娘寺加塞仁波切（在藏文原意为大珍宝，用来尊称有实修成就的师长，中文常以活佛称呼）提到，中国人很能骗人，国民党时期他们家乡被马步芳统治，马步芳和解放军打得最凶时，向他们囊谦廿五族（现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徵派一千匹马，藏人不敢不交，但在赶著送往西宁途中，半路上马步芳被共产党所取代，他们也就把马献给了共产党，以讨好共产党。共产党因此说，玉树是最好的，第一个归顺的，并予表扬，还说玉树的一切不予变更，指派了三人做为他们的代表。

这前来的三个人中，两个是共产党军官，不懂藏语，一个懂藏语的，人人叫他特派员，其实是国民党的投诚人员，现在已是一伙的。

据康区娘荣人阿丁在他所著“我的一生”中提到：“中国军队占领我们位于金沙江以东的家乡后，在各地都派来军事代表，他们建立了一些基层政权，几乎全部上层人物都被任命了官职，除了宣传“民族平等”、“民主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外，主要就是徵调人力畜力运送物资，一九五二年公路修通后，宣布罢黜乌拉，并给藏人发锦旗，赔偿损失等，大约一九五三年初，中国军事代表被撤消，代替的是党委书记，开始在藏人中以救济的名义进行摸底工作。”

事实上，阿丁就曾经是积极份子，几次被派去进行这类摸底工作，他的上级告诉他，扶贫救济等只是暂时的，主要是现在先了解情况，为民主改革铺路。

无奈的是，还没能够让西藏人弄清楚“解放军”是如何解开绳子时，中国军队就已带著一张嘴、扛著枪的来到拉萨了。西藏人漠然地看著中国军队踏上他们的土地，但是，解放军带来很多银元却是一件受欢迎的事。

藏人洛桑格列说，中国人带来了很多钱，他们要赶建公路，也修建了很多的营房，于是大量招募藏人去干活，给的价格也比较高，给的都是大洋。他觉得这是中国人的政策，是为了吸引老百姓，让老百姓对他们产生好感，所以就对穷人大量给钱，一天给四块钱，超乎寻常，几乎是平常的六、七倍，可说是在撒银子了。

因为这样，最穷的人有活干，又有钱买得起东西，老百姓有出路，又稍微安静了些，共产党一举两得，一方面路修好了，一方面老百姓觉得共产党也不错。

而且，让娘寺加塞仁波切也说，慢慢地中国人愈来愈多，并开始向人民宣传说：“解放后不要上税，信教自由，不像国民党军队，共产党的军队是不偷、不抢、不派乌拉（乌拉是西藏原有的一种地租性质的交通运输劳役，但乌拉差役并不是无偿的，如果西藏人民没有接受土地，就没有支应乌拉的义务）”等等。

而且，开始他们甚至对捡牛粪的人都以大洋付工资，他们花钱像流水一样，支应乌拉差役也给大量的超量的大洋做为报酬，并廉价出售白糖、冰糖、瓷碗等，藏人的羊毛、牛皮、甚至狗皮等都可以卖好价钱。

加塞仁波切说，这么做藏人当然非常高兴，所谓：“共产党像父母，大洋多得像下雨。”就是那时的话。前一句话是中国共产党给藏人教的一首歌曲里的歌辞，后一句是藏人的感受。

但渐渐地事情就变味了。

曾任昌都白日县县长的洛尼则说，中国军队入藏后，一开始藏人并没有反抗，是因为中国人刚来时，说买卖公开，拿一把粮食也给钱，损坏东西要赔偿等文件、告示到处都是，许多藏人不仅不反对，有些甚至有好感，认为中国人来了就不用支差上税。藏人不懂政治，一开始时如何能懂得中国人的险恶和诡计。

但慢慢地如当时谚语所言：“中国人的政策是湿牛皮帽子，愈乾愈紧”，不再像开始那样一点东西都给远远超过价值的钱，不仅不给钱，反而开始徵调，并要没收私人财产，咒骂宗教和僧侣，不准进行宗教活动等等。于是人们才反应过来，接二连三地造反。

首先是西藏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物价飞涨，洛桑格列说，当时拉萨物价飞涨，拉萨地方

突然来了很多人，他们没带吃的，但因为他们带来了很多银元，人数又很多，街上的东西全部都被他们买光了。

洛桑说，中国人没来以前，一“克”（约相当于十公斤多）粮食（指的是青稞）要七点五两左右，中国人来后涨到了七品（一品是五十两），原来连个十两都不要的，已经是几百倍的了。如一般酥油原来只要三、四十两，后来也是七品以上，到后来街上的食物只有中国人买得起，其他人都买不起。

十三岁时到甘登寺（拉萨三大寺之一）当喇嘛的洛桑更秋则说，中国部队来时他正在寺院当和尚，一开始几年都很安静，除了物价上涨以外，在法律上惩罚的?几乎是没有的，他们不惩罚人，也不枪毙人、折腾人，只是物价上涨。一开始中国人还是有花钱，还算讲道理，但后来就愈来愈凶暴，一会儿说好话，一会儿又说令人难以忍受的话。

还有藏人说，开始修路时，中国部队每天给他们四块大洋，后来愈来愈少。一九五九年中国掌握权力后，就再也不给钱了。

然而，当时愈来愈严重的物价上涨却让西藏濒于饥荒的边缘，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说，西藏人民抱怨共产党来后物价飞涨，老百姓都受到很大压力，吃不饱，因为共产党有很多军队（超过三万以上）来西藏，要靠西藏本地出产的东西，平时西藏地方大、人口少，出产并不是太多，对于自给自足没有太大问题，但几万的军队进来，东西物价涨了很多。

嘉乐顿珠说，一九五二年二月到四月时，他人在拉萨，那时局面已经混乱得不得了，但西藏政府对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拉萨的人民不满，天天写请愿书给西藏政府，希望中国共产党裁军、不要干涉西藏内政、以及宗教自由等。拉萨经常有游行、示威，强调签定十七条协议是中国强迫西藏当局所为，他们认为这是不合情理的。

而且，中国部队来到西藏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就好像是占领军进驻占领区一样，所有军队走在路上非常威风，晚上抱著机关枪、冲锋枪到民间去检查，让西藏人非常反感。

在拉萨，由于西藏人不断抗议不应在拉萨维持著这么一支庞大、无必要的军队，甚至物价也让西藏人面临到饥饿的地步。因此，西藏反抗入侵组织接连成立，“人民会议”是其中较为显著者。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西藏政府和民间的菁英，利用在拉萨传召大法会的机会，召开西藏“人民会议”，两名“主战派”司伦（代总理）鲁康娃和罗桑札西是主要领导者，“人民会议”并推派出五位人民代表向中共驻藏党政机关请愿。

四月一日，“人民会议”组织僧俗民众共四千多人上街游行示威，沿路还向驻藏机关和外出人员扔石头、吐口水，同时要求禁止驻藏机关和驻军悬挂五星红旗。当天晚上，部分藏军和僧俗群众包围了中国驻藏党政机关及中共驻藏代表张经武的住所，还向“主和派”的西藏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的家中射击，拉萨局势因而顿形紧张，他们并提出：“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独立地位不容侵犯”等要求。

同时，“人民会议”还要求西藏政府应命令地方官员，禁止他们出售粮肉等一切食物及牛粪等一切燃料给中国军队。如果中国军队不走，就把他们饿死在拉萨。

面对这种压力，张经武为此亲自登上布达拉宫，拜见达赖喇嘛，要求西藏政府按照十七条和平协议办事，必须立即制止拉萨发生的骚乱，解散反动组织“人民会议”，并要将在幕后进行策划的两名司伦撤职，同时要求达赖喇嘛限期答覆。

同时，张经武还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任命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军区司令员，十八军政委谭冠三为军区政委，命令驻藏解放军为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应作好一切战斗准备。

但是当这种情形上报到中国中央与毛泽东时，毛泽东认为以西藏的客观实际状况来看，实不宜展开备军行动，为了缓和中国部队与西藏政府间的紧张关系，争取时间以利于进藏部队，因而决定暂缓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另外有关推行民主改革及整编藏军事宜也一并暂缓。同时决定，为了争取早日修通从四川到拉萨的川藏公路，命令十八军首先投入修路工程。

而西藏政府也为了相应敷衍中国，不得不解散人民会议，并下令逮捕了五位人民代表，撤销鲁康娃和罗桑札西的司伦职务。

拉萨当时因为物价波动造成人民生活不安外，其实因为拉萨为达赖喇嘛驻锡地，当地又有重要寺庙，因此还算受到相当保护。然而，在金沙江以东的西藏东部，却在中国入藏后，首先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西藏本有的宗教与社会制度受到最强烈的冲击。

这项运动，即是所谓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主要是展开“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两减”（减租、减息），并且全面进行“土改”（就是将土地分给人民，在西藏的民主改革中，并不是要将土地分给私人，而是建立合作社，西藏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某些地方也曾分配土地，不到一年就变成互助组，所以土改并非民主改革的重点）企图打破旧西藏的农奴制，并且结束西藏固有的政教合一制。

一九五五年，前面曾经提及的康区人阿丁再次被派去救济，他们到乡下时宣称缺衣少吃的都可以得到救济，但首先要调查那些人需要救济，上级并且要他们重点了解谁最具有民望，可能成为反抗的骨干与领袖。不久阿丁成为重点培养对象，被保送到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他们除了学习“我们伟大的祖国”以及宪法等科目外，还有民族宗教政策。

在这次所谓的学习中，老师告诉阿丁说：“中国是由汉族领导的各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可以保持自己的语言、传统、宗教。”

但老师又进一步解释说：“民族传统分为有益的、有害的、以及无益无害的三类，有益的部分可以保存，无益无害部分的取舍由各民族自己决定，有害的部分则要进行改造，因为这些将会成为社会主义的绊脚石。”如藏人多食肉和黄油（即奶油），这些如果拌著蔬菜吃，一份可以让三个人吃饱，显然是浪费；藏人衣物宽大长袖，两个藏人的衣服料子可以缝三个汉人的衣服，显然也是浪费；藏人的歌曲中，舞蹈虽很好，但内容显然是糟粕，应该改正；还有藏人花很多的钱买饰品，对生产和再生产不利，又无助于吃饭穿衣等，所以是有害的习俗。

在阿丁这名老师的列举中，藏人除了舞蹈几乎一无是处。这名老师同时在谈到宗教政策时说：“虽然信仰自由，但在宗教上开支很大，非常的不好，而且宗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障碍。”老师并说当大家回家时，家乡已经建立了农业合作社，并给他们介绍什么是合作社，说初级合作社是人民将一切生产资料交给合作社，其他非生产资料可以用入股方式，然后按劳分配，干多少年终就分配多少，口粮由政府统一配给，只要节约一点保证够吃。

其中有学员问到，如果鳏寡或老人小孩怎么办时，老师回答说，可以各尽所能，老人可以干手工活，干不动的可以到地头赶麻雀，小孩可以干放牧等力所能及的活，总之，合作社是人人有活干，大家一起干。

[藏人贡秋在这方面的回忆是：“中国军队是在四九年时进入我们部落的，刚来时他们说：“你们是念经信教的人，我们来与你们无涉，主要是部落附近有许多国民党、马步芳的残兵败将，以及土匪等，这些人对我们都不利，所以不过是经过你们的部落而已，不会伤害你们一根毫毛，我们要砍伐森林，每一棵树木都会给付钱给你们，为运输要修路，占了你们的土地也会付钱，中藏各为一家，不会干涉你们。”藏人信以为真，说是要“解放”我们，但后来才知道完全是另一回事，于是西仓部落的头官焕觉多登和喇嘛嘉以及丹增嘉等人领导部落的三百余男子反抗。

以前，国民党时期，由于反抗，我们寺院的几十名僧侣被捕后以绳索穿过肩胛骨押送；共产党来了，又只好继续反抗。当时五世嘉木祥（活佛名称）的哥哥洛桑才仁从中调解，才使中国人承认他们工作不当、藏人反抗也是受特务土匪的挑唆等，最后，中国人给了一些钱做为赔偿。

当时在措尼等峡谷高山上有马步芳部马良的土匪，台湾方面曾派来飞机空投武器，因此引来大量的中国军队，对藏人喇嘛给高薪和一些名号。等那些土匪被赶走后，又开始宣传社

会主义非常好、信教自由等。

一九五四年时，中国召集二百余部落头官、大喇嘛到中国内地参观，西仓头官焕觉多登也去了，在北京，中国人告诉他们："明天要去见毛主席。"焕觉多登对同伴说："是上师喇嘛可以说是去朝拜，是僧人可以说是去听经，去见一个汉人老汉，干什么呀？你们要去就去，我就是不去。"

在船上，人家坐在凳子上，他却说家乡都是席地而坐，我坐不惯，而回船睡觉。像这类表示不满的事有许多，后来他被捕时，称毛泽东为"汉人老汉"和"不见毛主席"都成为他的主要罪行。

一九五六年，又出现反抗事件，最后中国人劝降，派拉卜楞寺的江瓦纳日和嘉窝阿贡劝降，双方约好次日缴枪，中国概不追究。但第二天，中国军队却包围已将枪收集一处的西仓和拉日贡部落，突然攻击，打死僧俗男女共四百多人。嘉窝阿贡来到设在达参寺旁的解放军指挥部，说："你们怎么能这样欺骗我们？"并拔枪欲射，但被敌兵抓住，从此失踪。当时，西仓部落有一叫达若的人，枪还在手中，拼死抵抗，打了很久，听说打死了许多中国人，但最后还是饮枪自杀了。

到了一九五八年，战事又起，那一地区绝大部分部落都起来反抗，藏人被打败，死伤无数，活著的人有的逃入山中，有的被俘。

我十二岁入寺为僧，不会打枪，也未直接参战，一九五八年，中国人在我们寺院（贡保纳嘉）逮捕了一百五十余名僧侣，寺院并未参战。当时也不仅仅是我们寺院，到处都在捕人，被捕者中，我们寺院回来的不过二十余人，我被关押在合作寺法座的经堂，开始关了三千余人，我出狱时只有四百余人活下来。其中中国人只有几名而已。

那些死去的人，共产党在寺旁挖了一个大坑，全埋在里面，每天死十几个人，都是因饿而死。冬天土冻，尸体就堆在寺院的马厩里，后来死人太多，马厩也容不下了。我是五八年八月二日被捕，也没什么罪名，如果勉强算，由于我是一位大喇嘛的侍从，他们说我知道这个大喇嘛的财宝，其实我并不知道有他们所说的财宝，最后判了三年，由于年轻，才活了下来。

当时，有一个叫玛吾夏嘉的人，在政治学习时说："你们说政府和父母一样，封建社会，帝国主义是坏透了，但以前藏人，不管是头官或百姓，并不缺吃少穿，虽没有许多大米，却也不缺糌粑、酥油，虽没有汽车飞机，却也是上者有马、下者有牛可供骑乘以代步，虽没有许多绸缎洋布，却也不缺皮袄、氆氇，你们父母般的国家和政府，每天却只有一顿山上的牛儿不喝、门口的狗儿不闻的稀饭，一天死十二、三人，这是吃的好的缘故吗？（干部在会上常说犯人吃得很好），你们叫我们讲卫生，晚上用罐子当尿盆，白天当饭盒，是这个缘故吗？

话说完，此人随即被捆绑，押在黑牢中，不久死去。"

"民主改革"的和平解放运动约是从一九五五年起持续到六 0 年初期，不但因此引发各地抗暴事件，许多藏东地区的康巴人和安多人被迫离乡参加战斗，最后数万人拥集到拉萨，更是间接种下一九五九年拉萨事件的主因。

而在一九五六年底时，中国曾决定在六年内，即第二个五年计画时间（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年），西藏将不进行改革，也不改编藏军，就是所谓的"六年不变"，和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后所谓的"五十年不变"，其实是同一个思考逻辑。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却很快在西藏各地强行推动所谓的"民主改革"，令西藏人陷入了高度的恐慌。

当时，各种奇怪的说法多了起来，会议也多了起来，会议中中国人不断讲解放的好处，并说解放后就幸福了。有时开会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发言支持文件内容，不支持就说要做思想工作，要拖很久不能散会，藏人没有什么政治观念，认为既然这样就先支持再说吧，能早点回家就是了。

理塘人当札说，中国人在他们的家乡"解放"时，首先要人们缴枪，然后说"三年不变"，

说“解放”是要人民自觉等。而当时理塘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枪枝，人都很强悍，枪枝有的是中国来的、有的是印度来的，没有枪的几乎没有，最贫穷的也会备有一、两枝枪。当札说：

“人们开会商量讨论该怎么办，许多人都说中国人是在骗人，决定不缴武器，中国人则坚持一定要缴枪。当时地方县长全部到中国开会，后来中国人让县长们回来，要他们劝藏人说：“缴枪即可，不解放了。”县长回来，向藏人解释，中国非常强大，是打不过的，不如投降等。

共产党表明要谈判，使者天天都来，理塘来了很多中国军队，藏人在此时问护法神，到底要不要与中国人和谈，结果护法神吉祥天女说和谈最好，不要打。当时也请喇嘛来念经，也请他们算卦，都说是和为贵、战不好。

但是中国军队却包围理塘寺，要藏人缴枪。藏人在寺院开会商量，有人不投降也不愿交枪。有一叫登永阿成的，他说降也死，不降也死，要死的有名目，说罢起身就走了。其他有人主张投降者，也有反对者，群龙无首，吵成一团，当晚集中在理塘寺内的四、五千名不投降的藏人各自为阵，散乱的向外突围，于是杀的杀，逃的逃，投降的投降，惨不忍睹。

五、六个月后，登永阿成招了千余兵，开始与解放军在理塘交战，第二年，中国部队大量增援，藏人终于被冲散。”

此外，让藏人更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共产党那时还到处宣传僧人很坏，说僧人是在欺骗人民、剥削人民等，所以僧人每次都是以不安的心情出门，当时每个人都很不安，不知那一天灾难会降临。

让娘寺加塞仁波切也说，当时那名懂藏语的汉人经常向藏人暗示今后共产党会做什么，他说寺院已经没有用了，中共是不允许信教的，向佛像下跪磕头有什么意思呢？还给点酥油灯，干什么要浪费呢？把佛像放倒，他自个儿都翻不过来，摆很多的供品干什么？谁吃啊？

藏人气得都说他是鬼。他还向藏人说：“有钱快花，有富快享，以后这些钱只会带来灾难，都要充公”等等。

加塞仁波切又说，到了一九五八年初，说是要开一个极重要的会议，于是叫各部的百长（百人之长）和部落头官等都到结古，每天开会要参加会议的人响应建立合作社。众人不从，开始公开反驳，慢慢的就对参加会议的人从开始的礼遇变成每人配一个警卫，早晨由警卫押著去开会，晚上回来就守在门边，反正一定要支持合作社。

雍珠则回忆说：“大约是那一年的藏历五月，中国突然要各部头领全部去结古开会，但去的就被抓走，没去的就开始和中国人发生战争。有个喀纳部落的百长开会召集部民说，我如果去开会，肯定是回不来的，现在有个选择，大家是愿意和中国人干，还是愿意接受中国人的统治？我认为这其实是同一种选择，一个是背著枪战死，一个是背对著背被斗争而死，反正都是死，大家愿意如何的死法？部民同声要求酋长不要去开会，他们宁愿战死。

有一天我们渡河时，山上两个放马的高声叫喊：“中国人来了，中国人来了。”我们不知中国人在那里，当时我们大部分已过河，见对面田地里有许多穿藏装的人向我们这边奔来，快到河边时，我们才见到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人，我们立即隔河向他们射击，那些“藏人”也脱去藏装，露出里面的中国军服，……。

打完仗后中国人开始抓人，不管是否参加过战斗，都一批批地逮捕，反绑著双手被押往中国，帮曲寺在当时并没有参加战斗，而且还在中国军队一到时就投降，但最后寺内全部寺僧还都被逮捕，活佛南喀坚赞被押到西宁，寺院完全被摧毁，人民还被迫参加拆毁寺院的行为。

其他没有被抓的藏人被中国人强逼在牧区开荒垦粮，建立所谓的国营农场，每天只分发一点点食物，到后来几乎没有了，就纷纷挖野菜，但我们家乡并没有很多的野菜可吃，一般老百姓多在国营农场内饿死，头面人物和地方上稍有名声的、以及精壮男性全部被押到西宁和北方荒漠地带，绝大部分都死了，只有零星几个人侥幸活著回去。”

当时的情形令活佛也忍不住感伤，加塞仁波切接著说，由于死人太多，几年过后，野外到处是累累白骨，也无人收拾，彷佛一堆堆白玉石。

此时，一些所谓的“积极分子”在中国人的督促下，也跟著说佛教是骗人的、麻醉人民的等等，让人民干拆毁寺庙的暴行，人民不敢不从，怕被说成是落后份子，遂使地方成为“米拉的故乡”（指成为荒芜之地）。

饥饿中，百姓只好捡拾敌人军马的马粪蛋中未消化完的豆子，这些豆子看似完好，听说吃了以后却没有一点营养，又或者是在敌人官兵、干部倒在垃圾堆中的饭渣充饥，当时有个年老的寺僧叫白果南达，饿极了将小孩的尸体都给吃了，随后他被人告发，后来就永远失踪了。

西藏禅古寺僧白玛果牙提到，他们寺院每到藏历五月有一个叫禅古策珠的宗教法会，十四号是跳神，十五号则给人灌顶，在灌顶的这一天，四周的信徒云集，人员集中，中国乘此机会却突然行动，中国军队包围了禅古寺和禅古村，人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知所措，中国人于是开一条通道让藏人过，一个一个的过，凡他们想抓的人全部被捕，因为人民是前来接受灌顶，当然谁也没有带武器，所以被抓时都是束手就捕。

白玛果牙说，与此同时，中国人在结古行动，结古镇中他们要抓的大部分人都被逮捕了，前后共有几百人被捕，这些人从此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也不知押到什么地方，死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藏人雍珠说，一九五八年，当禅古寺院举行次珠（六日之意）法会，结古和附近地方的人有许多人都去观看，中国人突然行动，将参加法会有些名声的、或较能干的、家中有枪的人全部无故逮捕，并到结古的藏人家里大肆搜查，收走了全部的枪枝，连旧火药枪都没有留下。

在这方面，班禅喇嘛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人代表大会讨论会上的发言中也谈到：“青海的夏茸噶布和马里等地区的牧民等早已把部下的几千枝枪收起来，上缴到政府，当时并开了大会表彰他们，还让他们戴上大红花。可是回到住处地一下车就全被抓起来，长期关押。”

班禅喇嘛说，在青海地区一个部落有一千到三千户，人数约四、五千不等，每个部落被抓去的人数是八百到一千不等。

再以禅古寺而言，禅古寺当时并没有去围攻结古，在结古战役结束后，中国人却来攻击禅古寺，禅古寺内没有一枝枪，天亮才发现被包围，就打了起来，反抗的僧人被打死六、七人，其他人全部被捕，几个那天碰巧在外边的得知寺僧全部被抓，就赶紧逃之夭夭了。附近的藏人又反攻了一次，敌人退回结古，藏人进入寺院时发现，除了三个僧人躲在角落侥幸未被发现外，其他寺僧已全部被逮捕了。寺院的门、窗、佛像等已被砸得面目全非，仓库已被劫夺一空。禅古寺有七百余名僧人，后来只有两、三个人活著返回家乡，其他全部死在监狱中，加上逃脱的，全寺所剩的僧人也不过十余人而已。

拉妥人白噶成列也说：“在达赖喇嘛要去北京之前，我们家乡有一叫格日茶卡的盐场，由于白教喇嘛永格木金多杰认为不能开采而封场，已很久没人开采了，中国人明知这些，却派四、五人（应为四十五人）前来开采，盐池中有一宝塔，因当地缺少石头或不知什么原因，整个宝塔是使用兽角垒叠而成，有牛、羊、鹿、黄羊等我们地方有的一切动物的角，人民甚为珍视，因年久宝塔的许多部分已埋入地下，中国人在采盐过程中拆毁了这个宝塔，人民甚为不满。

当时有一个叫擦仓格日秋旺的人，是个有三十余名士兵的小军官，他和我哥哥无吉尼玛商量后决定驱逐这些中国人，于是由他们率领，我们带上袋子伪装前去取盐，暗中带上刀枪。一直到中国人吃饭时为止，我们都慢吞吞地装盐，终于中国人在他们住的草皮房门前集合，唱歌吃饭，只留下两个哨兵，枪枝也不随著带出而留在房内，我们七十余人突然发难，敌人措手不及全部被俘，夺得四十余枝步枪和许多子弹，其中除翻译的枪是三八步枪外，其他全

是七六二步枪。

我们将俘虏的衣服全部剥下来，将他们捆起来各抽了两百鞭做为惩罚，最后讨论这些人的处理方式，一些人建议杀掉，另一些人说不能杀，杀了就麻烦了。当时我们曾存有谈判的念头，最后训斥他们一顿说他们不遵守喇嘛禁令，犯了采盐毁塔等罪行后放行。

但中国人当时似乎不愿意把事情闹大，中国人一直这样，他们会在最愤怒时后退向你示好，又在最友好、最没有理由时突然动手杀人，他们肯定要考虑大局，不像我们只看到眼前的事实。

总之，中国人在做出出兵报复的样子后接受了调解，并且希望我们交出?j 枝东西和兇手，但夺来的米面我们早就分给人民吃光了，我们便收集了四十枝性能差的枪，还有他们的衣服等交给前来的人带回，但是事情并未圆满解决，因为中国人不承认“冬”，冬是藏人的一种赔偿习惯，杀人后赔上一定的财产，即称为“冬”。非要我们交出兇手不可，还要我们交出被抢的枪而不是顶数字的破枪，我们实在舍不得交出那些枪，就谎称枪已被部落的强盗拿走了，当时我们部分人已躲在山上以防中国人的报复攻击。

不久，达赖喇嘛从北京回来，我们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虽然与中国人的纠纷还未结束，但我们对交出兇手已经没有诚意了，甚至懒得再编造理由搪塞。我们认为中国人迟早要收拾我们，不如大干，并且决定切断中国人的交通，但在讨论何地切断交通时，说在江达切断，江达地方的人立即说不行，并举出一大套理由，说在昌都切断，昌都的人又是一套，反正是大家都希望反抗，但又希望自己家乡能保住，不致在中国军队的报复中被摧毁或遭遇损失。

我们最后说：“那就在我们拉妥地方吧！反正我们已经杀了中国人，中国人也一直在追捕我们，我们中的许多人已不得不留在山上。”大家于是决定在我们的地面上伏击中国军队。

当时在拉妥县有四百余敌军，他们由于没有后援，补给中断，不久悄悄从伊曲喀绕道退回了昌都，拉妥王也在昌都，一直是中国人的干部，敌军在临走前召集拉妥县的人民开会说：“我们暂时回昌都，物资托当地藏人保管。”我们得知敌军退出后，马上进入拉妥县抢劫中国军队留下来的军用物资，烧毁敌军的营房，告示全体百姓：“从今天起，要与中国人打仗，以后不许通敌。”并将几名通敌的奸细抓获后处决了。

我们回到家乡拉妥，有些牧民想转移到我们的阵地来，那些牧民个个人精枪好，装备也相当不错，但我们去迎接时，却见他们扶老携幼，赶著全部牛羊，不像是在打仗，而是在迁移牧场。也难怪，谁也不忍留下自己的亲人独自逃离，这也是我们藏人失败的一个原因。实际上，在战斗中大批被打死的往往就是这类人，每次逃跑都是一群一群的，枪弹一扫射就是死伤一片。

一天清晨，我被枪声吵醒，立即起来给马备鞍观察，只见苏莽寺的僧侣一路逃来，只闻枪声，不见敌人，不久敌又开始炮击，那些僧侣中已有部分人倒下来，整个房子都在颤动，我们盲目打了几枪，心中稍感恐慌。

当时很乱，寺僧死了约十八人，其他百姓死的也不少，一路我们和敌人乱打一阵，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该到何处去，传说在结束已集中了七万名敌军，全是骑兵，因此我们在峡谷中四处躲藏，约七天左右，便向昌都杂夹玛贡方向逃了去，当时有敌机空投下大量传单，上面写著：“立即投降，保证不打、不杀、不抓等，并讲了许多无路可逃的道理。

到昌都，得知萨迦派的卧击寺已毁，该寺三十余僧利用有利地形拼死抵抗，杀死许多的敌人，由于枪管发热打不出子弹，在敌营中的一个囊谦女人听到寺僧用藏语相互喊叫“枪不能打了”，便告诉了中国人，中国人趁机发起攻击，寺僧被迫持刀与敌肉搏。除一幼僧装死而幸免遇难外，全体寺僧全部壮烈战死，其他藏人则远逃到各地。

好多藏人藏在昌都雅仓后山的密林中隐藏，有一天我与弟弟去雅仓磨糌粑，突然遭敌军包围，因怕在寺院中战斗会累及昌都寺和印经院，乃将枪藏起来后在马圈中伪装成马夫，但是没有用，因为他们的许多提问我们不是答不上来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明显的还是在说假话，

因此还是被捕了。

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向囊谦方向开进，我们十余个俘虏和由当地藏人收缴的四十余驮枪枝，由其中的一个连队负责押送。其他被捕的多是德格人，其中有一名俘虏不断遭押送者的刀劈枪砸，身上鲜血淋淋，在翻山时，我们落在后面，在住宿时，有一个中国士兵走过来要取我马上的马鞍，我不给，发生争执，我以马鞍击倒这个年轻的矮个子士兵，但最后我的马鞍还是被抢，人还差点被打。

第二天继续步行，几天后快到香达时，我向翻译要茶喝，翻译说："喝茶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过河时，果然见河对岸有四、五十名满面怒容的藏人，手持木棒在等待，一见我等便喊，你们这些反动派，为什么不再"吓咯咯"（藏人或主要是康巴人在发起冲锋或壮声威时，经常发出的一种呐喊声）的叫声呢？有一个男人突然过来一下打在一个囊谦俘虏的脸上，那人手中的尖石头把那个俘虏的几乎半个脸给撕了下来，惨不忍睹。我马上说："要打就打反动派，请不要打我们老实人。"他吼道，什么老实人，人民解放军已说了你们是反动派，还装傻，说著向我击来。

这时一些中国兵一拥而上，几个藏人也在后面踢我，随后中国人把我押到一间房子内，房内关著七百余人，全是囊谦人，其中还有一个叫阿德日囊的人，是一名西藏等级较低的政府官员，他还哀求要我装成不认识他。

随后开始开会交待问题，有钱人家必须交待是怎么致富的，若说是劳动致富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说是怎样剥削人民的。一些喇嘛则被逼迫交待自己是假喇嘛，曾与女人甚至同自己的妹妹、姐姐通奸等，有苏莽拉雄寺的喇嘛气急败坏地在批斗会上说："呸！我怎么会干这种事情。"批斗的人说："拉卜阿旺则莫已经承认有这事。"他说："拉卜阿旺则莫是我的上师，怎么会像你们到处乱咬。"

又问："你是否给反动派护身符？"他答："不管是不是反动派，凡跟我要的人都给了。"于是那些人拿出刀子说："看你是否能刀枪不入？"随即从手臂上割下一块不大的肉，顿时鲜血立即染红了一半的身体。那些批斗的人喊："大家看，他的肉都不能挡刀枪，他的衣服怎么会刀枪不入呢？"

随后又逼迫一个僧人交待鸡奸的事，他不断地辩护没有这回事，不承认便被打，打得那个僧人倒在地上起不来，然后叫我弟弟问："你想不想当喇嘛？"他立即回："不想。"就让他坐了下来。

轮到我了，我想豁出去了，反正一死，就历数他们的所作所为，说："你们刚来时让我们运送物资，说是会给钱，结果什么也没给；修公路从田野中间穿过，说是给补偿，也没给；修路炸药爆炸，死了近百人，说是给补偿，也没给；说是信教自由，结果是杀僧毁塔，凡是听你们的话就有信仰自由，不听话就说是利用宗教的反动派；你们说的比杜鹃鸟还好听，做的比饿狼还要兇残，所以我要造反，不仅造反，还杀了你们四、五十人，又如何？"

立即有人跳上来问："你想死还是想活？"我说想死，会议主持人说："这人死不悔改，请大家帮助教育。"于是立即围上来一大堆人，揪头发，拳打脚踢，我还打了一个人，随后的暴打使我完全没有还击的机会，不一会儿我就被打得晕头转向倒在地上。

那天阿夏百户也没有屈服，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他说："我怎么是反动派，我是阿夏百户，是从小以十善佛法、十六人法约束自己的人，你们才是反动派，灭教毁寺、诬蔑三宝…。"话没说完早被拥上来的打手给打翻在地，即使如此他还是骂个不停，说中国人是贼狗，骂那些打他的藏人是狗。

如此我被管了十五天，打了十五天，我的满怀勇气也被打得差不多了，从第十六天开始，我再也不敢充好汉了，但阿夏百户宁死不屈服，中国人要那帮打手在不打死人的前提下对我们进行"帮助"，不久他们决定送我们去中国。"

在共产党入藏后，在金沙江以东，中国军队强迫僧人结婚，或是逼迫他们屠宰牛羊，不还俗、不杀生的就会遭到批斗。

而且，共产党在批斗寺院喇嘛时，口中说"和尚是红色的贼"，就是指穿著袈裟的出家人；而喇嘛则是"黄色的强盗"，意指上师等转世活佛。

藏人才仁嘉措就说，西藏迪康寺的和尚凡是留在寺院里的每个僧人都配了女人，这些女人有的是志愿的，有的是被叫来的，有的和尚跑到山上的就算了，但留在寺院中的每个人都配了一个女人。

女人配僧后，第二天女人就要回报："和男人发生关系了没？"有些女人好心就谎报说："已经发生关系了。"但坏女人若说："和尚昨晚没理我。"僧侣就会遭受又是打又是批的命运。

有些和尚到这般田地都还是不听话要守戒律的，头上会被人浇汽油点著，中国军队口中说："你想做真正的佛教徒，就点火让你成佛吧！"有的人就这样烧死了。

当时在普巴本部有一户人家叫拉钦贡保的，此人在迪康寺为僧，当时他因为坚持守戒律被烧得很厉害，但还没死，家里有一个女佣人不忍心，就说："我们两人睡过了。"这样才能有逃脱的机会。于是他们二人冒充夫妻，过了一年后，就逃走了。

由于中国部队入藏后于一九五五年开始推行民主改革，也因此在藏人居住的地区造成过大的冲击，就连当时已经投降中共的班禅喇嘛也深觉愤怒。第十世班禅喇嘛在青海视察时，发现民主改革使得藏人非常穷困，有的连饭碗都没有，他曾大骂地方干部："旧社会要饭的手里都还有个破碗，蒋介石、马步芳统治青海几十年，藏族老百姓也没有穷到连个碗也买不起的地步。"

第十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因此在西元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时，上书中国总理周恩来，这份七万言书的正式名称是"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班禅喇嘛在信中揭露了中国平叛与当时的民主改革的大量事实，这些指控更成为今日佐证历史的重要史料。

在西藏，班禅是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重要活佛，而且，自从五世达赖喇嘛拜四世班禅为师后，五世班禅又拜五世达赖为师，六世、七世达赖喇嘛又拜五世班禅为师，自此形成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徒的历史系统。

而在五世班禅以后，清朝历代皇帝更特别礼遇班禅，以贯彻既定的分削政策，因此西藏历任班禅转世系统与中原朝廷关系均极良好。

而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控制大陆后，立即进行笼络班禅的工作，一九五一年四月班禅会见了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五月又获毛泽东接见，这些殊荣让当时这个十三岁的孩子非常兴奋。

当中国在一九五六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时，就曾经请班禅代为宣传，使藏人能够理解自治区将来的运作。更早之前，中国本已于一九五四年九月选达赖喇嘛为第一届全国人代常委会副委员长，选班禅为常务委员，同年底又选达赖为全国政协常委，班禅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人职位虽高，却是虚职。

班禅喇嘛从此时担任中国职务后，终其一生均与中国为伍，在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班禅更被提升为全国人代常委副委员长，任原达赖之职，实际负责了西藏自治区的推动，并配合中国政策，将西藏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地区。

班禅喇嘛提到，民主改革本来应是为挽救宗教和民族利益而做，但是后来却发生了一些错误。如很多人可能只是在叛区住了一下、或是给路过的康人和安多人借宿也都被认为与叛乱份子有勾结。而对于不得已支援叛乱团体的，也都戴上自愿支援叛乱者的帽子。甚至还有一些人竟毫无原因地就被加上叛乱份子和反革命份子的罪名。他在七万言书中指出：

"如在土地分配上，民主改革中对农奴主所有的土地和生产资料，按所有者参叛与否，加以没收和赎买，分配给所有农区的人，废除了西藏土地的封建农奴所有制，建立了农民所

有制。但是，又因为调查不深入，以致又有很多人戴了黑帽子，很多不应该被没收的家户却遭到了没收。而中、富农奴如果在行动和言语上稍不加检点，就会立即遭受打击。

牧区方面的情形则大致和农业区相同。一些共产党干部在农业区搞完激烈的民改斗争后，头脑正在发热，因此一到牧区又对许多牧主和富裕牧民展开了激烈与尖锐的斗争。致使许多牧主和富裕牧民，只考虑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无暇顾及牲畜的管理和繁殖。

同时，民改后，由于对粮食抓得过紧，以及对群众留粮的标准太低，因而造成口粮吃紧。由于当时粮食缺乏，紧张与缺粮的人民难以从别处弄到粮食，以致在西藏发生了有人饿死的情况。这是非常不应该、拙劣的、严重的。过去西藏虽是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么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可以完全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

因而，西藏人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只好吃掉许多牲畜，对发展生产带来很不利的条件。民改时，由于禁止来往运送食物，并对人们在各地往来也严加限制，因此城市需要从农村运来的物资差不多都中断了。而城市内对余粮又大量收刮，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了。大多数人家都被搜查，居民自己库存的口粮、青油、酥油等，差不多都被挖光了。

而且，由于政府对于城市的口粮、青油、酥油等未能及时供应，或供应欠妥，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肉类、酥油、青油等极欠缺，连灯油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著急，叫苦连天，不安营生，致使城市情况紧张，名实两损。另外，有一个阶段由于全区的家庭纺织停顿，群众在穿著方面也受到了影响。”

班禅喇嘛在这份七万字的意见书中慷慨陈言，他强调，原本党的政策应该是只对那些执迷不悟的叛乱份子、反革命份子、最反动的领主及其代理人实行专政，但，后来全西藏关押犯的数字竟达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几，班禅喇嘛严重抗议：“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班禅喇嘛说到，在一九五九年时，毛主席曾经指示，由于西藏人口少，应采取不杀人或只杀极少数人的政策，比如叛乱头子拉鲁和罗桑札西不杀也可以。但事实却与此相反，到处有犯人被关押，也出现了许多不应当得死罪的犯人的尸体，这会使得千百户人家的父母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十分悲伤，眼泪不断这是不用说的。

关于西藏寺庙内的封建农奴制的特权和压迫剥削，班禅喇嘛说，因为近一、二百年，尤其是近十年期间，西藏一些寺庙的统治者在各级封建政府的支持下，以各种特权对广大僧俗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班禅喇嘛说：

“但是在西藏各寺庙中，有各种不同的状况，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寺庙都是那样。说每个喇嘛都是那样是不对的，一般的喇嘛没有那些罪过而且依教行事的善僧们更不会那样。..以致后来在寺院发动“三反三算”运动时，在实际工作中“反对宗教”本身甚至成了主要的工作。对于应予保护的圣洁对象，盲目疯狂地进行激烈的反对，因此在西藏的宗教寺庙问题上，发生使人们魂散神迷，伤心至极以致哀号的不好现象。

党在寺庙中主要是依靠贫困喇嘛，基本上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是贫困喇嘛中，也有一些是由于从前贪酒好赌等坏行为而变穷的。所谓“三反”，反对宗教是其一，即所谓破除迷信；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计的使僧尼还俗方其三。

在千方百计使僧尼还俗的时候，首先在各寺庙以所谓“学习”和“发动”的名义，将僧尼集中在大经堂和大房子内，不分昼夜地紧张的学习和强迫动员其互相批评。对公开表示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份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

当时还会问喇嘛们：“还不还俗？”如果提出继续当喇嘛的要求，就说：“你还没有受到教育，没有破除迷信。”而给予粗暴的斗争，甚至被管制和关押者也为数不少。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是铁打的人，根本就无法提出继续当喇嘛的要求，从而使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也请求还俗而回到家中，这些人既无法成家，又无力从事生产，加之都

不愿离开自己渡过前半生岁月的寺庙，但这些人之所以只好回家，就足以证明了发生在寺庙无法居住的严重问题。

此外，有些寺庙的工作队除了在喇嘛中开列名单，要他们回家还俗外，更严重的竟叫喇嘛站在一边，比丘尼和俗女站在一边，强迫他们互相挑选。

但深山禅庵或寺庙中有许多从事终身悟静修禅、严守教行的虔诚教徒，他们视红尘诸事为毒素，悲观厌世。由于革命事业也是红尘之事，他们很少有对之表示欢迎或积极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但这类人却受到了管制和关押。因此西藏大多数的寺庙没有僧尼居住，就是有人居住人数也很少，而这些人的宗教修养水平也低。”

班禅喇嘛表示，发生了这些状况，而有些人却说：“西藏进行了民改，广大僧尼获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权，自愿回家还俗，所以寺庙仅剩下了那么一点喇嘛。”这种说法，是得不到包括我在内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西藏人民承认的。

在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中，更强烈控诉西藏佛教被摧毁殆尽的情形。他说：“在消灭佛像、佛经、佛塔方面，从基本上来说，除去四大寺（哲蚌、甘登、色拉、札什伦布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庙外，在西藏的其他寺庙和广大农牧区的村庄或城市中，有人盗用群众的名义或戴著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折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等恣意进行疯狂般的破坏。”

“而且，还公然无忌的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施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成了黑地（西藏俗话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而哀号。”

班禅喇嘛说：“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千五百余座，而民改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之多，由于大部分寺庙没有人居住，所以大经堂等神殿、僧舍无人管，人为的和非人为的损害、破坏巨大，沦于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

“全西藏过去僧尼总数约有十一万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一万，剩余约十万，民改结束后全藏僧尼就算以七千人计算，也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住寺僧尼素质除了札什伦布寺稍好一点外，其余各僧尼素质一般很低，寺庙已经失去了作为宗教组织的作用与意义。”

“同时，民改后有喇嘛的寺庙，大部分的例会、时会、和时祭都中断了，集会和辩经没有了，因而显密理论的讲辩、“教经读经”、“传释教诫”、“编者经论”、“灌顶随持”、“悟静修禅”、“画线设坛”、“献供火祭”、“初十礼佛”、“廿五香会”、“还愿供神”、“跳神练音”、“送鬼驱魔”等正常宗教活动基本上也没有了，从而使“讲辩者”和“闻思修”的甘露枯竭。有宗教学问的人逐渐死去，教事陷于停顿、学问失传，因而使西藏土地上昌隆的佛教眼看著被消灭，这是我和藏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无法容忍的。”

班禅喇嘛的这封长达七万字的意见书，为当时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做了铁的见证，虽然因此为他带来廿四年的厄运，但也因此使得外界得以有系统的了解中国军队入藏后的种种错误政策，也因此一直被中国视为机密文件，但在一九九七年时经过特殊管道才得以对外公布。

十世班禅喇嘛从投降中国、到最后亲眼目睹一生护持的佛教走向衰亡，他的一生涵盖了从统战到护教的两极色彩。面对西藏长年的宗教黑暗，就连班禅喇嘛也一样无能为力，而他不顾一切上书的七万言书正充分反映他无处倾吐的内心世界。如今，这段宗教迫害虽然已经走入历史，但想起这场宗教浩劫，西藏人依然忍不住伤心落泪。

第四章 展开护教救国运动

“民主改革”让西藏翻腾，在西藏人痛苦的呻吟中，数以万计的中国部队来到西藏，这

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土地与空气，在还不能理解汉藏间弄不清的宗属关系时，冲突已经遍布雪域。

当时才六岁的藏人贡保当周，就坐在家乡的河边，亲眼看著中国部队大量进驻他的家乡，而他最亲的阿妈遭到中国部队残酷地射杀而死，自己也中了六枪。贡保当周说：

“一九五六年时，我六岁多，我的父母在我很小时离婚，并分别嫁娶，所以我是由外公和外婆养大的，我叫外婆妈妈、叫外公爸爸。那一年五月时，部落的男人集合在一起，都说中国人得寸进尺，如不早日预防，必定后患无穷，于是，西仓、唐龙等头官决定不让中国车队通过部落领地，他们堵住许多车队，汽车由帆布包著，没想到里面全是中国士兵，双方于是打了起来。战场距离我家很近，到晚上双方都还在对峙。

天亮时，我外公赶羊出去，我和外婆正在喝茶，猛听得几声枪响，不久便枪声大做，子弹像雨点般飞来。中国人将我们牧场全部都包围住，接著是大雾和倾盆大雨，在大雾、大雨、和乱飞的子弹中，因为牧场廿几户人家的牛马尚拴在圈内，在枪声中，这些牛马成批倒下，我们住帐蓬，子弹直接飞来，打得锅碗瓢盆破片乱飞，我和母亲缩蹉躲在灶旁。

一会儿，我听到隔壁喊著：“母子俩，坐不住了，我们一块儿逃吧！”我母亲是个跛子，我才六岁，那里走得动，我母亲喊：“你们逃命吧！我们母子俩是走不动了。”又在灶旁缩了一会儿，实在待不下去，帐房已被子弹打得破破烂烂，母亲一手拄著拐杖，一手牵著我，冒险往外跑，当我们母子二人一拐一拐的走到帐房外时，只见我们雇主一家九口人全部死在一块，在一堆牲畜尸体旁，无一幸免。

我们母子俩一拐一拐的往河边跑，我们住在平原上，只有河边有凹地可躲藏，我们找到一个水沟，躲在里面。我母亲脱下我的一双藏靴，把我装到她的藏袍的怀里，也不知何时，我就在母亲的怀中睡著了。睡梦中，听到母亲在摇我，说：“中国人来了，中国人来了。”我惊醒时，见河对岸有两个中国士兵，一人牵著一马，一人平端著一枝枪，站在距离我们五十公尺的地方，也不瞄准，只是平端著枪射击，打一枪，就再拉一下枪栓。

我母亲向他苦苦哀求著：“阿爸罗罗！（西藏安多方言，表示乞求）我们是一个老妇和一个小孩，不要杀死我们，求求啦！保佑啊！”求了许久，那人仍不停地、不急不慢地向我们母子俩射击。一会儿，可能母亲已经绝望了，不再乞求，将我从怀中取出，为我穿鞋，并将五世嘉木祥的照片也塞在我的靴子中，用靴带绑住了。这时母亲的脸上滴下几滴血，当时她已经不能说话，张著嘴，头向后仰著不动，我拼命叫著：“阿妈”，又摇著我的阿妈，河对岸那个中国人见我母亲已死，也返身走了。

我不停地叫喊“妈妈”，喊到声音嘶竭，那时，妈妈张开的嘴慢慢合上了，我以为母亲还未死，又不停地喊“妈妈”，但从此妈妈再也不动了。那个中国人可能打了几十枪，因是平端著枪，射了好一阵才将我的母亲打死，我也中了六枪，都是擦伤，头部伤口较大，到现在头部左侧还有凹陷。

我守在母亲的尸体旁，不停地喊叫著“妈妈”，叫累了，停一会儿，再叫，到了黑夜，我离开妈妈的尸体去解手，三宝保佑，我却再也找不到妈妈的尸体，我在黑夜中到处乱跑，就是找不到，不久，我也趴在地上睡著了。

醒来时，天已亮，我从河沟中爬上来，见不远处的路上，中国军队排成队在行军，我人小，就坐在河边上看热闹，那些中国人不理我，不停地在走，非常地多。

我被一个好心人带到他的家里，他家的帐房已被打烂，倒在地上，他掀起帐房，见到被打穿的锅还剩下不少的奶子，他瓢了一碗给我喝，奶子已发酸，虽然一天一夜没吃饭，却喝不下多少。他又从地上抓起很大一块乾肉，塞在我的怀里，对我说：“你先顺著路向前走，我们收拾完东西就来。”

当时，我看到到处是尸体，牲畜和人的尸体，帐房都被打倒，一些没打倒的也是一塌一塌的，连那些狗都不叫了。都悄悄地趴在地上，中国人连畜牲都打死。这期间，狗根本不咬

人，叫都不叫一声。

最恐怖的是，那些母牛奶涨得对我一直叫，我们家乡原来有一个残忍的方法，即将初生的牛犊从小杀死，以便可以挤更多的奶子，何况牛犊不易养活。现在这些母牛的女主人或死或逃，没人挤奶，她们的奶子涨了，见只有我一个活人，就团团围著我转，不停地叫，那里震耳欲聋的枪声和二、三十头母牛围著我转，我只好不停地嚎哭，真是恐怖。

后来据人们告诉我，那次攻击，包括我母亲共死了四十二人，绝大部分是女人、小孩，因为男人都在前一天上山打仗去了。”

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在西康省道孚县开始实行土地革改起，到一九五七年，包括青海、甘肃、四川等金沙江东部广大藏区，在官逼民反的情况下，都发生了反抗性的游击战斗，中国军队亦随即展开平叛的军事行动。

而在地方上，稍有反抗力的，若不是在对中国军队的游击战中被打死，便是逃到尚未实行土改的西部藏区避难，这样才造成后来以拉萨为主的反抗入侵人士的大集合。

关于这方面，藏人丹增降巴也曾经提到：“我是德荣宗（县）人，德荣宗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反的，起因是四、五十名中国人来我们家乡组织批斗会，于是藏人就造反了。我们境内共有七座寺院，四个格鲁派、一个宁玛派、两个噶举派。我们原将四、五十个中国人围在县城内，后来敌援军至，我们只好退出。战斗到了一九五八年时，我军已经是弹尽援绝，只好将部队分散成许多小股，在各地打游击。

一九五六年，在一个叫塞查堂的地方我们与中国人交战，我军阵亡十八人，其中有两人是在弹尽后砸枪投河而死的。半夜，我们前往战场，到处都是鲜血，我们救活还未死的三名藏人伤员，敌军被打死多少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敌军的尸体已经被他们运走了，那时我们有两百余战力。

同年在格日噶堂，我们与一股敌军激战，敌人另一股绕到了我们背后，于是双方在那里打了一场恶战，我躲在山洞中，敌人死伤惨重，死了差不多有两三百人，我方死伤不过二十七、八人而已。在格日塘噶，双方死了几百人，后来人们说那个地方是鬼域，夜不敢行。

也是那一年，在松永地方，天未亮我们就与敌人交战，藏人有八人阵亡，我军未和敌人有很大的杀伤，但两股敌军误会，相互投手榴弹，我军在误会中退出战斗，在退出时不仅带出阵亡八人的枪枝，还夺得敌人四枝枪。

在宗雄荣，我军又打了一次胜仗，我军夺得大炮两门，四梃机枪，另有许多的枪枝。

如此我们在各地打游击，在家乡整整打了三年，一九五八年藏历一月十五日，我们弹尽援绝，只好外逃，有些地方虽也重打了一下，但多是骚扰一下再逃回，本来当时我们也想去投靠普巴本（雪域护教军总指挥），得知他们也缺少粮食供应。因为到处是敌人，真不知该怎么打才好，于是人们开始越过怒江向西奔逃。”

在初期以西藏康巴人为主的反抗行动中，许多地方都是各自作战，战争最早是发生在金沙江以东，正好是最早推动民主改革的地方。一九五六年后，理塘发生了战争，不久安多也发生了类似的战斗，一九五七年更蔓延到芒康、贡觉那一带。

也因此，理塘、贡觉一带藏人最早卷入战争，而且因为理塘、贡觉属于“昌都解放委员会”的管辖，所以彼此间不仅不能建立联系，更谈不上有组织性的并肩作战，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家乡孤军奋战；理塘人然楚阿旺与贡觉人阿奈巴青，同时体会到藏人的束手无策。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廿五日，然楚阿旺到达拉萨，但是一九五六年一月在西藏东部，他的家乡已经开始在进行民主改革了。当时中国提出两种解放办法，一种是和平的；一种是暴力的。前者是要求把枪、刀子都收下，这样便不会伤害人民和财产，宗教和寺院都可以保存；但中国又用威胁的口气说，如果不听就采取暴力解放，就是兵戎相见，那后果是很难预料的。

这样藏人便在理塘寺开会，研商是不是要交枪，上面的头头和喇嘛都说不交，因为这样藏人什么都没有了，有人主张还不如打吧！反正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还是会收拾我们，还

不如打死算了。最后没有一个人要交枪，大家都说："不交了，打吧！"

但有一个叫阿木喀宗的喇嘛提议说："我们不如先交一批性能已经不好的枪一千枝，延缓一下时间，看看局势会不会有变化。"商量后大家决定先交五百枝枪，结果去了洛县交涉后，中共却强硬地说："不行，枪必须全数交出，这是命令，不交，后果就是暴力革命。"

但藏人却一致决定不交枪，阿木喀宗喇嘛回来后，有一个部落的县长在参加会议时带了七、八百个带枪的人马，会议完后碰到中国人在那里埋伏，那地方有很多沟沟坎坎，一到那里双方就打起来了。藏人反击后死了二十几个人，中国部队被打死许多，中国人被迫退出去。

这样大家都开始接受打仗，人都集中在理塘寺，元月廿四日，中国人把理塘寺全都包围起来，也开始进攻，第一天死的非常惨重，到处都是尸体，就这样打了八天，理塘寺有很高的城墙，中国人拿了梯子过来，然楚阿旺当时还是个喇嘛，一生都在念经，根本不会开枪，只能拿著斧头躲在墙角，看到中国人爬在梯子上，很快地抓住他的领子，拿了斧头就砍，这样也砍死好几个中国人。

理塘人当札也说，由于十八岁以上的人全部来作战，召集五千余僧兵，当时藏人的作战人员约一万人左右，在投降与否发生不同意见后，藏人不愿投降的向外突围，那真是死伤累累，尸堆如山，也不知道究竟死了多少。

然楚阿旺说，当时造反是理塘、杰塘、巴塘三个地方都造反了，三个地方本来是一个整体，但后来杰塘被划到云南。理塘有五千名僧侣，再加上各个部落的士兵，人数相当多。当时据说有个团长，人称鹰爪团长，他让中共受到阻击，有整整七天不能攻进来。七天后，发现中国人突然用飞机进攻，三个寺院中因为理塘寺在山凹中，炸弹都炸在山腰上，但其他寺院却被炸到天上到处乱飞，炸成了一片废墟。因为藏人不懂，都往房子里跑，巴塘人大部分都被炸死了。

因为藏人都在寺院都发了誓，要和寺院同归于尽，决不离开寺院，但这时大家都慌了，都准备逃跑，人就从四面八方往外跑，解放军开始冲进来了。但也有藏人在经堂（墙很厚），藏人躲在里面不出来，中国人就在外面烧。

这时候理塘就失守了，很多突围出来的都在山上打，打了好几年。然楚阿旺后来人到了拉萨，每天都听到这些事，心急如焚，向上报告好几次要求发武器，西藏政府从来不给，藏人认为这是因为当时西藏政府和中国人关系很好，最后已经逃到外国的嘉乐顿珠认为他们可联络美国，要他们派人来，接受训练后再空投到理塘进行战斗。然楚阿旺说："于是理塘就派人到美国去训练，这是第一批派过去的，后来共有七人都装备了很好的武器，再空投到理塘去打仗。这时，别的地方也开始打起来了，也开始派人到美国受训，要大家一起来打。

这时候，来了飞机在理塘扔了三颗炸弹，但都没有爆炸，第二天飞机扔下了许多藏文传单、以及飞机、大炮、坦克的照片，一些如"以后会宽大处理"、"你们是打不过的"的传单很多。当时一方面是藏人占优势，他们先占据一个商店，公安局内有很多犯人，他们要攻进这个公安局救人，却又攻不进去，后来因四周都挖了水壕，很多牛羊被赶了出来，也被炸得血肉模糊。

当时有一个地方叫窝郭嘉的，房子四周已修了四个碉堡，攻不进去，里面有六十五个共产党干部，但都是藏人。那几个藏人为了对共产党示好，是对藏人最坏的，藏人特别恨他们，所以一定要攻，双方互相打互相骂，都是零星战斗，那边打死几个，这边又打死几个，这项任务共有十八个年轻人执意要冲上去，到最后，只有四个人活著回来。

在理塘地方，二十五个部落中有三个部落先打、二个加入，其他二十个部落都没有给任何援助。这时有一天，突然发现彷佛是中国人的屋顶上都插上了红旗，藏人觉得莫名其妙，这时一个哨兵用望远镜观察，才看到很多大车、小车，来了很多人，因为中国部队都已进入村庄了。

一些大炮旁都是解放军，藏人这才知道中国人的增援部队来了，大家都只敢躲在民房中，

不敢出来，结果大炮五、六分钟就轰一次，男女老少都被炸得一塌糊涂，然后坦克忽然就冲上来，一边扫射一边摧毁，真是惨不忍睹。

西藏人根本没有反击能力，我人在山顶上，眼看已经顶不住了，大家就到处乱窜，剩下十几个人都跑了。”

藏人四窜后，留下的仅剩残破的家园。在战斗中巴塘寺院和恰城寺院完全被摧毁，理塘寺也是完全毁灭。然楚阿旺说，在清朝时代，曾把理塘寺摧毁过一次，后来大约是在一九三三年和国民党打仗时，又把寺庙摧毁了一次，但那次是把人从寺院中赶出去，寺院不是完全被摧毁；等到第三次一九五六年中国军队来时就是完全毁灭，而且变成了田野，只是后来大家又从田野中把寺院重新建立了起来。

此外，恰城人次成丹增也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恰城位于巴塘和理塘之间，现在中国人已将其列入理塘县，恰城原位于巴塘、理塘、杰塘（现迪庆）的中心，从这些地方骑马到恰城要五天的时间，如果快马加鞭，也要奔跑三天才能到。

大约是一九五六年藏历一月，当时我十八岁，那一年中国人让上巴喇嘛当什么主席，也让那些恰城的头面人物到中国去参观、开会，乘这些人离去，在恰城组织那些贫穷的或要饭的藏人搞革命，鼓励那些人反抗，并也给他们许多的名称。由于我家乡距离中国很近，对中国人几年来的所做所为都大致了解，藏人意识到中国政府将采取的措施，于是大家决定反抗。

恰城不同于其他地方，在恰城只有一座寺院，寺院很大，是格鲁派的，叫“桑佩林”，是原来一百一十三座小寺合并而成的，那些小寺以前是噶举派的。恰城气候冷热适中，一年两收，是块宝地，人民富裕、团结。决心反抗中国后，许多人在桑佩林寺院中，决定造反。

当时，不远处有中国人的兵营，有几百人驻防，恰城人围而不攻，切断了他们的水源，困了一个月，并告诉中国人，你们把我们的头面人物诱骗到中国，我们绝不答应，宁死也要和你们拼。于是双方在一个月后交战，中国人分守两个阵地，寺僧组成的敢死队攻下了小一点的那个阵地，我方死了许多人，也打死不少中国人。

但那个大的阵地却一直攻不下来，有一次中国飞机来轰炸寺院，一天投了八、九十颗炸弹，躲在寺中的藏人死伤累累。恰城打响后第五天，理塘打了起来，但杰塘在此期间却一直按兵不动，中国人不停地对杰塘人说“不要跟著反动派走”，并且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使恰城人孤军作战。

中国发现“革命”的结果引起恰城、理塘的强烈反抗后，才又宣布“六年不革命”（改革），并放回了原来被骗去的恰城头面人物共十六人。但那些头面人物一回到家乡，便率人逃到山上，分成小股，利用恰城险峻的地形打游击。

当时我也应“十六－六十岁”的徵兵令去参战，那时我是个僧人，我参加了前期的战斗，但未随他们逃入老林中，主要原因是，我有一个舅舅在拉萨经商，他从拉萨打电报要我去拉萨，当时，寺院已被摧毁，没什么可留恋的，所以我便在一九五六年的藏历八月到九月时前往拉萨。当时，通天河以东战火已全面燃起，大部分寺院已被摧毁，男人全躲进深山老林中，中国人平时也躲在兵营中。

在我们寺院，有一颗大炸弹将几十个僧人全部炸死。我们藏人有个毛病，就是遇到危险不知所措时，除了祈祷，就是等死，在寺院里死的全是这种人。飞机一轰炸，都挤在寺院里，结果一颗炸弹就可以把一房子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炸得血肉横飞，死伤无数。

我在当时就产生怀疑，寺院最壮观，目标最大，人家就是希望要把人赶到里面再炸，因此，每次轰炸，我是绝对不往寺院逃的。我还告诉藏人，寺院、佛像是挡不住枪子、炸弹的，当时。敌机还投下大量红红绿绿的传单，传单上用藏文写的大致内容是：“要服从毛主席的领导，不要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其实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中国人他们自己在瞎说。

我想去拉萨，为了途中的安全，从中国人那里领了通行证，是通过亲戚领的，我有许多

亲戚替中国人做事。我们康人为西藏的自由流了血，那是我们的骄傲，可是，同样的我们恰城人和康人中有许多人为中国人干事，这也是我们不光采的一面。当时，我也没这样想，想的只是有通行证好赶路。

过了金沙江（藏语称为舟曲），中国人又是一付菩萨脸，甚少暴戾之气，当然是相对于河东而言的。我到了拉萨后并前往印度经商，在各地朝圣后回到噶伦堡，当时大家正在为人在印度的达赖喇嘛应否返藏而吵个不停。在噶伦堡的商人们极力叫嚷要开战，算是为四水六岭起了个头。当时成立的康巴人组织叫"康人四部"，后来安珠开始打造金座，藉机广结各路人马，当时和安珠有联系的在国外主要有嘉乐顿珠，国内有卡其管家和大仲聂帕拉等人，并开始组建"卫教志愿军"。

当时我们未经历过现代战争，服装及装备现在看起来简直是找死。我的藏装、裤子等全是黄色的绸缎，仅护身盒就配带了两个，都很大，长短两枝枪，长短两柄剑、刀、狐皮帽，各种装饰等等。看上去人变得高大，威武了，老百姓看了都很高兴，认为兵强马壮，敌人看了，会产生错觉，十余人看上去似乎有上百人，可威慑敌军。

马也是这样，驮马头上竖一箭杆，缠哈达、绸缎等，挂上去的玲铛不只一串，而是两串、三串的，大小不等的挂在乘骑和驮马的脖子上，马鞍和垫子极厚，色彩又鲜艳，彷彿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办喜事。

这样看上去那军队阵容很强盛，大家都喜欢这样，真打起来，这不是找死吗？人高马大，走到哪里，人民夹道迎接，说："神兵"、"护教兵"来了，含著泪水说："这下放心了。"寺院则不仅出迎，还长号短笛齐鸣。原来在竹古湖边札营时，湖边有各部的帐蓬，山上有哨兵的帐房和做其他用途的帐房，竹古湖清澈，有敌人奸细，从远处探查，湖边及山上的帐蓬和人倒影在湖中，使其以为我军的帐蓬有如天上的星星，回去便说有无数藏军。

我们在聂木与敌交战，打得真是过瘾，我们冲过去和敌人混杂在一起，敌人也乘夜偷偷摸过来，天亮时，双方大打，太阳升起后不久，就把敌军全部赶了出去，到处是敌军被撕破的棉花在到处飞。我军和敌短兵相接时，有开枪的，有挥刀冲杀的，那真是热血沸腾的场面。
战斗后，聂木的女人们手捧香炉，高呼"佛教胜利"、"西藏永固"、"佛教永固"、"外道战败"等，真是让人掉眼泪。"

贡觉则又是另一个战况激烈的战场。阿奈巴青是贡觉人，她的父亲是贡觉邦达部落的头官，她指出大约是一九五七年左右，从昌都到德格那一带都有中国部队在修路，当修路修到昌都时，当地藏人就打起来了。她因为是女孩所以没有参加，但知道每个部落都抽了人参加，那时她的父亲有病在身，这时有个百长叫钦美多杰的，率了四、五百人逃到贡觉，另外德格廿五个县也率了七、八百人逃到贡觉，于是各部商量一起狙击修路的以对付中国，他们也准备与芒康的普巴本联合。

因为修路的部队人太多，他们商量后就往札羊方向靠拢，札羊那边有个"色雍"（色就是金，雍就是毯，类似平原，但并非真正的平原，是比较大的平地），大家就在那里扎营，结果有一天早上醒来却发觉已被解放军层层包围，飞机在上面轰炸，下面也在进攻，死伤非常惨重。

色雍那边打败后，他们就往贡觉方向跑，在这之前阿奈巴青并没有打过仗，但因为父亲过世，家中没儿子只有她这个女儿，所以继承了"头官"的职位。不过因是女儿身，所以母亲、奶奶、姑姑等都不让她上前线，多是在后面指挥，做一些安排。有一天阿奈巴青就决定让几千个妇女、孩子一千多人先走，其他男人则留下来在各个山头狙击中国军队的追击。

当时百长齐美多杰的妹妹也一起逃过来了，她的女儿叫德琼的就和她一起开始参加战斗。阿奈巴青说，当时她们从山上看到敌人像蚂蚁一样，黄绿得一大片，并说今天一定要打一仗，不打不行，于是两人下马后就开始开枪。

阿奈巴青拿的是父亲的手枪，德琼拿的是大号的盒子枪，当时阿奈巴青是廿五、六岁，

德琼才廿一岁，她的枪不管用，但德琼至少打翻了二个人，不过打了几枪后因为子弹有限只好开始逃跑。那时众人已跑得很远，她们骑马到夜晚才追上。

在德格那时曾听说边坝地方有四水六岭护教军的名称很响亮，于是就往边坝方向走，队伍逃跑时都是昼伏夜行，白天藏在山沟中，派一些人去侦查，这样终于到了边坝。在边坝看到很多逃来的家属，还有牛、羊，老头和老太婆坐在牛背上的两个篮筐内，人非常的多。当晚大家听到飞机声，吓坏了，以为敌机发现我们，是来追击的，于是当晚又派人去侦查。

第二天天亮时竟然静悄悄的，这时派去侦查的人回来说："这下好了，昨天的飞机不是中国人的飞机，是美国人的飞机，是我们自己人的，投下了十几个人都是我们自己人，有许多的枪，这要保密不能对别人说。"

虽说要保密，但人人一遍又一遍地说，最后还说要保密，人们互相传，最后弄得老幼皆知。大家想这次不必再跑了，就往边坝方向走。边坝寺是一个很大的寺院，有很多寺院执事、高僧、以及些藏族官员都聚在那里，每个部落都来了一些人。后来美国又扔了好几次武器给我们，都是好枪。

大家都觉得好极了，有枪又有那么多人，我们还怕什么？西藏人要以此为据点再向外扩展，因为大家知道有美国的援助就不再逃了。

但突然有一天晚上却被包围了，阿奈巴青记得，当时中国军队人数非常多，天上有飞机，地面有大炮，战争只打了五、六天，藏人就完全败了。大家往树林子跑，敌人也在丛林中四处搜查，逃亡的藏人一共是二、三百人，但当时妻离子散，有些子女找不到父母的被冲散后，子女跟著那一户就走了，那儿没兵就往那儿跑，根本没有目标。

廿多天后，藏人决定往北走，越过喜马拉雅山的北方无人区，有一天大家正在爬一座大山，才翻到山上天刚亮，突然听到枪声，然后看到四处冒出来的都是解放军。彼此打来打去，几个德格男人还要继续打，阿奈巴青高喊说："不要打了。"因为再打下去，妇女和小孩全部要死，只好投降，所以大家都变成了俘虏。

当阿奈巴青在八宿县被俘虏时，她的奶奶、妈妈、姑姑都已经老了，这三个女人被认为没什么用处就被赶了出去，让她们自生自灭，但她们听说阿奈巴青要被押到昌都，就等在门口，被押出来时，三个人就喊著："不要押，我们三个靠她养活，你们把她押走，我们就要饿死了。"中国当兵的不理她们，她们就说："让我们一块走，求你们把我们三人一起押走。"当兵的还是不理她们，三个人就在后面追，当兵的烦了，就给一棒头，踢一脚，她们被打倒后爬起来后满脸都是血。

阿奈巴青当时走在队伍最前面，看的直掉泪，后来她们三人没赶上，却听得到远远的哭声。

被俘虏后藏人的枪被集中起来，人则用绳子绑在胳膊上穿起来一起送到洛县，看到山上一群主要份子也在那里，中国部队把藏人用手拷拷起来押著走，但只有阿奈巴青是女人，其余全是男人。他们要被押到昌都，共有廿五辆车等在那里，有部落人、喇嘛、军官等，廿五辆车子全部装得满满的，绳子编成的网子盖在她们头上，动一下就砸，就这样把她们全押到昌都。

阿奈巴青说，这些藏人全被关在昌都寺，这是一个很大的寺院，有几千名喇嘛，在大经堂内廿五辆车押来的人全集中在那里，腰带、鞋带、护身符、还有藏人衣服的钮扣只要是铜的也都被取下来。在房子各个角落都放了尿桶，解手都在那里，但只有我一个是女的，在解手时很不方便，但也没有办法。尿桶一天倒一次，早上给一小块炒面、糌粑，下午给一个包子或稀饭，肚子好饿，就这么关著十几天也没人理。

后来昌都解放委员会主任王其美来了，他要大家交待问题，并说交待后可以宽大处理，然后开始学习，因为阿奈巴青是女的就关在另一个养牲畜的房子内，里面已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女的关在那里，天天都在斗争。有一天她和五十多岁的丹增秋吉（就是齐美多杰宫保的

老婆）被扣上脚镣，说她们罪行没有交待清楚。如第一没交待有多少财产；第二没有交待枪枝到那里去了；第三部落有多少枪也没交待清楚；第四要交待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干过那些坏事等。

阿奈巴青不愿讲父亲的罪行，丹增秋吉也非常勇敢，她站起来抖抖衣服（带有诅咒的味道。西藏女人的衣服下摆被认为有经血，很不乾净）说："你们不害羞，你们中国那么大，那么多男人、军队，把我们女人这样你们不害羞。"她很勇敢，始终不愿说她丈夫的坏话，这样斗争中也有好几个人被枪杀了，但在整个寺院中也开始有人饿死。

在寺院中一个大经堂经常关著几百人或上千人，每天都有人饿死，每天至少有一个尸体、多时有六、七具或十几具尸体。每天放风时，尸体就会被拖到门边，然后活著的回去，死的尸体就扔了，所以每天都可以知道当天又死了几个。最后有一部分人被枪毙了，少部分人被放了，还有一部分人又被卡车押著送到昌都监狱，一直住到一九六五年，然后这一群人又被送到拉萨，阿奈巴青脚上拖著脚镣整整拖了一年又一个月，后来竟在监狱中共待了廿一年。

白噶成列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到处都有大小不等的战斗发生，虽然大家都认为应继续进攻，但从山顶上往下看，山下有许多敌军，我们用长枪打了一些子弹，但敌人理都不理，我们继续讨论接著该怎么因应？当时有一拉妥觉雄人叫阿萨塔拉，自告奋勇愿意去与中共谈判，他持的是原来就和中国人谈好的协议，即在拉萨没有变化之前，拉妥与中共互不为敌。据说后来他被带到昌都与王其美见面，他当面斥责王背信忘义，王于是答应遵守原定协议，不再继续向拉妥进兵，双方并且维持现状以等拉萨的变化等。

他回来后，敌兵撤回，并到处宣传说中国人与拉妥已决定维持现状，这一下，四面八方的逃兵和顶不住中国军队进攻的人纷纷逃向拉妥。不久四水六岭到洛宗，藏历三月拉萨失守，昌都的王其美开始不停地来信要我们投降，并说明大家不要破坏国家的财产，不要枉费个人的性命，拉萨已经武力解决了等。

但我们还是没有放弃战斗，我们在进攻时派了一个当地人带部分人乘夜去打听消息，那个人到自家门口，对来开门的父亲说："爸爸，我回来了。"

父亲一听儿子回来了，痛苦地说："啊喀喀！（表示很遗憾的惊叹辞）我的好儿子，你回来做什么？你难道不能跑到远一点的地方吗？"儿子说："爸爸，我回来是有事。"

父亲又说："回来还能有什么事，真是没出息，他们会剥你的皮。"

儿子再说明已经带了四水六岭的人来了，父亲一听万分高兴，立即叫醒妻子让他们母子见面，然后再说明敌情，当地有敌人约四百余人，每天早上放羊出去后，就会玩篮球，一会儿再放牛上山，而这时藏人要去打扫牛圈、羊圈等，敌人主要是挖洞住在一山上。我们根据这一情报布置战斗，并且组织敢死队向敌小山包发起攻击。当晚敢死队就悄悄爬上小山包先藏起来，我们则负责冲击被赶出来的敌兵。

因为拉萨已经失守，肯定是要通过暴力手段了，中国人到处派人劝降，当时北有苏莽僧拉多拉部，南有贡觉以及察雅等部的军队，数量都不多，敌军开始向我方进攻时，首当其冲的察雅阿旺巴登组织抵抗，敌人一路过来，见人见狗都要开枪射杀。察雅当措十六部以四水六岭的名义招募十六岁到六十岁的士兵，当时拉妥附近凡能打仗的男人几乎已经全部出动，投入了战斗。

敌人后退入康巴噶，康巴噶有寺院，寺院的主人康智仁波切已经逃亡，敌于是将三百余名寺僧中选出强壮者赶入一房间中，夺取寺院的全部马匹，后经苦苦哀求才留下一匹马作为活佛的座骑。

敌人随后进入大经堂，拆毁佛像佛具想做为战堡和住地，有个僧人因为不满动手打了他们，便因此被捆绑在柱子上，并将全部寺僧叫来欲当众惩罚。

此时，突然有一寺僧亮出怀中的斧头，一下子就砍死在身边的敌兵，其他寺僧也取出各

自找得到的刀棍斧头等肉搏，经堂内顿时乱成一团，敌人见人就射，寺僧逃出的不多，许多人被俘后死在中共监狱中，被打死的寺僧则被敌人集体埋在寺院内，后来重建寺院时，从地下挖出许多人骨，才知道当时的一些阵亡寺僧被中国人埋在这里的，共有八十八具骸骨。

由于我们没有通讯设备，加上也不懂军事布置，特别是大规模的军事布置，人们谁也不知该如何，而且各自作战，有些在打，有些在逃，虽然不知往那儿逃，但还是有人逃。

一天晚上九时左右，传来飞机声，我们经常遭敌机轰炸，但飞机都是白天来，晚上来这倒是第一次，飞机从我们的头顶掠过，至边坝，在边坝转了两圈又飞往夏贡拉方向，马上有拉妥仁波切说这是来支援我们的，我想这个时候有谁可以来支援？会不会是中国人从空中来了？

后来飞机向下空投人员，我们也看不清是不是中国人，正在这时，有人回报说是四水六岭的人，当中有色顿月、然日益西等，我立即快步奔向边坝，见到边坝士兵正与空投人员对峙，我立即高喊是自己人，大家好高兴，边坝立即以最隆重的仪式进行欢迎，寺僧吹著长号持香迎接，其他人在旁烧香、煨桑？，算算空投人员一共十六人。

色顿月首先发言："你们作战辛苦了，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不是指挥人员，你们有什么需要，特别是武器弹药，我们可以想办法。"色顿月并要求报来实有人数。其次，是各部一定要守住各自所在的阵地，阵地失守了就无法空投武器；第三是建立军司令部以及按县建立军队编组，并强调指挥部由我们建立，他们只是支援等。第四，如果我们能守住一个月或十五天以上，就会有支援："我们人能下来，就能让武器也下来。"

当时空投人员还带有黄金，他们向工作人员以黄金支付工资，甚至帮他们砍柴、清扫马圈等的人也得到他们给的黄金，当时有人私下说："共产党以大洋在西藏铺路收买贵族，现在美国人以黄金来铺路了。"当然我们是希望如此，可惜并没有。

这时总部命令我们前去波密，占领波密全境。在翻山前进时，在山顶有十余具我军先头部队冻死的尸体，路越往下越难走，只有在悬崖绝壁中开出的一条独径，稍微不慎摔下去的话只有粉身碎骨，每次只能过一人一马。

我们几乎断粮了，士兵们个个饥肠辘辘，同时敌人也被我们围困了七天七夜，他们绝对也是没吃挨饿的。几场战斗下来，各部都有大量伤亡，我们一些指挥官在巨石上开会，这时双方已经交战十四天了，于是有人建议部队从另一路退回来，同时也使敌人可以退出被围困的阵地，然后我们可以尾追到平原有吃的地方，但敌人会不会不退反进呢？

但最后商量结果只能退，这可能是一条出路，否则军队断粮，虽然敌人被困，我们也不免处在困境中，于是开始退兵。但因有人不愿退，我招集波密人的众军官正在商讨，密林中有敌人突然向我们射击，当场有四名指挥人员阵亡，另有一些人受伤，于是他们更不愿撤出，说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在埋葬那几个战死者时，一个连长又说："死几个人就逃，这算什么？"我说这是总部的命令，他气愤地说："真是一批败类。"

在波密，我们几千人挤在峡谷中，开始撤退。一些年轻士兵说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愿饿死，当时的情形也确实如此，那批年轻人总是反覆强调："与其回去饿死在边坝，不如留热身子于波密冰冷的土地上。"

但因敌人在唯一的一条通道上修筑了强大的工事，我们突破阵地的希望微乎其微，这时每天都有人不肯承认前面的阵地无法突破而发起攻击，每次都有一些最英勇的官兵牺牲。我们缺乏爆破工具，只能用仅有的一些火炮和枪枝集中射击，封住或压住敌人的火力，使敌无法杀伤我突击部队，他们顺利地撤了回来，此时我们若乘胜攻击应也能攻占敌人的碉堡，但敌人仍有许多其他的阵地，放眼向下望去，敌人阵地到处都是军马，我们已无力一一攻取，加上敌人援军一再换防和我军食物告竭，使大部分官兵前进的意志已有所削弱。

回到边坝，谈及此战，真是死伤惨重，许多最勇敢的战士丧失了生命，我们在波密有二百多人阵亡，有几百人不愿回边坝，宁愿饿死或留在当地做游击战，空投人员看到我们狼狈

而回，甚为不满，大发雷霆之怒，一直认为我们应解决断粮的困难。但嘉康果南却责怪决策错误，并说我们被困时没有一碗糌粑的后援，我们为了往后的战斗才返回，并非临阵贪生怕死，军中血性男儿都要留热身于波密冰冷的土地上。

战场上死的死，逃的逃，然日益西是从美国空投回来的，在一次战役中他扛著横射炮向敌人射，因为敌人也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他被击中时，整个下巴几乎被打掉，然而他一负伤便立即吞食衣领上的毒药而当场死亡。另外在山梁上的战争中，占果、阿朵、与齐美公保一同并肩作战，但过程中齐美公保对儿子说："儿子，走，吃口糌粑再打。"但以后他俩就失踪了。原来，吃糌粑只是个幌子，他是领著儿子向后逃去。之所以逃跑，是因为其他人觉得抵不住了，有一些人也提议投降，所以乾脆一走了之。

有一位叫仲囊嘉智仁波切以袈裟包头？坐在战场上，问他应该怎么办，他说念颂一亿遍六字真言就没事。当时有一个叫额车罗嘎的人高呼说："不要打了，我们投降。"还说："为了德格王子、囊谦皇后，活佛的安全，只有投降，从现在开始，谁打枪谁就要为皇后、王子和诸活佛的安全负责。并高举白毡和哈达，其他人不知所措，都停止射击愣在那里，一些人甚至将枪集中准备投降。

但当时有一个专门打制佛匠的铁匠，拿著工具，前后背著两个小孩，他一看人们欲降，从收起的枪枝中拿起一枝美式步枪，将八发子弹都装满，边高叫："我也降，投降，投降。"但到了敌人附近突然向敌射击，在射出八发子弹后他也被击倒，由于他出其不意，使敌有好几个人伤亡。他这样一来，就有人跟著高喊："我等也是男子汉，要打。"但也有人依然继续逃跑。

当我们到达在长江源头的当雄时，正好是当地藏人的营盘被敌人摧毁后不久，在战斗中，整个部落的男人以及外地投靠能打仗的男人几乎全部阵亡，最后甚至一些女人也拔刀向敌冲锋而死了。真是可怜，那些女人因见自己的丈夫兄长儿子等都死了，悲愤中亦但求一死，真是惨烈。

那时候，藏人毫无军事常识，其中最大的缺点是行军打仗都领著妻子儿女父老，不管瞎子、聋子一大堆都要领上，还有牲畜等也要赶著走，在边坝、在其他地区都是这样。其本意是怪可怜的，不希望家人分离，能够同生共死。但每次战斗特别是飞机扫射时，死的绝大部分是那些老人、妇女和小孩，由于他们赶著牛羊一批一批的，从飞机上往下看黑压压一片，就专门向他们投弹，战斗中也是他们死的多，现在我们提的死亡人数都是不包括他们的，他们都是成群的死亡，真是惨不忍睹。许多母亲死了孩子还趴在母亲身上吸奶，几天后转到这地方时，孩子还是趴在母亲身上，但是已经死了。这种事开始时还有点感觉，见多了就麻木了。"

事实上藏人打这场战的决心非常强烈，藏人加松说，在一九五三年左右，热振僧噶（摄政王热振的贴身侍卫）有两个弟弟在为中国人效劳，是中国的干部，他们不断扬言要杀死热振僧噶，热振僧噶也说要杀死他的两个弟弟。后来他们在桥头相遇，双方决战，热振僧噶说："我是哥哥，你俩是我的弟弟，今天却要在这里自相残杀。因为你们是佛教的敌人，我消灭你们是为了保卫神圣的佛教，所以我是正义的，即使我死了也绝不后悔，可以让你俩先动手。"

两个弟弟随即向其攻击，于是双方在桥头格斗，热振将他的两个弟弟全部杀死了，并说："我杀的是佛法的敌人。"

从多名受访藏人的回忆中可知，藏人是在绝望无助中才被迫与中国对抗，但最后都因为实力过于悬殊，不是被迫流离到拉萨，准备另一场战斗，便是遭到无情的监禁，与世隔绝。这些都是西藏人自发而起的战争，如美国等外国势力介入都是很晚的事，但是，在中国的论述中，均将藏民反抗视为是受到帝国主义的蛊惑而起。

在这方面，中国国务院于一九九二年出版的"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中，为自己辩护武力进藏的原因。在这份资料文件中，中国表明当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湖

南、以及与西藏相邻的云南、新疆、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解放后，对于西藏一开始也是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

因此："在一九五零年一月时，中央即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当时控制西藏的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札.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不顾国家和西藏人民利益，拒不接受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号召。"

中国国务院表明，当时西藏还在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中央才不得不于一九五 0 年十月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昌都。

中国方面也一直以"扫荡国民党与外国势力"做为军方的精神号召，在西藏抗暴运动中，曾有一汉人姜华亭从解放军阵营中投奔到藏族人民的一方，在战争后期成了"洛桑札西"。人称"汉人洛桑札西"的姜华亭，在他个人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中国当时一贯的说法。

姜华亭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八军五十三师一五五团的副团长兼炮兵营长，山东莱阳县人，在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军第一次进驻莱阳，他的父亲当时担任粮食站副站长，于解放军撤退莱阳县之前，共军曾命令他把所有粮食一概隐瞒。

等到国民党军队到达时，他的父亲怕瞒不住国民党特务，便把四万斤麦交给国民党军队。因此在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当共军再度回到莱阳县实行清算斗争时，便在斗争中将他父亲抽掉两条肋骨并痛毙，从此结下姜华亭反共复仇的意念。

年轻时的姜华亭在炮校就读，当时炮校的军事专家和顾问，都是苏联人，他们这些低阶干部除了学习军事课程以外，同时还要兼学数学、文化。姜华亭在沈阳高级炮兵总校受训期间，获悉西藏毗连印度、尼泊尔，目前还未彻底解放，以西藏政府为首的反入侵力量，相当坚强，藏民大多数拥护西藏政府，中国驻藏军政人员，仅能控制点线，但点线之外，入夜就变成是反抗藏人的天下了。姜华亭心中从此认定，西藏是最理想地方，一定要去西藏。

因此，在炮校毕业、快要分配工作时，炮校召开大会，校长孔成周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他说："人民政府早有命令，解放四川后，立即进军解放西藏。"

他又说："一九五一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我方部队进军西藏，解放水深火热中的西藏人民。可是西藏统治集团中的一小撮分裂主义份子和国民党特务、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竭力利用藏汉民族之间的误解和隔阂，挑拨藏族同胞和我军之间的关系。致使不少藏族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更不敢卖粮草和柴草给我们，妄想饿死我们、困死我们。"

"目前我军刚到西藏，当地的一小撮反动武装，不断袭击我军驻地和粮草运输，破坏我军进军西藏，巩固边防的光荣任务，在此紧要关头，我们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要到西藏去，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实际行动支援我军先头部队。"

他最后说："同志们！为西藏劳苦大众立功的机会到了。"

于是姜华亭写了个志愿书，表示自己愿意去西藏，立刻受到校党委的表扬。一个个年轻汉军在军乐和口号声中，带上大红花，踏上进军西藏的征途。

一九五六年，姜华亭随著援藏部队经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沿康藏公路到达波札木，他的部队首先负责担任保卫西藏工作委员会及西藏军区司令部任务，并且驻防林卡萨巴。一九五八年三月，在他驻防林卡萨巴的最后一个月时，大陆内地反右派任务刚刚结束，但西藏整风运动却正要开始。

事实上，这场普遍在藏族地方发生的战斗究竟有无必要，也曾经引发汉人部队内部的质疑。一九五六年底，在大陆内地开展大鸣大放不久，驻藏十八军内部的三个将级军官，包括十八军参谋长李觉、后勤部长秦志植、政治部主任洪流等少将级以上军官，背著十八军党委，联名上书毛泽东。

他们的主要意见为：

一、“西藏地区荒山野岭，由内地调大批人员进藏，以现实国力，得不偿失。

二、西藏社会政教合一，虽然妨碍进步，但现时并不影响党的基本政策推行。

三、西藏反共势力，是受内地藏民区的急进改革的影响，只要从事实上予以证明，西藏反共，逐步可以用政治手段予以瓦解。

四、邻国印度、独立不久，正在埋头建设工业，改善国民生活，内政反共，外交中立偏左，并无扩军战略，不可能威胁西藏，故不必在西藏派驻重兵、浪费国力，并影响中印邦交。

五、对西藏最关重要者为设施教育与改革藏民生活，使藏民有了普遍认识，才可稳步的进行改革，否则引起全体藏民反感，西藏边界线几千里，无法彻底封锁，改革不宜操之过急。

六、邻国在边界上很少设防，我军现时亦没有设国境线必要，只择重点的建立国防工事，足以适应喜马拉雅山情况。

七、西藏一团人费用等于驻内地三师人，劳民伤财，违背我军精打细算作风。

八、驻藏部队，应实施轮换制度，使全体人民解放军，对西藏地区均有实际体验和认识机会。”

但上书期间正值大陆内地大鸣大放，接著又是反右派运动，所以一直搁置到反右派运动结束后，毛泽东以上书人士思想叛党，有意扩大西藏地区艰苦，出卖祖国边疆领土，密谋组织小团体等罪名，发回谭冠三，由张经武到西藏，主持整风运动。

最后中国十八军军委会，除将上书三人批判外，凡有不满意中国政策的发言，都列为反党反人民小集团，逮捕押送内地劳改，共牵连四百多人，这是中共进军西藏十年来，党政军工作人员最大的一次整肃。

针对这场战役，嘉乐顿珠认为，西藏抗暴是很自然的一种发展，没有外来的势力或是组织在鼓励他们抗暴，但共产党戴了大帽子说是国民党特务、美帝国主义、印度政府鼓励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共产党因为发生这些事无法向全世界交待，最好的方法找藉口说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等。

嘉乐顿珠说，从一九五四年开始最初是青海和四川的藏区组织，以后就变得很激烈。共产党进军青海，青海很多维族、藏族反抗，所以共产党就镇压他们，杀了很多人，慢慢地所谓土地改革、民主改革，鼓励农民去斗争地主、庙主，这样发展出民间的公愤，因此民间自动组织。

达赖喇嘛也表示，当时被驱赶到山中当游击队的康巴人从几百人增加到上万人，他们与中国军队狠狠打了几仗，中国人则动用机关枪和轰炸机，而且轰击受到猜疑的村庄与寺院人民，因此，村庄和寺院被完全摧毁。当时喇嘛和俗家领导人受到侮辱、监禁、屠杀、甚至拷打，佛像、经书、和对藏人有著神圣意义的东西受到摧毁、嘲弄、甚至偷盗，并且还扬言说：“佛陀也是反动派。”

一九五六年时，达赖喇嘛在印度，一九五七年当他回到拉萨时，整个西藏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人民都拿起了武器，只有西部和中部卫藏地区仍然平静。

达赖喇嘛认为攻击他们的宗教，是一项最疯狂的政策。达赖喇嘛说：“中国人老是说，英国人曾经侵略西藏，但是英国人入侵拉萨时没有摧毁过任何一间寺院。但中国人不管是侵略西藏也好、或是解放西藏也好，却摧毁了很多寺院，中国解放军来时摧毁了，之前清朝的赵尔丰来时也摧毁过一次，在青海一带马步芳也摧毁过寺院，在康区与安多有许多寺院已多次被摧毁。”

在很多藏人的生命中，自己的寺院第一次被摧毁、重建，中国人来又摧毁、再重建，到一九五九年时最后摧毁，达赖喇嘛说，半个世纪内，中国人曾经有计画地摧毁过藏人的寺院，这些历史都应该要写出来。

第五章 喇嘛杀人

喇嘛是藏传佛教中守戒律的僧人，但是在战事发生后，誓不杀生的喇嘛反而成为战场上最勇敢的一群人。

西藏人大多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为了挽救西藏，有许多喇嘛更是脱下袈裟成为武士，“喇嘛杀人”这件事在西藏历史上因此变得特殊。

对西藏人来说，在这么一个特别时代中，喇嘛杀人可以不算破戒。而且人们会为杀死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高兴，甚至有人宣称杀死一个毁灭佛教的中国人也可能是功德一件。

所以有些喇嘛会说：“杀一个中国人，等于建一个宝塔，这样离佛就更近了。”然而，一个在西藏杀人不眨眼的喇嘛，到了印度可能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死。

现在必须回过头去理解西藏人的逻辑转折，以认识西藏人如何在“喇嘛杀人”事件中得到心灵的解脱。

从佛教观点而言，毁灭宗教是天下无与伦比的极大罪孽，于是为了保护佛法、防止对方制造更大的罪孽，以致于出兵打仗、包括杀人，都可以是符合教义的。特别是在佛教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喇嘛更被认为有义务挽救佛教的灭亡而采取行动。

当时的西藏僧人曾经唱道：“若在和平宁静的年代，我们是维护佛法的比丘僧；若遇到以佛教为敌的纷乱时代，我们是维护佛法的刽子手。”而西藏的俗语也说到：“若是佛法遭到危害，即使比丘也持矛。”这些都说明了藏人视佛教为一切之本，若是佛教遇到伤害，则其他一切均可变为次要或可以变通的一种思维方式。

也因此，当喇嘛在维护佛教的情况下杀了人，人们仍然会尊敬他们，因为大家知道喇嘛杀人是为了西藏，为了自己的民族、宗教。本来不该杀生的，杀生会妨害他们成佛。

对此达赖喇嘛指出，根据传统与习惯，过去在西藏历史上已有喇嘛出征的事，但临行前要把自己的戒律先奉还，然后再出征，这当然是非常可悲的事。但这些喇嘛考虑时却是为了民族、为了宗教，所以他们的军队就叫做“护教志愿军”。

按照规定，僧侣绝大部分在当兵以前，都会把自己的戒律先奉还，而且必须奉还给传授自己戒律的师父、比丘，并且向自己的师父说明，原来从这里接受戒律，但现在由于佛教已出现毁灭危机，需要弟子出力，可能会因此违反戒律，所以暂时把戒律奉还给师父，但也希望如果没死，将来再来向师父领受戒律。

但有时师父已经过世了，或不在身边在别的地方，为了变通，也可以在著名的佛像跟前如此发言，等于就是把戒律奉还了。

在战场上，喇嘛都是敢死队，他们会说：“我没有妻子、孩子，可以第一个先死。”

事实上，在战斗中，喇嘛虽然勇敢，但是却不太会打仗；有些喇嘛激动起来，十几个人就开始冲，这群喇嘛左手拿著佛像，右手拿著一把刀，就拼命往前冲，跑到最前面时就被当活靶打；或者是一个个的冲锋，等到前面的倒了，后面的又再一次左手拿著佛像，右手拿著刀，再往前冲，也因此喇嘛死伤非常惨重。当时还是喇嘛的旺青就说到：“我原是僧人，拉萨事件发生后，我和一群僧人逃到山南加入四水六岭，我们的军官是达杰寺人，叫青才旺德，我们一路上收缴或捡拾藏军溃兵的枪枝，另有一些人携带几枝枪者，跟他要也会给你，如此，我们百余人（多为僧侣）有三十余枝枪，子弹很少，几百发而已，选一些青壮，二人配一枪一刀，意谓著一人死了，另一人可顶替射击。

我在拉萨是下密院的，仗打起来后，有个叫安珠的被大炮击中，整个大腿被炸烂，但他极勇敢。边喊：“阿旺云丹，把枪拿去。”一边把手中的枪扔过来。当时有许多僧人被打死，满地一片红，红的袈裟和鲜红的血。

上密院（小昭寺）打得相当不错，他们先诈降，等敌兵进入，再一起开火，打死许多，小昭寺因此被打得残破不堪。我们下密院嚷嚷说要拼命，往哪儿拼，满街子弹乱飞，不见敌军。听说敏珠桥有中国人时，百余僧冲过去，开始一个也没有，过了桥，突然遭袭，百余人

中只有十几个脱逃，其余全死了。

我和一理塘僧嘎松尼玛及一老僧在一起，到桥那头，射来一阵子弹，在我们两中间的老僧仰天倒在地上，我们分头躲入丛林中，过一阵，没动静，老僧仍然躺在上，我俩慌张地抱他起来看时，已经断气。嘎松尼玛取了老僧的护身符等物。当时，从远处见拉萨城内硝烟弥漫，布达拉宫在浓烟灰尘中时隐时现。

打仗时，我们僧人也只有拼命而已，绝大部分冲锋时只提著一把刀，战斗中负了伤也感觉不到。我们当中有一叫丹达者，会打枪，算是会打仗吧！如果说打死了敌军，他也许有可能，其他僧人第一没枪，第二即使有枪也不会用。

听那些有战斗经验的人讲，要打死中国人非常不容易，你一开枪他就趴下，藏人以为打中了，没那么容易。敌兵冲锋时一闪一闪的，很不好瞄，我们又没有很多子弹可以不停地扫射，三拖两拖，对方已到跟前，一扫射，根本不让你抬头，只好跑。其实真正在战场上并不害怕，炮弹呼啸著落地爆炸时也如此，只想著要杀过去。

当时子弹就像金子一样珍贵，我的那枝英式老破枪，子弹打出去，反而听到啪啪的闷响，而敌方的枪声是那么清脆，让人气馁。更糟的是打几枪枪筒便发热。我逃到拉萨河边，那时到处是尸体，几乎每一步都是踩著鲜血和尸体，我指的是那些不时碰到了布满死尸的地段。其中以老人和女人最多。”

由于寺院一直是藏人的精神堡垒，因此发起抗暴的很多地方，都是以寺院做为作战中心，喇嘛与部落民众都一起参加抗暴，“让娘寺”喇嘛南塞说：“让娘寺有六、七百僧，当时，中国人经常召各部落寺院的头面人物前去结古开会，说是要走社会主义路线，不久传来蚌本（僧官之意，是由寺僧选出的负责寺院内外具体事务的僧职，一般有两个蚌本，一个负责行政事务，一个负责宗教事务）在会上反驳中共的说法。在此期间，雪嘎政府（雪嘎即“翼”之意，是玉树地区对部落的称呼，约类似后来的乡公所）有七、八个中国人也经常宣传教育。

寺院开始商量该怎么办，一个卸任蚌本典玛拉桑首先说，我们不走社会主义路线，社会主义不管贫富财产要充公，不许私人拥有，寺院不能当寄生虫，不能坐食人民的供养，要参加生产劳动，要向寺院征税等。于是，有一些僧人前去攻击雪嘎政府，但这时中国人早已逃走了，于是他们捣毁房子，焚烧中共大量的文件，将有用的东西全搬回寺院，让娘寺算是正式造反了。

不久，由于敌军炮击和援军赶至，围攻结古镇的各部落藏人全部相率逃退，大部分结古寺和其他围攻者逃到了萨年宁，结古解围后，中共就派人到让娘寺，问让娘寺准备要怎么办？让娘寺回答：“我们不投降，打！”并要各地僧俗回寺参加战斗，还派人到萨年宁向札武部落求援，因为听说他们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并要属于让娘寺的隆宝上下两部回来参加战斗，上部隆宝堆玛、和下部隆保麦玛共有百余骑前来增援，农区的也来了一些，另外各庄也来了几十人，让娘寺僧不论老幼大小全部来了，于是，近千名僧俗就这样静候中国军队前来攻击。

我们与敌人交战多次，有一次我们追著敌人，打死好几个敌军，第二次敌人又来了一股，被我们打死一些，几天后，敌人大股到，从各个山头蜂拥而来，我几百余骑在山上不停的开枪射击，但效果不彰，当天在外围各山头的战斗中，先后有三、四十名官兵阵亡。第二天天亮，只见周围各山头已完全被敌军占领，寺院已处于敌军的包围之中。

我们将僧俗合编成四部，分守四面及各门，不久，敌人开始向寺院炮击扫射，不分白昼黑夜从未停止，我当时躲在大经殿中，寺院下方的格日村和在寺院院墙外共百户，隆保酋长的房子已被敌占，并在上面插上了红旗，架起了机枪。当时有一个小喇嘛报告说：“敌人已进札巴的房间。”札巴的房子在寺院内外墙之间，几个僧人听到后立即起身前去攻击，这时敌已逼近大门口，以机关枪枪口对著内墙紧闭的大门门板向大院内扫射，在院内的人与狗被突然射来的枪弹打死许多。当时僧人喀吉兄弟，悄悄爬上门顶，拿大石头从上向下猛砸，几个敌军顿时惨叫倒在门外的草丛中。

另有一人摸近门边，突然以刀从门缝向外捅，听到敌人大叫的声音，我们随即呐喊著开门，持刀矛想与敌人肉搏战。但因为敌人已占据四周有利地形，寺院外已经不能行动，于是官兵们将寺院内的全部房间打通后固守。当时有一敌军从札巴房门口向外张望，正好被赶来的旺泽百长一枪击毙，敌兵向前扑倒在墙脚小路上。一个外号叫然格、真名叫洛桑索巴的格古（格古为僧职，是负责维持秩序的，因常手持铁棒，中国人俗称其为“铁棒喇嘛”）持刀想去拿那枝枪，快到跟前时，敌人快速闪出取枪后躲回，他跟著冲进札巴房间内，敌人从里向外射击，他被打得混身是窟窿，袈裟被打得破片乱飞，但他还是往前冲了几步才倒下。

在战斗结束后，听当时被赶去清理战场的藏人说，仅寺院内墙就有九十名寺僧的尸体。俗人死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让娘寺”活佛加塞仁波切也说：“一九五八年藏历七月的大约是七日，外围阵地就已经完全失守了，第二天，敌人包围寺院并开始步步向寺院逼近，这时，除了寺僧，各部官兵中有枪的大约只有三十余人，而且每个人都只剩下十几发子弹，有百发以上子弹者甚少，因此每一发子弹都要节约著打出，且要瞄准并在有把握时才打，在肯定可以击中时才射击，如此坚持了整整七天。

但敌人没有子弹不足的问题，以此来看最后的结局似乎很明显了，但敌人必须要花很多的力气才行，后来敌人已开始用炸药包进行爆破，一包包的炸药送到墙脚、门口，随著巨响，院墙一片片被炸倒，如此中国军队逐屋用炸药爆破，我军步步后退，最后大部分都集中在大经堂内，大经堂的门对著格日村，敌人从格日村集中火力向经堂射击，子弹可以直接打进经堂内，佛像等被打得残破不全，也有一些人员负伤，大经堂顶不住后，要退入孔觉坡章地下室时，途中遭敌扫射，死伤累累。十一日或十二日时，在大经堂内的三十余僧坐不住，就向敌人发起自杀式的冲锋，全部死在一块叫然辛田地旁的宝塔边上。

这样阵地一块块失守，青壮多已战死，只剩下一些老弱，藏历十四、五日，一轮明月下，只有少数寺僧突围逃出，当时让娘寺号称七百僧，少说也有六百人左右，其中逃出或活著的不过百余僧而已。

有个叫协松的背尸体的僧侣，当寺院已经被敌军占领摧毁时，他过河向河对岸山坡上的敌岗楼冲过去，岗楼本是藏人建的，后被敌军所占，他冲进去第一个岗楼，口中边叫：“我的多么好的寺院，叫你们这些强盗给毁了，让你们这些强盗给毁了。”他一边奋勇砍杀，竟连续砍死了二、三名岗楼的敌军后，在山顶的岗楼附近才阵亡。敌人冲进寺院后到处搜查，敌军冲进经堂，以绳索套住巨大的佛像让藏人积极份子拉下来砸碎，并将佛祖语录“甘珠尔”铺在地上，让老百姓从上面践踏而过，大部分寺院的财宝则运往结古，如此让娘寺彻底给摧毁了。”

另外，章果寺喇嘛嘉洛则说到：

“我们的寺院先后被中国共产党摧毁了两次，一次是他们长征时窜入我们的地方，寺院于是组织军队抵抗，先是出外迎敌，失利后退回寺院固守，中共军队将寺院围攻了近一个月，当时的战斗听说非常激烈，藏人一次就死了八十余人，伤者更多，中国军队攻占寺院后，将寺院内部设施全部破坏，但未焚烧。

一九五六年中国人在我们地方进行革命，要消灭佛教，并将人民的财产收归公有，枪枝要上交，以及引诱一批人斗争另一批人，人人自危，不得安宁，因此，寺院决定予以抵抗。做出这一决定的是寺院的会议，即由六十人到八十人不等的僧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一机构是寺院较大事件的决策者，当时寺院就开始与中国人发生摩擦。

当时有一件事，就是中国人在各部落建立民兵组织，因没有人愿意去参加，便以支差的方式强迫每个村庄根据大小抽人去参加，有一个叫曲瓦拉日贡旭的村庄，村民花钱雇了一个僧人去当民兵，寺院认为僧人不该去当民兵，不允许去，但由于该村没人愿意去，只有该僧人愿意接受金钱替该村支兵差，于是部落还是派了这名僧人，寺院要处罚该村，中国人则偏

祖该村。

而且，中国人在刚进入我们这个地方时，还曾对寺院执事说：“以往双方发生战斗（指的是解放军长征时的冲突），双方都有错，大家都不要放在心里，中国人说未来将会帮助章果寺院，寺院方面回答说不需要中国人帮助，只要维持原来的权益即可，在中国人满口答应后，因为已知道中国人在中藏交界的达泽多（即康定）进行镇压和压制宗教的事，所以得此保证后也就安心了许多。

但是那僧人后来还是当了兵，随后中国人又向寺院征重税，我们寺院的吉瓦（负责为寺院做买卖等经济事务的人）之一从印度买来大量的绸缎和从日喀则买来寺院自己用的长地毯，结果被中国人征了重税。此后中国军队愈来愈肆无忌惮，又说寺院的执事与国民党有关，然后又藉口到寺院搜查，麻烦的事接连不断发生，寺院被迫抵制，摩擦不断升高。

有一天，中国军队突然包围了寺院和村庄，寺院和藏人也立刻做出反应。僧俗都集中在寺院内，双方终于又打了起来，共打了两天左右，藏人被打败，僧俗死伤惨重，寺僧就死了百余人，俗人死了多少没人清楚，反正到处都是尸体，有的则被枪决或关进监狱，后来没有几个人回来的。”

在这些反抗的战斗中，一开始的作战主力是俗人，多数喇嘛仍在寺院中念经，但到最后藏人已经顶不住了，许多喇嘛便开始参加战斗，而且表现得极为勇敢，甚至是敢死队的成员。喇嘛洛桑更秋就记得战争爆发时，他们这些喇嘛人在寺院中，心情却跟著寺外的炮火起伏，虽是个出家人，但最后还是投入了战争。

当时不论僧俗选择固守寺院，最后玉石俱焚的事情极为普遍，由于藏人虔诚信仰佛教，许多人都接受与寺院共存亡的命运。但更多的则是被迫离开寺院，投入军队的行列中，以致“喇嘛杀人”到今天仍是许多出家喇嘛忘不了的回忆。洛桑更秋说：“一九五七、五八年安珠贡保札西在竹古塘建立了兵营，那时我们在寺院都得到了消息，五八年藏历六月，安珠在离我们寺院不远处一个叫甲布桑多的地方负伤了，后来然楚阿旺在林周地区又建立了兵营，安珠负伤前就有藏人警告说不要再往前走，前面有中国人的军营等，但四水六岭却把这些人抓起来问他们是不是特务？并不相信，结果没走多久就挨炮火了，炸得很惨。

这些消息我们在寺院都听到了，后来又听说在贡嘎击毁了十四辆汽车，其中有一、二辆车的以员跳到河里，最后几辆则跑回拉萨，西藏人也抢了很多武器。这时大家开始想到要到山南参加游击队，并且秘密串联，后来一共有一百六十多个僧人要去。但有枪有马的人不多，我是没枪没马，没枪没马的人先走，但又派了四个有枪有马的人去探路。

我们步行到四水六岭处受到热情招待，但就是没有枪和马可以给我们，还是徒手兵。后来噶登寺参军的人全来后，便自成一部住在恰喀寺内，我们在那寺院开会，选了四个指挥官，二个人负责领兵打仗，二个人负责后勤照顾食物，军队虽建立，但多数人没有枪。

有一个寺院的大喇嘛在当时给了我们两头牛吃，他问我们说：“你们都是喇嘛，又没有枪打什么仗，还不如到寺院念经吧！”我想反正也没打头了，就去念经。当时有二百多名四水六岭的人正准备出发，说是要进攻泽塘（山南地区的首邑），他们都骑著马，武器装备也不错，拿著旌旗，雄纠纠气昂昂地要出发，我看了好羡慕。

大约是一九五八年藏历十月吧！那时雪下得很厉害，我每天都要去背柴，有九个投降的中国人天天在那里砍柴，和尚我就去把柴背回来。后来我又被调到恰卡寺去念经，念了二、三天后又听说要去进攻泽塘的地方，这次我就跟著出发了。

但我还是没枪，不过这时山南地区开始有空投的枪下来了，但大部分都摔坏了，多是木头的枪柄给摔坏了，必须要请木匠修理。

泽塘那边经常可以听到大炮的声音，一个恰城人率了十几个人的队伍，有枪有马、还有望远镜，虽然子弹不多，但装备还算精良。他们说准备晚上要去泽塘打仗，希望我们有一些人去扛炮弹，我们说好啊！就在晚上等呀等，也不见他们来，后来知道他们直接上前线去了。

于是我们也拿著刀向前冲，到了前线看到前方有中国人，我们每个人都躲在树后，如果中国人出现，就要把藏在身后的刀子拿出来，但中国人并没有出现。

第二天我们又继续向前推进，这时离中国人的兵营就很近了，我们一共有九十多人，为了不要惊扰敌人，就用毯子把马蹄裹上，马头上的铃铛也取了下来，晚上就悄悄进入了泽塘寺。当时这个寺院还在我们藏人手上，但城市有很多部分就落在中国人手里了。

当时泽塘地区一共有九百多名四水六岭的士兵，其中一半有枪、一半没有枪，有枪的子弹也很少，炮则有二门，是扛在肩上可以横射的（火箭筒），装备大概就只有这些了。每天我们派廿五个人去偷袭，组织廿五个人的游击队，谁敢死就报名，但攻过几次后，就只剩下十一人了。

当时我和两个“多仓”（多仓是藏语，是指在军队中一起吃饭的人）都入选了，并且被安置在一个寺院中，当时还是没有枪，但没枪仍准备去突击。一个多仓拿著锄头，当廿五个人冲到前面，却没有藏的地方时，他就马上在旁边挖洞，那些有枪的人马上就钻到洞里射击。如果再向前射击，他就再向前堆土，为他们挖掩体。

我参加战斗前后一共十八次，没有一次被打中，但有两次差点被俘虏，被抓到衣领但身体一挣就脱逃了，后来他们发给我英式步枪，又给我一把冲锋枪，是一次可以射很多子弹的那种。

我们廿五人是敢死队，有一回藏人从泽塘寺的屋顶向下射了二炮，一炮射到前方某地，因为地形障碍看不清楚，另一炮射在敌人挖洞的山岗上，这两炮射完后敌人马上往后退，撤得很乾净。我们去清点伤亡，却发现我最好的同伴也死了，他的尸体就被我们扔到雅鲁藏布江了。”

在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西藏人随后在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建立游击队的武装基地，总司令根益西便是一名喇嘛。

但是却有曾在木斯塘打游击的西藏游击队员提到，当有人违反军令时，根益西喇嘛可以一边念著经文，一边说：“把他们杀了。”然后又继续冷静的念经。

此事一再受到流亡藏人内部议论，根益西指出，这件事他已向达赖喇嘛报告，因为他们当时的基础非常薄弱，禁不起折腾，所以必须要有严法来压，没有严法人们会有各种念头、欲望，所以他有点高压。根益西说，当时西藏什么也没有，几千人守在荒山中，必须要有严法，才能制止各种挑拨的话，只能这样，否则兵营成立不起来。根益西说：

“僧人是不能杀人、害人的，喇嘛杀人谈不上有什么正当。但当时由于环境非常险恶，特别是毁灭了佛教，危害了达赖喇嘛，还有其他的暴行等，我虽然是个僧侣，但业障、贪、瞋、痴都没有消除乾净，所以冒火了，也就参加战斗。

另一原因是因为藏人很少，而且中共毁灭是以宗教为对象，僧侣也只好起来战斗。有些僧侣看到自己的经堂被毁，忍不住参加战斗，这种情形很多。也有些人是因为生活没著落，就只好参加打仗。

而且，兵营内物质匮乏，没有吃的，什么也没有，在第一年内几乎没有一餐饱饭，只是饿不死而已。所以一直有人到处偷盗，还到老百姓那里偷盗，怎么讲都没有用，最后才决定杀一儆百。做了决定后，也把这个决定公布出去，公布后还有有八个人去偷东西，于是杀了其中四个人，其他四个则是认错，被抽鞭子。

此外，还有一些人不属于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却也跑到尼泊尔这一带，在尼泊尔、西藏边境游牧，天天到西藏境内去抢劫一般牧民，弄得里面的人都害怕四水六岭，而且有牧民逃到印度后还告到达赖喇嘛那里，说四水六岭的人经常跑来抢老百姓的东西，结果还有命令来责问我们怎可抢老百姓的牛羊？

这样不仅伤害了西藏的名誉，也危害了军队的纪律，在不断提出警告、忍让了很久后，没办法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我不得已下令：“你们偷多少，我们就抢多少。”就把他们的牛羊

都都拿回来。但也把强盗部落各挑出两个强悍的人枪杀了，这样的强盗部落有好几个。

当时有一个噶瓦人牵了两匹马、偷拿了武器当逃兵，此人和中国人有联系，还把自己的状况告诉了中国人，并带了望远镜、地图、马、长短枪等，要投靠中国人，希望中国人帮他还钱，债还清了他就回来。

但因他手上有那么多东西，绝对不能落到敌人手上，特别是地图，非常重要，于是我便派了四十多人，要把他押回来，不准备杀他，但是不管任何情况绝对不允许他进入西藏，也劝他投降。最后四十几个人打了起来，不仅把他打死了，也打死了借宿家庭的三、四个人，母亲抱著孩子在睡觉没起床，也被打死了。”

根益西说，虽然他是一个僧人，但为了维护军纪只能如此，他不能从僧人的角度考虑，而必须从军队总司令，维护军纪，军队的声誉等来考量。所以，他只好被迫杀人。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命令，是大家一块商量后决定的。

在西藏护教战争中，根益西不但是筹组四水六岭的主要角色，后来更是木斯塘游击战役的最高负责人，参战经验极为丰富。根益西说，他虽然是个喇嘛，但当时听到中国人被打死也会非常高兴的拍桌子，现在想想那些死去的士兵都只是一般士兵，他们也是很痛苦的，杀死他们没有任何用处，更没想到自己还会为杀死一个人感到高兴，做为一个僧侣是非常不应该的。都是因为人的业障还未清，是因为贪、瞋、痴还未清理乾净，才会这样。

根益西说，他觉得非常遗憾，因此后来他去拜见达赖喇嘛，也谈到这个问题，并且要求达赖喇嘛为这些人祈祷。

达赖喇嘛对根益西说：“你杀了人后，还为杀了人而感到高兴，罪过是双倍的，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杀了人都是自己的罪过，即使是被迫而杀也要为这件事感到难过，为此而忏悔。”根益西觉得达赖喇嘛讲得很有道理，于是向他忏悔。

喇嘛分很多种，在西藏有一种藏名叫“朵多”、俗称“浪荡僧”的喇嘛。这些人非常勇蛮，虽然是喇嘛，但都留著长头发，而且袈裟提的高高的，在他们腰上挂著铁钥匙，到处去打架，洛桑格列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洛桑格列说，他们这种人每次打仗都是冲锋陷阵，宣称不怕死，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显示出胆怯，是打仗中最勇敢的。在哲蚌寺像这类的僧人就有百人以上，但朵多都是单独行动，比方他们到中国军队中去修马鞍，军队一看他们就知道是敢死队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如果有人挑衅，朵多也绝对是装著就是这么一回事的样子，绝对不能表示退怯。

原来也是喇嘛的然楚阿旺说到，打仗的“朵多”浪荡僧平时到处浪荡不念经、不学习、只是打架，你说他不是僧人，可是他却住在寺院里，寺院需要出力时他们也会出力。若要打仗了，浪荡僧大部分都会当兵；一些高僧很少去当兵，但也有些喇嘛很清楚中共要消灭佛教，没有其他路子的时候只好对抗，是迫于无奈。

浪荡僧当兵人们并不会把他们看成是合格的喇嘛，但后来大家都造反时就没有高僧、低僧、男女之别，连女人都冲锋陷阵，因为那时大家感觉遇到一个很坏的劫，连女人都被逼得没办法了。

朵多平时就是靠自己的勇敢吃饭，不能退，一般当兵后都非常勇敢，而且他们没有任何知识，只知道逞勇，凭自己的血性之气冲锋。不是每一个护身符都可以挡住每一颗子弹，敌人用机枪扫射时，他们也不知道要躲避、退避，甚至他们把退避视为怯懦，只知道要往前冲，所以死了很多人。

而俗人家里总是有妻子孩子，心里会有牵挂，死者也不会瞑目。但如果朵多死了，他们自己也不会有什么遗憾，死得其所，而且也没有妻子孩子的牵连，在他旁边的战友也觉得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死了就乾乾净净，这可能是最大的不同点。

然楚阿旺说，在三大寺，是浪荡僧人数比较多的寺院，比例约是百分之三至四，至于高僧占多少比例他不敢妄加评论，但参加战斗开始入伍的绝大部分都是朵多，他们一般没有佛

法的实践，只会念些简单的经文。虽然朵多在佛法的实践上应是属低层次的，可是他们却为宗教、或是为自己的勇气献出了生命，也为西藏佛教立了功。

"朵多"洛桑格列就说："从严格的角度来看，僧人是不应该去打仗的，但地方被水淹了，他虽是喇嘛还坐得住吗？大水要我们的宗教、民俗、文化全都冲走，谁都坐不住，所以就去救援。中国人要消灭我们，让后世没有藏人这个民族，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消灭的就是宗教，所以就顾不得什么了。而且我们的修行不高，道行也不深，所以觉得与其乾坐著，远不如去救老百姓或去拼命，应该是一种善行吧！不能说是符合宗教，但绝对不是恶行。"

除了"朵多"以外，在一九五九年拉萨造反后三大寺以及上下密院无数的密院等，一般都是比较正规的僧侣，一生念经外没学过开枪，很多僧侣没有枪都是拿著刀子在那里冲，喊杀喊打的冲，死了很多人，这些应是比较正规的僧侣，但他们也造反了。然楚阿旺说，高僧当兵的例子也有，也都领兵打过仗，这应该是没有办法之下的选择。

然楚阿旺说，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并没有什么敌人，只有被憎忿心所迷惑的众生，按道理不应有仇恨。但一些喇嘛因为道行不够肯定会产生些仇恨心，将对方视为佛法的敌人，杀一个少一个，认为："我一定要杀死他，我杀死它后就会产生一些欢喜心。"如此的心情当然是不对的，但这样的也不少。

而且，各寺院为了西藏的自由和宗教，当兵可能是为宗教效劳的一个捷径，也是最直接的，而且僧人也有国家观念，愿意为祖国效劳，由于这样所以有很多人参与了，寺院被毁，佛像被打，当然也是很气的。

格西强巴加措也指出，出家人打仗进入战场，这种例子很多，有的出家人学佛能力不错，有的出家人则是在寺院中担任司机、会计的工作，但毕竟是出家人，西藏当时参加战斗的，小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寺庙，大则要保卫佛教，所以才上场打仗，但不是说他们不想学佛。

而且，去参加战斗的都是年轻的喇嘛，快要得到格西学位而参加战斗的就比较少，但不管有没有上战场，其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佛法。

强巴加措说，虽然杀生不合佛法，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动机，他们不是为了杀中国人，而是为了不让中国人破坏佛法，而去上战场。但有一种想法，若在战场上杀了三十个中国人，回来之后会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再当和尚了。

强巴加措解释说，西藏最有名的政治犯拥禄达瓦才仁是甘登寺的出家人，而且是甘登寺的活佛。一九五九年他上战场，在拉萨的小昭寺来了中共的坦克，拥禄活佛就跳到坦克上，杀了一些中国汉人，后来他被捕，但现在已获得释放，现在他还是出家人，但不穿袈裟，他说："我不穿袈裟，因为我杀人了。"因为他感觉自己没有资格再穿袈裟了。

强巴加措说，出家人最主要有四个戒律，不杀生、不说假话、不嫖、不偷，但杀生以后就没有资格穿袈裟，为了佛法而违背自己的戒律，这对一个出家人，是很难下的决定，去，会违背戒律，不去，心里又很难过，是很痛苦的心情。

而且，佛教分大乘和小乘，出家人上战场从小乘来说是比较违背佛法，是不可以的，但对大乘来说却可以。因为大乘强调不是为我个人，为普渡众生，他们参加战争，是为了整体的利益，所以如果参战不是抱著仇恨、而是抱著拯救生灵以及保护佛法的动机参加战斗的话，应该是合乎大乘的。

西藏人也会说，在佛祖释迦牟尼五百个转世经历中，有一次转世为船长，他们要到一个岛上时，有一个海盗头子门那冬土，想把船上的五百人都杀了，船长发现他要杀五百人，有很大的罪过，还不如我把他杀了，只有一个人的罪过。因为这个杀人的动作不是出于害人，而是觉得慈悲他。

当时在西藏内部，由于宗教迫害事件不断地上演，所以喇嘛出征的情形也愈来愈普遍，然而在此之前也不是没有先例。在西藏历史上，西藏喇嘛参加战斗已有将近千年的历史，最

早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吐番王朝时代，所有西藏的历史都记载了拉隆巴多杰行刺西藏末代赞普（国王）朗达玛的历史事实。

拉隆巴多杰是一个喇嘛，他在山中修行时，发现有一些穿著袈裟的人牵著狗、背著箭囊、持弓前来打猎，拉隆巴多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才得知西藏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法王之一赤热巴巾已被反对佛法的大臣所暗杀，并且拥护不喜佛法的朗达玛为西藏国王，朗达玛继位后，大肆破坏寺院、迫害佛教徒、焚毁经文，就连那些持弓牵狗的僧人也是出于被迫。

拉隆巴多杰得知此事后，声言为了佛法，于是前往拉萨行刺，终于杀死了朗达玛，却也使强盛的吐番王朝解体。拉隆巴多杰以喇嘛身分杀了人，但在所有由佛教徒撰写的史书中，几乎每一个作者都是以赞赏的笔调来描写这段历史，就连在民间对拉隆巴多杰也多所崇拜与信仰。

在吐番王朝解体后，西藏经历了长达四百年的分裂时期，蒙古军队横扫世界时，兵力曾经到达西藏地区，并由蒙古人扶持建立了统一的萨迦王朝政权。萨迦王朝政权后来由降秋监赞所击溃，继而建立了帕竹王朝。

然而，降秋监赞本身就是个喇嘛，在与萨迦王朝的战斗中，他不仅全盘指挥，还亲自带兵上阵作战，但后世从未有人对此予以谴责。

西藏僧兵大规模投入战斗应是从十七世纪更藏嘎登颇章政权的建立开始的。西藏政权从帕竹王朝起，接著是帕竹王朝的外戚仁蚌巴夺取西藏政权，在仁蚌巴王朝后，原为其属下的辛厦巴造反，并建立了著名的藏巴王朝。藏巴指的是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即为现日喀则一带，由于王朝定都于日喀则，所以藏人将辛厦巴称之为藏巴国王。

西藏著名的藏巴国王信奉藏传佛教的噶举派，但当时由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西藏佛教界一股新兴的力量。格鲁派主要以拉萨一带等卫藏地方为中心，拥有不小的势力。其中的第三世达赖喇嘛到西藏康区、安多、甚至也前往蒙古地区传教，进而使得蒙古的元大汗及其部众皈依佛教。

随后，格鲁派又传入蒙古其他各部，在第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接著转世的第四世达赖喇嘛即为蒙古人，于是更强化了格鲁派在蒙古的地位，也使得绝大部分的蒙古人成为格鲁派的信徒。

格鲁派的蓬勃发展终于引来以噶举派为皈依的藏巴国王的不满，当时，藏巴王朝的最后两个国王对格鲁派采取了暴力压制的政策，并且频频骚扰位于日喀则的札西伦布寺，该寺是由第一世达赖喇嘛所兴建，为班禅喇嘛平时驻锡所在地。

于是，藏巴国王和格鲁派的两股势力水火不相容，进而发生了冲突事件。西元一六一七年，前来朝圣的蒙古部落抢夺噶举派教主噶玛巴的牛群。第二年，藏巴国王又率大批军队前来报复，于是蒙古人与色拉寺、哲蚌寺、以及信奉格鲁派的一些藏人部落联合抗击，为了维护格鲁派的安全，格鲁派的喇嘛首次正式而大规模的参战，并且有了“僧兵”的称呼。但接著蒙藏联军突然溃败，藏巴国王攻占色拉寺、哲蚌寺，不论是参战或未参战的僧俗都遭到了杀害。

这次的战争最后以格鲁派缴纳巨额的赎金、以及许多格鲁派寺院被强制改宗噶举派才暂时告一段落。然而，藏巴国王并不满足于此，心想格鲁派虽受到重击，但元气未伤，最后必然复兴，因此便与信仰噶举派的蒙古喀尔喀部确图汗联手，并不惜与信仰西藏传统宗教苯教的白利王相互勾结，三方约定同时出兵消灭格鲁派。

在此危险关头，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的管家向在新疆游牧的蒙古和硕特部寻求援助，在和硕特四部领袖商讨派谁前往解救格鲁派，由于和硕特部部长是一个虔诚的格鲁派，他自告奋勇领兵请往。他首先和准噶尔部联合袭杀喀尔喀部确图汗，接著又联合格鲁派僧俗攻灭苯教的白利王，然后开始准备攻击藏巴国王。

因为藏巴国王当时略为松懈，在对方发动突袭时，藏巴国王军队措手不及，虽然无力组

织反攻，却又拒绝投降，并且立即转进兵力固守各宗堡与寺院，格鲁派僧俗和蒙古联军多次攻击都没有进展，格鲁派便派遣一名南捷札仓（直属达赖喇嘛的寺院，原来寺院即在布达拉宫内，达赖喇嘛的一切法事活动，都有南捷札仓参与）的喇嘛为间谍去了解敌情，结果了解到除非断粮或自动投降，否则绝难攻下。

此一消息使得主动引来蒙古兵的达赖喇嘛管家索南无沛惊慌失措，原本试图请求达赖喇嘛出面调解，为达赖喇嘛所拒绝，因为格鲁派引来蒙古兵已为众所周知。

就在左右为难时，哲蚌寺的僧兵成为关键，他们首先在很短的时间内攻下了一个拒不投降的城堡，从此威名远播，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藏巴国王只好投降，终于结束了统治西藏的藏巴王朝，西藏历史也从此进入了由格鲁派或达赖喇嘛统治的噶登颇章政权。

喇嘛出兵稳定政权的例子还包括在一六七九年时，印度拉达克军队攻入西藏，西藏政府在当时派遣已经在札西伦布寺出家为僧的蒙古贵族嘎登才旺出征，先让其奉还戒律，然后率兵赶走拉达克人并攻占拉达克的首府列城。嘎登才旺先奉还了原本自上师领受的戒律，成为不受戒律约束的人后，才率兵打仗，这是喇嘛出兵最正规的方式。[/font][/font][/size]

到了二十世纪初，僧兵又再一次成为西藏反抗外族入侵的主力。英军入侵时，西藏政府组织了大批的僧兵投入战斗。而在一九一一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时，当时西藏政教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在印度流亡，西藏处于满清军队的军事占领下，随著满清政府的垮台，在西藏的几万名满清官兵分裂成“保皇”与“共和”两派并发生内哄，西藏政府立即组织僧俗与中国军队交战。当时，集中在拉萨的中国军队攻打色拉寺，色拉寺喇嘛于是奋起反抗，并组织起来攻入拉萨，在随后的战斗中，喇嘛更一直是作战主力。

由于喇嘛作战勇猛，在迫使中国人退出西藏并迎接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印度返回西藏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特别嘉奖这些从军的喇嘛，其中位于康区的大金寺甚至被达赖喇嘛赐予代本（西藏军队中最高的军队编制，相当于团长）职，大金寺是五世达赖喇嘛派人建立的，在拉萨的战斗中，大金寺在藏学经的三百多名喇嘛全部参加了战斗，受到达赖喇嘛十三世最高的肯定。并决定将大金寺按照藏军编制进行整编为僧军，授予青狮白象军旗一面、铜号一个，并发给英式步枪五百枝，子弹二十五万发，同时任命该寺喇嘛恭布次仁为代本（团长）、青泽为副代本（副团长）、协嘉为路波（参谋长）等。

固然西藏的僧兵历史由来已久，但并非常规的僧兵却终究是紧息状态时的临时军事体制，如果再扩大看一般藏人，西藏政府一向没有对人民施予常规性的军事训练，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传记中谈到藏人的兵役制度时说到：“西藏政府原来的传统是发生战争时，西藏政府除了徵召喇嘛、以及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性带口粮自动出征外，没有任何的训练与作战经验，甚至没有统一的服装，同时也没有组织，老老少少混杂在一起乱哄哄的出发，在作战时便使出全部力气发出“咯呵呵”的呐喊声，由呐喊使敌人误以为对方人数众多而惧战，这是他们最有力的手段。但战后就各自鸟兽散，自寻生路或藏匿。”

寺院除了在紧急时提供兵源而有喇嘛从军的历史外，同时也成为西藏政府存放军械的地方。在西藏的许多寺院中，都存有备用的军械，如“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先后两次夺取西藏政府的武器都是从寺院拿走的；第一次是到香嘎曲秋克林，第二次是八宿寺。

在一九五一年中国进军昌都时，西藏政府曾经组织并派遣一些僧兵前往增援，只是增援的僧兵还未到战场，藏军就已经在昌都战役中惨败。而中国也在其编辑出版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中提到当时西藏政府确实曾派遣数量不多的僧兵前往作战。

中国入藏后，喇嘛们不但组织成僧兵抗暴，“喇嘛杀人”事件更在西藏佛教历史上，烙下民族最深的伤痛，西藏人对中国人的仇恨，多因此而起。安多人索南嘉则说，在他们的家乡有一个木门，木门一边是中国人，另一边全是西藏人，双方从不同化。西藏有一句话说：“不给中国男人叫舅舅、不叫中国女人为姑姑”，意即不通婚。

同时敬神时藏人也会对神说：“希望佛祖不要错了，成为残暴中国人的保护者。”

索南嘉指出，打死中国人时，西藏人口中喊著的是：“佛教胜利！佛教胜利！”。

因为这样，比丘尼阿奈巴青难过地说，她们西藏在历史上是完全独立、自由的国家，她们有自己的宗教，也过自己的和平日子。但中国人抢她们的土地，灭她们的佛法，毁她们的寺院，劫夺她们的佛像、艺术品、珍宝等，屠杀她们的喇嘛、格西、僧人等，去看哲蚌寺的废墟就可以知道有几千个寺院被摧毁了，造成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办法？西藏人被逼迫得无奈了。

阿奈巴青说，喇嘛杀人第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宗教、文化，第二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这就是佛法，佛法是为了利益人民，逼到这个地步了，还分什么僧俗男女呢？很多女人都拿著枪去打仗，藏人有句话说：“逼急了尼姑也会带佩刀。”这是逼急了的，而且喇嘛打仗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杀人，他们是因为连蚂蚁都不想踩死而出家，逼得没办法才出生入死，这其实也是佛法。

第六章 雪域护教志愿军

从一九五一年中国军队入主昌都后，很快出现藏人被抓、喇嘛被斗的各种汉藏冲突，此时藏人心知战争已是不可避免之事，从此西藏各个角落开始出现零星战斗，中国也因此展开平叛的军事行动。但这些零零散散的自发性游击战却因多数缺乏组织与军事训练，又缺乏现代武器支援，因而只能在点上做骚扰式的突击，很容易就被中国部队所歼灭。

与此极不相同的是，从一九五一年到五九年间，“雪域护（卫）教志愿军”与“四水六岭护（卫）教志愿军”这两支藏人游击团体，却能以组织型态结合藏人进行长期战斗，给中国军队带来极大的威胁，因而成为西藏反侵略意志的两股主要象徵。

成军最早的“雪域护教志愿军”，在康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缠斗长达十年，藏人承受最惨重的伤亡，最后解放军以绝对多数镇压了这支民兵组织。虽然败势已定，但仅存的西藏战士在弹尽援绝、粮食不继的情况下，却依然坚持在自己的土地上流完最后一滴血，他们没有逃亡，有许多人在被俘前服毒自杀，临死都不愿屈服，留下西藏历史上悲壮的一页。

西藏康区包括囊谦廿五族，即现青海省玉树地区和已并入中国四川的甘孜地区、木里县、以及并入中国云南省的迪钦地区、还有划在西藏自治区内的昌都全部地区、那曲大部分地区等均是，人口约占西藏民族三分之一强，地域也约占西藏总面积三分之一左右，康人（或称为康巴人）多为牧民。

西藏人一般认为他们的民族常因地域而形成不同的天性。如说：“虔诚信佛的卫藏人、强悍勇敢的康巴人、勤奋精进的安多人”，由于个性剽悍，抗暴中勇猛的战士多为康人。一九四九后中国军队到达康定（藏名是达达泽多，中文音译为打箭炉，康定是清末赵尔丰在攻占康区后所取，意指康区底定之意），就整个康区而言，长江（又名通天河、指金沙江段）以东地区在国民党时期就已经受到国民党的统治，长江以西地区藏人为防国民党部队入侵，过去亦曾经组织民兵，而且因为都穿黄色制服，所以被称为“色热”（黄衣军之意）。

芒康地区的黄衣军曾经长期驻守在长江以西的丁青一带，在得知共产党军队已经到达康定后，芒康黄衣军的首领普巴本. 慈晟尖赞又组织起一千名民兵，就连驻雅安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也向黄衣军阵地逃来。当时战败的国民党军队中有一名军长、两名师长及两千五百名士兵，这些国民党军队拥有无线电台，装备的枪枝全是“色楞布然”（五三式步枪）。

他们表示，如果藏人要打解放军，他们愿意一道抗击；如不行，则要求借路前往缅甸，或给他们食物，只要借条路，他们愿将武器全部交出，同时还可以向台湾求援，请台湾方面空投武器给藏人。

当时，芒康黄衣军的首领普巴本认为这主意不错，中国的共产党部队正在逼近，应该准备抗击，因此，便将此讯息向驻芒康的西藏政府军第九团团长首领德格王子汇报，德格王子

表示要向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请示，但藏人当时并不知道，中国与阿沛及德格王子已经私下有联系了。

德格王子和阿沛于是下令，要求藏人不要卷入中国内战中，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其他党，抓到一律送回，双方各守边界，互不侵犯，而且也不许取国民党的一枪一弹。

国民党那些军队得知后非常不满，藏人好言相劝，并给他们派了一个向导，表示歉意后打发他们上路。当这些国民党军队正要过澜沧江时，一半人已经过河，一半尚未过河，而且正在河这边埋锅作饭时，中国军队就已经赶到了，结果未过河的部分不是被杀是被俘，只有军长和一名师长率廿五人从原路逃回，其余的则可能逃到缅甸了。

不久，中国军队来到长江以东的西藏土地上，并且从四川、云南两省调集军队向前逼近，普巴本立即向西藏政府要求增援兵力，或者也应将存放在昌都仓库的武器配发给康人。当时的康人内心非常著急，又没有发报机等现代通讯工具，传递消息时只是在信使上的腰带打上印泥，以证明他一路上快速传递消息并未宽衣解带。

但这样得到西藏政府的回音却是，有关中国军队入侵一事，官方藏军即足以对付，不要黄衣军，也不配发枪枝，并且要黄衣军就地解散。德格王子和阿沛随后也将西藏政府的状况全部都告诉了中共。

当时解放军部队即将入侵的传言满天飞，人心恐慌，德格王子因此下令说："不准说解放军来了，那是谣言，违者割唇，解放军不会来，来的是他们内战中的败将等。"德格王子同时也写信给当地最高的政教领袖贡噶喇嘛，叫他不要抵抗中国部队的入侵，说藏人打不过人家等。

藏人并不清楚中国人的内战，国民党败军来时，贡噶喇嘛还领了军与他们交战阻击，但等到共产党军队逼上来时，他的军队却已经解散。

等到中国军队来时，德格王子以前往前线视察为由，在离开指挥部后就与中国军队互献哈达，西藏政府德格王子所部第九代本也即第九团所属第一、二营的军队未放一枪一弹，在无抵抗的情况下让解放军入藏。唯有藏军第三营却在长江渡口和解放军队打了六天六夜，让解放军无法渡江，解放军没有办法，只好逆流而上，从上游以木排横渡长江，并且将第三营打败，大部分藏军都战死，只有少数几个逃了出来。

解放军在江边绕道得手后，又连夜奔袭，突然将第三营驻地包围，藏军从此解体，就连廿里外的地方都听得到激烈的枪声与爆炸声，三营营长逃到黄衣军首领普巴本家中，得知德格王子已经投敌叛变，抱著普巴本痛哭。三营营长说："西藏政府病了，我们以白云为证，向土地起誓，拿政府薪俸，守土护教，平时苦了许多老百姓，关键时刻却投降了。"边说又边放声大哭。

普巴本说，西藏政府官员已经和中国互献哈达，并引导中国军队前来，因此要三营营长逃到昌都去。果然没多久，中国部队就进入芒康县城嘎拖，既然政府官员已经投降，大家也只有跟著投降了。

中国人进城后，立刻通知普巴本到嘎拖，普巴本遵命前往，中国将另外芒康地区一些较有名的酋长和大喇嘛召来，并分别任命为解放委员会的各种官职，普巴本．慈晟尖赞被任命为主任，副主任是塞巴喇嘛。

没多久时间，到芒康的中国部队来到昌都，另外有中国部队从昌都东边的德格进军，却遭到德格藏军的激烈阻击，并且打死许多中国人，但因为当时阿沛已经向解放军投降，并且到察雅地区幽希山脚的铁桥上去迎接中国军队，互赠哈达。败局已定，随后解放军在昌都成立解放委员会时，并令帮达多杰为第一主任，主任是帕巴拉，普巴本等五人为副主任。

一九五四年起，中国开始在通天河以东划归中国云南省的康区迪钦等地进行民主改革。在民主改革之后，有关强制僧人还俗、不得进行宗教活动、没收财产等消息不断传来，河东的藏人不断向河西方向逃来，引起藏人极大的恐慌。

河东与河西的藏人隔著通天河（指长江上游），却有著不同的际遇。昌都、芒康、贡觉、都是在通天河以西的地方。在河西，双方因为有十七条协议，一开始中国似乎显得相当和善，但时间一久，中国人态度一天比一天恶劣，引起藏人的不满，而江（河）东地区民主改革的情况以及江东表现藏人感受和顺口溜的歌谣，也随著那些逃亡者传到河西地区来。

例如，说中国的政策或统治方式是："中国人就像湿牛皮帽子，开始戴著舒服，但愈来愈紧"；以及说中国人是："开始像神鸟杜鹃，悦耳又动听，其次像善言鹦鹉，巧言狡辩多变，然后像不祥的猫头鹰，白天睡而晚上示恶兆（指暗中活动，挑拨离间），接著像鹞？鹰，开始行抢掠，最后像恶狼，连皮带肉都要吃"等等，愈发增添河西藏人的不安。

同时，中国在河西也徵召许多藏人去修路、又徵税，以往藏人可以自给自足，现在却日趋窘困。普巴本经常与中国人争论，如修路所发工资太少，税额太重，解放了，应该让人民享福，而不是赶去劳动和增税等。

由此慢慢引发了通天河西岸的反抗，芒康于是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一九五五年，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途经理塘、德格来到昌都，虽然没有经过芒康，但是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和噶伦索康等人却来到芒康找普巴本，并且对普巴本说："民主改革在六年内不会实施了，各宗县要安心工作，要严格执行十七条协议，中国人说长江东西岸有区别，东岸之事也是工作人员的错误，中央有少数民族政策，而且六年以后民改与否也要视藏人的意愿而定，这些我们已经在北京谈妥了"。这些话甚至公开向藏人做了宣示。

但私底下，赤江仁波切却对普巴本说："十七条协议他们根本就不遵守，一年比一年霸道、恶劣，其政策如湿牛皮的鞋，是很难说的，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西藏中央政府无能为力，因为那里有达赖喇嘛、有大昭寺等重要寺院，不能乱。但中国人很可能为了给其他地区做榜样，而首先在昌都采取民主改革，如实施了，坚决不能答应，若实在不行，应以武力抗拒。"

没想到，赤江仁波切走后不久，一场所谓的"民主改革"宣传就开始尘嚣飞扬起来了，中国人不断地向藏人介绍民主改革的好处，并且从藏人中挑选出一些人，然后问他们的看法，一些藏人也鹦鹉学舌，中共就马上大肆宣传，说这是人民的意愿与要求。

果然，中国在一阵宣传之后，便开始宣称长江以西各宗县要迈出第一步，如有人自愿进行民主改革，中国将给予特殊的奖励与照顾，不但各酋长喇嘛可以保持比原来更多的职权，对人民的现状也会给予照顾和救援。

当时昌都也召开有关民主改革的紧急会议，十八军政委王其美并且发表演说，然后就要大家表态，表明对民主改革的看法。会上，首先是帕巴拉（昌都寺大喇嘛，一直在北京任中共人大或政协委员）之父表示赞成民主改革，接著八宿县和昌都县全部代表也跟进支持，普巴本看情形不对，就赶快站起来表示反对。

普巴本说："解放委员会根据十七条协议工作，但回顾过去几年是名不符实，给我们带来很多困难。一方面，中央说六年不变，一方面却问明天成立还是后天成立（紧迫之意），我们芒康开会后认为不应进行民改。"

另外又有一个芒康代表叫普隆仓秋的说："解放军刚来的时候是给了一些大洋，此外没有带来任何利益，但却要这要那的，藏人宰了牛要交给解放军，割了麦子也要交给解放军，我们吃什么？石头和土不能吃，还剩下什么？只好吃野草。芒康历史上从未有这样的事情，长江以东那样的民主改革我们坚决不要，我们绝不答应。"普隆仓秋在会上边说边拍胸脯边跺脚地讲了许多。

接著一些发言者也都表明了反对的立场，有人建议举手表决，结果竟是反对者获胜，支持的只有八宿和昌都。王其美最后却说："明天休息，再好好考虑一下，后天再说，但改革是肯定的了，不是和平的改革就是强制的暴力改革，两条路，何去何从自己选择"。

王其美平时老谋深算，但那天却气得脸红脖子粗，一付气急败坏的样子。王其美把普巴本找了去，说："我可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说这样的话，真是没有想到。"

普巴本回说："那是人民的意见，不是我要这么讲。"王其美又说："你指责中央代表，实际上是在说我在背后操纵，说那些不是中央的政策，其实，那不是代表们要这样做，那是中央的政策和策略，这条路是非走不可，任谁也逃避不了，我是对你实话实说，而且，自治区筹备会就要成立，在此之前，一定要做出决定。"

王其美说："要知道，指头是顶不破天的，达赖喇嘛到北京多么顺利，陈毅到拉萨也做了许多指示"。普巴本说，如要民主改革，请给我们西藏政府的命令，否则人民不会答应，我们也不同意等。

其后，普巴本等认为从王其美的口气看，绝不会善罢甘休，由此大家开始讨论武力抗拒。于是，芒康地区的各部酋长、喇嘛，都在佛经"般若波罗密多经"跟前发誓："中国如强制民改，何处开始，就从那里发出战役。"贡觉、德格、札羊、芒康等四地首领从昌都返回时，又到一处叫曲尼孙多的地方（在德格与贡觉交接处），宰杀一头牛，发了"红皮滴血"之誓。

所谓"红皮滴血"是将新鲜牛皮铺在地上，并将牛心脏的血滴在上面，上面再以枪枝交叉为人字，发誓者从牛皮之上、交叉之枪枝下钻过。发誓说："如强制民改即造反，一人造反，其他支援"。

在此同时，通天河以东地区情势极为紧张，吊打、竹签钉入指甲缝中、以油浇头点火焚烧等方式烤问的事不时传来，一些头皮被烧焦的人也逃过河来，使藏人完全绝望，由此，巴塘首先打了起来。

由于巴塘、里塘、杰塘（现云南迪庆之一部）决定联合攻打在巴塘的中国兵营，他们集了三千多人攻巴塘，一直很顺手，也攻占了一个中共据点，多有掳获，但在分配缴获的武器时，三方发生一些摩擦，当时巴塘有许多武器储藏，巴塘曲德寺的人想独吞攻占巴塘后的战利品，因此打发理塘和杰塘兵回自己的家乡，彼此发生矛盾。

理塘、杰塘等人在打了十一天后各自返回自己的家乡，随后，巴塘集一千五百余人连续六天进攻县城，前后冲锋五、六次，杀死许多中国人，藏人也有不少损失。

当打得精疲力竭之时，由于一时攻不下来，巴塘军只好截断水源后围困。中国部队更惨，因断水只好喝尿水过日子。在巴塘仅剩下二百余中国军队和三百余藏人组织为民兵，中国部队向围攻者诈称："请缓攻三日，我们已向上报告说我们顶不住了，要投降了。三天后，我们一定缴枪炮。"巴塘人攻了许多时间，也累了，就答应了。这时，中国人从康定遣一师援军快速赶来，过理塘时，理塘竟坐视敌军通过而未阻击。

三天后，中国军队的飞机飞临上空，开始对藏军猛轰滥炸，向中国守军抛下水等补给品，飞机炸弹将曲德寺的三层弥勒佛经堂全部炸毁，三架飞机轮番轰炸了几天，把藏人炸得昏天转向。藏人不懂现代化战术，全躲入房间内向空中射击，飞机一颗炸弹就将房子炸毁了，使驻有藏军的村庄和曲德寺全炸成废墟。

在轰炸的第三天，飞机绕到芒康地区，投炸弹威胁。随后又有一个叫李代表的人，专程跑来"道歉"，说将曲德寺与芒康的洛然寺弄错了。但三颗大炸弹投在山后，加上机枪扫射，损坏了寺院的一些建筑，并有一僧受轻伤，一些牲畜也被弄得鸡飞狗跳，飞机飞得很低，机上有中共小红旗飘扬著。

藏人非常气愤，于是普巴、麦巴、和洛然寺领袖在一起商量，他们商量后认为未来的结局只能是曲德寺的下场，不能再坐以待毙了，于是，一同立誓并重建军队。

自此，芒康地区开始备战，并认识到组织的重要性而秘密建立了兵营，正式名称为："雪域护教志愿军"，军旗取材自象徵西藏主权的雪山狮子旗，只是将中间的双狮托法轮改为一只雪狮踩在中共军人身上，象徵征服佛教的敌人，而官兵们的标志为在一方块黄布上以藏文写著"雪域护教志愿军"，四角有"白杂达然"的梵文，乃"在这个世界至高无上"之意。背页有白布，上书姓名、所属部队番号等，这些是模仿当时的中共军队而来。训练工作则是由原藏军士兵负责训练，主要是号音的各种识别。

这时，中国又在芒康县城逮捕了当时在昌都会上抗议的人民代表普龙仓秋等五人，其他各部落酋长或首领以及人民代表闻讯后全逃出县城，并全聚在查下（杰措牧民之牧地，现为杰措乡属地）起誓决定起兵反抗，于是十八部的酋长和各寺院代表等共四百余人全聚在一起，旁立“甘珠寺”经典，众人凭经文起誓说：“死如同样花纹的佳嘎乌，患难如乌鸦同样黑（意即同生死、共患难）。要么藏人胜，要么中国人胜，男尽女绝，使这世界无烧火之痕亦在所不惜等（无烧火之痕意即后人看不出这起方曾经有人类生存）。”

另外又订了几条纪律，大家还签字划押，并规定“十六－六十”岁徵兵制，每户出一兵，佃农（不向政府纳税者）两户出一兵，如此秘密徵兵，共招募了千余兵，俗人部的总司令为普巴本，僧部的总司令为札巴喇嘛。

当时的誓辞或纪律中确定：

一：“雪域护教志愿军”之基础或原则为，在保卫佛教之国的政教和领土的基础上，保卫和敬仰西藏之“三个特别之宝”，并为此而不惜流血牺牲。

（西藏的三个特别之宝为一、佛教与政教合一的国家；二、雪域佛法之主神圣的达赖喇嘛；三、虔诚信仰佛教与达赖喇嘛的人民。）

二：在反抗侵略与保卫国家的斗争中，不分上下贵贱一致抛弃私人恩怨，团结一致，不分教派地区，相互支援。不管以往有任何怨仇，那怕是杀父之仇，暂时都不许计较，那怕在独木桥相逢亦不得仇视。战争结束后，由政府做出公正处理，如有违者，严惩不贷。

三：官兵喇嘛的财富散诸穷人或充为军资（后来此条多未能实施）。

四：凡难于起兵之部落，须将武器交给“雪域护教志愿军”，而不得交给敌军，并积极筹措军需品，靠近敌营之部落，要设法刺探情报。

五：对自愿以物力资助“雪域护教志愿军”者，战争结束后，从物质和待遇等诸方面给予嘉奖或补偿。

六：凡差巴户（向政府纳税、并领种政府土地者）每户出一兵，其他每二户或三户出一兵。在需要时，从各寺院徵调僧兵，行“十六至六十”徵兵制。

七：“雪域护教志愿军”必须保护人民的利益，不许行抢劫、盗窃等恶行，如需徵用，须按价付资，无资金则由部队统一派三人以上去（向民众）乞讨，不许在外斗殴，回营须详细禀明外出情况，不许以兵营之名在外欺骗。所得战利品一律缴公，不许私藏。

八：对立功将士给予升级及物资等奖助。凡叛国投敌，泄露军事机密、将我联络人员出卖给敌军者，一律处死。对被迫投降或因不支而被俘者，不予斥责和处罚。为了分化敌军，对被俘官兵给予来去自由。

一九五六年藏历九月，“雪域护教志愿军”已有作战准备。当时在盐井有一团的中国军队，已做好“强制民改”的准备。驻芒康的叫六一一团，团部在芒康县城内，但其所部则分散驻守各地，其中在桑巴竹卡的丝竹渡口有守军，中共声称有一加强连，加强连应该最少有一百五十人，实际上并不到此数，约只有近四个排、九十余人而已。

另外在容许有一营的兵力，职责在守卫那里的弹药库，当时，巴塘和里塘还没有公路，物资要绕一个大圈，是从昌都运到距容许一日脚程以外的地方，然后人背畜驮运到容许储藏。雪域护教军决定先从这两个地方同时开刀，以偷袭吃掉他们。

在做出作战准备后，便通知贡嘎喇嘛，贡嘎喇嘛表示支持，但同时声明无法随同起兵，因无装备，但保证阻击在其土地上之中共军队增援。贡嘎喇嘛的士兵骁勇，当时西藏与中国军队对峙的边界，战事频频，因此在当地，每家每户都不仅有枪，而且，和枪枝一块还有一个便于携带的布包，内装乾粮，只要一声令下，就可带上枪枝、乾粮，出发作战。

当一切就绪后，雪域护教军兵分两路，突袭容许的是由秘书丹巴所率的尼迪寺军队和觉拉、瓦当三部，人数共三百余人。突袭桑巴竹卡的由普巴本．慈晟尖赞亲自带队。突袭容许的军队由于军情泄露而落空，但突袭桑巴竹卡渡口的却得手，他们伪装成百姓，在当地藏人

的支持下埋伏好，等天亮中国军队不带武器出来在院子内排队唱歌、吃饭时突然攻击，战斗很快结束，雪域护教军旗开得胜，打死几十人、俘虏十七人，其中有两人因伤重留在当地藏人的家中，并缴获许多武器。

当时，除六一一团而外，驻芒康的都是雅安军区和来自云南的解放军，有独立师、独立团等编号。

随后，普巴本又将其他十五名战俘全部送回中国人的兵营中，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间，中国方面有信使来言："王其美欲见普巴本。"至于见面地点，中共方面表示王其美是到不了你处，并不是不相信你们，而是路太远，所以，双方最后确定在距兵营较近处见面。

那一天，普巴本带了二十五名骑兵前去会面，到会面处，将随从留下后独自前往，随王其美的还有谭冠三。谭冠三问普巴本："你现在打算干什么呢？认为这样能干得出什么结果吗？五三年我们派人前往内地参观学习，当时没有派你去是我们的失误，如你到内地去看看就好了。"普巴本对王其美和谭冠三说："我去不去内地都一样，我知道中国非常的大，但我是吃糌粑、右衽系腰带的藏人，我要维持自己的事业，你们是吃大米、穿汉装的，你们也要维持你们自己的事业，因此，我虽知你们非常强大，但不能不守卫自己的土地与传统，这是无奈的。"

谭冠三听后回说："算了，今天不谈这些，本来只想和你闲谈一下，但我不慎把话题引到这方面，很抱歉，我主要想和你谈的是，你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将会尽力而为。"随后他又笑著说："你喜欢枪炮弹药，这我知道，但这个忙我们帮不上，其他什么都可以帮，你喜欢马，我们从西宁运来的马个儿高、尾巴长，好威风，我可以帮助你。老王你们是老熟人，可以谈"。

如此，双方谈了许多，其间普巴本说："我们知道藏人成不了气候，但一切都是你们逼的，彷彿这片土地的主人是你们，而我们是你们的奴隶，还有本来说好有十七条，却完任不遵守，十七条也没有了……。"谭冠三马上说，十七条没有完，如果十七条协议完了，上次陈毅副总理到拉萨，达赖喇嘛和他们就不会互相献哈达、握手，和双方很亲热啊！如十七条协议被撕毁了的话，不会这样啊！

谭冠三并叫左右拿当时的照片为证后说："你仔细看，你不是非常看重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吗？你看看文件，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有什么指令都在里面，还有，跟在美帝国主义的后面跑是愚蠢的，目前中国与尼泊尔、缅甸的关系非常好，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团结一致，陈副总理与达赖喇嘛关系多么友好，中印关系很好，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想干什么？你又能干什么？"

普巴本回答："是这样。但我以为为家乡、为人民有一份责任，要为此尽职尽责。"谭冠三又说："你有什么甚于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对人民负的责任呢？没有啊！如果你也和嘉乐顿珠、雅康娃等帝国主义份子勾结在一起是不好的，这事你也知道，在朝鲜，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打仗的结果怎样，你当时是主任，我们一块儿庆祝过，你是很清楚的，因此，和他们联系是绝对不好的。"

最后，谭冠三说："再不用多说了，如你所言，你可以为西藏和佛教的事业做你的事，如果有一天普巴本死了，那是你大丈夫得荣誉的事；但如果有一天普巴本被俘了，那是很不好意思的，也许那时我们会见面。"

总之，那天谈了三个小时后结束，普巴本回来时，王其美等也返回，一会儿，到处传来军号声，只见会谈地四周的山脊后面走出无数中国军队，都顺山路返回了军营，也不理会正在返回途中的普巴本，原来解放军在四周布置了大量伏兵以防万一。

然而，这次会谈却反而提醒普巴本必须与外界进行联系，特别是谭冠三一再强调不要和帝国主义及嘉乐顿珠、鲁康娃等联系，更启发了普巴本，因此决定派人与他们进行联系，另外又再次派人与噶伦鲁康娃和达赖喇嘛经师赤江仁波切、侍从官帕拉等西藏政府官员联系，要求支援武器弹药。但西藏政府回称没法与印度的嘉乐顿珠联系，西藏政府帮不了你们任何

忙，而且中国人经常找麻烦，西藏政府已被迫称你们为反动派，但请不要生气等。

当时西藏政府分成两批，有人主和，另有人主张反抗，赤江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赤江仁波切又以许多密信告诉普巴本，一切全靠你们自己的努力，西藏政府无法给予一枪一炮的支援，且因为你们的努力与勇敢，在自己的家乡打仗，使拉萨这方面也安静了许多，找麻烦的事少了许多，他们会说“反动派”并传达那类文件是不得已的，请谅解，并特别寄来达赖喇嘛的斗蓬，以及玛哈神像等，以示殊荣。

随后普巴本继续派人和印度联系，后来从印度噶伦堡派了人来，他们还带来了嘉乐顿珠的一封信，雪域护教军当然高兴万分。信中通知要选派一些人前往接受训练，同时也要查询一九五七年第一批空投到理塘人员的下落。于是先派了两名代表在一九五八年时去印度，印度方面后来又传话说：“至少派二十五个年少之人，从拉萨也可，最好是从康区当地派遣，要年少能干的。”这边于是准备从康区直接派人。

一九五八年，局势对西藏人愈来愈不利。在这之前几年的时间里，藏人只是打打游击，并守住本土，从无进攻中国大本营的力量，中国军队做了许多防御工事，山被挖空，营房四周掘沟并插上尖木桩，围上铁丝，军队经常一半住营房、一半宿野外，因此，虽过去了较长的时间，但藏人根本没有进攻的机会和能力。

中国军队开始从四面进攻，中国部队五十三师加上雅安军区等的部队不断进攻，“雪域护教志愿军”虽严阵以待，无奈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中国军队从各方攻来，打了十五个日夜，藏人根本就无法在家乡站住脚。不管去到那儿都看到中国人拉的大片的粪便，以往中国人是不敢进入森林的，但现在森林、山河到处都有粪便。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护教志愿军仅剩两千人，枪也只有一千五百人有枪，人少枪也少，实在无力友撑，只好放弃阵地，让无枪无马之人前去投降，或回村负责收集情报、送食物等工作。有枪无好马的则叫他们分散进入森林、打游击，能打就打，平时就躲著，这样或许可以牵制一部分中国军队，剩下的千余精锐则开往北方贡觉等地。

在战斗中，有许多中国人被藏人杀死，中国人于是将怨气发泄到百姓身上，更因此杀了许多百姓，如仲达家的母亲和四个孩子在田地种田，却无辜遭敌军开枪扫射，三个孩子和母亲被打死，只有母亲尸体下的一个三岁多的孩子幸免于难。其他全被杀死并向牲畜乱开枪，还在飞机向人群乱扔炸弹。

由于这些原因，为防继续伤害乡亲，雪域护教军昼伏夜行，进入贡觉，再到察雅，约一个月后，敌军才知我们已离开芒康。当时也参加战役的普巴本之子才仁多加回忆说：

“中国部队不断追来，当时，敌军在芒康的洛然寺成立一指挥部，其中有一支部队，全是骑兵约有六百余人，都配长马刀，像电影中的日本刀，马鞍是皮子的，边上有皮袋可装子弹，有转盘机器和卡壳时替换的枪管等，都驮在马上，总之装备很精良。在骑兵之后有三千余人，并用骡子挑著大炮等，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分几路前来追我们。

一路上，我们若遭逢中国部队，双方就一阵对抗，经常整个山沟都在颤动。在战场上，札巴喇嘛是总指挥，人们不让他上战场，有一次，他拿著望远镜观察，突然说：“看，看呀，敌人来了。”接著，一些中国骑兵从山口冲过来，身上的大衣被风吹得像老鹰的翅膀，正在爬上山头的我军士兵立刻向他们射击。

此时，再也听不到枪声，只有一些炮声能分清，不管是藏军或解放军的枪，枪口不断冒出白烟，只见白烟，却听不到枪声，烟雾的尘土到处飞扬，当中国军队凶猛的冲来，藏人心中确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当时，总指挥札巴喇嘛在此之前一直维持僧人身分，没有摸过枪，这时他对左右说：“喂喂，把枪给我。”左右给他一枝卡宾枪，他端枪瞄了一下后又说：“算了，有许多我们的士兵，容易误伤。”

有的藏人后来回忆说，真不忍打死那些中国人，和核桃一样（意谓很年轻，稚气未脱）。

还有人说，在他打死一名石堆后的敌军时，那名敌军竟一面用一只手扫射，一面用一只手抱著头。这些被打死的敌军骑兵的冲锋枪全是新的，彷佛刚出炉，连那些黄油都还在。

战斗仍在进行，但情况愈来愈不利，普巴本之子说，后来藏人决定撤退，以防敌军大量增援后脱不了身，当时，在藏人手中的尚有三个山头，藏人决定确保两个山头，以备部队从中间穿过撤退，放弃另一个山头及另一个山腰（因山顶已被敌占领），于是开始吹号联系并传达命令。才仁多加说：“但因号令全是原藏军的那一套，中国军队有一些懂藏军号令者，还有随德格王子投降而改编成中国军队的部分藏军，他们被分散在敌军各排连，做为翻译，由于他们也懂藏军的号令，知道藏军要放弃的山头，于是三十余敌骑突然冒险插入两个山头的沟中，想阻击撤出的藏军。

藏军尚未及撤出山头时却见沟中有敌骑插入，只好继续固守山头，并从两边向下攻击那些插入的敌骑，敌军处于极不利的地形加上藏军占绝对优势，不一会儿将二十七敌骑全数击毙，另三骑奔逃。另外又见十七名解放军在沟中围成一圈，面朝外而死。藏军不得不承认，有些中国士兵极为勇敢，拼死抵抗，绝不逃跑。

藏军被迫从一山头刚退到一山头，经常立足未稳，追兵已至，未及抵抗，又弃地后退。而且，中国部队的重机枪和三门小钢炮把人打得晕头转向，藏军恼火了也想集中火力还击，当时集中藏军的三枝机枪，严阵以待，不料七六二机枪竟无法连射，打一枪再装一子弹。

原来，前一天几个士兵没事干，竟将机枪的转盘弹盒取了下来拆开，拆开后又不会安装，只是将弹簧随意塞进转盘弹盒中，另有两个空弹盒，没有人会装子弹，拆弹盒的是一个从西宁逃出来的回人，谎称懂原理，结果弄成这样。

另一梃机枪射了七颗子弹就卡壳了，身边又没带替换的。第三梃机枪是在偷袭桑巴竹卡时夺来的，只射了一会儿，枪管竟又飞出，这枝枪原来在竹卡枪管也曾打飞，枪答叮叮当当地顺崖掉了下去，如此倒霉的事一出，人人觉得气丧，再加上敌军的攻击，而我们自以为有利的岩石地带，根本不利守卫，子弹和碎石到处乱飞，防不胜防，于是，我们全线溃逃，敌军一直尾追。

战斗中，有两架敌飞机，未向我们轰炸，但却将炸弹投在拉宋的牧民，他们除了给我们食物外是无辜的，那些牧民刚起床，飞机便飞过来，又是轰炸，又是扫射，打死百余头牲畜。

藏军的人数日趋减少，解放军却日日有增援，如此集中决战，只能吃亏。这时有人带来消息，说是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十月间，美国将会空投武器，在此期间，尽力扩充人马，没有武器也不要紧，同时将现有武器的型号、数量、以及步骑兵人数等报往印度大吉岭，以便他们支援，来信还叫我们挑选精壮青年赴印转送美国受训。

另外留在芒康的零星人员跑来报信，称在家乡洛然寺的军队指挥部已趁夜撤走，后才知是因四水六岭围攻札木，因此迫使敌军撤走。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敌军撤走的原因，因此，派信使前往察雅各部，要求他们于一九五九年五月立誓并正式起兵。

另外，我们则返回芒康，一方面劝原投敌之部再次起兵，对有枪者也促他们起兵，如不愿者则请他们将枪给我们而不要交给中国人等，当时较乱，一些人顺利地交出枪枝，有些人不交，有些则是我们强制收缴，总之很混乱。

当时中国部队从成都调来大量军队，敌军称有十五万人，事实上没有那么多，不过也不会少于五万人，西藏军区的五十一师则退回，只留了六一一团，五十一师所以撤走是为了围攻四水六岭，而将攻打我们的任务交给了成都和中国昆明的部队，各部敌军云集，加上原有的独立师、团等部敌人战力大增。

同时，还向德格、芒康等地分线进攻，空中每天有五架左右前来侦察、扫射。当时贡嘎喇嘛部有一间强悍的寺院叫嘎达寺，寺僧和查哈的康民集中千余兵，固守寺院。激烈交战五日后，敌军用炮、飞机狂轰滥炸，守兵与寺院同归于尽，无一幸免。

藏军不知空投何时能来，但当时却已听说，在理塘方面已空投了武器和人，空投的七个

人刚落地即被中国人打死。有鉴于此，他们暂时停止了对我们的空投。因此，我们又派人通过边境前往印度，并给嘉乐顿珠写了信，说明在整个芒康内有近二万兵，被十余万敌军围攻，但我们缺乏武器，如有武器，我们可以坚持住，何况召六、七万兵并非难事，但前提是必须有武器供应等。

信中并要求明确指示是要退到国境外还是就地战斗，如继续战斗，我们一定要使烧火处有灰烬（意谓一定使做的事情有成绩）。

那时，通过杂域和拉萨边境等各种途迳派了许多人回来，但未能到达芒康，有一次将派往芒康的人先空投到了边坝，而不是到芒康，因为当时芒康局势非常危急，为防止武器落入中国军队手中，就将空投人员先投到边坝，当时边坝地区有雪、达、洛三部之兵和各处逃来之人共七千余人，四水六岭围攻札木时也在边坝建立了一些组织。

当时解放军尚无力顾及边坝，都在对付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和雪域护教志愿军，空投人员成了藏军当时的希望。但是，有三个空投到边坝的人，本来是希望他们一到边坝就立刻步行到芒康协助雪域护教军，当时他们带来全套的发报机，无奈他们三人却天天在边坝玩牌，飞机两次前来都未能联络上。而当时已先空投了两次武器，在第三次空投时，因他们三人顾著玩牌，飞机只好又将武器带回去了。

而两次空投的武器，第一次是发下去了，但第二次的却存放在边坝寺内，拖著一直没有向下分发。没有多久，中国军队就开始向边坝地区发起攻击，边坝被打得一塌糊涂。空投的人中有的被中国军队打死了，电台则被缴获，当时应有两名报务员到芒康地区报到，但他们背著电台却失去了联系，从此没有下落。”

芒康地区的藏军急需武器，却一直未见有人前来联系，在枪绝弹尽时，俗人总指挥普巴本首先阵亡，于是整个部队只好在深山里面边打边躲，有时集中伏击共军，有时则需化整为零，分散各地。藏军中有很多也由骑兵变成步兵，化整为零地分散在森林中。藏军步兵们分为小股，到处针对共军小股部队和工作队进行袭击，除非与敌正面相逢，否则一般是不参战，
而只是在森林中来回移转。

一九五九年底，藏军人人都已非常失望，大家知道西藏政府已经完了，拉萨也已经失守了，边坝也已遭覆灭，四水六岭部队甚至已经逃到外国去了，但是由于印度方面一直没有明确的指示是空投武器还是不空投，所以雪域护教志愿军还无法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只好继续努力。

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在芒康进行民主改革，在洛然寺和县上到处都是驻扎的军队，藏军不得已必须派人到乡下找粮食，但解放军几乎在每一个村庄都设有驻兵，并且还严格控制粮食，
谁家每天磨了多少糌粑，谁加磨了，怎样消耗的都要监视，使藏军在找寻食物时更加困难。
才仁多加说：“到了一九六 0 年五、六月间，藏军心想与其被动挨打还不如主动袭击，于是决定将仅剩的人员分为四部，每部约为五十人，先后四次主动袭击或伏击共军，但却因此令解放军大规模集结，下令非歼灭藏军不可。

于是西藏军区五十二师、五十三师和成都军区又加派三八八团及特种部队等，加上一直驻扎在嘎拖（芒康县城）以南的独立师、还有昆明军区的部队，从昌都到杂域，宽广的地域上到处布满了中国军队，各重要山头也都有共军，人数约有十万人。不管白天晚上，信号弹此起彼伏，看得藏军只好放弃乘骑，不分僧俗官兵，就连总指挥札巴喇嘛也是徒步步行在森林中，队伍人数仅剩五百人。

藏军队伍出发时，都有人在后面负责毁灭足迹，人人只能吃野菜，有时一天只能吃一勺糌粑和一把野菜，人人都疲惫不堪，平时昼伏夜行，又不敢离开森林。中国人则在每一个村庄都驻有军队，还宣称要把藏军饿死、困死，并且到处发传单，特别是在藏军官兵的亲属和家中、以及与藏军较亲近的人家和路口都留下了大量的传单。内容多是：“札巴喇嘛和普巴本赶快投降，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只要你们投降，保证给予优待并恢复原来的职权。”

传单中又说，西藏政府已经灭亡了，逃到印度的又多已经饿死或热死了，帝国主义救不了你们，只要你们投降，将执行三不政策（即既往不咎、不关、不没收），但另一方面又要求藏军官兵的家属、妻子、母亲等抱著孩子，随中国军队在山下哭叫，要他的亲人快快向人民政府投降。

当时，在长江以西一带，有很多部落均已被消灭，有一部分藏军被迫逃亡到缅甸，到现在都不清楚他们的下落。从六 0 年到六一年，四处都是中国军队，察雅五部的牧民都在战斗中遭到覆灭，或死、或降、或被俘，雪域军所剩的四百人已是军力最强的一部了。原来在各从山峻岭中还有七、八百名义士，但有很多人均在向外移出时被歼灭，到六一年时已经所剩无几了。虽然他们从几年前到死为止，没有得到美国方面一颗子弹的援助，却并不完全死心。而札巴喇嘛还在等印度方面的消息，但已有赴死的打算了。

藏军心里清楚，要战胜敌人已经是毫无希望的了，既然在战斗前藏人已立了多次誓言，现在许多人已经死了，还活著的也必须忠实履行诺言，慨然就死。幸好，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已经脱险到了印度，算是为民族和宗教的复兴留下了种子，除非有国外叫我们过去，否则我们不能过去，更不能投降，唯一的道路就是根据我们立下的誓言去赴死。”

一九六一年三月，藏军与共军遭逢，藏军被团团包围，共军甚至还在森林中装上喇叭，用喇叭高声叫喊著，要藏军赶快投降。藏军立刻以射击做为回答，整整一天，两边军队从这个山头打到那个山头，札巴喇嘛等两百人还是杀出了一条血路，冲了出去，但仍有一半的人受伤被俘。

剩下的人更少了，整个西藏境内的反抗运动大体上已被中国人镇压下去了，坚持到最后的仅剩下芒康地区的战士而已。仅剩的人又多次与中共发生战斗，凡是被押来的俘虏几乎都是伤员，共军也意识到最后的藏军非常顽强。

剩下不到一百人时，因为缺少军粮便到一个牧民处，不料却被两个牧民发觉，中共后来也因此得知藏军就在不远处，于是立刻电告其他部队，从四面八方将山头团团围住，整整一个晚上，中共不停地调兵遣将，到天亮时，数不清的中国军队将整个山头给围了起来。

藏军最后被困的地方叫久措，靠近察雅，天亮时，共军用扩音器敦促藏军赶快投降，并从四面慢慢地逼上山头，于是战斗又打响了。在中午十二时以前，解放军共进攻了五次，都被击退，开始解放军想抓活的，但因为共军发起攻击的地面毫无障碍物，以致死伤惨重。最后则改为密集向山上扫射，以掩护其他部队进攻。

战斗到中午十二时，中国军队虽然仍攻不上山头，但藏方官兵已意识到这是最后一天了，这次是在劫难逃、毫无胜算了。于是便让六个人投降，这六个人中，有五个是随军家属，另外一个是排长，因为他的手臂被打断，惨叫连连，因此就叫他前去投降了。当藏军高喊：“请允许我们投降”时，共军马上就停止了射击，但等发现只有六个人下来投降后便没有动静时，又开始发起攻击。

到一时左右，札巴喇嘛召集剩余的士兵说：“今天我们已经是无路可走了，只能战死，但临死前我们也要痛痛快快的打，如能坚持到天黑自然好，这可能是我们雪域护教志愿军最后的末日，因此不要再抱逃脱的希望，为死亡做准备吧！”

每个人都分配了毒药，但大家互相嘱咐，不到最后一刻不吃毒药，能多打死几个敌人赚几个。共军持续进攻中，又有一些人阵亡了，札巴喇嘛到战死者的尸体边去寻找子弹，发现尸体身边的子弹几乎是一无所有，当时环绕在他身边十八具尸体，竟无一人有剩余的子弹。

最后他们终于在一个喝毒药自尽的空投人员身上找到廿余发子弹，札巴喇嘛得了子弹后非常高兴，他对在自己身边的两个随从说：“打仗一定要留一些子弹给自己，敌人要活捉你，不会打死你的，所以必须要留一些子弹给自己。”札巴喇嘛又说：“死也要好好的死，先吃点糌粑吧！”

就在这时，解放军的机枪又响了，开始了又一次的攻击，望著渐渐逼近的解放军，札巴

喇嘛起身扫射，几乎将子弹全部打光，解放军的攻击也因此缓和了下来。此时已是下午二时左右，解放军已不再射击，战场显得出奇的安静，这时一旁突然有人叫出：“喇嘛圆寂了。”他们看时，只见札巴喇嘛盘腿坐在那里，头微微低著，鼻中有稍许红色和白色的液体流出。

一旁的战士有人哭著想拥抱札巴喇嘛的尸体，这时解放军却扑了上来，但解放军并不知道札巴喇嘛已经圆寂，还喝令他站起来，并用刺刀在他们的额头上捅了一刀，又用小刀在他的左手拇指上割了一圈，但只见白白的肉，不见血流出。

中国军队问：“山上还有多少人？”一旁的人回答：“已经没有人了，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但中国人仍继续向柏树林中搜寻，猛听到一声中国人的叫声，随即传来叭叭的几声枪响，中国人又是一窝蜂地逃回去。

接著又有两声巨响，两颗手榴弹在中国部队中爆炸，当场有六、七人被炸翻。随著一阵叫喊，中国军军全部都冲进柏树林，共有七人被俘，另外有一人正在发报，但手中握有毒药，在挣脱共军手后再将毒药塞到嘴里，共军忙得用水灌、用手指拼命往嘴里抠都没有用，服毒的藏军已经两眼翻白、阵亡了。

当时被空投到芒康的布桑也参加了这场战役，布桑回忆说，当他们被空投时，西藏已被中国占领，不过札巴喇嘛还在坚持，并且和中国军队打了好几场轰轰烈烈的仗。当时芒康因为来了很多中国军队，大家就在山上打游击，单是四月九日那天就打了九次仗，双方战事很激烈，每天从早上六点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多，解放军和西藏游击队互相喊话要对方投降，到十五号时已被解放军重重包围。

布桑说，当时大家手持的是美式M 1 步枪，也有固定的联络时间以电台设备向美国报告情况，十点钟时，眼看又死了两个人，大家决心要打到最后一颗子弹，后来没有办法，决定集体吃药自杀。但布桑说他来不及吃，正把药含在嘴里时，药被解放军从嘴巴中打了出来，从此被俘虏，有很长时间变成哑巴无法说话

最后一场战役共有十七、八人被俘，其余的全部自杀或阵亡。自此，西藏芒康地区的“雪域护教志愿军”遭中国军队全部消灭。

第七章 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

以双叉刀尖为旗帜的“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是当时西藏地区组织最严密的抗暴团体，抗暴行动受到康、安多和卫藏三区藏人全面的支持。在它成军两年的时间里，“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转战西藏各地，鼓舞各地游击队继续与中国对抗，更经常牵制解放军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最后还护送达赖喇嘛成功逃往印度。

在西藏坎坷的近代史中，“四水六岭”是西藏人的骄傲，这段历史说明藏人曾经凭著毅力，对抗中国强大的武力威胁，宁死不屈，表现出藏人最高的民族韧性。

一开始谁也没想到，和谈后的西藏局势，反而让藏人陷入绝望之境，在中国强制进行民主改革、敌视与消灭宗教的情况下，强调组织反抗的声音愈来愈大。东边的西藏康区首先发生战争，藏人在战争中死伤非常惨重。因此在拉萨做买卖的巴塘、理塘、杰塘的商人非常著急，他们商量停止做买卖，并凑钱买枪买马，然后便十个、廿个返乡参加战斗。

当西藏东部康区受到迫害后，也有许多康巴人逃到拉萨来，使得拉萨成为另一个战争根据地。这些逃亡到拉萨的康巴人在安珠贡保札西的领导下，终于促成了在西藏反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的创立。

安珠贡保札西（以下简称安珠）是康区理塘人，早年在拉萨经商，在拉萨的康巴人间，以及在巴塘、理塘等地都具有很高的威信。当家乡受到战火波及时，安珠便开始联络印度大吉岭的藏人以及和西藏政府若干官员（如达赖喇嘛的侍从管家帕拉），同时也广交与招揽因战乱而逃亡的康巴人。

另一理塘人然楚阿旺后来成了四水六岭的右翼总指挥，他说到，当时在拉萨时，大家经常去找安珠贡保札西，要他想想办法。他们每次找安珠，安珠都是说：“不要著急，会有机会。”但大家都很著急，因为家乡每天都在死人。

一九五七年时，达赖喇嘛、班禅喇嘛都去了印度，藏人计画达赖喇嘛先留在国外，然后接著就在拉萨起事。那时在拉萨已凑了不少枪马，是理塘地方二百余家商号凑的。当时的计画是根益西等在印度噶伦堡的藏人阻止达赖喇嘛回藏，然后印度噶伦堡的人在卓木起事，在西藏的人在拉萨起事。

不料后来从印度捎信来指出：“你们先动手，我们还不行。”安珠认为印度方面“言而无信”。不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拉萨与卓木均未能起事，安珠贡保札西只好逃匿，在噶登寺静修了五、六个月，众人皆不知其去向。

后来也是四水六岭主要战将的根益西则说，他在拉萨时，安珠曾经和他等人一起讨论，大家说到家乡已经完了，在拉萨的人如果一天到晚只做买卖不做准备的话，下一次就轮到拉萨要遭殃了。而且因为家乡死了很多人，所以决定举行宗教仪式。

当时很多拉萨商人都觉得达赖喇嘛去印度、中国等地，路途往返非常辛苦，于是决定为达赖喇嘛祈寿，后来行动扩大为希望所有的商人都能参与，于是各自去联系自己熟悉的商人来加入。

在准备期间，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时，又觉得仅仅祈寿不够，应请达赖喇嘛讲授和主持时轮金刚大法会，并要奉献一个前所未见的供礼。大家商量过来商量过去，觉得达赖喇嘛平时没有黄金宝座，于是决定开始募捐。在当时因中国实施民改，人们也不知道财富对自己是福还是祸了，因此捐献的人非常多。

商人把资金献了，并且讲好，以后如果情况好就归还，情况不好就算了，当时康巴人有十八户大宅在拉萨，所以有人建议把这些抵押给中国，从中国那里得到钱，如果最后能把中共赶走，房子就收回来了。

共有五十六名金匠负责制造达赖喇嘛的黄金宝座，另外，拉萨八廓街有一叫羌然玛的跳神的地方（属政府所有），在里面成立了办公室，开始登记所有的捐赠物品。当时贵族、人民、拉萨、山南各地的捐出物很多，还有无数的妇人当场取下耳环、金手镯以及康巴妇女取下金钮扣等。这些黄金除了一开始有一些用买的，其他都是捐献得来的，所献黄金像铁一样堆著。

拉萨大昭寺内到处都是念经祈祷的人，从噶伦堡买来几十驮布，制成到处都可见到的经幡。

一九五七年藏历四月十五日举行时轮金刚大法会后，结帐时才知道一般人家所捐献的竟远远超过贵族的捐献量，使贵族大丢其脸。单是计算这些就花了很多时间，黄金按多拉计算，（五十多拉约为半公斤，三多拉为一两三钱），打制黄金宝座共用了约四千零五十多拉；另有五个金盆，各有十三多拉；金大灯一盏，有一千三百余多拉；小金灯则更多。

而银子由于实在太多了，堆积如山，在此期间未用完的银子，就在请时轮金刚时熔成银砖献了上去。另有九眼珠，以及上有自然显现狮子的绿玉等，均镶在黄金宝座上。

当达赖喇嘛坐在黄金宝座上讲经说法、传授时轮金刚大法时，献贡品的人达二百余人，时轮金刚大法会后，共算了廿三天的帐，都是不分日夜地算。剩下许多钱财，于是决定成立基金，为达赖喇嘛祈寿。

在这些宗教活动热烈展开的同时，主张抗暴者便利用众人打制金座时，开始买枪买马，准备打仗。

四水六岭老战士嘉玛阿楚说，在拉萨起誓造反时，是安珠先一个个和大家联系后，问大家是不是愿意同生死共患难、为西藏、为宗教而战，一起抗击中国人？如果愿意，那边有达赖喇嘛的佛像，每个人就在达赖佛像下说：“我们愿意！”刚开始有些人愿意，有些人还在犹豫，但后来没有办法，因为能往那里去呢？家乡打得一塌糊涂，大家都觉得这是迫于形势，

都起了誓，而且起誓的都是领袖人物。

不过在宗教仪式结束后，也有些人退出了。因为这些人自认参与打制金宝座是纯宗教行为，他们对打仗不感兴趣，甚至有些反感。但多数的康巴人则由于家乡一直在打，所以心中有苦，大多踊跃参加。藏人便以此名义开始广交各路人马，于是康和安多的人都在时轮金刚的名义下聚在一起。次成丹增说：“当时内部商定，要聚合康人，使藏人有个中心，而为达赖喇嘛打制金座，更是打动人心的。无数的康巴人将护身符、戒指等凡属金银的纷纷献上，大昭寺内的广场上，金银堆积如山，并借此机会，联络各地来的康人献金座，中国人也无话可说。而康人在家乡经历残酷战争，多已不留恋财产，捐献时极慷慨，说交给中国人，不如献供。

如此，以黄金打制了金座、金案，并在大昭寺放了一盏大金灯，也是完全用黄金打制的。其重量一个人很难抬得动，现在听说已经叫中国人给拿走了。即使如此，金子仍然用不完，又向三大寺等寺院献了许多。并请求达赖喇嘛讲授时轮金刚大法会。

兵营建在竹古塘也是神谕的，我们并不知道竹古塘在何处，查访许久才知道。当时，在拉萨一带的康人多知道要在竹古塘集兵，知道的人多了，本来容易走露消息，但中国人一直未察觉，可见当时的藏人就是这样齐心。　安多首领津巴嘉措是后来到的，他有五、六十人，安多有钱有势的人大多没有来，来的多是朝圣者，他们没有枪马，是最弱的一部。安多部和恰城部的营地在一起，他们多持刀、矛，那也是津巴嘉措去筹措来的。安多人虽然武器简陋，但在战斗中都极勇敢，没有勇气的是不会来参军的。”

有关“四水六岭”这个名称，在西藏古代就已经存在，所谓“四水”就是指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六岭指的是在这四个江河流域的西藏地区；四水六岭也泛指整个西藏。但“四水六岭”如何成为反抗组织的名称，藏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藏人指出，在献金座时，达赖喇嘛曾说：“这是四水六岭的”，由此有了“四水六岭”这个名称。

但另外有一些人则说，大家在商讨组织名称时，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说：“就叫四水六岭好了。”其他大喇嘛也表示赞成，四水六岭的名称就这么定了。于是再以地区为别来任命负责人，宗教方面的负责人是格西哲蚌吉索，总管是安珠贡保札西。

当时参加四水六岭的洛桑诺布说：“我是安多卡加人，原来是个喇嘛，五一年我还俗娶了媳妇，后来在拉萨虽然非常紧张，互相僵持著，但没有发生太大的战役，这时有一些藏人包括安珠、根益西等已开始在串联，秘密地互相连系。藏历三月时，来了很多信，提到要建立四水六岭，如果有愿意参加四水六岭为西藏打仗的，请到竹古塘会面。

我们要出发时抓到三个中国人，他们说自己是国民党，后来我们也把他们带到竹古塘，到那儿时四水六岭已有八、九百人了，就开始任命玛吉、百长（连长），并发布了一个廿七条的军纪。当时并不叫“四水六岭”，先叫“南北护教志愿军”，南指的是康巴，北指的是安多，后来又改成“多康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

当时每个人胸前有黄布，写著志愿兵的缩写，上面还有四水六岭盖有印章的布挂在胸前，说我们要为西藏独立决死战，绝不后退退缩，还规定不许内斗，有仇有冤者等战斗结束了再算，现在一切停止。”

安多人索南嘉则提到：“安珠等人一开始建四水六岭时我就去了，四水六岭一开始叫“护教志愿军”，后来成为“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一开始我们以为台湾会空投武器，因为青海省的地方都知道有国民党，或说美国会空投武器，有各种说法，但后来都没有。后来则改叫“多康四水六岭”，一开始时我们安多人只有三十五人，后来集中到三百四十七人，但是只有十几枝枪，安多津巴嘉措打造了三十几把长矛，配发给我们。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在安珠与康巴头人的筹备下，在竹古塘正式举行成军仪式，正式组织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总部，预备与驻藏中央工作委员会、西藏军区司令部展开有计画、有步骤的战斗。有许多商人在离家时，都已给家人留下遗嘱，他们对妻子说：“我如果因为保

卫宗教、国家而死，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请你好好抚养子女。”

六月十六日，吉日，藏人按习俗开始煨桑（也就是烧香，常在宗教特别节日时举行，烧香可以去除任何不洁之物），当时军队分为左右翼，右翼从左转、左翼从右转，然后竖起军旗。军旗是战斗目标的象徵，上面用两把拐头刀交叉，一把上绘火焰圈，表示神刀，代表雪域之神的红与黑护法神；另一把刀未绘火焰圈的，代表民间的组织力量。

刀的上方中央，绘一个太阳，象徵著整个藏民团结在法王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坚定奋斗，前途光明。旗帜四角，绘四颗鬼头，表示要征服一切邪魔。

由于军旗在拉萨时就已确定为双刀相叉，底子黄色则是在竹古塘决定的。中国尚红，藏人尚黄，因黄代表宗教，在水木土火金五元素中又表土地，意指为西藏（土地）和宗教而战。

另因中国国旗上有镰刀、锤子，四水六岭军旗上则是双刀，刀之柄是金刚，即黑持金刚（神名，为一护法金刚神的名称）。因他们是护教军，刀为文殊菩萨之义？，莲花为观世音菩萨，三者合称“日松贡保”，意谓人神共同抗击佛教的敌人。

之前在五月十三日开会，点人数时包括康和安多人共有两千两百人。安多人多无枪，仅持刀矛等。随后任命了十八名“马吉”（相当于司令官或将军），总指挥为安珠贡保札西，安多领袖为津巴加措。十八个马吉的军队分为左右两翼，然楚阿旺是右翼指挥官，恰成人阿并次成是左翼总指挥。

“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大部分都是在藏东家乡尝过败仗苦头的康巴人所组成，另外还有少数的安多人。其实当时还没有康巴、安多的说法，西藏人说，康和安多就像头上的两个角不分长短；像脸上的两个眼睛没有好与不好的差别。而卫藏人因为家乡就在那里，如果他们一参军，中国部队很容易找家庭的麻烦，因此大多不方便参加，但很多粮草、马草都是卫藏人提供的。

西藏人是后来到印度有了三区的划分，才开始分康巴、安多，也才开始有一些属于藏人地域观念的纠纷。

安多人洛桑格列说，安多在四水六岭的山南时期可能有一百人左右，另外有五十多人跟著安珠贡保札西走了。家乡没打仗前安多人可能加入，但后来没能逃出来的就不可能了。因为安多非常远，他的家乡到拉萨步行就整整要走五个月，那时又没有车，所以很多安多人都在自己的家乡逃走了。

而且，在当时安多能够骑著快马侥幸逃出来的非常少，很多人都是一路打，还没到拉萨前，就已经被中国人消灭了。

原名姜华亭的汉人洛桑札西则说，四水六岭准备成军时，在山南地区的竹古塘已有各地康巴军陆续集结，并且搭起了数百座的帐棚，人数约达一千五百人。汉人洛桑札西说：“在我投向藏军后，当时各地的康巴军队陆陆续续集结到山南，并且在这里搭起了数百座的帐棚，来自西康、拉萨等各地的康巴人约一千五百人已经集结在这里。

在安珠与康巴头人的筹备下，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组织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总部，预备展开有计画、有步骤、与驻藏中共工作委员会、西藏军区司令部的战斗，四水六岭总司令是安珠贡保札西。

由于各路反抗英雄的公开会师，山南竹古塘便成了草木皆兵，藏人反抗中国人入侵的情绪，此时达到最高峰。

一九五八年春季驻西藏中国军队，为了对付迅速发展的藏民反抗运动，首先清除流落西藏的大陆内地汉回各族反对共产党人士，以防他们参加反抗军组织。

在四水六岭于山南建立总司令部前，安珠等领导人物早已在拉萨有了秘密组织，制定誓辞并约法三章：“一、大家齐心合力反共到底；二、中途投降与逃亡者，全家诛头；三、流落青康一带的藏人，都要参加护教志愿军，否则严惩不贷。”

秘密组织的各领袖宣誓后，写信分别通知居住在西藏各地的青、康藏民，自备枪马到山

南竹古塘总司令部报到，当时自动报到的这种自备枪马战士约有八百多人。”

四水六岭右翼指挥官然楚阿旺也说，他们向人民介绍自己时都说：“我们是自愿从军以保护佛教、国家，希望民众可以提供粮草，对提供的粮草我们尽力付款，如果目前无能为力以后局势好转时也不会让你们吃亏等。”

然而，“四水六岭”这个军事组织很快就引起中国军队的注意。当时的噶伦尼乌夏说：

“一九五八年时，他们开始商量向达赖喇嘛献金宝座，而实际上却是密谋在竹古塘建立兵营，在他们分批前往竹古塘时，中国人问噶厦说：“目前有许多康人骑马背枪到拉萨，到底是怎么回事？”

噶厦回答：“康巴人不论富裕与否，都极看重枪马，平时出门即骑马背枪，这是他们的习惯，没有什么特别的。”

后来中国人也听说了竹古塘建立兵营的事，又来问噶厦：“那些康巴人在竹古塘建立了兵营，对此噶厦不管吗？有没有阻止或驱逐他们的计画？”

噶厦说：“地方出现纷乱对谁都不利，因此我们一定会管，包括发布告示等都要进行。”

中国人要求噶厦一定要贴告示，要卫藏地区的人不许给康巴人任何帮助，驱逐他们的事由中国人来办等。于是噶厦发布告示说：“对过往的康巴人，除了公平合理的出售粮食外，不许给予任何支持。”

噶厦将写好的告示给中国人看，中国人说：“叫你们不要帮助康巴人你们却写成要帮助。”噶厦回答说，如果不公平合理的出售粮食，那些康巴人饿急了就会抢劫。

后来中国人又说他们驱逐康巴人的中国军队人数不足，需要藏军的帮助，但噶厦说明因为藏军大部分已遣散回家，在拉萨有一两个兵营，其中一个警卫团是保护达赖喇嘛的，警察团则要维护拉萨的治安，扎什兵营有一些军队，派他们去他们会向前开枪还是向后开枪，噶厦不敢保证，因此派兵非常困难。

但后来噶厦同意派十几个熟悉地形的人支援中国人，由中国人负责驱赶的工作，不过后来中国人又改变做法，说他们负责保护公路和各机关单位，驱逐康巴人则是噶厦政府的事。中国人会改变做法，是因为中国人想：“康巴人没必要驱逐，他们会抢劫山南而逼得人民走投无路，然后康巴人再转往卫藏地方，在那里又抢劫，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驱逐是会受到人民欢迎的，因此现在不急著赶他们。”

达赖喇嘛的侍从官帕拉则说到：“当时噶厦还是召开了一个所谓设法让中国人消气、让康巴人的骚乱平息的会议，最后结论是说要平乱必须恩威并施，首先派人和谈，和谈不成才进行战斗，但中共必须提供武器，如此则不但可以使中国人的愤怒消除，又可平息康人的骚乱。

但有些噶伦认为政府真的要与康巴人自相残杀吗？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帕拉解释说：“现在这里没有外人，说了也没关系，我想中国人是肯定不会给我们武器的，这样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尽力而为，是中国人不支持等。如果中国人给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讨论要怎么办。于是我们先派了政府代表和三大寺代表前往山南和谈。”

不过，当时一切行动都在秘密进行中，当西藏政府内部获悉康人决心组织战斗之事时，就派了十余名代表要求见安珠贡保札西，但安珠要别人说他不在，只派了几个人负责接见。

这些政府代表无奈地表示：“请你们不要在西藏政府的直辖地面建立兵营，在这里设立兵营和中国人打绝对没有好处，中国人不停地找政府的麻烦，希望你们将兵营迁到康区或其他地方去。”

因为政府代表有几次要见安珠都没见到，最后四水六岭代表向他们说：“康区正在打仗，如果政府愿意和中国人商量有关停战协议，我们可能会考虑，除非中国人停止在康巴的残酷行为，否则我们实在做不了决定。”

当时康巴人虽然曾经经由哲蚌寺的总管聂巴与西藏政府有秘密联系，并且开始要求提供武器以便打仗，准备起来救自己的国家。但四水六岭的成员认为，由于当时西藏官员都拿了

共产党的薪水，对于军事行动都是采取“先暂行压下”的行事原则。

因此，虽然当时的各区藏人都有联手抗击中共的秘密军事行动，但政府的态度却让他们相当失望。针对这点，帕拉指出，西藏政府相当理解四水六岭是为西藏的民族和宗教利益而工作，也非常同情，但想要提供支持却非常困难。帕拉说：“西藏政府当时处于非常为难的状态，虽然西藏社会从政府到民间人人都有“若能抵抗中国人就应抵抗”的想法，但西藏政府却因为需要与中国人合作，很多行为绝不能过分。

因为这样的顾虑，所以政府从来没有向人民明确指出要做什么，而且进行这样的讨论实在太危险，也可能有害无益，因此有关反抗中国一事，从未公开在会议上正式讨论过。

公开上，西藏政府并未支持抗暴组织，但是在达赖喇嘛还没有去北京之前，已经决心组织战斗的康巴人却多是与我联系，因此我也被中国人列名为“反动分子”。但是由于西藏政府是负责处理政务的，而官员中只有我一人不须受其他同僚的牵制（帕拉为达赖喇嘛侍从官），因此与康人双方的联系一直是由我一人在进行，对于中国，我在外表上也是尽量客客气气。

和四水六岭秘密进行联系的事我从未与噶厦谈过，噶厦方面也从未询问过，因为如果知道四水六岭与噶厦有联系恐会扩大纷乱。如果有中国人找噶厦的麻烦，噶厦与达赖喇嘛可以说完全不知道，如此一旦事情成功了对民族、国家宗教均有利，不成功也只能追究我们少数几个人的责任，出于这样的考虑，才没有联系。

我从来没有利用政府名义告诉西藏反抗军政府要如何如何等，但可能因为我对这些反抗军的想法相当重视，而使他们产生了政府是同情与支持他们的印象。”

帕拉说，噶厦的立场非常难为，如果设法与中国人合作，藏人看了就不顺眼；和人民在一起，中国人也有可能突然制造暴乱。

这个以康巴人为主的西藏正规游击队，一经成立即兵分两路，一路以山南地区为根据地进行抗战，另一主力七百余人（或号称一千）则由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总指挥安珠贡保札西率领，取道曲水县向北前往香嘎登曲克林寺，夺取西藏政府的军械库。因为四水六岭的人数虽然不少，但许多都是徒手兵或刀矛兵，即使有枪，子弹也是寥寥无几，因此获得武器对四水六岭的未来成败极为关键。

在有关四水六岭护教军的武装问题上，在没有建军以前，达赖喇嘛的侍从官帕拉，就曾与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首领安珠贡保札西讨论过这件事。帕拉提醒安珠，四水六岭在竹古塘，每个人手上只有百余发子弹，但是中国人却有几十、几百万的子弹。安珠听完后说：“请政府马上给我们武器。”但帕拉表示实在没有办法给。

安珠贡保札西为了夺取武器，曾经计画突然袭击拉萨，然后夺取政府军械库的武器，但帕拉立刻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会引发动乱。帕拉要求安珠不要这样做，然后告诉他，在拉萨东方的香噶登曲克林有一个政府的军械库，如果设法去取那里的武器，会比较方便。本来安珠担心那里的都只是过时的武器，后来派人探听，得知那里的炮和枪枝都非常的好。

在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编制完成后，首先挑选精壮，由安珠亲自率领。然而，前往接受武器的北路军由于军情泄露，在聂木地方便遭到中国军队一五九团和一五五团的伏击，解放军以优势武力打死四水六岭前卫二十余人，其中包括左翼总指挥恰城雍佩次成等指挥官。但四水六岭也进行反击，歼灭共军重机枪班，双方激战半天。右翼指挥官然楚阿旺说：

“安珠有交待，在未取得武器前，遇到敌人要绕开，但有些军官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说，我们是前卫精锐，遇敌不战难道不羞吗？还有曾纳阿噶与热巴布琼等人则咆哮说：“逃跑不羞吗？见敌不战不羞吗？”于是最后大家决定继续前往，但遇到敌人就打战。在前卫顺著山沟继续进发时，发现中国军队在山上修筑了七处工事，沿著山沟分布，正在埋伏等待我军。

左翼最高指挥官恰城雍沛次成率几十人走在最前面，与其他部队拉开了一定距离，当他们从沟口进入敌第三处伏击点时，遇到露出地面的电话线，有一人想砍断电话线，雍沛次成阻止并已预感到已中伏，当即令部队后撤，他们一撤，河对岸一声炮响，敌随即发起攻击，

雍沛次成的二十余人立刻下马抵抗，后续部队也分别与第一、第二伏击点的敌人打成一片，顿时山沟中枪声、呐喊声响成一片。双方打了一天一夜，我军阵亡四十九人，其中恰成雍沛次成和贡觉阿聪都阵亡。统计负伤约六十七到六十八人，敌军损失更惨重，虽无具体的数字，但从一共缴获七百余支步枪、机枪判断，死伤应在六百人左右。我军也损失四十余支枪，全是步枪。

在战斗中，敌军有许多在走投无路或负伤后，大多跳河自尽，人枪全部被冲走，我军阵亡者也只能投入水中，结果有一阵子河水变红，当地人形容此役打得河水变红，确实不假。

左翼总指挥所率二十二人中，只有四人逃脱，十八人就地阵亡。

战斗结束后一阵赶路，路上走了好几天，但无战事，终于到了噶登曲科林寺院。到寺院附近，我们兵分三路，一路有我和普巴成列率领去占领山上的宗（县）政府城堡，白多率另一部占领寺院，另一部则占领山脚下的村庄。我向噶登寺的代表表明希望见到宗本（即县长），并介绍自己是多康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对方听了后表示不管是谁都不能进入宗堡，但我们表示自己是军人，上头下令我们进入宗堡，让其他人进入寺院。我们受命而来，不进则死，那有退路，还望见谅。但对方还是不让我们进去，并说政府来函说到，世局混乱，不得让任何人进入宗堡或寺院。

我见多说无益，叫多数人直冲宗堡大门，见门已关闭，便以大石头击之，并高喊快开门，里面的人乃开门并恭恭敬敬，低头弯腰的。我们也虚张声势，以枪指著几个吓得面无血色的老溪问到："中国人在那里？"对方连连摇手称："没有！没有！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冲进去时见约有二十余名守宗堡的男人，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有，都空著手惊慌地站在那里，我以枪顶廿一个年轻人的胸膛，喝令他将枪交出来，他慌社慌张指给我们看的却是他们的配枪，并无西藏政府的军械，问之才知道是在寺院内。

我当即在宗堡上插上四水六岭的旗帜，并告诉俘虏来的两个头头，告诉他们我们是不偷不抢，希望他们了解。但是白多率领进占寺院的部分就不是那么顺利，寺院在宗堡下方的山腰上，僧人强悍，不许他们靠近并威胁说："你们还是安静地坐著，如欲强行进入，可能要迫使我们开枪。"

寺院四周有围墙围绕，共有八个大门供进出，白多无奈，只好退入村庄内从长计议。这时螺号悠悠，望眼可及之处，我大部队踏著尘土飞扬而来，等我军全部抵达噶登曲科林以后，安珠让寺院派人前来，寺院因此派来了两名代表，安珠向他们介绍我军为护国、护教之军，非危害人民打家劫舍的强盗，寺内留存有西藏政府的武器，希望能交给我们，你们留著也无用，但那两个代表根本不听，言无政府命令，他们无权交出，且政府命令他们不惜作战也要保护枪枝，故难从命。

说来说去，双方毫无进展，安珠于是召集众军官研究对策，安珠下令说，如果寺院拒绝缴枪，说什么也没有用，今晚全军将寺院团团围住，明日拂晓进攻，破门而入。

在我们回去布置进攻寺院事宜时，许多官兵流著泪要求不要把枪口对准寺院，还说护教军怎可攻打寺院？我等又去找安珠，安珠说，攻之无妨，或许不需要交战。

果然，当我们冲破一门，我率几个人直接冲入寺院执事的僧舍时，无一人抵抗，我请寺院执事外出，他竟示意要我把他绑起来，于是我们将寺院几个执事捆绑起来，押到寺外，附近老百姓见我们捆绑寺院喇嘛，都大惊失色，纷纷涌来求情，我们则故意喊杀喊打，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对方答应缴枪，留一百支步枪和一些手枪做为保卫寺院之用，但在取枪时他们又言留一百支枪对他们毫无用处，愿意全部交给我们，对中国人则以被反动派劫夺做为搪塞。"

黄昏时候，四水六岭的急行军前往并且接收了西藏政府存放在香噶登曲克林寺院内的英国制造武器。清点后得知共接收到的藏军秘密仓库所储藏的英式武器，共有壮筒轻机枪廿梃，加拿大冲锋枪四十枝，八一迫击炮一门，炮弹七十二发，步枪五百枝，各种子弹七万发。

"四水六岭"在获得如此大量的武器后，专门成立了军械部，并给没枪的士兵补给枪枝

或更换子弹不多的枪枝。但又因为缺乏驮运武器的牲畜，因此又派兵劫夺了大户人家在附近的一个牧场，共获得八、九十批驮马，然后起程回山南。当他们到了一个叫乌玉藏堂附近的地方时，前卫传来报告说从日喀则方向和羊八井方向分别有中国军队正沿著公路前来。

安珠当即下令："现在有枪用了，打！"所有士兵本来正在吃饭，一声令下，战士们扔下饭碗上马前去战斗，四水六岭军共分三路，一路守总队，其他两路分别伏击从公路两头赶来的车队，也就是史上有名的聂木战役。安珠他们在香噶登曲克林取了武器后，没想到竟能藉著这批武器，在归途中又在聂木宗（县）把中国部队打得鼻青眼踵，这场战役更是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成军以来，打得最成功的一次。汉人洛桑札西回忆说："接受武器后的游击队，个个欢天喜地，称得上是人强马壮武器好，虽然还缺乏火炮配备，但因藏人不打攻坚的正规战，所以不甚重要。而敌人所使用的武器都是沈阳兵工厂制造的，其性能根本不及英式武器，再加上藏人多半是父子同兵，没有官与兵的分别，都是为了护教挺身而出的自然结合，因此打起仗来特别勇猛。

反观解放军从一九五六年底，整编新军，优势是火力强，战士年纪轻，但缺点是没有实际的战斗经验。解放军当时都是廿五岁以下的青年，毫无实际作战经验，那能敌得过饱经战斗锻炼的康巴老战士？常常看到情势不对，都举枪高呼"喇嘛投降！"但因当时敌军大部分霸占山口，在整个形势上还占优势，藏军为杀一敬百，敌军都成了刀下鬼。

取得武器后，在藏军折回山南途中，经过拉日公路，不幸却被敌人发现，中国部队立刻由拉萨抽调出一五五团两个步兵营、和一五九团的一个步兵营，共计战斗兵将近两千人，秘密以汽车运到曲水，再步行到聂木宗，企图堵击四水六岭南进。

这次解放军共有三个营，人数和四水六岭相比是四比一，火力比约是三比一。共军到了小河南县政府附近，就暂时停止前进，把大部队隐藏到山地，进行敌前休息。而四水六岭军则在行抵县政府北部小河岸时，亦因天晚休息。但另外又派遣五十多人，埋伏到桥的北部，用五梃英式轻机枪或壮筒机枪火力，封锁桥梁。

第二日北京时间凌晨三点半钟，中国部队展开进攻，却未料到四水六岭军已有了准备。当解放军尖兵一排多人甫抵桥上时，五梃轻机枪火力齐发，只听到嗖嗖的声音，瞬息间便把解放军全部歼灭。接著四水六岭军反攻过去，又把后续的一连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大部分又歼灭了。

下一个目标便是攻击指挥部，当时敌人的前进指挥所是设在县政府对面的民房。指挥所内的解放军看到部队被歼，知道已身陷重重包围，无法脱逃，曾在房顶举枪请求投降。但因当时康巴人未看清敌人指挥所动作，开动机枪向上射击，因此将屋顶上的解放军压缩到屋里顽抗，最后以汽油灌注燃烧，人屋全部付之一炬。

这一天从拂晓前打到天黑，打得敌人死伤遍野，在这场战役中，总计打死解放军二百七十多人，打伤的则超过一倍以上。事后藏民看到由曲水装运死尸的大卡车，如装死猪般一样的运到拉萨去，伤兵则由部队押送担架队，抬了两三天才抬完，曲水民房，到处是伤兵血迹。而且，当时还缴获了步枪一百多枝，冲锋枪七十枝，重机枪二座，轻机枪三十七梃，迫击炮三门，各种子弹千多发。

但同时，四水六岭在这场战役中亦有伤亡人数达四十七人。有十余名知名的康巴青年，为了杀敌红了眼，都是在敌人密集的火力攻击前，挥藏刀冲上去才牺牲的。"

然而，汉人洛桑札西说，这次战斗却是在西藏多年战斗中，打得最成功的一次。四水六岭竟能以五百多名游击队，创下打胜将近两千人的中国新国防军的奇迹，从此护教军名声传遍西藏民间，以山南为基地的护教军之所以发展壮大，应是得力于这次聂木宗的战功。

经过这次战斗后，中国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开始认识到以康巴人为主的抗暴军战斗力，从此下令驻防西藏各地部队，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在没有任何援军的情况下，不准擅自打攻击战。

而当时的军事情势是西藏方面除了拉萨、日喀则、昌都等少数城市已为中共控制外，其他各地多有游击队四处流窜。四水六岭心知游击队本无后防的明显界线，因此，四水六岭自聂木宗获胜后，便决定撤退至藏北经藏东，最后再回藏南，准备打一次长途游击战，以支援各地的反共势力。

四水六岭从此展开一场长途行军，但因为在藏北无人区给养极缺，四水六岭士兵一路上吃尽了苦头。汉人洛桑札西回忆说："我们在藏北时给养极缺，一路上尽是山岭砂岗，几天内见不到一户人家，真是缈无人烟，我们所带的粮食，早已吃得一乾二尽，全军都靠打野兽活命，过著茹毛饮血的生活。而更艰难的是，在这里的怒江上源拉喀池到嘉黎宗的一段，地形特别的高，沿途多浮沙地，这是青康藏高原的独特现象，在其他地区是没有的。

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待人马走到上头，一下子就陷进地里，马匹四蹄，愈拔就愈陷愈深，如此活活埋藏了几只驮子弹的骡子。同时，敌人则分别由拉萨、当雄、里河三地，派兵跟踪，好在是步兵追骑兵，始终保持著一段距离。

由于长途行军，食粮特别困难，唯一能买到的是牝牛，再加上以打猎到的野牛、野马、野羊等充饥，每人分些鲜血淋漓的肉，还挂在身上边吃边走。行军到念青唐古拉山东北，大家已经精疲力尽。但跟踪的敌人步兵，通讯设备完整，又能得到食物补充，所以其行军速度很快，已经很接近我们了。

由藏北到藏东，沿途没有敌人军政据点，但一路上因缺粮使我们损失了一些战士。我军抵达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东部主峰区时，敌人由黑河方面派遣来的跟踪部队，因大雪山地带难行，自动撤回，另外由拉萨派遣来的部队则尚未赶到，我军便利用这个机会寻找食物，因为饥饿难受，所以反而把拉萨方面的来敌看成次要。

就在我们兵疲马惫时，突然一营敌人兵力趁我军在忙于补充食物的饥饿状态中实行偷袭。偷袭的敌人一直冲到我们司令部的地方，我们仓促应战，把敌人打退，但总司令安珠不幸负伤，总指挥然楚阿旺则被冲散。当时敌人并未发现我军高级人员的受损情形，认为我们战斗力还强，所以就回拉萨去了。我军才因此得以从容退到林孜，那里粮草更多了。

在四十多里长途的游击战后，又被敌人偷袭，我们必须先作兵源补充才能恢复攻击力。藏人打游击优点是人强马壮，适宜流动生活，擅长打各自为阵式的麻雀纠缠战术。其弱点则是由于藏民过惯自由生活，无法接受有组织的严格军事训练，打胜仗勇上加勇，打败仗就很难掌握。"

"四水六岭军"要不断冲破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千里转战后，虽然部队由于冲散或阵亡而不断减损，但也不断予以尾追而与解放军发生战斗。在玛雄一战，四水六岭军陷入解放军伏击圈中，最后虽苦战逃脱，但总指挥安珠贡保札西负伤，右翼总指挥然楚阿旺也被冲散。然楚阿旺回忆安珠受伤的情形时说："当时敌人炮弹像雨点般射来，我用望远镜观察，见敌人已从隐蔽的山脊后翻出，但由于太远双方并未对射，只有炮弹不断落下来在四周爆炸，我看到安珠营帐处浓烟滚滚，心想不好，立即奔过去时，见几个随从抓再站在那里，冉冉浑身是鲜血地对我说："阿旺，不行了，安珠被打伤了，现在该是好好地赴死的时候了。"我至安珠处，见安珠半卧在那里，浑身是血，眼睛已被鲜血盖住，我以安珠的帽子擦去污血，安珠睁开眼见到我说："阿旺，我没事，我有护法神的保护，没事的。"

其他有几个随从均已负伤，其中有一叫道杰的约四十余岁的芒康人，他的腿已被炸断，他一手推著枪，高叫："别碰我！"别留下枪。因为藏人相信沾上他人的污血，护法神就不会保护自己，否则可以刀枪不入。

安珠说他要喝水，然后挣扎著起来到一山弯处，丹正旺杰、索南朋措和我三个人点火焚烧柴薪，准备溶油熬伤口止血消毒，安珠不让我们碰他，只是叫我挑一些人上后山控制制高点，还说如被敌人占领山头就完了。我想安珠可能快死了，不能让敌人发现尸体，否则会被运到拉萨在藏人面前炫耀，故未从命。安珠再一次强调说要设法抢占山头，否则这个山弯中

的人都会死，还要我和夏乐才沛带一部人上山去。

我们向佛祖起誓，绝不扔下安珠，不管他是活是死，安珠又说：“请尽快上山，我绝对没有事情。”我乃说：“如阵地失守，则必是我战死了。”当时我身上全是鲜血和脑浆，这是因为在丛林中近距离击杀敌兵所溅，当时我已不相信什么护身符了，为什么不伤别的，偏偏伤了安珠，我的随从朵朵索南顿珠已负伤，他有一匹好马，我向他借了马转身对后面的官兵说：“大家随我来，如不能占领此山头，我们大家都完了。因为山顶有敌，大家要不管死活的向前冲，如果山头失守，则山弯中的我军都会死，我先冲，我死了大家不要停，一定要冲上去。”

当四水六岭军在聂木宗尝到胜利的滋味后，安珠贡保札西成了众所拥戴的领袖人物，昌都境内的南北各路游击队一致拥护安珠为他们的指挥，更希望能够联合起来，攻打札木，以消灭敌人在昌都以南的军事重镇。但没有料到的是，玛雄负伤后痊愈的安珠率领四水六岭军以较多兵力攻打札木，却反而吃了败仗。

札木位在青藏公路上，为昌都与拉萨间由中共新开辟的城市，公路东南通缅甸，西南通印度，为对付缅北与印东的秘密枢纽，是中印缅边区的战略要地，形势非常重要。

札木当时修筑了大批房屋，分为政府机关、驻军营房、物资仓库三区，而以军分区司令部所在的砖瓦建材建成的三层大楼为核心，但四周都有地堡网连系。

驻在札木的中国军队仅一百多人，安珠却率领了八百多人进攻，把札木层层包围得水泄不通，中国军队一些新修的房屋差不多全烧完了，就只剩下那个司令部，但解放军却凭著坚固的工事死守。游击队人数虽然多了七倍，但在武器上因无炮无炸药，所以始终不能解决。另外还有一点是因为游击队声势浩大，心理上有点轻敌，才给死守的中国部队得到待援的机会。

那时中国部队从拉萨方面抽调两营兵力，从昌都方面抽调一五四团、一五七团部队，分两路赶来。拉萨方面的援军，因为知道游击队声势浩大，因此一到附近波密区，就化装成藏民，伪称是四水六岭的援军，最后竟然让他们混进游击队中，当时这些中国军队从穿著藏式长袍中掏出冲锋枪，打了个措手不及，让四水六岭损失非常惨重。

四水六岭在受到猝不及防的两面攻击后，立刻分成南北两路撤退，北路由安珠率领的则退到边坝、拉日一带，略加整顿，很快就恢复战力。不久，在帮助当地藏人组建了强有力的地方游击队以后，安珠贡保札西便率领主力取道贡波江达返回山南，在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不久即与在山南的部队会合。 在玛雄冲散的右翼总指挥然楚阿旺与主力失去联络后，便潜回了色拉寺，又连络了从噶瓦、理塘等地逃来的藏人以及部分四水六岭军的散兵约六十多人，准备回山南时，发现共军由一五五团第三营营长杜效模率两连兵力护送二十七辆军车前往泽塘，他们便在地势险要的贡嘎宗喇嘛庙附近埋伏起来。

左边就是滚滚独流的雅鲁藏布江，右边则是居高临下的喇嘛庙，增援泽塘的中共军队并不知道前面有埋伏，他们分坐廿七辆车（西藏平叛纪实记载为廿七辆，但其他藏人说的都比这更多）到达时，完全陷入埋伏，五十多支步枪火力齐发，一下子打坏汽车六辆，其中有一辆车被打急了，司机著慌开进雅鲁藏布江淹没了，一辆车则折回逃走了。

藏人认为这场战役打得非常成功，是继聂木宗战役后的最大胜利。共夺获了重机枪两门、轻机枪五梃、冲锋枪七支、步枪廿四枝、手枪两枝、子弹两千多发，然楚阿旺也一战成名。

就在然楚阿旺伏击中国军队时，四水六岭留守山南的部队接到然楚阿旺的命令前去增援，中途在札囊地方正好与由泽塘赶来增援的两支共军相遇，中共军队再次遭到重创，两个连的兵力伤亡过半，汽车被烧毁，共军一五五团副团长殷春和也在战场上被击毙。在此之前，留守山南的四水六岭军曾先后三次围攻在山南地区唯一的中共据点泽塘兵营，但由于四水六岭缺乏炮火器具，加上没有训练，虽造成一定人员耗损，但也未能攻破。

此时，西藏首府拉萨的局势也日趋紧张，中国的强暴和藏人的疑虑终于导致拉萨之战的爆发，由人民组成的反抗军和西藏政府军联合在拉萨市区摆开阵势，虽然藏人决一死战，但

在中国以继对优势的炮火摧毁下，几等于乌合之众的藏人在两天内即告瓦解，大部分藏人开始四散奔逃。

拉萨会战后，四水六岭护教军和西藏政府军从此会师，结集山南。另外中国西藏军区，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前线政治委员会周仁山，率领了两师援军、五百公安部队、及十八军的一部分，分成三路，向山南进行决战。　　当时四水六岭约有三千多人，加上从拉萨战役中败退下来的六、七百名藏军和几万名士气低落、灰心丧志的僧俗人民，成为藏军方面的基本力量。

汉人洛桑札西认为，各路的反抗军会师年县的觉拉寺，当时人才济济，有著身经百战的游击领袖，也有受过英国军事教育的藏军代本，无奈彼此间意见却极为分歧。四水六岭护教军方面的意见是主张进攻泽塘、乃东，在中共山南分工委会所在地，给敌人来一次严重打击，若形势不利，再退出国境。

另外以藏军为主的政府军则主张保存实力，他们认为西藏反抗军，已经胜利地完成掩护达赖喇嘛，率领僧俗高级官员，平安脱离中国的天罗地网，在政治上已给中国无法弥补的损失。又认为西藏人民的反共，是全球民主与极权斗争中的一环，今天不能逞一时之勇，投敌人所好，打无前途的决战，所以不如整军退出国境，意义较为深长。安珠看到大家意见不一致，对坚持攻打主张，亦有些动摇。

但是，四水六岭当天晚上就接到错那县来的报告，说到由江孜方面来了一营敌人，已经用奇袭手段，占领了唯一退路的要道，封锁了通达印度的山口。因此各部队及随军、三大寺喇嘛研究结果，认为后防发生问题，只有马上撤退的一条路。而此时正面的解放军，还在吸引各地游击队出战，四水六岭军于是决定撤退，并尽量避免走宽敞大道，以使敌人布置的陷阱落空。

虽然四水六岭已经决定不战而退，但一路上还是不断与中国部队发生大小战斗，当藏军退到错那山以北、隆孜县以南地区，四水六岭军与张国华指挥的三路敌人，形成决战态势。张国华大军浩浩荡荡的从三面包围上来，心想大雪山横亘在前，四水六岭军前无进路，后有追兵，只有与之决战一途。

当时张国华的进军口号是：

“一、歼灭山南敌人，根绝美、蒋、印度破坏西藏的代理人；

二、不允许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长期干涉西藏的彻底解放；

三、歼灭康巴反动派，以雪达赖逃出拉萨的耻辱（由此亦可得知达赖喇嘛不是中共故意放的）；

四、打好山南歼灭战，结束西藏战争；

五、发扬昌都战役的光荣历史；

六、新军要创造新的胜利。

但四水六岭军竟全军跋涉雪山成功，只损失了一部分骡马而已，在他们已经退达到山顶时，赶到雪山下的敌人，立刻用排炮向山头鸣发，但因为积雪万丈，炮弹一点也发挥不了作用。四水六岭军亦用机关枪回敬。

四水六岭军得意的在山顶上高声喊著：“张国华，赶快回去好了，你的布告上说达赖喇嘛是神，真是走得神不知鬼不觉，你们整天派的飞机，都没有侦察出来。但我们四水六岭可都是人，你这次又扑了一场空，世界上那有第二个阿沛阿旺晋美，再来一次束手让你报战功？”

中国军队一波波涌来，但因为给大雪山挡住，也无可奈何。

整体而言，在西藏人抗暴中，四水六岭军曾在不少战役中获得胜利，并占领山南地区，确实给中国部队带来极大的威胁。前西藏噶伦尼夏乌谈到四水六岭时曾说：“中国人对四水六岭的建立好像不甚害怕，在竹古塘空投武器等事中国人也非常清楚。有一次中国人对噶厦说：“美国在竹古塘空投多少武器我们都欢迎，以前国民党的武器全部都是美国供应的，我们除

了石头和木棒外什么也没有，后来美国支援的武器对我们帮助不小，因此我们非常欢迎美国人空投武器。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时，我们噶厦去中国人的地方，中国人中有一个高个子军官对我们说："你们噶厦期待四水六岭是错误的，他们顶多不过几千人，再增加也不过几万人而已，我们共产党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一回事。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被我们消灭了，你们噶厦将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是错误的，我们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他话虽如此说，但同时中国人却非常警惕人民会不会站在他们那一边，所以在拉萨中国人的住处全部在围墙上拉上铁丝网，也挖了战壕、修了碉堡、杏眼等，到了一九五八年时，双方关系已经极为恶劣，中国人不信任藏人，时刻做好战斗准备；藏人见了中国人就辱骂，甚至斗殴、捅刀子等，骚乱会发生不过是时间因素而已。"

四水六岭军虽然成功护送达赖喇嘛到了印度，但在达赖喇嘛流亡后，四水六岭几乎是不战就退入印度，也让四水六岭英勇的历史留下遗憾与争议。对此然楚阿旺认为，虽然四水六岭也很快就退到印度，但若没有四水六岭，达赖喇嘛根本就到不了印度，现在西藏问题就根本谈不起来，现在想要恢复寺院、恢复宗教、恢复文化都可能只是梦想，这是四水六岭最大的贡献。然楚阿旺说，当时在印度境内噶伦堡那儿有一些藏人，而中国和印度关系非常好，印度政府已准备遣返那些藏人，并把他们准许定居印度的证件都没收了起来，正在谈什么时候送他们回去，就在这时达赖喇嘛到达印度的消息传来了，没过几天又把证件还给他们了。

四水六岭成员相信，如果达赖喇嘛没有到印度，印度政府会和中国政府合作，把西藏人全赶回去，西藏人就会被全部集中在西藏，怎么被欺负外界都不会知道。现在世人会关注西藏人，是因为在外面的西藏人监视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并告诉全世界，使全世界关注西藏，重视西藏，否则这个世界不可能有西藏问题。

汉人洛桑札西则说，与中国军队相较，西藏各地的抗暴队伍，凭著政教合一传统，拿著几乎是与戈矛差不多的武器，前仆后继，与中国军队打了六年多的仗。而其中的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更从一支七百多人的队伍，发展成一万人以上的半正规军，在西藏战斗两年，共有一千多人牺牲，最后四水六岭各部九千多人，能对抗三倍以上敌人的分进合击，且掩护僧俗，安全退出战场，整军打出国境，英勇事迹，传遍中外。

洛桑札西说，四水六岭护教军经常牵制中国部队张国华十八军兵力的三分之一，同时又吸引了其它三分之一，使其仅剩下三分之一对付藏军。鏖战两年虽牺牲了一千多人，但消灭了中共驻藏党政工作人员五百多人，军队官兵六百多人，击伤和击坏运输汽车一百多辆，并夺获不少物资。

同时，四水六岭使中国地方干部，只能在少数点线上孤守，他们把中国从县政府到村为止的行政系统，完全予以摧毁，而由护教军取而代之。藏人从共军手里缴获的内部文件中，看到这样的记载：

"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策划、支持下，流窜到西藏地区的以安珠贡保札西、夏格、朗吉多杰、甲马、桑培等为首的康区叛乱头子，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在拉萨组成了四水六岭反动组织。所谓四水六岭是泛指西藏及川、滇、甘、青等省藏族居住的地区。该组织一成立，即以向达赖喇嘛献金宝座为名，展开大规模的捐献活动。在召开捐献活动的筹备会议时，西藏噶厦的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夏苏、居美多吉，都出席了他们的会议。

七月四日，四水六岭向达赖喇嘛正式献金宝座的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噶厦以达赖喇嘛名义向参加仪式的藏、川、滇、甘、青五百多名四水六岭组织成员回送了礼品，他们向达赖喇嘛呈送了一份报告，要求达赖喇嘛领导四水六岭地区。

接著，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支持下，他们成立武装并不断扩大其力量，炮制了"保卫宗教、西藏独立、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等反革命纲领和口号。

又经过一段串联、酝酿活动后，在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由邻省窜入拉萨的近五千多

名叛乱武装的头目和藏军以及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的代表秘密聚会，结成同盟，将所有武装力量统一于“四水六岭”组织之内，并正式签订了同盟书，各自承担了将来叛乱时所担负的任务。六月十五日，安珠贡保札西等带领两名藏籍美特和部分叛乱武装离开拉萨到山南地区的竹古塘，建立叛乱根据地。廿四日召开有廿七股叛乱武装的大小首领参加的会议，宣布成立“四水六岭卫教志愿军”。由安珠贡保札西担任总司令，夏格、朗吉多杰、甲马、桑培等任副司令。

“护教军”一成立，就得到外国势力空投、陆运武器弹药等物资的援助，噶厦中多数官员更是明里暗里全力给予支持。早在三月他们就给各宗（县）、溪（相当于宗的庄园）寺庙下令，要大力支持“四水六岭”组织，为叛乱份子筹备粮秣。噶厦在山南地区打开拉康、多宗等地的粮食，向叛乱份子发放粮食，打开军械库为叛乱份子提供武器弹药。叛乱武装有恃无恐，气焰嚣张。

在这种形势下，西藏实行适当收缩后，只是保点、保线、自卫。七月廿一日就在拉萨以东仅八十余公里的争莫寺伏击了人民解放军的一辆运输汽车，打响了在西藏噶厦管辖区武装叛乱的第一枪。接著又在麻江、尼母、羊巴井、贡噶、札朗等地伏击解放军过往车辆，使副团长殷春和、营长杜效模、分工委副部长沈凤楼等军政人员一零九人被杀害，三十二人致残，十余台汽车被焚毁和破坏，并且夺走大量武器弹药。

到一九五九年初，武装叛乱活动加剧升级、愈演愈烈。叛乱份子不仅洗劫道班、袭击兵站，伏击车辆、炸毁桥梁、截断公路，而且围攻人民解放军和党政机关驻地，并妄图一举加以消灭，占领各地。泽塘中央山南分工委、札木中心县委、丁青中心县委和驻各该地的解放军先后被叛乱份子围攻，山南分工委被围攻两次共七十七天，丁青县委被围攻达九十天，被叛乱武装打死打伤我军政人员共计两千多人。”

在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四水六岭护教军”也跟著退出孺西藏。

西藏正式沦陷。

第八章 从拉萨事变到拉萨战役

虽然“雪域护教志愿军”与“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拉开了藏人抗暴的战线，但却挽回不了败亡的颓势，就连居首邑地位的拉萨也产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之兆。果然，从“拉萨事件”到“拉萨战役”发生仅仅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里，西藏问题在中国军事强权之下溃堤而出，这是当今回溯西藏问题时，最关键的一刻。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拉萨群众愤怒的吼声惊动了远在北京的中国，藏人积压己久的不满情绪，在中国入藏八年多之后，终于藉著中国西藏军区邀请达赖喇嘛看戏的偶发事件引爆。藏人心恐达赖喇嘛将被挟持绑票而不断集结，数以万人计的群众誓言保护他们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仓促逃亡，中国下令武力镇压，西藏人的命运从此转折。

这一天，西藏人永远难忘。

即使过了在四十年，负责保护达赖喇嘛安全的达拉朋措札西，回忆起当时那一幕时，仍免不了惊心动魄。

达拉说，三月十日上午凌晨三、四时，老百姓在聚集在罗布林卡门口，很远都听得到叫声，有关人士打电话到他家传达这个紧急的情况。他到楼上一看，大概约有一、二千人聚集在那里，后来还不断增加，估计已有一万多人（达赖喇嘛的自传提到人数不可计数，有人说有三万人）。

藏人高呼口号，要求达赖喇嘛不要去中国西藏军区看戏、一旦去看戏可能就回不来了：“你们这些负责达赖喇嘛安全的，为什么不负起责任呢？”群众都高声吼叫著。

老百姓又抗议说，平时开会可以带武器，为什么这次不能带？为什么要限制保镳人员？

这当中一定有问题，西藏军区必然有企图。

另外一个原因让老百姓不断聚集的是，当时虽然噶厦已经下令十日当天不必派军队去西藏军区，达赖喇嘛将在没有随从的情形下进入中国军营。但在西藏自治区工作的藏籍干部已一再传言：“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持到北京。”这个消息也很快散布到民间。

藏民大量集中后，又高呼：“今天达赖喇嘛去军区绝对不行”、“不要去”、“噶厦要平息人民的纷乱”等口号，帕拉秘书长说，当时并没有任何西藏官员发起任何密谋或计画（中国曾经怀疑西藏政府介入策画暴动），但当时包括妇女在内都举行了示威游行。

罗布林卡的大门被迫关闭，所有噶伦在宫内不停密商。

前一天噶伦就已经不断反映，希望达赖喇嘛不要去看戏，但达赖喇嘛认为不必多疑，仍准备前往中国军区。一些公务员得知这个消息就到拉萨说：“明天达赖喇嘛要到军区，中国人说不能带警卫，特别是演出是在中国人的军营中进行，这绝对不是好兆头。”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十日一早当尼乌夏和代理噶伦辛格一起乘车前往罗布林卡时，见许多人也正在前往，他们以为是要去拜见达赖喇嘛的民众，但在恰果桥时，尼乌夏的随从跑来说：“罗布林卡集中了许多人，正门已经被关闭。”在那附近，又遇到几个孜仲（秘书）说：“两位如果不下车，恐怕藏人会因为不明究底而起哄。”两人于是步行前往。那时藏人正在高喊：“达赖喇嘛请不要去中国人的军营”等抗议口号。

由于群众集中在门口，噶伦康索便以大喇叭广播说：“你们不必担心，达赖喇嘛今天不去军区了，已推辞前往，我们噶厦会去向中国人说明，因此你们不必集中在这里，可以回家了”。

现场的藏人便回答说：“既然如此，汽车出来时请空著车出来。”噶伦开车出来时，藏人怀疑他们会将达赖喇嘛带走而进行秘密搜查，现场也看到一些腰上别著长刀的妇女。藏人告诉噶伦说：“你们见了中国人不要缩头缩脑的，也不要被大洋迷惑了”等等说了许多。

门外的状况愈演愈烈，不少西藏妇女聚在一起举行示威游行，这些妇女不断责骂西藏官员是废物，说西藏全部都叫你们换成了大洋，现在是不是也准备拿达赖喇嘛去换中国人的大洋等。

目前在台湾定居的藏人丹巴说，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他人就在拉萨现场，那时他才廿几岁。由于藏人很担心达赖喇嘛去看戏可能会被软禁，知道达赖喇嘛人在夏宫便不让他出来。

后来藏人说罗布林卡周围都要由藏人来保护，否则这些西藏官员会偷偷把达赖喇嘛带到西藏军区。这些负责包围的藏人不让噶伦外出，来来去去的人都要由这些戴有识别证的西藏人验明身分。除非有噶厦的命令，老百姓才让他们进去，但只准进不准出，罗布林卡不让任何人出来，因为担心出来的人会把消息泄露给中国。

在罗布林卡的内墙是僧俗官员和警卫团官兵，外墙四周是第二、三、六代本的官兵，但藏人自告奋勇者甚多。

藏人不满的情绪逐渐升高，当时有一个噶伦叫桑洎次旺仁增，老百姓把他误认为阿沛阿旺晋美，便向他丢石头，因为桑洎与阿沛都是西藏军区的副司令员，桑洎因此负了伤。

发生此事后，罗布林卡的官员请老百姓不要再闹了，因为他并不是阿沛，桑洎被送到罗布林卡旁的德古林卡疗伤，这是印度领事馆所在地，里面有医护人员。

此外，平时在罗布林卡有一个习俗叫“丛呷”，就是指所有僧官每天早上一起茶叙、吃早餐，参加的人只有僧官、没有俗官。其中有一个僧官叫帕波拉堪琼，他在丛呷结束后回到拉萨，平时因为僧官是穿袈裟，但他再回到罗布林卡时却是穿藏服，又带著口罩，老百姓以为他是中国的间谍，所以丢石头，他当场被打死，这件暴动事件又使得当时的情况无法平静下来。

所有噶伦因此又拜见达赖喇嘛，请达赖不要去，那是三月十日中午的时候。后来达赖喇嘛接受了大家的建议，但达赖喇嘛要噶伦去西藏军区解释，说明为什么今天不去的原因。

于是三名噶伦一起乘车到了中国军营，看到许多拿著花朵的小孩在排著队，他们三人于

是在接待室等著。一会儿中国军官谭冠三来了，当时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两人都在北京，不在西藏，所以谭冠三便扮演这个角色。他们二人喊谭“三号”，就是第三号人物。

谭冠三和阿沛阿旺晋美坐一边，他们三人坐另一边。坐定后，索康向他们解释达赖喇嘛本已决定前来，但罗布林卡各门已被人民包围，因此无法前来，对此达赖喇嘛深表遗憾，希望以后有机会等等做了说明。

谭冠三是个矮个子，他听完后愤怒地说：“怪不得达赖喇嘛，主要是你们噶厦，什么时候都不能把事情做好，今天而言，是故意将已准备就绪的演出给破坏，什么时候你们都是这样声嘶力竭地在喊。”

谭冠三又说：“在此之前，扎什军营的藏军和中国军发生斗殴，双方都死了几个人，其后又有几个汉藏军人互相残杀，今天又在罗布林卡外将昌都堪琼由人民以乱石击毙，你是负责治安的，要在三天之内交出杀害堪琼的凶手，否则我们虽不会暗杀你们，但要在人民中宣传并予惩处”。

尼乌夏回答：“是这样，如果昌都堪琼是一两个人打死的，可以调查、缉拿，但这次是人民乱石打死的，要找一个明确的凶手是不可能的……。”当时康索在旁边插嘴说：“不要再说了，算了”。

几个中国军官纷纷站起来发言指责，说西藏官员被康巴人迷住了是错误的，最后谭冠三说：“不怪达赖喇嘛，以后还要见面，达赖喇嘛的安全要由你们噶厦负责”等。

他们三人回来后，又向达赖喇嘛报告此事，转达谭冠三说此次达赖喇嘛不能来，以后进一步再谈。

达赖喇嘛随后也要求老百姓赶快回去，并说明他已不会去西藏军区，但老百姓还是不听。那天打死堪琼后，人民拖著他的尸体到拉萨八廓街游行，高呼：“中国人滚回去”、“西藏是我们西藏人的”、“驱逐中国人”、“我们不承认十七条协议”等。

一个名为“西藏独立运动”的组织，也在墙上及中国人住的房子门口张贴这些标语。很多藏人并要求中国军队先撤退，再来谈西藏与中国的关系，不管是文官还是军队，首先要全部撤退。

达拉解释指出，“西藏独立”组织的其中一些人秘密编写了宪法等许多文件，并且发起运动、散发传单，那个宪法在拉萨事件中被藏起来了。这个组织与他有联系，也曾向军营进行联系。但当时的秘密组织大约就是这些，另外一个则是“人民会议”组织，其他就没有了。这些组织并没有广招成员，都是找可靠的人再串联起来，这样如果让中国人抓到也是一个人，就不会牵连到其他人。而其中“西藏独立”运动组织的首领是罗桑益西，在当时曾向印度、尼泊尔的代表提交文件。

另外还有一些妇女聚集进行运动组织，后来并将三月十二日做为妇女会的创建日，在西藏女英雄更松拉、噶林夏由拉、白贡丹卓玛、达乌仓卓嘎、德莫其美、从康灭灭、噶嘎夏嘎桑、日色央金、从康仓拉等人的领导下，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集合，共组织了几千名西藏妇女。

他们开会后提出的决议有：“中国人返回中国去，西藏的主人是藏人，藏人可以管理自己，中国人没有统治西藏的权利，如果中国不停止，我们将决心继续进行战斗”等。这些文件后来寄给中国政府，而且在游行中给了印度在拉萨的办事处、尼泊尔的办事处、不丹的领事馆、以及喀什米尔人的代表，要求他们进行支援。

当时谭冠三从西藏军区写了一封信给达赖喇嘛，信中提到：一、达赖喇嘛如果想外出的话，是不可能的事；二、可不可以把达赖喇嘛住在罗布林卡的那一个寝室，以秘密方式告诉西藏军区；三、有没有办法可以用信得过的噶伦以秘密方式带达赖喇嘛到西藏军区。

谭冠三的意思是说，他非常关心达赖喇嘛的安全，因此邀请达赖喇嘛到他的军营去避难。

因为有这封信，大家觉得情况不妙，西藏政府怀疑有大炮对准罗布林卡，大家商讨后就有两个想法，希望达赖不要住在罗布林卡，搬到布达拉宫去，或是离开拉萨到别的地方。当时噶厦把这个想法转达给达赖喇嘛时，达赖认为他住在罗布林卡和住在布达拉宫是一样的，且西藏人民有任何困难他必须留在这里，不能离开，不能不管西藏人民，达赖还一再强调不会有事。

当时谭冠三和达赖喇嘛共有三次相互书信往返，其中谭冠三还向达赖喇嘛与噶伦抗议西藏人不应在拉萨北部通往中国的路上设立障碍物，并且要求立刻搬走。但是，架设这些障碍物的群众领导人却拒绝这项要求，因为设置障碍物的目的正在于把中国援兵堵在城外，以保护罗布林卡。如果中国人要把这些搬走，正足以证明他们是想要进攻以逮捕达赖喇嘛。

由于达赖喇嘛在信中以“反动派”称呼聚众的藏人，口气也表现出礼貌与难堪，因此这些信件后来都被中国出版并做了宣传。达赖喇嘛对此非常震惊，他表示，即使他知道将来这些书信会被引用来批评他，但在当时最紧迫的时刻，他有责任去阻止这场冲突发生，因此才会写那些信。但是达赖喇嘛说，后来他会离开拉萨，完全是出自他自己的心愿，并非为周围的人所诱拐，因为当时拉萨的每一个西藏人都知道中国正准备炮轰罗布林卡，如果他还留在那里，他的生命一定处于危险之中。

达赖喇嘛还说，在中国人出版那些信件时，却没有说明还有一封阿沛阿旺晋美写给达赖喇嘛的信。阿沛为当时噶伦之一，他主张与中国谈和，被藏人讥为“藏奸”，因此在拉萨事件发生后便一直留在中国西藏军区内。阿沛在信中除了建议达赖喇嘛努力摧毁反动份子的阴谋外，并说明中国已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以阻止达赖喇嘛出逃。

阿沛还在信中说：“如果您佛爷带几个可信任的卫队官队员，留在内墙里面，固守一点，并告知谭冠三将军你房屋的准确位置，他们肯定会留意，使这栋房子不要被摧毁。

因为这些字句所暗中透露的讯息，让达赖喇嘛相信：“阿沛已经知道中国人企图摧毁宫殿和人群，同时不愿伤害到达赖喇嘛。”

当时宫殿外已经十分紧张，在内墙外尽是聚集的广大群众。多数人手上拿著棍棒、铁锹、刀子等武器，另外还有些战士甚至拿著步枪、机枪、以及十四、五门迫击炮。三月十六日，中国准备摧毁宫殿的消息在群众间传了开来，藏民不断发现，有各种迹象显示中国军区正在为安排重炮轰击宫殿而做测量。另外又有人不断传言，说是中国空军又空运来新的部队，惊慌的藏人集体情绪十分高涨。

十六日下午四时，揣测成为事实。西藏人听到从中国军营发射出来的两枚迫击炮弹巨大的声音，当炮弹落在北门外的沼泽时，发出的巨大声响让藏人的惊慌和愤怒达到最高点。

第二天，达赖喇嘛在神谕的指示下出亡，他说他并不怕死，但那一刻，他深觉到留下来并不能为自己的人民做些什么，现在最好是到别的地方去，为西藏人民保持一个不灭的希望。

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后的四十八小时，已是一触即发的拉萨终于爆发了流血冲突。在这次“拉萨事件”中，藏人对中国军队做出最猛烈的反抗，但最后却在中共“平叛”的强大武力下遭到平复。

藏人俊嘉在当时也曾经参加守卫的工作，俊嘉原来是嘎登寺的喇嘛，在中共准备诱捕达赖喇嘛时，他在罗布林卡担任守卫，但俊嘉说：“当时四周都是百姓，政府还发了三、四车的武器给人民。发下来的四十余梃机关枪中，很多枪都用不成，在战斗真正开始时，竟只有四梃机枪可以射出子弹。

而且，战斗在半夜打响，整个夜晚都是轰炸声，但都是中国军队在向藏人狂轰滥炸，藏人虽然手上拿著枪，但除了挨炸，都找不到还击的目标，中国部队都是躲得远远地轰击，极为密集的炮弹劈头盖脸炸过来时，就只见中国军队的炮弹不断在四周炸开，藏人不停地倒下却无力还击，到处都是死尸。

罗布林卡与布达拉宫都受到敌军猛烈的轰炸，原来守罗布林卡东、南门的百姓想要越过

拉萨河逃亡，结果被中国军队成群杀死在河中或河边，尸堆如山。而平时在罗布林卡开会的房间内堆满了伤兵，我在逃出时看到一名医生在那里忙碌得很，但有什么用，屋内根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全是伤兵。　　眼见里里外外，到处是死尸和哀号呼喊的伤员，幸亏自己的护身符好，我一直在如雨点般的炮弹中待到天亮，由于留下来是死，逃也是死，但逃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于是便拿了长短四枝枪和四百发子弹逃亡。”

十三岁就去当兵的才仁多杰提到当时拉萨打仗时的情形。那时他廿九岁，担任机枪手，但机枪根本没有地方射，只见中国的大炮炮弹像雨点般落下来，但因为双方军事力量过于悬殊，西藏人死伤惨重。回忆当时，才仁多杰说话时看著远方，难过地说：“我们守在布达拉宫的顶上，有一些大炮架在那里，只能向大概的方向轰击，也不知道中国人在什么地方，到处都有炮弹，顶了一阵子实在顶不住，大家就开始逃，我扛著机枪也跑了，反正在拉萨的经过令人伤悲，简直是束手无策。

看不到人，打不了仗，炮弹又不断落下来，中国军队一直没进城，光用大炮轰，西藏人受不了就逃了，大炮轰过来的浓烟把布达拉宫都遮住了。

我想，完了，布达拉宫可能已经被轰瘫了，慢慢烟散了，布达拉宫又出现了。又一阵轰，又看不见了，本来很想坚持一阵子，但一下子又坚持不住了，实在无法坚持。中国人的炮弹好像没有限制，他们又不需要节约，所以只好逃走。”

已经来台湾弘法多年的昂念仁波切当时正是色拉寺一名年轻的喇嘛，他提到中国军队先是从远方发射炮弹，爆炸后土石喷洒，周遭有许多人丧命，剩下的人全在炮弹的威胁下被迫集中逃向罗布林卡。昂念仁波切说：“这时对面的山上陆续传来隆隆的枪炮声，面对这种情势，原先所怀的雄心壮志和勇气都已经消失了，又听说达赖喇嘛已经逃出西藏，于是我和同伴商量逃走。原本想沿著雅鲁藏布江逃走的，但江边已死了很多人，我们大部分的僧人都不会游泳，只好待在林中休息，等到晚上时再回罗布林卡。夏宫里人已剩不多，进到大殿后才发现已有些僧人聚集该处，大家体悟到生命的威胁已然逼近，有人认为这是业力，逃也没用，因此决定在大殿持诵“玛尼”而不走；有人则主张投降。我跟随大部分人离开大殿，然而外面的炮击并未暂歇，仅剩下的七、八位同伴，在吃下护法米后，大家开始分头逃亡。

我决定沿著夏宫的外墙逃走，炮弹在我身后爆炸，有人因正处在炮弹击落的地点而丧生，有的人因为肢体被炸伤，逃亡一小段路程之后，已无体力再逃。由于身旁的炮弹四处散击，当时只能拼命地向前跑，根本无法把握下一移是否能够安然存活。我一路逃到夏宫外战火稍歇的林中时，只见一位同学抵达，等待许久后并未再见到其他同伴前来，内心悲怆之余，只好逃回色拉寺。

所幸色拉寺里只有几处被炮弹击中，战火尚未漫延过来，寺外有几位寺僧持枪在巡逻防守。我当时提议大家立刻追随达赖喇嘛逃亡，由于天色已晚，大家决定天明后再走，于是我回到僧房中，才刚坐下喝了一杯奶茶，便听到阵阵炮轰声响起，原来中国部队已将炮火集中转向色拉寺攻击。我立刻跑到寺外，紧急得连茶碗都来不及带走，就仅有身上的僧服，便孓然一身和全寺的僧人仓皇逃离。”

从“拉萨事变”到“拉萨战役”，中国解放军在西藏平叛工作从此宣告底定，而藏人的另一场苦难却从此开始。然而，这个重要日子在历经四十年的岁月后，却仍有许多疑点，到现在依然是各说各话。

所有的事件发展都是从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戏起，但中共的资料说，这是达赖喇嘛主动提出来的要求，因此，中国方面因此认定，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在拉萨发生的全面武装叛乱，就是精心策画出来。

中国无论是在“西藏平叛记实”、或是“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中，都指出当年藏历二月七日（西历三月十六日），是达赖喇嘛主动向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安排一下。”

邓少东当即表示欢迎。

但达赖喇嘛却在他"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自传中，提到这是中共的一项"邀请"，他完全没有拒绝的余地。达赖喇嘛说："在我通过最终的格西考试（约为三月一日）的所有仪式和筹备期间，我得知有两名中国官员要见我，他们被领了进来，是两位宣称由谭冠三将军派来的次级官员。他们告诉我，将军要我去参观他决定在中国军营上演的戏剧。我已听说这项计画，并答应去，但我当时确实无法集中在这件事上，因此，我告诉两名官员，等十天仪式结束，我即安排日期。"

另外，拉萨战役第一炮究竟由何方先发，到现在也是个争议性的话题。针对拉萨战争的第一发炮弹，其实是西藏政府方面射出的说法，达拉表示完全是中国人在造谣，事实上是中国部队先向藏人攻击，藏人才反击的。

但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却没有说明是谁先开炮，只说到，炮击是在三月廿日凌晨两点开始，也就是在他离开四十八小时，当时解放军还未察觉达赖喇嘛的出走。达赖喇嘛说："他们整天轰炸罗布林卡，然后把大炮转向拉萨，罗布林卡内外便可见到几千具尸体。罗布林卡内的一些主建筑物实际上被摧毁，所有的其他建筑物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毁坏，只有马哈迦拉经堂才奇迹般地幸免于难。"

而且，根据达赖喇嘛的自传提到，拉萨城里的房屋遭到毁灭或者纵火，主寺的金顶都穿了洞，旁边的许多经堂夷为废墟。布达拉宫西侧受到严重的毁坏，达赖喇嘛曾经使用过的部分房间被毁坏，被摧毁的还有政府学校、正门、军队指挥部以及月收索尔村的房屋。

同时，一块炮弹甚至落到安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黄金陵灵塔的房子里，西藏医学院几乎完全倒塌，色拉大寺也被同样彻底的摧毁。

中国国务院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中则说，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后，叛乱份子调集约七千人，于三月廿日凌晨向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于当日上午十时奉命进行反击。

台湾"蒙藏委员会"的专题研究"西藏历次反共抗暴事件发展经过及未来展望"中，也指出是拉萨军先发动攻击，中共继而命令驻藏部队血腥镇压："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第三天，即三月十九日夜，抗暴军向中共驻拉萨部队和机关，发动了全面武装进攻。三月廿日，中共中央命令中共驻西藏部队施行血腥镇压，拉萨市区从上午十时起发生激烈战争，战斗达到最高潮，抗暴武装多次向中共"西藏军区司令部"施行猛烈攻击，印度驻拉萨领事馆曾中流弹。"：

"三月廿一日，巷战继续进行，双方发生肉搏战，伤亡惨重。西藏两个大寺色拉寺与哲蚌寺喇嘛及拉萨市民与中共军对抗。据称，西藏地方政府发给色拉寺两百五十枝枪，十多箱子弹。色拉寺喇嘛都脱了袈裟，换上俗装，参加战斗。"、"抗暴队伍继续攻击中共西藏军区司令部，中共出动飞机助战"、"三月廿三日，达赖喇嘛的夏宫被炸弹夷为废墟，哲蚌及色拉两寺被炸起火"、"中共在拉萨市实行戒严"、"三月廿七日，中共清理战场，焚化遗骸。"

"三月廿八日，中共发布命令，取消"西藏地方政府名义"，改组所谓"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新华社并发布"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据称："截至廿三日止，已俘获叛军四千余名，缴获了各种枪八千余枝，轻重机枪八十一梃，八一迫击炮廿七门，山炮六门，子弹上万发。许多叛军为我包围并投降。"

此外，在死亡人数方面，三方面提出的数字均不相同；中共方面只字未提伤亡数字；达赖喇嘛的回忆则说，"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拉萨人丧生，但在罗布林卡内外便可看到几（千）具尸体。"

反倒是"蒙藏委员会"提出的资料，死亡的人数最多："估计约有两万名藏胞被屠杀。"

拉萨战役第一枪为谁所发已无法查证，死伤人数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数字出现，但无疑的是，西藏人却在拉萨战役中经历了战争残酷的一面，卓玛尼玛回忆拉萨战役当时的情况说："一整天罗布林卡都在打，我们并没有打，当时炮轰得很厉害，男人在打仗，女人走动四处

乱跑，都想找个较坚固的房子蔽身，就这样来回奔跑中，许多女人和小孩被打死，满街都是尸体，都是小孩和女人的尸体。

后来有人在大昭寺方向喊要投降了，接著中国人的广播也响了，说要藏人投降，当时我的马拴在中国民警单位的窗户下，因此马没有被牵走，我丈夫给我留下的枪，是支好枪，枪上有人狮子徽记，我将枪埋在马粪堆。

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有一个人，三天后，中国人通知他们去开会，开会时要男女分开，我觉得不妙，就让我的男佣人将长袍放下，系成女人装束（藏人男女长袍大致相同，只是男人系的高，女人系的低而已）而幸免。随后听说要挨家挨户搜查男人和武器，这样就无法躲下去了。因此，我对男佣说："反正是个死，落入他们手中还不如试试能否逃走。"

晚上，我们悄悄给马上鞍，中国人端著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不停地来回走动，他们从窗口往外吐的痰都吐到我们身上，令我们一阵心惊胆颤，以为被发现了。我们悄悄给马备上骡子后，敞开大门，在院内腾上马后，猛抽一鞭，马匹便向前一路冲出了大门，只听到"呸"的叫喊声，随后便是一阵枪声，我们一路往前跑，马匹养得非常膘肥，根本没问题，只听到耳边不断有子弹"嗖嗖"的飞过去，但并未射中。

不过十天左右，中国军队又来了，天上是飞机，地面是蚂蚁般的军队，于是又打起来了，天上地下都在打，手忙脚乱，到处乱跑，跑到山上，遇到阿勇嘉丁然杰，他是安冲阿勇部落的人，在另一个山梁上，有阿勇部落的酋长和和他的三个儿子，中国人开始通过时，阿勇酋长父子和他们的看似约有廿至三十人的部民与中国军队打起来，打的非常激烈。和我们在这山梁的阿勇嘉丁然杰也和中国人打响了，我看到许多中国人倒下，我当时打了几枪，打得不多，只是短暂地参战。由于阿勇酋长父子等打得很顽强，中国人向他们围去，本来冲我们来的中国人也向他们的方面过去，阿勇酋长父子三人与和他在一起的部民全部在这一天战死了。

中国军队依然不断涌来，我从山上，看到无数的妇女自知逃不掉以后，手牵著小孩的手或是背著小孩、抱著小孩跳湖自杀，看到她们成群结队地往湖中跳，真是惨极了。"

除此之外，拉萨战役后，中国对参加运动的西藏妇女进行无限期的监禁和虐待，而且当成很大的罪恶加以无情的打击，许多西藏妇女都因此失去了的生命。

一九五九年的三月十日由此被认为是西藏问题的起源，更是藏人永远纪念的日子。他们将这一天称为"抗暴纪念日"，每年的三月十日，流亡在外的藏人都会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哀悼当时不幸为西藏罹难的人。

第九章 溃败

惨烈的拉萨战役让更多的西藏人兴起逃亡的念头，在中国军队翻动一个个尸体，似乎在寻找某一个特定人士时，已有更多的藏人知道，他们最后的希望－达赖喇嘛，已经逃离拉萨了。

但，这并不表示达赖喇嘛已经安全，整个西藏到处都是中国的军队，唯一的净土仅剩下山南地区，以达赖喇嘛的困境来看，肃清山南后必要时才可以后撤，否则达赖喇嘛将永远走不出来。虽然山南地区有很多四水六岭的军队，但因为达赖喇嘛必须要通过中共在山南唯一的军事据点－泽塘，而且中国士兵都有著较好的枪枝，达赖喇嘛就在他们的射程之内。

四水六岭军得知亦已得知泽塘聚集了一百零五辆车的军车和弹药，计画消灭四水六岭在山南的根据地，要肃清山南，泽塘成为最关键的障碍。

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已派阿塔诺布和噶塞洛才二人为电报员，负责与美国方面进行联系，他们到此已一年多，为了保密，"四水六岭"将他们置于一偏僻的村庄内，另派廿人为护卫。他们和美国联系时提到在泽塘有五千余敌军占据，因此急需美国提供军援。

而四水六岭手中握有美国在一九五八年空投的两门无后座力炮，另外还空投了五百枝"札

西喀仁"（吉祥的长管枪之意，每次可装五发子弹）炸药廿箱、手榴弹一百颗，威力比中国人用的木柄手榴用还要强。为了攻打泽塘，四水六岭战士共带了五箱炸药、和五十颗手榴弹前往。

中国军队也已全部进入地下坑道内，泽塘虽有解放军的营房，但军事阵地全在坑道内，在坑道中备有大量的柴草粮食弹药、煤油等，因此使得泽塘一仗非常难攻。

当时参加围攻泽塘战役的洛桑更秋说："藏人都在地下挖了洞，共挖了一个多月，后来想，中国人从房子内挖了很多坑道，人就躲在坑道内，我们就想冲到房子里面。因此就从树林中砍了很多很长的大树，一棵树要十八个人才扛得起来，然后在树上面钉上木板，做成一个大的梯子，这样人可以从上面冲，于是有一天，我们组成了敢死队，三十六个人扛两个梯子，后面又跟著几个人拿炸药包，还有几个拿枪掩护，悄悄往房子方向走。

中国军队在屋顶修了一个很高的嘹望哨，哨兵在藏人快接近房子时发现了他们，照明弹便一个接著一个的过来，机枪也开始扫射，但因角度不对，他们趴在地下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不过壕沟中出中国士兵却不断去扔手榴弹，手榴弹一直打转、冒烟，半天蹦起来才爆炸，开始他们还捡起手榴弹往回扔，但因为手榴弹实在太多，顶不住了只好往回跑，梯子、炸药包就放在那里。过了一会儿照明弹、机枪没有了，我们又悄悄摸过去，想把炸药包拿回来，因为炸药是很珍贵的，结果到那儿发现已经被中国人拿走了。"

甘孜章果寺的喇嘛嘉洛也说，在泽塘时，双方挖洞，有一间多杰家的房子被敌占据，他们从阿佳拉的房子中向多杰的房子挖洞，敌也往回挖，可以在挖洞时听到敌挖洞人员休息时唉呀的叹息声，同时，大金寺部也从侧面同样向多杰家挖洞，但却挖错、挖歪了。但当时他们以为可以了时，便放置炸药，躲在掩体内等敌人被炸上天空中。一声响，大地都在颤抖。

嘉洛说，当时他从掩体中探头看时，只见空中飞舞著被炸上天空的木头等，以为爆炸成功，心中大喜，即跃出掩体准备冲锋，不料却被同伴阻止说："你看清了，被炸的是我们自己的岗楼。"仔细一看，真是泄气。

然而，围攻泽塘的四水六岭战士，最后终于利用美国支援的有限炸药，炸塌中国军队所挖的地下坑道，不少中国士兵因此遭到活埋，山南的解放军才因此得以肃清。当时领兵作战的然楚阿旺回忆说："敌外围铁丝网，铁丝上挂著空罐头盒，一踫就哗哗乱响。而且敌也在铁丝上挂了手榴弹，一踫就炸，加上不停地向外射击和扔手榴弹，我从山上观察，只见我军敢死队的一些人已冲通铁丝网，接近敌据点，但敌手榴弹、机枪的火网、灰尘、浓烟不久将我军官全部遮住了，整个冈布山一片火光，我暗自想敢死队完了，但后来还看到受伤的敢死队中有人不断捡起敌扔过来的手榴弹回扔，众人皆赞叹战士们的勇敢。

晚上我们悄悄扑向冈布，在铁丝网上挂上绳索，在远处一拉就响，一响敌之手榴弹机枪就扫个不停，消耗弹药而已。泽塘内虽有许多敌军，而敌军营中并无住人，全部转入地下，并在四周挖了壕沟。二十九日夜攻泽塘，也夺得许多武器。在战斗中，敌之炮弹似无耗尽时，不断地在轰击，每夜发射百余发。

从藏历十二月十日开始到三月十三日止，期间拉萨多次谣传泽塘已被攻破，在这三个月中，由于我们没有攻城器具，只好一直挖洞，从东、南、西各挖了一洞，泽塘的地质多沙，我们的洞必须挖深以便从敌壕沟下穿过，我们一边挖一边立柱，不久可以听到敌人也在挖洞，由于敌挖土声愈来愈大，挖土民众和士兵恐敌反施爆破而建议置炸弹。

当时我军从敌人手中夺得三、四十箱炸石方的普通炸药，我们在洞中放了四箱炸药和美国空投的一些炸药，然后堵了两天，并在凌晨点火，还准备了突击队，准备在爆炸成功后冲击。一声闷响，大地在颤抖，炸药爆炸了，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是将敌往回挖的洞炸塌，在里面的敌兵应没有幸免的。

总计在泽塘的三个月间，我方阵亡三十六人，伤一百六十余人，毙敌数不知，我方号称

杀敌甚众，其实敌在洞中，杀之颇不易，后据说在泽塘烈士陵有千余敌兵的坟墓。”

同一时间，拉萨政府方面送来了四、五箱茶叶，并没有弹药，说是运送弹药极困难，在摆渡时若被中国部队发现，拉萨方面将面临困境等，因为藏人士兵嗜茶，将茶叶分与众官兵后，官兵们都很高兴。

而重要的是，和茶叶一道还有一封信，信中提到拉萨方面甚为紧张，希望然楚阿旺能到罗布林卡来一趟，但当时然楚阿旺负责全盘指挥山南，难于脱身，因为泽塘是重地，一旦失利影响太大，于是便派人带了然楚阿旺的信去拉萨，说明山南地区已肃清。

在达赖喇嘛逃亡到泽塘以前，泽塘战争已经打了好几个月，而且，由于四水六岭士兵在山南泽塘地区进行长期围困战，才使得中国部队在江孜、泽塘、与乃东的部队自顾不暇，失去堵截的力量。

当时送信的人还未到拉萨，在半途就碰到达赖喇嘛一行人，达赖喇嘛从“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右翼指挥官然楚阿旺的来信中得知山南已清，已经没有中共军队时非常高兴，立刻叫益西才仁牵马带路，另外有人立即快马回泽塘告诉然楚阿旺达赖喇嘛已到的消息。然楚阿旺立即召集众军官，告诉他们达赖喇嘛将至，要他们不分昼夜，加强警戒，大家将前去迎接等。

在札希的寺院中，然楚阿旺等八名军官见到了达赖喇嘛，他们瞌头、献哈达，并表示内心无比的高兴。达赖喇嘛要他们就坐，说他们的努力已有具体成果，但是拉萨情况却很危急。达赖喇嘛还问泽塘的中国人不会出来吗？然楚阿旺表示不会，达赖喇嘛又问到还有什么要说的？

一时间，四水六岭军官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想到达赖喇嘛也要受如此的劳苦，不禁放声大哭，其他人也一样哭了起来，达赖喇嘛不停地安慰他们不要哭，并让他们与帕拉商量路途事宜。出来后仲聂让大家先吃饭，然后开会，仲聂叫四水六岭的军队留在原地驻守，之前达赖喇嘛已要然楚阿旺和他一起走，另外只让六、七骑做好准备出发，隔日天不亮就起程，当时和达赖在一起的除了家人，还有一些官员。

出发后到琼结南拉时，达赖喇嘛看到然楚阿旺佩戴的美式手榴弹和枪枝，深感兴趣，问他使用的方法，然楚阿旺取出手榴弹，示范使用方法，仲聂（秘书）在旁急得叫快拿开。

当时从拉萨逃出来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共约百余人，包括三大寺堪布，他们每人均领十余僧，四水六岭的众官兵有许多人都拜见了达赖喇嘛，理塘阿塔他们两个人带了发报机，随时把消息传到美国，现在也在雅拉扎堆拜见了达赖喇嘛，一路随行，最后达赖喇嘛一行人顺利通过山南。

达赖喇嘛离开罗布林卡两天后，拉萨就打响了，本来四水六岭部分战士准备前往支援拉萨战斗，但到距离甘登寺不远的甲玛囊时，拉萨已经失守，难民像潮水一样地涌来，只好就地留下掩护人民撤离。

然而，喇嘛和人们像潮水般逃过来，解放军一方面用大炮轰，一方面扫射冲针。他们只好也继续向南走，这期间达赖喇嘛私人寺院南嘉札仓的七个僧人，也从那里逃了过来。这些人脚下全起了泡，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走过路，是很享福的僧人，但现在再累也得逃命，七个人骑著马一起走，僧人因为瞌睡，累得从马上摔了下来，后来还有一匹马从悬崖摔下去死了。

雍珠说，在泽塘时他们当中有一个叫丹巴的懂中文的人，他以铜管做成的喇叭，高喊著要对方投降，对方说，拉萨已被占领，叫他们尽快投降。他们则说我们已占领了北京等，我们在穷开心、吹牛，没想到他们讲的是实话。

洛桑更秋说，这时又有一个人逃了出来，他们看到人就用中国话问：“喂？”对方也“喂！”的喊，但听起来好像是藏人，后来改用藏语问，才知道原来是色拉庄的一个僧人，他说其他五个僧人全部都被打死，只有他一个人逃出来、于是我们便领著他走。

这时可以看见泽塘山了，在山头的高山一直有枪向沟中射击，谁也搞不清哪一边是当兵

的，哪一边是自己人。天快亮时才知道山上是中国人，山下是自己人。过一会儿寺院执法的僧人润珠只披著一件衣服，拿著没有刀鞘的刀气喘喘地跑过来，那时全是死伤累累。

飞机也开始在天空出现，飞机后面有机枪，开始向藏人扫射，扔炸弹，后来炸弹没了便扔石头，把藏人打得一塌糊涂。逃走时有人引好几条路，我选择了最难走的路，飞机仍在上面扫射，一路过去只蹦见一个老太婆，并向她要茶喝，后来又走到雍布拉宫，这是西藏第一个国王建立的王宫，蹦到在附近山脚坐了噶登寺十几个僧人，个个肩上扛著英式步枪，正坐在那边休息。

再过去又看到上千个四水六岭的士兵逃了过来，其中有一个大胡子是寺院执事，拿著木棍赶那些人，口中直说："往回走！"、"往回走！"也就是回去打仗的意思。但大家都说打不住了，到处都是敌人，怎么打？人潮也堵不住了。

才仁多杰表示，他们走到了达宗靠近不丹的地方，蹦到了四水六岭二百多名士兵，虽然这里地势很险峻，但大家信心都来了，觉得可以打一仗，他们也算是藏兵，就归四水六岭的人指挥吧。于是大家便开始分配工作。那时藏军最好的武器是一梃重机枪，旁边有一个倒水的地方要不断加水，可能是俄式或英式的重机枪吧！一扣板机，二百五十发子弹就弹出去了，是最好的枪。另外他们还有好几梃机枪，会用的人很多，他也是机枪手，打的也不错，把中国人打死了许多。

才仁多杰说，这是他第一次和中国人面对面打仗，觉得中国人好像没有"死"的概念，前面一批被打掉后，后面一批马上跟著前面的尸体冲过来，完全不怕死，才几下子他们就冲到了门口，打了三天，最后实在顶不住就退出来了，但枪他们全带走，没有给中国人留下一颗子弹，中国人也因为死伤太多，没跟过来。

阿旺札西则回忆说："我们真是倒霉，如果早先打，可以逃到拉萨，我们是在拉萨战役完全结束后才开始打的，打败了就无路可逃了。因敌已散布在整个西藏，于是只向北边无人区和边坝地方逃，许多人则待在家中束手被捕，就如传单中所说的，彷佛真的无路可逃了。

一九六 0 年我们到边坝，并建立了庞大的兵营，当时边坝集中了来自各地的大量人马，共有约两万余。在边坝，美国空投过来不少人员，也空投了许多武器，但由于我们没有训练，集中在一起也不过乌合之众，当时空投下来的有德格布吉、理塘旺杰、甘孜罗松扎巴等电报员，如果我们知道战略战术，如应该是几百人一股地分散打游击，但我们集中在一起，没有训练、没有组织、没有后勤供应、没有多少武器弹药，甚至虽相聚在一起却没有相互协调、配合，而是大家各自作战，...甚至有的在战、有的在逃......。以这样的水平却与中国有训练、不必节约子弹炮弹、有通讯、有训练、有组织、有军事知识和经验的庞大军队正面交锋，当然是打不赢的。

当时边坝也空投下不少的武器弹药，仅子弹就有几十箱，大约是从藏历一月十三日到十八日止，给了许多好枪，有五发装、八发装、冲针枪等，当时我们也有一个挂名总指挥边坝喇嘛，并分配了各自的防区，但我们什么任务也没有，根据现代军事，那简直不是在打仗。

大约从藏历三、四月开始，敌兵做好准备后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进攻，那真是非同一般，天上有飞机，地面上的各个山口都冒出无数的中国军队，打不胜打、防不胜防，他们互相用电话联系，我们除了目力所及而外对其他的状况一无所知，因为战争刚开始，我军就完全被打散，敌人从各个山口涌来，我军兵力不知该怎么分配，也不知该怎么打。逃吧！逃到那里都会蹦到敌军，于是只好缴枪投降，我们部每两个人有一枝枪，战斗中大部分战死了，部分逃到北方。"

雍珠说，他在琼结受伤住院时，达赖喇嘛已经离开拉萨来到琼结，当时全体伤兵都去拜见，当时有个人叫益西什么的，由于不懂军事常识，站在无后座力炮后面，双眼已经被无后座力炮的火焰熏成瞎子，满脸是麻子，达赖喇嘛对他甚为关心反复进行加持，经达赖喇嘛加持后，第二日那人即可看见一些物品，其他人则给了一些护身符。

雍珠说，在他们家乡，男人走后，中国军队占领他们的村庄，建立人民公社，将全部粮食几乎一粒不剩地收走后集中在邦布寺的大殿中。人们实在饿坏了，只好去偷，被守粮仓的中国军队打死了许多藏人。随后是整个西藏的饥饿，在他们家乡更多的人死于饥饿，很多人绝户了，更多人死在野外的田地上。

而雍珠的妻子则被七、八个人强奸，不分白天晚上，不答应就用鞭子抽打，其他许多女人也遭强奸，由于男人大部分被抓，那些中共的汉、藏官员住在村里肆意践踏那些女人，谁也不敢不答应。

有些人吃狗肉，如加桑兄弟俩有四个儿子，在饥饿中等母狗离开后将小狗抱回家吃掉了。另外，邦布西瓦仓的卓玛才措，为了给儿子留下口粮，而绝食至死，儿子终于活了下来。

德钦人加松说，他们部落也组成了护教志愿军，由雍巴央比丘、热振僧噶等六人为首，各领几十个人在山上抗击中国人，各部队通称为护教军。但到了后期，已经无心应战了，加松说："后来敌军像蚂蚁般涌来，我们射炮后开始逃，逃到某处，见到恰城噶松求增在堵溃兵，不许我们逃，但那时候是打骂由你，反正要逃命，当时我们已无斗志，在被堵后，趁其不注意开始三三两两地逃走。

在指纳山上，只见横尸遍野，到处是僧人和几十个俗人的尸体，鲜血和袈裟看上去一片红，还散著许多其他物品，有一老僧未死，却被中国人挖去了双眼，在地上到处乱爬，身上到处是他自己与从地上沾上的鲜血，像个血人在那里悲惨地来回爬行、喊叫。

我们向洛札方向走，首先看到中国人的粪便，还有几个中国人的背包也扔在那里，再过去时，见雪地中有敌军黑压压地一片，我们绕过去到措纳以东后山，见一牧圈中有百余名噶登寺僧在那里休息烤火，我们也就地休息。突然见一骑白马者叫："快走。"我们乃起身就跑，敌已至跟前，我们一出羊圈就遭到猛烈攻击，但我们先走一步得以逃脱，噶登寺僧没有枪，没有马，又被包围，无力反抗，只好随中国人射杀了。他们大多死在那里，我们逃出很远后还听得到中国人射杀那些僧侣密集的枪声。

我们在雪中患上雪盲，到处都是敌人，我们无法回家乡，于是又回到竹古塘，这时敌汽车已追到了。我们一路向北奔逃，途中即使敌军只有一条狗来追，我们还是会头都不回地跑，真是惊弓之鸟。又继续逃，到羊卓雍措湖边，见几百名藏人陈尸湖水边和附近的草滩上，死者主要都是僧人，此时已看不见敌军，死难者的鲜血将湖边的水也因此变红了。

那里的藏人告诉我们，有一个西藏政府的贵族是中国主要的暗探，我们就等他前来，不久那个贵族果然来了，我们说我们是四水六岭的人，他还伪装叹息著说："我们把事情给搞砸了，达赖喇嘛已经去了印度，这可怎么办呀？"我们起身将他逮捕，搜查见其马褡子内装的全是劝降一类的信，这名贵族奸细就被我们处死了。

后来我们到了不丹边界，时为藏历五月，这时，大家已安心，但看到每个人身上都爬满了虱子。不久遇到不丹兵，他们一见我们望风就逃，我们当中有人拿著美国空投下来的美式步枪，便把这枪送给不丹国王为礼物，不丹国王才给了我们"沿途不准骚扰"的命令，说这些人是达赖喇嘛的警卫兵，还以很高的代价买了我们的螺马等，派人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印度。到印度后就去冈拖当苦力，开始当难民了。"

在逃亡的路上，达赖喇嘛听到他的政府被中国宣告解散，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由于山南的隆孜县还是藏军的控制区，便在此成立临时政府。达赖喇嘛在他发表的演说中，谈到由于四水六岭的努力，才使大家到了这里，从现在开始，西藏将建立民主的新政府，并宣布，西藏政府在山南储存的粮食供官兵们为军粮，并赐安珠贡保札西为拉萨的封爵，而且自己会留在山南某地。法会后，阿塔和罗才要求表演射炮，并且电告美国达赖喇嘛已到的消息。

后来他们在隆孜县举行盛大法会，以庆祝新创建的临时政府，达赖喇嘛和许多喇嘛们一起诵经祈祷，所有噶厦的噶伦也都聚集在一起，在很短的时间里，人们暂时忘掉已经到临的

苦难。

但是，很快地，中国军队准备移动的消息又不断传来，本来的计画必须改变，噶伦们都要求达赖喇嘛立刻退到印度。

也是四水六岭成员的恰城久美说，一九五九年他陪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在印度拉莫等了两天，主要是等印度方面的同意入境。两天后达赖喇嘛先走，第二天两位经师也走了。因为那里的路非常险峻，他就陪著两位经师走到边境，还和印度士兵住了一天。

过边境时达赖喇嘛已经在那里等，两位经师和达赖喇嘛见面后谈了三个多小时，然后达赖喇嘛继续出发，这时印度士兵排成两列，列队向达赖喇嘛致敬，藏人见印度士兵对自己的领袖这么尊敬，满眼都是眼泪。

他们在边境见了达赖喇嘛，达赖为他们加持后要他们听两位经师的话，恰城久美和另外十二人一起见经师时，经师告诉他们："达赖喇嘛和我们逃到印度，绝对不是我们自寻出路、不管别人，我们出去后绝对不会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我们一定会多方向国际求援，向世界人民求助，所以你们留在国内的要团结，要设法保住性命，人民逃命时你们一定要保护他们，能逃来多少就算多少，逃来愈多愈好。你们要打败中国人是非常困难的，到了一定程度你们也一定要逃出来。"

恰城久美说，在这之前他们已谈到要回西藏继续打仗，经师并没有叫他们不要回去，但那时人们都开始往印度跑，经师只说："你们要回去是非常勇敢的表现，但要注意保住生命是很重要的。"

第二天就要进入印度境内了，四水六岭的士兵在边境时请达赖喇嘛为他们加持，他们说自己到印度毫无用处，愿意再返回西藏作战。达赖喇嘛看到这些人如此有勇气伤心难忍，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可能会死去。

在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前，达赖喇嘛的警卫、札西兵营一百多名藏军、和四水六岭廿四人一起去见达赖喇嘛，当时四水六岭的人向达赖献哈达与要求做法事等，然后向达赖喇嘛表示要回西藏去战斗,不去印度。他们说："我们不去印度了，我们要回西藏战斗。"

达赖喇嘛给了警卫和藏军一点钱和护身符，那些士兵和警卫当天就翻山回西藏了，另外恰城人廿四人中也挑了十二人，一起到边境去了。

达赖喇嘛临走的那一天，大家眼睛都哭得很红，视线都看不清楚，有一个肩上有两颗星星的印度军官对恰城久美说："你回西藏干什么？西藏国王都已经离开了，你回去等于找死嘛！你都已经到印度了，还是留下来吧！留恋那个枪做什么（因为进入印度必须要交枪）？枪已经没有用了。"

恰城久美回答说："我们不是留恋枪，要回去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老百姓，到印度去我们就没用了，西藏才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印度军官听了他的话也掉眼泪，握住久美的手不能说话。

第二天恰城久美等人就回去了，回程路上一开始还好走，但后来就非常困难了，路上挤满了逃难的百姓，每当战士在战场上正准备打时，后面就又涌来了一大堆老百姓，士兵不得已只能往后退，后退到一个地方，而侧面的敌人又涌过来，不得已又再后退，最后只好逃跑，就逃到印度来了。

那时美国电台来电要藏人坚守阵地，还说明美国会空投武器支援。但是，当所有战士得知达赖喇嘛已经离开西藏时，士气几乎同时崩溃，四水六岭等于是直接逃到印度。达赖喇嘛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淡淡地说，当时藏人并没有任何希望可以赶走中国人，现实是西藏人除了逃跑以外没有别选择，"四水六岭"也是迫于无奈，而且逃跑还可以避免很多人的死伤。

但达赖喇嘛很遗憾地说，有些四水六岭的人有马可骑，他们将拉萨步行逃亡来的人民和三大寺的僧侣阻截说："不许跑，要打仗。"本来应让步行僧侣与人民先行，有枪有马的留在后面，但在中国人来的时候他们却骑马先跑了，害得当时人民落在后面，这种事出现了一些，

是相当令人伤心的，但在当时也无可奈何。

这些往事令西藏人不堪回首，洛桑格列还记得他们护送达赖喇嘛、并让达赖喇嘛越过边境进入印度后，他们又回到西藏。但那时拉萨已经失守了，到处是溃逃的人群，人像　　天盖地般逃过来，已经没有回去的地方了。所以四水六岭就跟著人群向后退，军心动摇，退到了印度。

昌都也有一个仓库是四水六岭守卫的，当时僧侣都在逃，人人把马放在一个村庄里，第一道战线一退后，大家就往有马的村子跑，然后骑上马就奔逃，败一次就控制不住了。

洛桑格列说，四水六岭军确实曾经阻挡逃出来的人，希望他们留下来打仗，但那些难民回答说："我们不是来打仗的，我们打不动了，我们只愿意逃跑。"他们一心想逃跑，但四水六岭则要他们把枪留下，因为有人不愿意，结果四水六岭开枪，也因此造成一些不幸的伤亡。然楚阿旺说，从这以后就是"留枪放人"政策，凡是逃出来的人都把枪留下来，人再走。

洛桑提到，中国军队真正涌来时，是从四面八方到处都来，更糟糕的是中国部队派来很多的间谍，到处散布谣言，军心就不稳，只好跑了。

另外洛桑诺布则说，他们退出战役后就开始跑，很多逃跑的人说到处都是散兵，山上天天在打仗，枪声不断，但却不知道四水六岭的人在哪里。山很险峻，都是高山，山沟非常陡，两边是悬崖，山坡上有很多的寺院、村庄，他们是骑兵就在山沟中顺著水走，山上看不清楚，一直到天完全黑后，才被人看到向他们开枪，但也是盲目打枪，后来男的、女的、满山满谷成千上万的人。

然楚阿旺也口气迷惘地说，当时一直有人在说这个山头失守了、某某山头也失守了，这样一听大家想，既然两边山头都失守了，那我还在这里打什么？于是赶快跑，大家都跟著逃，后来证实那些应是共产党放出的谣言，到以后已经没有进攻的心了。

然楚阿旺说，解放军在拉萨大肆轰炸，坦克横冲直撞，但是不知达赖喇嘛已离开，在罗布林卡的死尸中翻看僧装尸体，三大寺、上下密院、市民等逃难的人民纷纷涌向山南，幸好各渡口都有人守卫，使解放军无法立即截断人民的逃路。问逃跑的人，竟没有几个人愿意留下来打仗。

大炮轰击和坦克使藏人丧胆落魄，藏人对这两样东西完全是束手无策。因此都说："怎么打呀？怎么对抗啊？只见天上有无数炮弹落下，地上只有铁壳子坦克在转，只见死人，不见敌人，这仗怎么打？"

曾任昌都白日县县长的洛尼说到："我当时是僧人，在拉萨，当安珠组织"四水六岭"，秘密招收军队时，各部的头面人物到安珠家的经堂中起誓共赴国难，但真正要出兵时，却有许多推辞，这个说我的妻子病了，那个说有一些买卖关系未厘清等。……

不久，达赖喇嘛从拉萨逃出，四水六岭立即在各个交通要道布置兵力，掩护达赖喇嘛及随行人员出逃，在琼结日吾德钦宗，达赖喇嘛接见我们各部的长官，给我们讲话、给护身符等，我等因见领袖被迫逃亡，国破家散，只是一味地流泪，竟说不出一句话，达赖喇嘛说："不要悲伤，我们还是会见面的，我不会有事，我这一走，中国人会尾随前来，要小心。"

达赖喇嘛出发后，我们挑了一百名最精壮的官兵护送到邦锦，再过去就是印度的地方了。我部官兵旋即返回准备投入战斗。我当时驻防在一个渡口，没几天，敌军赶至，当时有阿尔达哇部的一群官兵也与我们一齐抗击，抵抗了半天终究挡不住，乘著战斗间隙，我们横渡雅鲁藏布江，并一路退到拉嘉日地方。随后又集中在隆孜县，大家争吵不休，一部分说要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一部分认为没有意义。

总之，最后是一路奔逃，没有人回去迎击敌军，在逃跑路上，翻越马郭拉山时，死了许多的人、马，因那儿只有一条路，互相践踏，特别是马、骡等一倒下，人们也不等其断气，便践踏著走过。

在途中，有安珠贡保札西派来的使者阻止我们逃跑，要青壮者留下来作战，但此时兵败

如山倒，已无人服众。当时并没有好好地打，连“败”字也无从谈起。本来是可以好好打一仗的，但达赖喇嘛一走，人们便全无斗志，认为达赖喇嘛出走，可能战争没有打赢的希塑，因此还未交手，心中便已经败了。”

然楚阿旺指出，达赖喇嘛通过山南不久，中国军队约有五百余人攻来，藏方守军却一路败阵，围攻泽塘的藏军军官开会后决定撤军，后来总部迁到雅隆颇章，他们到了该处时，见此处汇集许多从各处退来的军队，叫军官们下来与敌交战，却无人回应。

当时因总部又迁，藏军于是且战且退，官兵们已无心作战，军心动摇，军队已开始失序，许多人不听从指挥，有的人在后逃，有的则待在阵地上准备战斗，到竹古塘时，有信使奔来说安珠已到隆孜县，然楚阿旺立即率十余骑前往，留大部在竹古塘，见到安珠，两人悲喜交加，涕泗纵横不能言语。

安珠部四百余人又继续布置阵地，并派然楚阿旺等人增援措纳县，不久措纳县又失守，守军退到印度境内的门达旺，他们从山上见到措纳已被占，只好返回，当时根益西和许多士兵患有雪盲症，在玛果拉山脚蹤到安珠，牧人在积雪中为他们开路，于是四水六岭才过了玛果拉山，到了印度边境。但印度不让他们入境，只好在边界多待了七天，期间给印兵送礼，包括鞍叉备齐的马一匹。后来印度边防军获总部指令，才允许他们入境。

汉人洛桑札西记得：“当西藏人为局势所逼，不得已退出国境时，藏人不分军民，每个人都红著眼圈，衔恨出国，其心理之难受非身历其境不能体会。解除武装后，印度负责收容难民当局，对各族难民，分别安置。藏人退到印度后，首先到达门达旺，按国际法规定，把枪械全部交给印度政府。

交枪以后，印度政府分两批处理。一批是藏民，送到民索马日，我们汉、回共有三十二人，其中十二人是回民。在门达旺住了十多天后，台湾的马纪远派人把十二名回民接走了。我们二十几个汉民仍住在门达旺，住了一个多月后，才被送到硼地拉。”

[/font][font=宋体] 在这场战争中，藏人因极度缺乏通讯设备，大部分的通讯都是靠人骑马传信，旺青然丁在战争中主要负责送信，他是马不停蹄的通讯兵，没想到，最后却送信送到了印度。

旺青然丁被交待一定要克服困难，到达目的地，办好、办妥事情等，并交给他许多的信件，这些信有很多是要送给达赖喇嘛和安珠贡保札西的，琼波嘎日本也派了四个人同行，边坝喇嘛给他们护身符，叫他们对此事保密，不要给任何人讲。

他们兼程赶到拉日宗，但拉日宗的宗本（县长）不太理睬他们，叫他们赶紧走，说中国人快来了，他们会给他添麻烦，于是旺青然丁等人连夜走了几天，到处是人去楼空。他们一直往西南方向走，途中一路蹤到从拉萨逃来的僧侣一群一群地涌来，那人潮也说不出有多少，反正漫山遍野都是，他们对我们说：“达赖喇嘛已经去了印度，拉萨已经没盼头了，你们还去那里？”

送信的旺青然丁口头应付著，但仍往拉萨方向走，但再也不敢走正道，而是一直顺著山梁走，到了乌噶增昔地方，从山上看到县城已经被中国人占领，四周全是被缴获的牛马群。他们再到一山冈上的小寺院，有个老僧在那里破口大骂，说中国人已经对他们讲了，见到反动派或抓或杀，不许藏匿，你们来是害我们，快走等难听的话。这时，另有一僧乘老僧不注意时，悄悄示意我们快离开，等夜半再悄悄来。

半夜，旺青等前去时，那个年轻的僧人给了他们许多的食物，总之，在途中藏人都会给你食物，同时又叫你快离开，都唯恐连累了他们，他们都说达赖喇嘛已经平安到达印度了，你们还去那里？快走，让中国人知道了，你我都完蛋了。

他们一路走，但也见到一些人不愿逃了，说如此逃还不如一决死战，战死算了。旺青一行人在敌人枪炮轰击下一同向北奔逃，然后专门走山头，恐中了敌人埋伏，在途中遇到敌人的侦察分队，本来想要击杀他们，后来敌人却逃走了。

他们又赶到一个村子，正好村里的人正与中国人激烈交战，村子已经被完全包围，敌人非常多，旺青说，没有人帮得了忙，而且当时藏人也没有协同作战的思想，只是各顾各的，现在想来当然是错误的，但那个村子是没救了。从此，他们一直走荒无人烟的北方原野，避开有人的地方，只有一次遇到敌军，随即奔逃，大部分人连马鞍都未及备上，是骑著光马背逃来的。

他们除了人马枪外，其他东西全部都损失了，旺青等人后来是从南木措以北地方逃到尼泊尔，再从尼泊尔逃到印度，终于见到安珠贡保札西，将信交给他并提出要去见达赖喇嘛。

安珠贡保札西告诉旺青，没必要了，信给他就行了，并连声叹息。

第十章 木斯塘的游击岁月

达赖喇嘛出亡后，西藏内部的游击抗暴行动渐行瓦解，共有几近十万藏人跟著达赖喇嘛逃到印度与尼泊尔，失败已是注定的命运。但是，西藏人民不甘心，他们随时在等待另一个反扑的机会。

印度这个邻国收容了大部分的藏人，虽然印度与西藏虽然两相邻，但却是地形气候截然不同的两个地方。西藏是寒冷的高原地带，印度却是酷热的平原，藏人从西藏寒带退到印度热带后，有不少人受不了热而死亡，所以第一件事首先就是要避热。基于这样的考虑，印度政府于是安排很多藏人去气候较凉爽的锡金修路，当时有很多流亡藏人都希望到锡金修路，除了较易适应锡金的气候外，更因为那儿距离家乡较近，藏人心里老是想著，说不定那一天可以从这里回西藏。

但因为修路非常累，没出路，大家就想不如去打仗，这时有些年轻人表达如果有机会愿意接受军事训练再回去打仗。一直致力抗暴运动的安珠贡保札西和嘉乐顿珠也认为就这样修路下去，实在太可惜，因为退出来的都是年轻人，又很勇敢，他们决定在尼泊尔继续建立武装组织，并计画把这些年轻藏人送到尼泊尔北方的木斯塘去打游击，但一定要有人支持才办得到。嘉乐说，当时西藏人一无所有，只有勇气。而美方有钱、又反共，所以彼此之间是相互需要的。美国可以提供武器，西藏方面出人，但如果西藏成不了事，就很难得到美方的援助。

而在嘉乐顿珠开始积极与美国方面联系时，达赖喇嘛并不知情。达赖喇嘛说，有关美国援助一事，他并不清楚，直到一九五八年时才听到与美国有联系的说法，但并不了解详细的情况。一九五九年他从拉萨出来时，才知道随行在身边的两人是曾在美国受训的战士，他们有一门炮，到了隆孜县时，他们还表演发射大炮，那次他是第一次亲眼看见，当时也听说他们和美国有电报联系。

但达赖喇嘛关心的不是军事，他认为既然能从美国那儿得到军事援助，能不能将这些经费转为盖学校、盖个藏人定居点等。一九六 0 年，“四水六岭”获得达赖喇嘛接见，当时达赖喇嘛曾经与四水六岭总司令安珠贡保札西密谈，达赖喇嘛的目的是强调人民需要安置，学习一些工作技能，因此希望能将原要运用在军事上的钱，转到安置人民、办学校等，而且也提到要以西藏政府的名义要求美国提供援助等。

但美国一口拒绝了，美国说他只支持游击队的计画，和西藏政府没有关系，他们只愿意和“四水六岭”接触。最后藏人商量说，因为美方表示不愿和西藏政府接触，但这些钱藏人又非常需要，所以只好跳过政府层级，直接和“四水六岭”接触。

退到印度的“四水六岭”主要成员包括安珠贡保札西、南嘉多杰、仁钦才仁、伦杰札、安多津巴嘉措、恰城格桑琼增、根益西等共七人成立了决策核心，并一致接受嘉乐顿珠的领导。大家开会后决定安排老人去老人院、僧人去寺院，另外嘉乐顿珠还要他们挑一些年轻人，最后把二十五岁左右的都留下来。但曾经警告这些年轻人说，这是秘密，不能到会议上乱说。

人人都在追问安珠支援何时会来，有一回安珠被问得不耐烦了，要大家不要再追问了，他表示美国的支援肯定有，但他们只给游击队，其他如建立医院的就不给了。[/font][font=宋体]　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给他们具体承诺，决定支持他们在尼泊尔境内建立兵营，地点并且选定在尼泊尔北方靠近西藏的木斯塘。木斯塘之所以被选为武装游击根据地，首先，是因为这里是使用藏语的地区；其次，这里接近交通线；第三，在木斯塘北方中共部队的据点很少，虽是必经之路，但也比较容易躲避。而且，以前在北方做买卖的人，都说木斯塘是个好地方，进可攻、退可守。当时负责与美方接触的拉莫才仁回忆说："所以，我们就和美国ＣＩＡ连系，要求美方提供经济、武器的支援，ＣＩＡ的回音是原则同意支助，但计画中如多少人、在那里、怎么派人都要有详细的计画，安珠于是提出一个"木斯塘计画"。安珠说他从前去过这个地方，因为这里三面靠西藏，都是牧民，山边有野兽，如果没有食物还可以打猎，也可向牧民要奶喝，所以木斯塘最好。

一九六０年三月间，双方在加尔各答谈，ＣＩＡ派来的人先在加尔各答以私人身分找房子住，但他们不常在房子里。我和安珠二人去谈时，都是先决定时间，然后在车上谈，平时他们在街上都会拿个报纸做掩护。

在车上时，我把计画书交给ＣＩＡ，计画书上写著："游击基地共分四个部分；六个连队堵西方，六个堵东方，六个堵北方，三个连队在木斯塘。"原来计画中需要的游击部队人数高达五、六千人，主要是从锡金派人，然后再是从达拉豪斯、千巴、西姆拉（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印度城市，当时也徵召不少流亡藏人在当地修路）等地方找人。ＣＩＡ也觉得木斯塘很好，但认为游击队员人数只能有二千一百人。

于是我们便决定募集二千一百名游击队，但当时四水六岭有些人年纪大了，于是我们也向美国要求为这些老人提供养老资源，因为这些人已干不了活，修不了路。最后美国方面同意给三十二人工资，但要求绝对保密，只有我们核心的七个人知道。

有一次我们七个人开会，决定派廿六个人到美国去进行受训，我们认为要派脑子比较灵活、会讲话的人去，另外还要派一些人去学习爆破，这些人要从印度西里古里到巴基斯坦，然后再分批前往美国受训。

计画定好后，"四水六岭"廿七个部共派廿七个人、电报人员四人先培训，这些人就被送到美国受训。一九六零年四月，决定先派一百人去美国，双方言明一切行动机密，如果消息走露，救援就停止。因为这个工作牵涉到印度、尼泊尔两个国家，又是武装组织，在国际法上并不合法，所以一定要保持机密。

前后加起来，当时共派了三百多人从西里古里经东巴基斯坦到美国训练，当时印度和巴基斯坦不和，但巴基斯坦和美国关系好，因此藏人必须先通过巴基斯坦，然后在巴基斯坦坐飞机再到美国去。那时根益西他们在大吉岭的一个叫"SAFEHOUSE"的地方开了七天的会，连印度也不晓得，因为印度当时才刚刚独立，根本注意不到藏人这部分来。"

原来的计画是，指挥总部设在印度。第一批先去四百人，四百人到达木斯塘后，美方会派人和武器来领导，但因四百人人数太多，容易引人注意，必须二百、二百分两批走，特别要防止不要让印度人知道。

七人小组决定先派遣根益西到木斯塘去探路，根益西和三个电报员先行出发到木斯塘时，电报员在山中立刻和美方联系，美方人员对于已经有人到达现场表示赞许，原是喇嘛身分的根益西后来成为木斯塘的军事总指挥。

一开始和美方约定时，本来说先来二百人，但当第一批人选定时，不料这些被选定的人在临走前，有些人向他们的父母写信说："我们现在要回到西藏打游击。"父母知道后又和亲戚朋友讲，结果消息走漏，以致有许多人跟著涌到木斯塘来，木斯塘计画成了公开的秘密，其他人都知道他们要去木斯塘打仗，结果藏人全来了，一下子就涌来了二千三百人。

恰城久美说，大约是在一九六０年藏历四月一日，突然传来消息说是安珠贡保札西的命

令，安珠、嘉乐顿珠、拉莫才仁杰等共同商议决定，藏人不甘心，要重新再打一次仗。但因为在修路的藏人报名的太多人了，没办法只好抽签，被抽中的就先走，恰城久美没被抽中，就跟著排梯次。

也有些人没被抽中却不愿等了，他们说："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打仗的机会？共产党是他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他们能打仗我们也能打仗，他们能献身我们也能献身，为什么我们就没这个机会？"

于是很多人就开始往前走，印度、尼泊尔士兵就到处挡，路口被堵他们就爬山，桥被围他们就涉水、游泳，因为都是徒手、和平的兵，印度和尼泊尔士兵也无法开枪，就这样印度大吉岭一下子涌进了千余人。恰城久美本来是第三批的，但一直没人通知，最后也跟著人群走了。

当时因为突然有二千多人涌到尼泊尔木斯塘，引起印度议会发觉竟被蒙在鼓里的议论，印度方面并且通知了尼泊尔政府。尼泊尔政府问西藏人，是不是觉得印度太热所以跑到他们这里来？木斯塘的游击队员则回答说，他们是来找工作的；另外有的则说是来尼泊尔的佛教圣地朝圣。因此当时尼泊尔政府并不知道西藏人到木斯塘是来建立兵营的。

当时的指挥总部是在大吉岭，有办公室，为了解决这些木斯塘士兵的入境问题，指挥总部便派嘉日尼玛到尼泊尔边境，当时有五百人等在边境，嘉日的任务便是设法让他们入境。于是嘉日哭著向尼泊尔边境守军说这些人都是去拜佛的，虽没有钱，但都是好人，他边说边哭著，没想到用这个方法竟让大家都入境了。其他一千多人也是以类似方法偷渡入境，多是以朝圣为理由，从公路坐车到加德满都，外表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尼泊尔政府不知道流亡藏人是要到木斯塘建立兵营，印度政府也被蒙在鼓里。当印度在一九六 0 年六月获悉此事时，西藏人已到尼泊尔了。

恰城久美说，当时正是最没有饭吃、最苦的时候，本来美国只说要给四百人的饭，但一下子来了二千多人，吃的东西一直不够，训练项目又非常多。但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好，虽然是既困又累，然而大家都觉得此刻有机会打仗真是太好了，于是不分你我，如果我有一条毛毯而你没有时，毛毯就撕开给两个人用，一人一半，人们是团结又勇猛，士气极端的高昂。

这些藏人来到木斯塘后什么都没有，总指挥根益西因为担心藏人会酗酒、斗殴，又为了保密不能住在村庄，所以都把他们安置在山上。但山上什么都没有，反正那里凹一点，有些容身的地方就塞一些人，再加上木斯塘地势高，气候寒冷，什么吃的都没有，食物极端缺乏，大家苦不堪言。

因为兵营是秘密设的，如果去买大量的粮食会被发现，而且买后只能在夜晚搬运也是非常困难，所以往往只能用当地的山羊一点一点的拖。

这么多人没得吃，每天早上只有一碗汤，汤非常稀，碗一冲不必洗就乾乾净净，因为没有吃的，大家就把好的衣服都换成食物，兵营一周只给士兵二点五公斤的面，有时偶而十一个人给一条牛腿，别的什么都没有，很多人都生病了，也有些人离开军队走了，还有一些人因为饥饿，出去找食物时在雪中冻死了，但当时这群饥饿的藏人并没有指望美国给吃的，只希望美方给武器就好了，藏人拿了武器就好好的去杀一场，死了就算了，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情。由于美方非常生气藏人走漏消息，另外又认为藏人欺骗他们，他们不相信木斯塘已来了二千多人，因此原先承诺要支援的武器迟迟未来，藏人没有办法，只好砍木头作木枪开始训练，后来木斯塘把训练的照片送去，美方才恍然大悟。木斯塘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不支援，他们只有抢劫一途，到时还要在报纸上发表。更何况，现在两千人已经在那里，应该可以有所作为。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以后，木斯塘总指挥根益西先和美国联络，然后美国才再将武器空投到西藏。

总指挥根益西回忆说，当时美方极不高兴地指责藏人泄露秘密，因为建立军营的事被太多人知道了，还说藏人不诚实、成不了事，那么点秘密都守不住，印度方面已经知情。美方

并且通知根益西，美国决定不给支援了。

美方话一说完就没消息了，已到木斯塘的藏人也不知该怎么办，就和印度总部联络，但因为实在太苦了，已有一百多人受不了又逃了回去。总部设法向美方说了很多好听的话，最后总算从美国派了十二个受训人员前来支援，其中四个是空投、八个是步行来的，等到第一批援助来时，大家已在木斯塘一年多了。根益西说："没有援助时苦不堪言，得到援助后更难。美方的命令一个接一个，要他们打又要他们进西藏，天天在那里催，西藏人没有办法，只好听他们的话。

但木斯塘士兵也不知道那里可以打仗，美国又一直要他们派人去，有一回派去的人摧毁了中共的军队，马上又退回来，美国问车号，藏人说不知道，也没有把中国人带回来，美方话又说得很难听。

在北方只能步行，每一个人都背了很多东西，行李、几百发子弹、步枪、又只能带七天粮食，带多了就走不动，其他都要在当地寻觅，没有一匹马，要背著走一、二个月，但这些向美国根本说不清，美国当然不相信。

我们于是向美方说明，到西藏后要深入到很远的地方才能行动，即使有俘虏又怎么背得回来，美方应该要再多给一点钱，好让藏人去买马。后来美国于是又给了三千卢比，因为这时从西藏逃过来的人比较多了，马价也比较便宜，一匹上好的马只要三百元左右，东凑西凑凑齐了四百匹马，但堪为战马的只有廿五匹，而且没有马鞍子，就用布布置了一些马褡子。

这廿五个人骑马深入藏区，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结果刚好碰上敌人的两辆大车，袭击并打死了中共男女共十六人，得到敌人的肩章、车牌、帽子，还有一驮半的文件，文件中有很多是军官的日常记录。报到美国后美国非常高兴，总部也很高兴，说是美国游击队在那里已干了十三年多，从没有得到过如此重要的情报，都非常高兴。

不料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意外，当时有一个美国新闻记者，把西藏人在木斯塘的活动全都拍摄了下来，并且在美国报导，这件事又触怒美方，指责藏人泄密，不但要求严惩那些士兵，又决定中断支援。但我不愿意惩罚士兵，我很生气地说，这些人奋不顾身，潜回西藏去摧毁了几辆汽车，回来时还有人受伤，美国人说要切断就切断，既然不给就算了。

美国整整断援七个月，后来因为有拉莫才仁帮忙，支援才又恢复。"

随后根益西曾和两个电报人员去见美方人员，双方做了沟通，这时美方的态度转变，还送给根益西一个手表、一个收音机，又承诺将来会给大力援助，又问根益西还需要什么。于是根益西提了一份包括马鞍子、食物、帐蓬等的物质清单。

根益西提到，又有一次木斯塘共有三十五个人要到西藏去拿援助，说是有四个连的装备被空投在那里。但后来得知装备中只有八袋外国面条，美国人要西藏人带这些东西到西藏内去打仗。美国人主要是要木斯塘游击队到西藏去打仗，按道理不应回木斯塘，但因北方全是荒野，十几天内根本见不到人影，只有八袋粮食根本不够，即使过去了回来也是没得吃的，所以木斯塘士兵又退回木斯塘。

美方知道后，回电全是骂人的话。

当时参与建立木斯塘武装游击基地的核心成员拉莫才仁说，木斯塘主要工作在于搜集情报，训练的时间很短，从一九六一年三月美国第一次空投后，同年的十一月就开始打游击了，训练时间等于只有三月到十一月短短八个月的时间而已。

训练项目先要教导藏人如何使用武器，当时武器有步枪、冲锋枪、轻机关枪、重机关枪、高射炮、八 0 炮击炮、六 0 炮击炮等。接著是最重要的学习使用炸药，藏人要学习在爆炸后再攻击，然后要赶快逃跑，前后时间最多只有十分钟。

恰城久美说，木斯塘士兵受训时一会儿爬山、一会儿涉水，一开始因为美国空投一直没有来，大家手里只拿著木棒训练。等到空投有枪来后就好多了，我们开始训练射击、各种枪枝的使用方法，并且学看地图、爆破技术等。

当时在木斯塘，美国先后共三次空投武器；第一次空投足够装备四百人，第二次和第三次一共装备二千人左右，其中重武器有火箭筒、迫击炮八门、另外还有非常多的地雷和充足的弹药，很多藏人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子弹。

[虽然三次空投后，一千六百人的武器大约都有了，但并不是说每个人手上都拥有武器，因为一门大炮可以分配给十个人，其他有的人装地雷、有的备弹药、反正每个人都有活干，不会空手，所以才说二千个人几乎都装备了。

但后来支援逐渐减少，美国人一直抱怨西藏人为什么不到西藏去打仗？光是躲在这里，所以美国人就不再给西藏支援。而且，美方都是根据地图说话，他们言明第一次空投的四百人是要驻在西藏，而不是在尼泊尔境内，这是美方根据地图规定的。

尼泊尔与西藏间隔雅鲁藏布江，冬天时江面结冰，木斯塘士兵才能骑马过江去打游击，但夏天就只能装成老百姓过河去搜集情报。拉莫才仁说，因为藏人很同情藏人，所以搜集情报很容易。十四年来新藏公路在木斯塘士兵的突击后完全停止使用，以后才恢复。解放军后来新修了一条公路，三个团约一个师的兵力被牵制在当地，这些消息都是从破获的情报中得知。

游击任务每次约是十至廿人一批，绝不是打正规战。但木斯塘游击队却发现，那时中国人已经在那里扎好营盘了，一些据点、要地都驻有中国军队，公路每隔十、十五公里就有一个担任修路工作的解放军，也看到一些干活的苦力，是军队经营的，后来才知道也是解放军。
本来要占领的地方已经让中国人给占领了，而那时藏人还没有武装，武器是后来才给的，但有了武器装备后美方所指定的地方已经去不了了，只好退回来，但美方又不高兴，所以才不给藏人任何支援。

同时，美国人之所以没有支援武器是因为对于人数表示怀疑，调查后才第一次空投四百多人的武器，但初来四个连的武器却让木斯塘吵得一塌糊涂。当时共有十六个连，每个连都想接收这批武器和枪，最后没有办法就装备了八个连，等装备后粗具规模时，敌人已经把边境大的据点都给占了，除非把兵营建在山上，但兵营建在山上就什么吃的也没有，村庄已经让敌人给占了，变得只能打小游击，然后再逃回来。

由于美方一再要求西藏游击队员进入西藏，否则将不再提供武器支援，藏人一急，就派六十几个人骑马去突击西藏，据这些游击队员说，他们那次行动一共碰到廿几辆车、共六十余名解放军，他们把十几个士兵和指挥官全部打死，并且夺来了很多武器和一箱文件，这些文件好像是在说中国士兵士气非常低落、很怕康巴人等。

木斯塘把这些文件交给美国，美国知道后很高兴，空投增援就多了，什么都给，西藏人有吃的、武器也有了，后来他们又潜入西藏许多次，并且炸了两辆车。情形都是先埋地雷，然后步行，远远地躲在一个山头上，再用望远镜观察，但无法过去看，因为一旦过去，敌人追来跑都跑不掉。

有一次去的人骑马，共有十二个人在宗巴县设伏，藏人把马放在比较远的地方，敌方有五、六十人，后来还跟来大部队。到了一特定地方后，藏人突然一阵射击，十几分钟后看到地上八、九个人躺在那里，是死是伤并不知道，反正是打到了，其他的都逃开了。射击完后他们就跑到有马的地方，然后头也不回的跑了。

木斯塘的游击战役被认为并没有太大的功迹，唯一最大的一次便是有次夺获中共大批文件，藏人俊嘉便参加了那一次的游击战。俊嘉说，一九六一年木斯塘兵营建立后，一九六二年藏历九月，木斯塘已经有四十余匹马，分过去后平均每个连队有两匹马，于是当时便组织三十余骑准备返回西藏，过去都是步行。俊嘉说：“我们过了雅鲁藏布江上游，来到一个叫拉桑的地方，继续向北走就碰到中国人的公路，那地方是属于北方地区，没有森林或高山，只有砂土原野和芨芨草，藏人一共设伏了六天六夜，却一直不见敌军出现，因此大家商量该怎么办。有些人主张回去，有的则建议劫夺附近一个属于中国军队的牛场，争执不下时，阿成

列叫我扛上机枪，率两个厦额（军职，相当于排长）为助手，再沿公路向西走一段。

中午一时左右，在最前面的阿成列摇动红旗表示有中国军队前来，不久便看到原野中有一辆中国军车扬尘而来，汽车玻璃的反光让人远远就可以看见这辆车子。我们在路边挖了坑，将机枪架好，头上、身上与枪上都绑了一些芨芨草做为伪装掩护，再取出配发的十盒子弹，每盒是一百发，摆放在旁边，静候敌车。

当这辆中国军车进入藏人设好的伏击圈后，藏人壤壤首先开枪，中国军车当即停了下来，所有人开始向敌车扫射，只有一些零星还击。在扫射了一个小时后，木斯塘士兵“咯呵呵”的呐喊著冲过去，见到男女军人共十一人倒在车内，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剩一口气。

木斯塘的士兵这时挥刀砍杀尸首，并且高喊：“把毛泽东领来吧！”在收拾一阵后，通过望眼镜看到大约有四、五十辆草绿色的军车开了过来，木斯塘士兵立即离开战场，起身回逃，原本是两天的路一天就过来了。”

拉莫才仁说，那次夺取文件是立了功，藏人后来进入西藏做的主要都是些破坏行动，但在一九六七年以后工作重点转为搜集情报。

过去藏人对情报工作并不在行，有好几次犯错的例子。拉莫才仁举例说，冬天时，在中国境内有一个县，因为电台损坏要重新换零件，木斯塘便派两个负责联系的电报员去修零件，双方约好每天的几点几分在某地接头，各派电报员来接受。但是木斯塘的电报员穿的都是印度巴塔制鞋厂的鞋，这家厂胶鞋很受欢迎，但在中国的工作人员穿的都是中国鞋。

有一天下雪，在下雪中双方仍派人交接情报，时间约达半个钟头，但因为很冷，电报员直跺脚，然后又各自回去。很不巧那时刚好有中国的巡逻员通过，巡逻员发现有很多脚印，而且两边脚印不同，于是这些中国巡逻员认为一定有特务潜入，结果在西藏内的电报设施被发现，人也被抓起来了。

另外有一次是在拉萨有一个负责电台通讯的电报员，木斯塘给他寄去一种藏人很喜欢的印度布料，是一种丝质衣料，在旧西藏很流行，过年时就把这件衣服寄到西藏。在中共十月国庆时，这名电报员便把这件衣服穿上出去看戏，拉萨警察发觉当地没有人穿这种衣服，判断这个人一定是从外地来的，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还有一次是一名电报员在房屋地下室进行发报工作，只有房屋主人知道他人在那里，有一天那家人出外工作只剩下小孩在家，不知怎么的这个三、四岁的小孩走进地下室，工作人员就给小孩戴耳机听音乐，大家想这应该没什么。结果晚上父母回来，家里也来了很多人，那小孩子就拉著外人说地底下有音乐可以听，一传出去人就被抓起来了，那一家人也被抓了。

拉莫才仁说，曾有一个电报员被派到沙日村一带，白天大家都出去工作，他以为村子里没有人，就爬到屋顶上去照相搜集情报，结果偏偏给一个老太婆看见，这个老太婆到处说她看见鬼了，因为她从没有见过那个人，这事传开后，这个电报员待不下去就只好搬回来了。
[/font]

因为木斯塘是秘密武装行动，美方要送钱给木斯塘游击基地也煞费周章。有时当月不能送，有时两个月、三个月一并送，木斯塘只能到时再找可靠的人去拿钱。拉莫才仁说：“一开始都是从加尔各答拿钱送到木斯塘，路途很远，每次大多是带十二万的印度卢比，专门有一个组织负责送钱，在加德满都有两个旅馆是联络点，钱都会送给旅馆经理，然后他再送钱给木斯塘，有时是从边境送到波克拉。从领到钱到送达木斯塘十分困难，要通过两个国家的检查，但十四年中仅丢了三万元。

有一次是有廿五万元的钱分别被装在罐头中，送钱的人要从印度的西里古里出发，在一九六四年以前是从西里古里送，六四年以后就改从德里送。那个送钱的人很小心，从西里古里上火车后，钱就放在位子下，因为钱太多太紧张就不时低头看一下，确定钱还在，不料这些动作引起旁座的人怀疑可能是走私，结果被检举，人被带走后把罐头的东西挖出来发现有廿五万元，还有很多信件，得知是个秘密工作人员，但不知是属于那个组织。

正巧那时我和嘉乐顿珠到加尔各答，两个人走在路上，买了份报纸，看到报纸上有一个间谍被捕的消息，没想到正是自己的人。我于是立刻到德里和印度情报局联系，在廿四小时内，这个人就交保了，钱也拿回来了，没有什么损失。

但还有一次三万元却损失了。有二个送钱的人要坐火车到加德满都，结果在尼泊尔边境的旅馆住宿时，那家旅馆正好发生窃案，饭店已经报案要警察来问话，对每一名旅客的身分和行李都会查问。当时旅馆外面是稻田，这两个送钱的人担心机密外泄，因而趁警察不注意时把钱扔到稻田里，身上只留了三万元，事后又趁警察走后旅馆不注意时把钱捡回来，那两个人说三万元是要给加德满都的西藏办事处，但后者说不知道，后来这两个人被押到加德满都。

眼看送钱时间已到，我却没有获得通知，我猜想一定是出事了，于是马上从大吉岭派人去了解情况。那个派去的人正好坐在火车站一个茶馆内吃茶，火车刚好停在站旁，两个藏人坐的位置旁的窗户正好对著茶馆，两人一看到是自己人，赶快叫他过去，就把扔在稻田里的钱给他了，但三万还留在身上，会这么巧真是是佛祖保佑。

但因为西藏办事处向警方表示并不知情，这两人于是又改口说钱是做生意用的，因为交待不清坐了六个月的牢，三万元也因此被没收了。”

在美方提供武器与经费的支援下，木斯塘的游击行动成为西藏抗暴运动的另一个延伸。拉莫才仁说，他们会坚守木斯塘，是为了要让西藏人心中知道在木斯塘还有藏人的军队，可以鼓舞藏人斗志，另外也希望能争取国际支援。但藏人心里也了解，美国之所以帮助西藏是为了要阻止共产主义蔓延，还有则是为支持少数民族的独立与收集情报，所以才支持木斯塘的武装行动。

依照藏人的意志，游击战绝对要继续下去，不能撤退，但后来美国却告诉藏人，因为他们的国家政策转变，要和中共建立关系，所以军事援助要宣布停止。木斯塘武装抗暴必须结束，美方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复员工作，全部军队要变成良民。

西藏人无可奈何，这时木斯塘内部正因为总指挥根益西私自将军款纳入私囊闹得不可开交，总指挥的职务由甲德旺堆所取代，根益西率领他的支持者离开后，却将木斯塘的军事机密全盘向尼泊尔政府揭发，尼泊尔政府因此要求木斯塘军队必须尊重他们的国家主权，尽早交枪。

尼泊尔政府在木斯塘还未解除武装前，要总指挥甲德旺堆把所有的非法武器交给尼泊尔政府，旺堆表示同意，但要先让他了解复员（退除役转业等辅导工作）的详细情形，他才愿意让军队解除武装、交出武器。尼泊尔政府内政部秘书长于是要旺堆先做一个复员计画，旺堆就要拉莫才仁到尼泊尔进行这个计画。

拉莫才仁说到，没有想到正在做这个复员计画时却遭人密告而被逮捕，尼泊尔视他为麻烦人物，因为他有两次到木斯塘，尼泊尔政府竟然都不知道。审问时拉莫才仁被问到：“你到尼泊尔来有什么合法文件？”、“是哪一个人派你到尼泊尔来？”、“是谁授权给你做复员计画？”拉莫才仁回答：“是你们秘书长让我来做复员计画的，我没有文件，是你们请我来的。”

后来拉莫才仁被关了七年，他们先把他关在警察训练中心的招待所，三年后又关到监狱中重新审问，并且完全禁止家人探望。

尼泊尔政府又派人向拉莫才仁说：“你要写信调动十六个连的负责人到波拉开会，再写信给旺堆要他交出武器。”拉莫才仁说他只在经济方面负责任，只向嘉乐顿珠负责，并没有权要人交出武器或要人开会。

在重新审问时，他们说已晓得拉莫才仁是木斯塘的负责人，当然他们知道嘉乐顿珠是最高负责人，但嘉乐不在尼泊尔。拉莫才仁被问到：“你说良心话，你是不是错了，尼泊尔是个独立主权国家，你在独立主权国家的土地上集中很多人，供给很多武器去攻击我们的朋友中国人，这是合法还是不合法？”

拉莫才仁当时回答说："可以说是合法、也可以说是不合法；为什么合法？是因为木斯塘军队成立十四年，你们也有军队、警察在当地，十四年来大家互相请客吃饭，这还是小事，旺堆还送了一匹马和礼物给你们的国王，我们又为你们修飞机场，这看起来似乎是合法的。但因为尼泊尔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们藏人在这里成立武装基地，以这个观点来看则是不合法的。"

木斯塘游击成员恰城久美指出，拉莫才仁被捕后，尼泊尔就开始今天一百、明天五百、后天三百的赶人离开，并且要藏人交枪，尼泊尔的军队也一直增加。但藏人想到若要作战实在非常为难，尼泊尔境内有很多藏人，拉莫才仁又在他们手上，如果发生战争连藏人都要陷入困境。但若是交枪，以前大家受了那么多的苦、费了那么多的劲才组成的军队，都将化为泡影，所以非常为难。不过最后大家还是决定交枪，且交枪的条件就是要换回拉莫才仁，但大家也做好战斗准备，嘉玛阿楚也说，当时他在尼泊尔的波克拉时，拉莫才仁被捕后，尼泊尔政府认为拉莫才仁不但在尼泊尔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军队，还私设七个电台，简直是罪大恶极。

一个尼泊尔警察也对嘉玛阿楚说："你们该交枪了，在以往的十三年里，我们认为你们可能会有所作为，但是十三年你们什么事也没干出来，现在山的那边是老虎（中国），山的这边是豹（印度），我们尼泊尔是羔羊，我们谁也不想得罪。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建立军队，是不是要反抗我们尼泊尔政府？如果不是你们就应该要交枪。"

嘉玛阿楚回答："我们不是反对尼泊尔，我们可以交枪，但是我们藏人的军队不像其他的正规军，枪说放下就放下，我们的枪都是藏人自己从西藏带过来的，属私有财产，而且军令也不是那么严的，所以请延迟交枪。"还说了很多好话。

这时甲德旺堆要嘉玛阿楚去印度达兰莎拉向达赖喇嘛请示该如何做，于是嘉玛阿楚秘密跑到加德满都，再坐车到印度德里，德里那里正好在罢工，找不到车，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到达兰莎拉，他先向流亡政府的内政部长旺德多杰说明此事。旺德第二天就安排他去见达赖喇嘛。

嘉玛阿楚向达赖喇嘛报告了一切，达赖喇嘛问："是不是甲德旺堆要和尼泊尔打仗啊？"嘉玛阿楚回答："不是，他只是把军队集中，一则威胁尼泊尔军队，同时想如此可以促使他们释放拉莫才仁。"

达赖喇嘛说："不能打尼泊尔，和尼泊尔是绝对不能打的，尼泊尔国家很小，中国那么大，尼泊尔的困难连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你们应该把枪交了，我知道你们做了非常大的努力，费了很大的劲，才有这个枪，这个枪对你们是很宝贵的，要你们交枪你们一定是感到遗憾痛苦。但不要担心，如果真要用枪，枪从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的，不要把它看得很重，你们应该是交了好，明天我要录音，再派一些人过去处理！"

第二天，达赖喇嘛决定派他的姐夫达拉朋措札西去处理，达赖喇嘛并且把他的意见做成录音带，让达拉和嘉玛阿楚二人带到木斯塘给当地的士兵听。达赖喇嘛在录音带中说，跟尼泊尔作战没有意义，尤其是现在已有数千名西藏难民在尼泊尔定居，战争势必会连累他们，何况藏人本来应该要感谢尼泊尔政府。因此现在木斯塘应该要放下武器，开始和平的定居下来，西藏的奋斗绝非一蹴可及，必须从长计议。

两人坐飞机到尼泊尔后，达拉先去西藏办事处，嘉玛阿楚先去波克拉，就把达赖喇嘛的录音带托百长丹巴与慈仁纳禄二人送到木斯塘，到了木斯塘甲德旺堆就把录音带放给大家听，士兵们听了录音带后都哭了。录音带内听到达赖喇嘛要大家交枪，然而一旦交了枪，没有枪后就再也不是士兵了，但大家又不敢违背达赖喇嘛，于是哭了好一阵子。最后就把一小部分的枪交出，大部分的枪却藏在外面。

当时有一木斯塘游击士兵叫巴青，木斯塘让巴青负责去交枪给尼泊尔政府，尼泊尔警察把他全身上下都搜了一遍，交枪后他自己在尼泊尔商店买了一把刀，回来后在房子内喃喃自

语的说：“错了，错了，这次我们错了，我们怎么能交枪呢？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他在任何时候都会说不要杀人、不要打仗，怎么会下打仗的命令呢？嗳呀，我们错了，我们错了。”[/font]

他说著说著，突然拿出刀子，用左手使劲一割，脖子后面的筋和皮全被割掉了，差点整个头都被砍下来，满屋子全是血。

但枪交得愈多，尼泊尔的态度就愈强硬。代总指挥甲德旺堆已把部分的枪收起来，带了人先离开，他并且要二个连不要交枪，一个是恰城久美的连，一个是壤壤的连。尼泊尔军队已经准备要抓这名总指挥。

有一天突然来了四百多名尼泊尔士兵到附近村庄，恰城久美马上派人去阻挡，希望他们不要再往前走。尼泊尔军队要求谈判，恰城久美心想这一趟非常危险，可能一去回不来，所以腰间别了一把手枪，外面别了一把剑，带了二个村长，另外带了七个士兵，把袖子卷到上臂缠上红带子。尼泊尔士兵只注意到他们八人根本没有作战准备，并不知道另外六十四名藏人已悄悄把附近有利地形全掌握了。但村民害怕会打起来，都在那边发抖，又不敢说。

去了后，两个村长坐中间，四面坐的都是尼泊尔军官，一名尼泊尔军官开口说：“我们感到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地方都没有碰到任何人阻拦，我们只尊重尼泊尔国王的命令，因此你们命令我们不要前进我难以遵从，而且其他地方都已经交枪了，你为什么不交呢？我们一来康巴军官都献哈达来见我们，你为什么没来？你不来就是违法，不让我们过去也是违法，你是当兵的，战争是怎么回事你也相当清楚，所以我建议你把枪交了。”

之后恰城久美就说：“到目前为止已十几年了，没有遇到一个人来，我也不知道你是否真的是尼泊尔代表，现在我知道后，我不是也拿了糌粑和茶来招待你吗？我吃的就是这些，多的我也没有了，而且枪我不知是否应该交给你，枪是旺堆交给我们的，所以我必须交给他，再由他交给你，这样才对，希望你等三天，三天后旺堆来了就交。”

对方又说：“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我拿尼泊尔的薪俸已有廿一年了，我非常想念我的妻子和孩子，但是我今天只能忠于尼泊尔国王来执行他的命令，就是要你们交枪。”

恰城久美又说：“好得很，你确实应该忠于你国王的命令，就像我应该要忠于我上司的命令是完全相同的，我虽然没有廿一年吃薪俸的历史，但是从一九五四年开始，我就一直和中国共产党打仗，我也是一个遵照命令、听从命令的军人，而且我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我想的就是西藏的独立，如果在上面的旺堆和尼泊尔政府已经在和好，我们下面的人却打起来可能不太好，所以我才说要等三天，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们这么多人，如何等三天？”对方讲得很凶。

“三天又有什么关系？和平解决的结局最好，战争解决可能很快，但尾巴会拖得非常长，所以还是等的好。”恰城久美说。

“三天后如果旺堆没来，我再来这里，我们再商量，我会来的，我的敌人是红汉人、红色中国，而不是尼泊尔人，所以我一定会来的。”久美再说。

最后两个村长保证恰城久美会如期回来，双方保证后，临走时和尼泊尔军队握手，其中尼泊尔军队中的藏人和恰城久美握手握得很紧、很紧。

甲德旺堆领了四十多名有枪的人开始逃跑，恰城久美和壤壤骑著单马在后面追，最后在一个山沟中追到了，旺堆问他们是要留下来还是逃？他们二人说留下来虽然会被抓，但他们要和当地士兵一起共患难。另外还有一个叫札钦国切的也不愿意走，于是三个人就骑著单马回来了。

甲德旺堆逃到多波，还属于尼泊尔境内，眼看再翻一个山梁就到印度边境了。当时他们一共有四十个人，但当时已有八个尼泊尔军、和七个根益西的人正在山梁埋伏，甲德旺堆在前面率了五个人要过去时，立刻枪声四起，双方展开一场枪战，甲德旺堆中弹身亡。

双方打起来时后面的包括昌都才多杰、安多降巴将近四十个人在后面休息，一听到前面

打起来也不支援，转身就往后面跑，跑到山沟中将三十多匹骡子的货物全部翻出来，背起来后翻山逃跑。这时甲德旺堆的一匹马从原路逃回来了，马褡子上有二十万卢比，他们又把这个钱背上翻过山逃跑了。

有一个叫阿夏玛的负了伤走不动，他们就留了一匹骡子给他，没再管他。阿夏玛骑上骡子到甲德旺堆死的地方，结果尼泊尔军队和根益西的人早就跑走了，五个尸体就躺在那里，甲德旺堆死时，枪还一直拿在手上。

还有一个叫丹增才仁的，是死在另一处，另外二个年轻牧民和马尸死在一起。阿夏玛没有办法，只好走原路回到尼泊尔军队那里投降，结果尼泊尔知道已经没人了，于是派人去尸体现场，最主要是确定死者身分。

旺堆被杀后，这时尼泊尔内政部秘书长、一个将军、警察总长、西藏驻尼泊尔办事处主任南嘉等人来都到宗萨巴，并且通知壤壤、恰城久美、札钦国切、丹增朋措来开会，当时他们手上都有枪。

藏人知道情势不妙，很可能要入狱，于是大家决定一定要团结起来，要设法保住在当地财产。回来后尼泊尔人向恰城、壤壤还有嘉玛阿楚说，你们去看看给你们安排的定居点是不是满意？于是壤壤共三人乘直升机到波特拉去看定居点，他们先是被安置在一个旅馆中，然后趁此机会把他们逮捕。另外札钦国切也被抓了起来。

被带到监狱后，连进了三道门，大家看到拉莫才仁，所有人就关在一起了。大家都被押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每个人的两边都有人警卫著，后面有一些人胸前有星星的拿著枪非常的威严，几天审讯后就分别关押。

当时木斯塘军队有多人先后被关押，有的关押几个月、有的关押一年就释放了，但拉莫才仁等七人却一直被审讯了大概六年左右，并且有一年多的时间没人理会。

这七个人分别是恰城久美、拉莫才仁、贝卡、札钦国切、理塘壤壤、嘉玛阿楚、阿夏玛共七人。罪名是“违背尼泊尔王国宪法，非法建立武装”，本来应处死刑，但因他们是外国人，所以判无期徒刑。

其中壤壤和恰城久美被关在另一个监狱中，一年二个月根本没出过门，见不到太阳，他们猜想可能是由于他们二人没有交枪的缘故吧！尼泊尔不让他们学藏文，他们二人又拒绝学习尼泊尔语，后来才让他们在太阳底下十五分钟，太久没有见到阳光了，第一天是头昏眼花。

在另一个监狱关的是札钦国切、贝卡、嘉玛阿楚、阿夏玛、和拉莫才仁，大约五年后，才又把他们所有人关在一起。

就这样关了七年多后，西藏政府和中国关系好起来了，据说嘉乐顿珠曾向邓小平说：“我有七个人还在尼泊尔监狱中，希望你把他们释放。”邓小平笑著说他没有权力干涉尼泊尔国家内政，但可以写信告诉他们他不反对释放这七人。

后来据说尼泊尔也收到这封信，这时人民法庭先判他们无期徒刑，然后要他们上诉，他们上诉到高等法院，在尼泊尔算是获释了。

尼泊尔政府要求他们七人离开尼泊尔，但因为组织在这里，有些人不愿意离开，结果阿夏玛、理塘壤壤、札钦国切又被抓起来了，理塘壤壤后来得了癌症死在狱中，其他人后来则被放出来了。

拉莫才仁出狱时已是一九七九年了。

已经年老、身体愈形虚弱的拉莫才仁说，木斯塘当初整个边境都被藏人占了，他真觉得很对不起尼泊尔政府，当然在西藏是为了西藏的民族独立，这似乎是合情合理，但藏人在木斯塘有武器、有电台、没有尊重别人的国家，确实是非法，所以难怪尼泊尔政府会解除他们的武装。

同时，木斯塘游击行动只能向中国军队进行骚扰行动，藏人社会在当时并不认为这个游击队有什么能力可以对付中国，甚至达赖喇嘛也提到，因为木斯塘的后勤补给未能有妥善规

画，以致多次狙击行动并没发挥太大的效果。

但曾经参加游击战的嘉玛阿楚说，藏人心知仅木斯塘两千人是不可能打败中国人的，即使能打死一些中国人，西藏也会有很多的损失，这不是他们的目的。但当时他们潜入西藏夺得很多文件，这些文件对美国也很有利，美国才因此加强支援，加强支援后对西藏就有利。

嘉玛阿楚说："我们的目的是让世界人民知道，还有西藏人的武装在抵抗中国人的军队，这点非常重要。"

嘉玛阿楚记得，美国人在实施训练时也曾这样告诉藏人："不要奢望打败中国人，也不要奢望可以靠自己打仗而解放自己的土地，你们的目的是表现，让人知道达赖喇嘛的军队在那个地方，仍然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民族被灭亡而在作战。

你们没有多少人，死一个就是一个，没有后继的，如果和中国人硬拼就像老鼠咬大象的脚，没什么效果的。但要定期骚扰，让世界的人知道你们在那里一直有事，中国也一直有很多军队牵制在那里，那样对他们是个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西藏人民还在进行反抗，这才是至关利益，而不是打死几个人。"

嘉玛阿楚认为，如果有人认为把中国人赶出西藏是他们应有的目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西藏人到现在还没有屈服，以及让西藏内部的人知道还有一支西藏游击队在那里反抗，这些目的是达到了。

成为西藏老兵的旺青多杰说，他们为了西藏和中国打仗，每次出征前都会在文件上签字："如果战死不需要政府任何的抚恤金，若有剩下财物愿全数奉献给达赖喇嘛与贫穷的人。"但是政府却把这些事给停止了，大家都受过训练，有很多人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他并不清楚。旺青多杰说："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生，也是最遗憾的。"

关于木斯塘这个武装组织的结局，达赖喇嘛说："绝大部分游击队都放下了武器，但少数人，大约是一百人无视于我的请求，结果被尼泊尔军逐出国界，最后他们遇到埋伏，壮烈而死。"达赖喇嘛说："这可能正符合他们的心愿，而西藏流亡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也于焉结束。"

第十一章 美国的介入

在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大规模的抗暴行动形同瓦解，西藏内部只剩下零星与小型的游击战，彷彿已知大势已去。但就在中藏战争即将终息之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却承诺提供武器与训练，使战争又延续了将近十年之久，西藏因为美方介入增强了武装的力量与信心，谁知最后亦因美国退出，落得饮恨接受战败的结局。这是西藏抗暴历史上既悲壮又无奈的一页，藏人的失落，让人不得不去回顾美国介入的是非与利弊得失。

美国实质介入武装行动后，确曾为西藏人提供了强力奥援，但起实质作用的时间应是在西藏抗暴运动的后期。然而在中国一贯"反帝国主义"的论调下，整场抗暴运动都成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从最早的昌都战役起，美国便已开始介入西藏抗暴运动。在中国这种说法的解释架构下，抗暴全是"外力煽惑"，藏人毫无自主性可言。

中国国务院于一九九二年在北京发表的"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中提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前，第一批美国枪枝弹药已经悄悄地运到西藏。

中国国务院说，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美国人劳尔.汤姆斯以"无线电评论员"名义在西藏探索"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援助"的可能性，并在美国报刊上报导："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一九五 0 年上半年，一批美国枪枝弹药经由加尔各答运入西藏，用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

这份白皮书又提到到，同年十一月一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诬蔑中国解放本国领土西藏是"侵略"。同月，美国还指使他国在联合国提出干涉中国西藏的提案。

并且，中国还根据美国人诺曼.C.霍尔著的"美国、西藏和中国"一书中所披露，一九

五七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旅居国外的藏人中挑选六名青年，送到美国的关岛，接受识图、发报机、射击和跳伞训练。此后，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海尔营地分批训练“康巴游击队员”达一百七十人，经训练的“康巴游击队员”被分批空投或潜回西藏，以“建立有效的抵抗运动”、“反对中国人的占领”。

另外，中国又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远东经济评论”所载“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一文记述：

“一九五八年五月，首批受美训练的两名特务携带电台到叛乱头目安珠贡保札西设在山南的总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

不久，美国即在竹古塘地区空投一批武器弹药给叛乱份子，计轻机枪廿梃、迫击炮二门、步枪一百枝、手榴弹六百枚、炮弹六百发、子弹近四万发。这一时期，美国还从陆路偷运大批武器弹药供给盘踞山南的叛乱份子。”

中国的指控令外界感觉到美国在整个西藏游击战争中，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但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却表示，他与美方联系才导入美国的介入，在这之前，藏人的游击行动全是自发而起。“四水六岭”成员洛桑丹增指出，当时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是与美国联系的主要人物，美国曾经空投包括食物、枪枝、机关枪、火箭筒等各式补给品给西藏人，但这些行动应是在嘉乐顿珠秘密逃离西藏与外界展开接触后开始。

当年的嘉乐顿珠是个廿来岁的藏族青年，年轻的他被父母送到中国南京学习中文，还曾经得到蒋介石的奖学金补助，很早就与国民党政府有过接触。一九五二年他回到拉萨，当时拉萨正因为中国军队入藏而发生通货膨胀等政治经济问题，藏人因此走上街头，要求“中国人离开西藏”，几个主张“西藏独立”的团体也在此时酝酿而生。

嘉乐顿珠看到民间对中国极度的反感，情绪也很高涨，他觉得情况非常危险。在那个时候，共产党也很希望能借助嘉乐顿珠在西藏做些事，他们向嘉乐顿珠说：“嘉乐你回来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我们支持你、支持达赖喇嘛，但其他所有不喜欢份子都要收拾乾净。”

嘉乐顿珠说，共产党那时常说藏族和老百姓之所以会反对他们，都是因为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所导致。而且那时达赖喇嘛年纪轻，有两个摄政王（鲁康娃与罗桑札西），共产党就骂那两个人是美帝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但嘉乐表示，如果那一天把这两个摄政王请来，大家一起问他们：“美国在什么地方？”恐怕他们连美国这个国家在世界那一个角落、在西藏的东西南北方都不知道。

但是中国还是说：“他们是特务，所以要杀他们、抓他们。”嘉乐说他一直劝共产党，劝了好几个月，但是没有任何效果，中国的态度很恶劣，军队又不断镇压杀人、抓人。嘉乐感到非常为难，他说：“我的父母送我到中国去念书学汉文、汉语、看内地的情形，主要希望将来可以帮助藏族人民建立汉藏两个民族的关系，但是共产党却反而想利用我来镇压人民。

我不能违背良心，被共产党利用做为一个工具来镇压人民。但另一方面我又实在没有什么力量来反对。现在共产党大军早已来到，藏族人民如此可怜，却没有能力与知识来反对共产党，有什么办法呢？

因此，最好的方法是不要让共产党利用，但如果我牵涉到反对共产党的民间活动中，共产党会怀疑是达赖喇嘛派我去做这些事情，为了不要为难达赖喇嘛，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只有安安静静、秘密离开西藏，逃离到印度去，到印度去也许可以做一些事。

首先，我希望印度尼赫鲁总理能帮忙劝劝中国；其次，现在西藏和外界什么关系都断掉了，假如和共产党搞得不好，发生大混乱，连逃难的地方都没有。而印度虽是西藏的邻居，双方若毫无关系，将来便不会同意我们入境，因此我想先与印度政府、老百姓联系，慢慢把西藏的困难讲给他们听，让外界可以知道西藏的情况，将来若真的发生混乱，西藏人民要逃跑时，便可以退到印度。”

当时是一九五二年八月。在临走之前，嘉乐和妈妈、弟弟（达赖的哥哥，名为洛桑桑旦，

已过世）三个人商量，其他人谁也不知道。嘉乐说，不让达赖喇嘛知道是担心假如共产党问他，晓不晓得你哥哥离开的情形，达赖喇嘛不知道的话还可以否认，所以事前并没有告诉达赖喇嘛。

为了保密，其他西藏官员也全被蒙在鼓里。嘉乐说，当时很多西藏官员和贵族是与共产党合作的，因为共产党拿了很多国民党离开后的袁大头，运到西藏来发薪水给西藏的政府官员，所以西藏很多高级人士，都是与共产党合作的，当然也有些官员是很忠心于西藏人民的，情形非常混乱。

嘉乐顿珠虽不能代表西藏政府，但因为他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因此在他还没有逃出来前，那时印度有个领事馆在拉萨，他曾经在那里秘密地打了个电报给印度总理尼赫鲁，一九四九年当嘉乐顿珠初次从南京来到印度时，两人就曾见过面，已是彼此认识。嘉乐要求能让他住在印度的大吉岭，并且到了印度后能够与总理联络。

结果尼赫鲁马上回话，表示了欢迎之意。尼赫鲁还问嘉乐，边境那么长，要从那个方向来？嘉乐就说大概会从西藏南部入境进入印度，这条路径就是后来达赖喇嘛出走的逃亡路线。

嘉乐说，曾有人认为他是去先探路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九年共七年的时间里，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所有西藏对外联络全是从嘉乐到了印度后才展开；同一时间在西藏内部，西藏自治区、青海藏区、四川藏区都发生了抗暴运动，但是因为在武器装备上不如中国，藏民也缺乏军事训练，一路渐渐败下阵来。因此，到一九五四年时，有很多游击人员与组织到印度找嘉乐顿珠，希望嘉乐能设法提供武器以持续战斗。

起先嘉乐都是劝阻的态度，毕竟这不是他来印度的目的，而且西藏人也没有能力去反抗共产党。但是同为藏人，他了解到西藏人的感觉很绝望，游牧民族本有的枪是很落后的，那有力量对付中国现代化的装备？藏人终究已经走投无路，于是他便写信给台湾、美国和印度政府，开始做牵线的工作。

嘉乐和印度、美国的联络，主要偏重在政治接触上，至于军事细节，如有关如何接头、派人训练、空投、美国中情局如何帮忙等工作，都是由他的助理拉莫才仁在做。

嘉乐说，美国会同意提供协助，是因为他们想搞清楚西藏里面的情形，才决定秘密训练部分藏人，因此一开始都是通讯训练，训练完后的藏人游击队就被空投到西藏境内，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嘉乐说，那时西藏已经闹得很厉害，青海、四川打得很厉害，也打死很多藏族人，美国训练了相当一部分藏人，他们从四川、青海派到美国去，训练后又空投到西藏。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第一批受训者连阿塔在内一共有七人被派到美国学习，一开始时只知道要接受美军训练，训练的地点正是被美军占领的琉球。经过八个月的学习后，阿塔学会报务，另外又学了埋地雷、炸毁桥梁、各种枪枝用法、空降、及如何当一个情报人员等。一九五七年时阿塔空降到拉萨，另有二人空降到山南，四人空降到康区。

一九五九年情况转为紧急，阿塔说，达赖从山南被护送到印度时，他每天以发报机和美国联系，告诉美国护送的情况。透过这些现代通讯器材，美方当时曾经及时掌握西藏内部达赖喇嘛的逃亡情报。

另一“四水六岭”成员色德月说，一九五九年四月时，他被派到美国科罗拉多州学习，当时一共有十八人一同前往，最后十八人都被空降到西藏康区。返回康区后他们便与当地的游击组织进行联系，当地自行组成的武装民兵共有一万多人。后来他们又与美国联系，美国提供了枪枝弹药、高射机枪、轻机枪等武器，枪枝发下去后他们又在不同地区与解放军搏斗了一年。

西藏人布桑则提到他在六 0 年代初与其他廿人到美军驻地琉球受训，“林园”是训练基地的代号。布桑是在一九六 0 年三月廿二日从大吉岭出发，六一年三月又从琉球出发到日本，然后从日本到泰国，三月十五日被空降在西藏昌都以南的芒康地区。

布桑回忆说，当他们被空投时，西藏已被中共占领，不过“雪域护教志愿军”的札巴喇嘛还在坚持，当时芒康因为来了很多中国军队，大家就在山上打游击，单是四月九日那天就打了九次仗，双方战事很激烈，解放军和西藏游击队互相喊话要对方投降，到十五日时已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也留下服毒自尽或被俘的悲剧。

藏人旺青多杰从十八岁就加入四水六岭组织，在西藏军事失败后，他于一九六二年被派到美国受训，与他同行的一共是十四人，等他到了琉球这个训练基地时，他算了算，西藏战士一共是一百三十余人。

阿塔说，据他了解，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康巴人曾经到美国受训的共有三百多人，这些训练人员首先都是在太平洋上的琉球岛训练，后来改成先在琉球检查身体，再送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然后直接空降到康区的十一个地区，直到一九六三年都与中国部队保持作战，美军也一直支援不同的武器和弹药。

负责军事接触的拉莫才仁则说明，美国一共采取了八次的空投行动，空投地点全是在西藏境内。拉莫才仁说：

“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期间，美国派阿塔、洛蔡等电报员空投到西藏的泽塘，任务是到拉萨与西藏政府建立联系。紧接著第二批空投到理塘、第三批空投到北方的南木措、第四、五、六次都是空投到边坝，第八次空投到芒康是最后一次。每次空投成员包括电报员、医务人员与游击战士等。

另外还有一些在接受完美国中情局训练后，是从地面进入西藏，而非空投，这些受训队员的目的是要在当地建立反抗军等地下组织。

在山南四水六岭成军时期，美国共空投三次，那时嘉乐顿珠和美国接头，要求他们给予支援，但还不是正式支援，不能公开，所有武器都是从外面买（如从捷克、日本、德国等），然后再空投给四水六岭，表面上美国并未公开介入，但已给予支援。

自从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后，美国才公开支持，然后开始供给美国自制的武器。美国的目的是在阻挡共产国家蔓延、支持少数民族独立运动、以及搜集情报。在西藏搜集情报对他们当然相当重要，这是他们当时的主要目的，这个世界都是互相利用，他们不可能是完全同情，也有自己的目的。”

有部分“四水六岭”战士开始被送到国外受训，嘉玛阿楚是被派到美国受训的其中一人，他提到他们主要从大吉岭出发，然后进入印巴边境，巴基斯坦的边防军会在边境等候，然后再用车把他们送到飞机场，有美国人在飞机场接受训人员。

飞机先降落日本的琉球，住一个星期检查身体后前往美国。美国人找了一个和西藏类似的地理环境（科罗拉多州海勒营地），山上有许多岩石和森林，嘉玛阿楚等四水六岭战士学了射击、保密、爆炸、看地图、测制地形、研究游击战术。嘉玛阿楚谈到当时训练的情形说：“在美国训练时早上起来马上就吃饭，吃完就出门，根本不让你闲著，要不就是打球、学习藏文，有时就把自己的行李全部背起来然后爬山，那个山高就爬那个山，下午再回来，反正都不能休息。有时炸铁轨、公路、桥梁，让我们用炸药炸，子弹根本用不完，只要愿意打就拼命打、射击，规定的子弹没打完就被认为不及格、不努力。

我们被教导，一次突击行动必须要研拟三条退路，如果没有三条路可退就不要去。

所有四水六岭的受训成员不仅学藏文，还要学数学，如测量、绘制地图、因为受训的人中有文盲，如果不会藏文，得到情报也不知如何记录、发放情报、或在地上标地名等。除了空投的以外，其他人都是步行回来的。按照过去路径先从东巴基斯坦，然后偷越国境进入印度、再秘密进入尼泊尔，一路上秘密行事，并没有碰到大麻烦。”

另一四水六岭成员卡列降巴说，他认识安珠贡保札西，于是他到大吉岭，和嘉乐顿珠、拉木才仁见了面，也得到机会到美国受训。卡列降巴说，前六个月他们被训练如何使用军械，后来分班他被安排在炸弹组，学了各种名目的炸弹、拉雷那一类的弹药；还有的是学习如何

保密、联络；课程中也有政治学习，全部共学了一年又四个月。

据嘉玛阿楚指出，美国先空投了四个连的武器，要四个人去指挥四个连。后来又空投三个连的武器，一共给了七个连的武器。美国的计画是七个连去打仗，其他人在后面补充，如果前面的人死了，武器就由后面的人取用。

但到木斯塘时每个人都想要有武器，大家挤来挤去，吵闹很厉害，不得已只好将武器一分为二，四个连的武器分到八个连手中，三个连的武器分到六个连，一半有武器一半没有，但总部的武装是另外计算的。

拉莫才仁说，四水六岭军过来时人人都没有枪，因为枪在逃亡到门达旺边境时，都交给印度了。在美国空投了三次后，总计有十个连是完全装备，六个连一半有枪、一半没枪，钱方面，美国从一九六二年后在每个月会定期给钱，到一九六九年复原时钱数都没有改变，至于服装、帐房、医药费、骡马等费用都是另外计算的。

一九六一年三月空投后，四水六岭军就先渡过雅鲁藏布江潜回西藏进行游击战，但雅鲁藏布江夏天水太急，只能冬天过，四水六岭打游击时就设法先破坏新疆到西藏的新藏公路、破坏桥梁、哨站、也破坏他们的汽车运输。美国人把他们在越战中的经验拿来训练藏人，另外的一些游击战术如声东击西、速战速决、攻击敌人的薄弱点等，再破坏他们的补给线，这些美国人都教了。

但因为四水六岭并不是正规军，几次的突击行动下来，木斯塘游击部队从解放军那里得来的武器并不多，而且在西藏主要工作是搜集情报，以为下一次的游击战做准备，例如经常要刺探情报如公路修到什么地方，公路是如何修的，有时也会进行一些伏击，但也是打了就跑。大部分工作还是在探听消息的情报工作上，并著眼于未来成立地下组织，当时这些以电台为主的游击据点都已建立，电台设备也是美国空投得来的。

然而，就在木斯塘继续游击行动时，美国却在一九六九年突然通知嘉乐顿珠要停止接济，他们说美国正在与中国建立关系，所以不能再支持了，希望藏人能以三年的时间辅导士兵退伍，并做好计画。木斯塘总部接到这个讯息时非常不高兴，大家觉得美方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但又能如何呢？

拉莫才仁说，那时有两个人在得知止接济的消息后，表示绝不投降就自杀了。这些人很激动地说，五年内藏人可以顶得住，每一个连都可以抵抗、自己生存。这两个人很激愤，后来一个上吊、一个跳河自杀。

嘉乐顿珠则说，一九六九年时美国政府出卖西藏，那时美国政府说明之所以无法继续支持游击行动，是为了建立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而且当时中国政府共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另一个则是停止一切对达赖喇嘛的支持。

美国当时提出的军事援助，也并未提供足够的力量协助西藏人进行游击战，至今仍令藏人耿耿于怀。嘉乐顿珠难过地说，他实在没想到美国人只是随便给他们一些枪而已，美国前中情局副局长曾经问嘉乐对这件事情有什么评价。

嘉乐说："这个代价太大了，美国人说要帮我们的忙，答应了我们的事情，最后不管是政治也好，武器方面也好，通通都没有做到。"

嘉乐说："美国后来在政治方面出卖我们，武器也出卖我们，比如在西藏南部有数万个游击工作人员，美国人却只给我们四百五十枝枪，而且更因此惊动了中国共产党派大军来镇压，这不是开玩笑吗？西藏死了很多人，又让我们西藏人一千年来辛苦建立的宗教文物，通通都烧掉了，这代价太大了，你们还能说几万人的地方给四百五十枝枪是好的吗？"

拉莫才仁也说，在攻打泽塘期间，美国方面除了第一批说明为训练用的少量武器外，一直没有及时空投，反而向色东月、堂巴仓旺青、扎噶布鲁等空投游击队员所在的硕达洛地区扔了大量的武器，他们散发了一些，据说也有未及散发而被敌缴获。

美国人都只是口头承诺嘉乐顿珠，从来不曾给书面承诺。嘉乐说，美国总统艾森豪曾经

派人来说，达赖喇嘛若能逃出西藏，他们一定会支持西藏的独立运动，会支持达赖到争取到独立的那一天为止。嘉乐顿珠说，美国曾说他们在军事、金钱都会支持，这点美国人答应过很多次，一九五０、五一年答应过一次，五八年又答应过一次，都是总统派来的工作人员（外交部、情治人员、国务院），这些都是他经手的。

但一九五一年达赖没有出来，一九五六年时美国本来希望达赖访问印度时能住下来，但那时候达赖喇嘛又回去了。到了一九五八年时美国第三次要求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并说绝对会在经济、军事上支持，会一直支持到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时止。

后来嘉乐顿珠告诉美国人，大家好来好去，是你们主动来说要帮忙的，今天你们说有困难，要承认共产党，非要把西藏出卖不可，那没有办法了，吵也没有用，现在我们说再见，也许不久的将来可以重新握手也说不定。

对于这段历史，过去藏人曾经向美国保证绝不外泄，但现在随著时间与国际局势流转，这段往事在美国与西藏都已开始解密。藏人俯思既往，心中都有许多感慨。

在西藏抗暴的血泪记录中，除了最终因为美国停止援助，使得抗暴行动被迫中断外，另外却也由于有美方提供的金钱支助，造成西藏内部发生流血内斗事件，让西藏人在英勇的抗暴历史上，留下耻辱的烙痕。[/font][font=宋体] 嘉乐顿珠说，原来美国给木斯塘的钱，分别是由美、印度、西藏三个地方发出，再送到木斯塘给工作人员，钱到了木斯塘，即是由总指挥根益西一人负责，不料最后却发生钱都给根益西（又称巴哇益西）拿走的争议。

又不愿意存在银行内，所以引起木斯塘十三个连起来反对，根益西把钱放在两个马褡子内，出行时带来带去，就是不交给银行。十三个连长联合要求嘉乐顿珠出面处理此事，另外的三个连则支持根益西，大家手上都有武器。为了解决纷争，嘉乐因此派他去清点帐目。

拉莫才仁清点后发现有三十多万的钱没有报帐，被根益西保存起来了。根益西向他解释说，钱他是保存了，但因为他在木斯塘杀了很多人，积了很多罪孽，他要用这些钱来整修寺院，将来他会把钱交给嘉乐顿珠，然后买地皮等。

但是拉莫才仁不接受根益西的解释，他说这些钱是军费，根益西却一直不把钱交出来，他从一九六四年派人去问还有多少钱时，根益西回答说没有钱，嘉乐想不应该没有钱啊！才开始怀疑的。嘉乐当时认为眼前是有美国帮忙，但钱不能完全用掉，因为美国中情局帮忙是根据利害关系考量的，如果环境转变、政策改变这些援助就会停止，所以一定要尽量节省，钱一定要好好保存。

拉莫才仁说，美国中情局在建立电台后，如果刚交十万元，就会马上打电报给根益西，美国人知道全部的帐目，但美国人也觉得亚洲人很会吃钱。只有根益西可以打电报表示收到，但怎么用是他决定的事，美国人不晓得，他们也不晓得。

拉莫才仁问根益西，从六四年到现在到底存了多少钱，为什么不讲真话？根益西说，如果嘉乐知道他存了那么多钱，恐怕会停止接济。拉莫才仁要他交钱，他不交，所以双方便冲突起来了。结果反对根益西的十三个连联手将他驱逐，根益西就带了那三十万走了，一行廿多人逃走，但继任的木斯塘总指挥旺堆主张把钱追回来，双方再起冲突，廿个人在山里继续武装抵抗，又不肯投降，最后被旺堆那方打死，还有一个在山上冻死了。

随后又发生一些冲突，根益西到加德满都后，支持根益西的第十二连连长和百长，占据聂香据点，双方又在聂香发生冲突，有两个人被打死，另一方有一个人落水后被冲掉了，这是大家不小心碰上的，根益西那时被任命为安全部助理部长，但他没有到达兰莎拉，所以西藏流亡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调查。

根益西本人在被作者问到此事时并不愿多说，现在木斯塘游击队员对于此事的看法也是分成两派，大多不愿多谈，有些木斯塘队员则认为，根益西的事，是丢脸的事，钱在他自己手里，领头的也是他，其他人谁也不了解美国究竟给了多少钱，但必定按照人口给了很多钱，当时当兵的人很苦，费用都不够，于是一些教官就开始反抗，并要求改善生活，有些了解的

人便支持教官，但不了解的人就说大家是为了权力而争，和根益西过不去，并说根益西为了这个兵营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要支持根益西。

根据部分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指出，由于冲突扩大，后来嘉乐顿珠和拉莫才仁遂派贾德旺堆代替根益西，闹出很多纠纷，根益西最后凑合地交帐了，大家还开了宴席欢送根益西。但最后根益西并没有前往达兰莎拉去担任安全部助理部长，而是跑到支持他的宁香，即第十二连的驻地。

事情闹大后，有一个追随根益西的人晚上逃跑，大家看到他逃出去就把他拦下，但他却自杀了。另外也有一些人被逮捕，因为听说他们准备在各地闹事，先后一共逮捕了廿一人。后来大部分人都写了保证书，保证不闹事、效忠西藏政府就回去了。但也有四个人不认帐，后来就被叫到法庭内，根据西藏习惯每人抽一百个马鞭，把他们关起来，他们认错后就把他们调到别的连队。

但当时在争执中，因为双方互相开枪，也有一些死伤。有些藏人谈到开枪时非常后悔，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当时不打不行、打也不行。打了违背达赖喇嘛的意旨，不打两面已经交手，觉得一切都将毁于一旦，心中非常非常的痛苦。

冲突是一九六八年开始的事，占领十二连也是同一年，整个事情是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四年间。

拉莫才仁说，大家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开会，也希望根益西参加，后来考虑到木斯塘游击队是非法组织，因此把开会地点改到印度北部流亡政府所在地的达兰莎拉，但请了三次根益西都不来。后来根益西又把情报泄给尼泊尔政府，但当时又不能把这些扯出来，否则印度、美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很多国家都牵涉在里面。这件事根本不能曝光，所以在当时无法解释，也不能解释。

另外一名木斯塘游击队员则说，根益西从木斯塘到宁香十二连，逃跑时他们在后面追杀，当时杀死了二个人，冻死了二个，还有两个人自杀了，后来在山上互相冲突打仗，又打死了六个，共十二个人在此事件中失去生命。而他们这边也死了两个人，双方在宁香打了几天，根益西就向尼泊尔政府投降了。

这名战士说，他觉得这段历史没必要说，真不知西藏后代会怎么想？他们这一代曾经为西藏流了不少血、吃了不少苦，而且确实有为西藏人献身的精神，但后来却自己人打起来了，而且打起来的理由仅仅是为了钱，实在是太丢人了。当时也是迫于无奈，为了钱理智也被淹没了，这些内斗是丑闻，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一个锅内吃饭，后来却自相残杀，实在是太丢脸了。

第十二章 台湾的角色

台湾介入西藏问题，几乎就是在拉萨战役之后，但是，随后而起的西藏独立问题，却因为象徵著藏人新兴的民族主义，深深触伤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即使台湾政府面临著国共决裂、大陆领土被窃据的伤痛，却与北京一样无法接受西藏希望独立的事实。于是，台湾政府在同情藏人反共、却又极力反对西藏独立的前提下，自身立场倍显尴尬。

拉萨战役发生后，当时已经将国民政府播迁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一九五九（民国四十八）年三月发表了一份"告西藏同胞书"，这篇文告并且将西藏内部抗暴，视为国民党政权反共的前哨战。他提到：

"西藏同胞们！

你们这次奋起反共抗暴，浴血作战，乃是我中国大陆全体同胞反共革命最庄严光辉的历史第一页开始，今日我虽身在台湾，但我这一颗心，乃是与你们始终一起反共作战。尤其是这次拉萨战争，我藏胞僧侣，壮烈牺牲，更使我关怀倍切，时刻难忘。我中华民国政府，正

在集中一切力量，给你们以有效的援助。并号召海内外全体同胞，共同一致，给予你们以积极的支持。

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反共抗暴行动，不仅是为了藏族全体的生存，为了藏胞个人的自由，发挥了大无畏的精神，并且对于自由亚洲各民族，各宗教的自由与安全，担当了英勇无比的前锋。所以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主张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站在你们这一边，支援你们！祷告你们的成功！

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西藏同胞们！朱毛共匪的傀儡政权，对于你们反共抗暴的革命运动，使用残忍、狂暴、恐怖、屠杀的手段，企图加以镇压和控制。我深信共匪的武装暴力，纵能一时破坏你们的寺院，劫掠你们的城市，绝对不能毁灭你们革命的意志，和宗教的信仰，只要你们更加坚决，更加勇敢，继续不断的奋斗到底，我必领导全国军民，很快地与你们在大陆上约期会师，共同作战，来完成我们反共抗暴，救国家救民族同胞的神圣使命。”

蒋介石的这份文告，后来成为台湾各有关单位处理西藏问题时的最高指导原则。

当时的台湾，“反共”是基本国策，年年花费庞大预算整军建武中，目的都是为了伺机反攻大陆。在西藏抗暴运动成为国际关注焦点后，很容易便被台湾纳入成为反共政治的一环。“反共”的时代背景拉近了台湾与西藏的距离，另外，台湾民众也以实际捐输，表达对流亡藏人的关切。

在西藏反共抗暴事件发生后，台湾方面经由“中华民国各界援助铁幕内人民争取自由委员会”发动“支援西藏反共抗暴募捐运动”，捐款共超过七百万元台币；在民国四十九（一九六０）年八月一日国民党中常会*告中，得知全部捐款已超过八百万元。

从国民党在最近几年解密的中常会内部资料可看出，从一开始台湾在西藏问题上，很快就陷入“西藏独立”意识的困扰中。在达赖喇嘛逃出西藏后，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八届中常会曾就西藏问题进行讨论。会中指出：“达赖最近曾表示：“一、要求西藏独立；二、成立临时政府；三、将西藏问题提出联合国讨论。”根据种种迹象，国民党判断，达赖可能直接或要求第三国将西藏问题提到联合国进行讨论，会中因此希望就此一情势提出因应对策。

这笔出于人道援助的民间捐赠如何送到西藏人民手中，在国民党内部也出现许多政治上的考量。例如：国民党内部考量到达赖抵印度后，西藏境内之反共抗暴运动与达赖之领导关系已逐渐变化，而现在西藏反共抗暴军之实际领袖与达赖亦存有若干歧见：“因此为兼顾发生实际效用，该项捐款应以下列原则处理：一、以全部捐款的一半作为直接支援现在西藏境内的反共抗暴军之用；二、以另一半给予达赖及救济逃印来台之西藏难胞。”

间已有若干歧见，但资料中的反共抗暴领袖又是指谁也未明言。以后中常会在民国四十八（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五日的第一四九次会议中，则又提到：“已有捐款可直接用以支援西藏之反共抗暴军，如由达赖转送难民，则应再加研究。揆诸达赖最近态度，我政府不必过于勉强寄送，否则亦有损于政府之尊严。”

当时西藏问题的主管机关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二、三、六组、情报局、外交部、大陆灾胞救济总会、蒙藏委员会等。在援助西藏内部抗暴军方面，中常会记录显示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二组第一次拨交美金一万元，第二次拨交美金二万元，两次都是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二组负责转交。

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二组又在中常会会议中报告指出：“在达赖喇嘛脱险抵印后，西藏境内抗暴义军主动约七千八百余人亦均于四、五月间相继撤退来印，当时本组为适应情况，策动藏胞拥护中央，以配合国际宣传起见，乃著本组驻藏边区工作同志与抵印义军义民加强联系，并设法策动其具有代表性之领袖秘密来台，以加强运用。

其间经过缜密部署进行，于去年八月（一九五九年八月）与抗暴军总指挥安珠页保札西、副总指挥津巴嘉措及嘉玛桑佩等正式取得联络，除策动安珠页保札西与津巴嘉措联名上书总裁，表示拥护及效忠政府……，而后嘉玛桑佩来台，则由国家安全局负责接待。

同时，以嘉玛桑佩为义军代表，授予少将官阶，主持义军在台办事处业务，透过该员与在印义军联系，瞭解区内外抗暴军动态，并设法联络运用，俾使藏境之抗暴武力能继续持久战斗。

而在救济金的支用上，四十八（一九五九）年一月时，曾将美金一万元，由本组转交抗暴军总司令安珠页保札西、副总司令津巴嘉措具领；四十九年八月要给美金两万元时，并于十一月携款赴印后，适安珠被印政府调查传讯，本组驻印同志不便接触，本组又将款收回。

而在援助西藏抗暴专款运用上，该款项是由叶干中同志向中央负责具领后，以用于支援抗暴为原则，但为免印度政府注意，引起麻烦，以使用藏名化名为宜，并对外保密。

而且，援助会于五十（一九六一）年四月拨发美金一万元、五十年六月本组派员到达兰莎拉发放救济金共达印币一万五千八百廿五元、五一（一九六二）年元月又在印度大吉岭、噶伦堡、锡金共发放印币三万一千九百五十元。但此次发放时，因藏胞已有传闻均来请求救济。唯我方在发放救济过程中，曾前后受到嘉乐顿珠所派人士之干扰，彼等曾鼓动藏胞反对照相领款，并开会决议请求达赖明令藏民不得领取，及要求印度政府迫令发放人员离境等。”

从国民党中常会的资料可以了解，西藏抗暴事件在国共两党对峙的当时，等于是一个极佳的国际宣传，台湾在救济西藏时不忘策反，对于西藏抗暴军并且给予“义军”的称谓，政治计算远高于人道救济。

尽管由于历史因素使然，台湾在处理西藏问题上或许缺乏弹性，但在国民党中常会提出的许多资讯却明显与事实不符，这些错误资讯出现在台湾执政党最高决策会议上，不但一直误导决策高层，更使得台湾在西藏问题上，从一开始就陷入无法精确掌握真实状况的困局中。

在事隔近四十年之后求证这些事，根本无人听过当时四水六岭领袖安珠贡保札西等人曾被策反效忠台湾政府，而当时为西藏抗暴寻求国际援助的嘉乐顿珠，更不记得安珠曾经告诉他拿过台湾方面的一万美元捐助，但他也不清楚，津巴嘉措是否曾接受这笔钱。

更离谱的是，被台湾视为抗暴藏军代表的嘉玛桑佩，在西藏抗暴组织中，却完全没有担任任何职务，西藏抗暴历史中，也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然而，嘉玛桑佩却被台湾奉为义军首脑，台湾还送给他一栋房子、封他为少将，国民党第二组还能透过这名与西藏抗暴军并无任何关系的人去：“与在印义军联系，瞭解区内外抗暴军动态，并设法联络运用，俾使藏境之抗暴武力能继续持久战斗。”

嘉乐顿珠说，嘉玛桑佩当时与国民党情治人员有若干接触，但是他个人与西藏抗暴组织没有任何联系，他的一切行动完全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宣传，并且是以其个人身分到了台湾的。嘉乐说，当时在印度、尼泊尔有太多的国民党情治人员在那里活动，但这些人员与西藏自发的抗暴运动，没有任何关联。

嘉乐说，叶干中是一名华侨，在当时主要代表台湾情治单位工作，但他从未与叶干中有任何来往。同时，资料中提到有关嘉乐曾经阻挠台湾支援事宜，嘉乐在现在是第一次听说，也完全否认。

由于救济对象错得离谱，加上一笔笔庞大金钱纷纷送入奇怪的人口袋里，使得台湾一再成为藏人指责的对象。不少藏人指责说，台湾钱只是图利少数的投机份子，根本没有帮助到许多贫苦的藏人，因此对台湾当局非常不满。再加上台湾方面始终不愿循达赖喇嘛的管道给予各项救助，都使得“台湾”二字，成为藏人社会中纷争的起源。

同时，从现在台湾公开的有限资料来看，在“西藏独立”逐渐成为西藏抗暴运动的主要诉求后，台湾方面的立场便开始显得踌躇，对于达赖喇嘛、与实际负责政治、军事联系的嘉乐顿珠，也出现了相当的疑虑。民国四十九（一九六０）年七月十八日国民党中常会会议提

出："达赖喇嘛与嘉乐顿珠旨在宣传西藏并非我国领土之一部分，为将来策动西藏独立铺路之阴谋。"

这次会议并且重申："西藏问题我们的立场，当然坚持是国内问题。"

同年十月廿四日会议中，则提到："嘉乐顿珠表示对我方仍有许多不满之处，并认为我方与藏人联系，应公开邀请组团访问。"、"嘉乐表示愿意接受台湾对难胞之济助，但款须汇寄达赖，必得电谢。"

同一次会议中，讨论到有关嘉乐顿珠来台访问一事，会中认为由于嘉乐顿珠一贯主张西藏独立，且为从事西藏独立活动最烈之人，对于政府存有偏见，奉总裁指示不再与之联系有案："现拟仍本既定原则，目前不予理会。"

从民国四十八（一九五九）年起，国民党中常会便持续针对西藏问题进行专题报告与讨论。五十（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时，国民党二组曾经对西藏政治运用问题提出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西藏内部的派系从过去分为亲英、亲汉两派，到现在分为保守派（旧派）、国际派（新派），而后者则是以达赖喇嘛胞兄嘉乐顿珠为首，此派受国际力量之鼓励与诱惑，主张西藏独立，并号召全体藏胞成立所谓"大西藏独立国"，与中央（中华民国政府）采对立态度。

这份报告分析指出："嘉乐顿珠的各项活动，系欲依赖美方及其他国际力量之支持，脱离中央（中华民国政府），达到其所谓"西藏独立"的目的。其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一面谰言攻击，尽其轻视诬蔑之能事，一面透过关系，试探中央态度，要求经济支援，及准许西藏独立。"

报告中说："该派认为，台湾政府目前已自顾不暇，其在联合国之席位亦将难保，故依赖台湾系属愚蠢之举，惟有在国际力量支持下西藏必获独立。同时，蒋总统在告西藏同胞书中对西藏政治地位之允诺不够明确，故应进一步明确承认西藏独立始有助于西藏与中央之关系。而且，中央过去对于在印藏胞之零星救济，无补于藏胞实际生活之改善，今后所有救济款项应交由藏府统一运用，以有助于藏胞之长久生计。"

在民国五十一（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中国国民党边疆工作指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记录中提到："台湾的立场是，中央一向尊重西藏固有传统制度及习惯，基于此，若干年来对西藏本身之政教设施均未轻予更移，对任何破坏此种制度及习惯之措施亦均不予承认。但是西藏目前仍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对西藏未来之政治问题，蒋总统的告西藏同胞书已有明确指示，但眼前唯一目标仍是以"团结反共、消灭共匪"为第一目标。

而报告中提到国际派与台湾的接触方面时提到："以嘉乐顿珠为首之国际派，为使其"西藏独立"运动获得中央的承认，曾数度与我驻印工作同志接触，试探中央态度。如在民国四十九（一九六０）年八、九月间，该派派朋措札西（达赖姐夫）与我方晤谈，表示总统在告西藏同胞书中对西藏政治地位之允诺不够明确，故应进一步明确承认"西藏独立"始有助于西藏与中央之关系。同时并希望中央在经济上予藏政府以支持，当时为我方所婉拒。"

"民国五十（一九六一）年六月间，我方派员赴达兰莎拉发放难民救济时，顺道晤见达赖，朋措札西及其他藏府官员，当我方告以解决西藏未来政治地位问题必须以总统文告为依据时，达赖表示同意，并愿即派代表来台，与政府商谈有关问题。同年八月朋措札西携带达赖呈总统亲笔函，拟代表达赖来台，惟因其函中内容仍涉及独立及狂妄语辞，故未被我方所接受。"

"同年十二月中旬，我方又应朋措札西之函邀派员赴达兰莎拉与达赖及其他藏府官员会晤，此行结果，藏方（国际派）表示，关于"西藏独立"问题，准与不准自在中央，但藏方非继续要求不可，其派员来台之主要目的，亦为商谈此事，至其他问题皆为次要。我方之立场与前同。"

这份文件中提到的达拉朋措札西原为达赖喇嘛的姐夫，曾随同达赖喇嘛逃亡，在达赖大姐过世后，目前的妻子格桑达拉女士正为"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亦

即达赖喇嘛办公室在台代表。目前人正在台湾的达拉表示，当时有一汉人名叫高迁规，他原任国民党四川军区副团长一职，在共产党入侵后他跟著逃到拉萨，改取藏名为丹巴顿珠，尔后为安全考虑还进了甘登寺为僧，因此藏人称他为“假喇嘛”。

达拉说，后来他也跟著逃到印度，到了加尔各答与国民党的华侨负责人叶干中接触后，也与国民党开始进行联系。那时，丹巴顿珠表示他非常关心藏人处境，便向达拉表示衷心希望能见达赖喇嘛一面。

达拉说，丹巴顿珠与叶干中后来被安排见了达赖喇嘛，但也只是个一般的拜见，丹巴要求与达赖喇嘛合照留念，谁知他却利用这些照片表示他与达赖喇嘛关系密切。后来丹巴顿珠从国民党处弄来一笔钱，说是要救济生活困苦的藏人，但却在给藏人每人十元印度卢比（当时印度卢比十元约等于美金两块钱）时，一一拍张照片存证，这件事被西藏政府知道后，便派达拉到加尔各答向他表示异议。达拉说，后来丹巴顿珠又从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那里弄来十万印度卢比的救济金，但西藏政府认为台湾目的在宣传，只是利用金钱做政治上的活动，不是真心要帮助西藏人，所以拒绝了台湾方面的钱。

达拉说，他是曾经在与丹巴闲谈时，提到他对蒋介石那份宣言的意见，认为宣言中的西藏立场不够明确，但从未要求台湾支持西藏独立或给予经济支持，也未把丹巴两人视为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自然没有任何被“婉拒”的问题。同时，达赖喇嘛也从来没有写任何亲笔函给蒋介石总统，反倒是当嘉乐顿珠在一九六四年秘密访问台湾时，曾经带回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给达赖喇嘛，达拉并且提供了这封信的内容。

不过，从蒋介石的书信内容中，似可了解达赖喇嘛曾经写信给蒋介石。蒋介石的信是这样写的：“达赖喇嘛勋凿：按本年三月五日来函，诵读悉是。令兄嘉乐顿珠先生面告各节，尤感欣慰。西藏事变发生后，西藏同胞处境困难，实一日之忘怀，对西藏抗暴运动支持与救援，我政府自不遗余力，今后自必续予以支持救援，以尽其职责，拯救藏胞于水深火热之中。目前全国反共抗暴情势愈形愈烈，胜利在望不远，务希加强联系，随时交换意见，无任企盼。

时绥

蒋中正

中华民国五十三年四月五日

另外，民国五十三（一九六四）年六月十日第九届中常会会议中又指出““达赖家族嘉乐顿珠等西藏独立派份子，乃于四十九（一九六０）年春在印度选举出各教区各教派人民代表，同年九月成立西藏政府新组织，五十二（一九六三）年三月发表所谓“西藏宪法”，积极展开反汉反政府活动，并离间藏胞与中央关系。”

“关于西藏问题，我在联合国历届常会中，强调所采行动，限于基本人权与自由暨藏胞之文化宗教生活方面，亦即赞成联大对共匪暴行之谴责；惟反对联大就西藏政治地位问题作任何讨论或决议。目的即是反对西藏独立，并注意达赖可能再向联合国要求承认西藏“独立”及准许“西藏”加入联合国等事。”

会议中还提到关于西藏未来之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问题，我政府如不表明立场，即有默认西藏独立之嫌，故我驻联合国代表团宜针对达赖方面之说帖，向联合国各会员国代表团，引述我蒋总统于三月廿六日告西藏同胞书之谈话，说明我政府之立场。

国民党中常会这些解密不久的资料散在各个会议记录中，这些曾经列为“机密”文件如今都已泛黄，从这些散落文件中方可回溯当年台湾方面对西藏事务的立场。由于国民党坚决反共、同时也坚决反对西藏独立，这种令藏人感觉冲突的立场，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根本难与西藏流亡政府建立友善的互信关系。因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仅能暗中行动参与行动，情治人员便成为当时活动的主要份子，他们的工作目标，一方面是希望能促成西藏反共抗暴的胜利，另一方面则又希望杜绝“西藏独立”有任何生存的空间。

在公开的计画中，民国五十一（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中常会会议记录显示：“为

争取留印优秀藏族青年子弟大量来台，依其素质及志愿分别送入各军事、政治学校或普通大专学校设立特别班，予以长期培养，储备为光复大陆后重建西藏之基干，为将来以政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准备条件。同时，还计画充实国立政治大学的边政学系、兴建西藏村、筹建喇嘛庙等工作计画。”此外，台湾也曾收留一名流亡噶伦苏康，出资成立一个“噶伦办事处”。在立法院与国民大会，也都有穿藏袍的藏族代表。

而私下，却因为当时国民党一党领政，西藏事务操纵在少数人手上，这些人投上所好，扭曲资讯，更支配台湾提供给西藏的各项支援。不但当时援藏的帐目不清惹来非议，在印度流亡社会更有“国民党社区”出现，几个藏人配合台湾情报工作人员的需要，让台湾高层误以为西藏工作已有进展；再加上又以假照片谎报摧毁中共军事设施，甚至，白纸黑字呈报达赖喇嘛同意蒋总统的文告立场，以吹嘘妄报炮制藏人心向国府“亟沐天恩，戮力勤王”的绩效幻觉，以符合当时中土虽失、仍猛为上国的政治文化。

由于当时台湾威权政治文化使然，方使得目前才渐渐出土的国民党中常会资料中，看到许多与真相有极大出入的资讯。台湾方面对于“西藏问题”从一开始就陷入意识型态的纠葛中，许多资讯都因“体察上意”而撰，既无真实而言，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了解了。

而在藏人内部，由于了解国共两党的内战纠葛，当时西藏流亡社会也曾经寻求台湾方面的支援。拉莫才仁提到，嘉乐曾经写信给台湾驻联合国代表，这封信其实是他写的，信中提到西藏问题已成国际问题，希望台湾能在联合国中为西藏发言争取独立，台湾的力量可以帮助西藏人民。

后来他们得到的回音却是：“对于独立运动台湾不表关心”。嘉乐想，如果不支持独立就不需要台湾帮忙，所以就没有再联络。

但到了一九六三（民国五十二）年时，国防部第二厅派了一个巴塘人到大吉岭，当时木斯塘总部就在大吉岭。他建议藏人和台湾合作，由台湾来支援，台湾可以派电报联络员、指挥员等。但嘉乐说现在已不需要台湾派这些人员，也不需要台湾支援，西藏人可以自己来。拉莫才仁也说，如果台湾想做这些事也可以自己做，不料台湾却采取了破坏行动。拉莫才仁说：“结果台湾还是想派人去木斯塘，台湾在那里有一个组织，并派了一个喇嘛来，因为我们把边境都占领了，所以台湾便把组织设在宗目附近，台湾的活动很小，如果他不破坏组织就与我们不相干。

这个台湾派来的叫格德仁波切，但多数藏人不承认他是喇嘛，这人是个特务，带了很多的信件，策反在木斯塘的藏军，这事被发现后，很多信件被搜了出来，最后就把格德给枪毙了。

他们的文件和信号，都有我们的名字在上面，在木斯塘可能还有他们的特务组织，但我们只拿到文件，组织没有破获，文件中也找不到线索。

我对台湾第一个印象是，要反对共产党这点在政治上我们是相同的，但台湾还是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时我们不计较后者，但不了解，为什么台湾要破坏我们已经组织起来的组织？为什么要挑拨？当时台湾共策反了十六、七个藏人，这十六、七个人全被赶走，都去参加国民党了。

另外那个巴塘人也在大吉岭成立组织，嘉乐向他说请你不要介入木斯塘的事，我们已不需要台湾支持，但还是有一些藏人参加，同样也是四水六岭的人，参加的人后来也宣誓加入国民党，宣誓那天墙上挂著蒋介石的照片，他因为回去要写报告，结果每一个宣誓入党的人都站在蒋介石的照片前，拍了照片寄回去。

这个秘密组织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我认为这个组织只是和台湾联络，与我们对立，为台湾工作就是反对西藏独立，挑拨离间，还写了信要他们离开。蒙藏委员会的人丹巴伦珠是台湾汉人，也是一份藏文报纸的负责人，最主要是利用报纸作掩护，并做情报工作，也尽量为台湾政府做宣传。他们编造了一些假情报回台湾，在尼泊尔境边破坏烧了一座桥后拍了照

就寄回台湾，说已进入西藏境内，是烧毁中共的桥梁。”

因此，在木斯塘的游击训练中，将台湾列为抗暴的次要敌人。嘉乐顿珠说，他知道在木斯塘一带，台湾情治单位曾雇用流亡的印度难民，吸收几个人，给他们枪、武器，让他们去捣乱的事。他们有两个据点，一个在尼泊尔境内，约是靠近木斯塘的地方，大概有十八、九个人在那里做非法活动，结果木斯塘的工作人员要他们缴械。

还有另一个据点则是靠近大吉岭，也有十一个人，他们就是去散发国民党的传单，不是真的到西藏去反对共产党，我想也是有助于国民党的宣传吧！但却说成国民党在那里也有游击队。嘉乐说，这些事蒙藏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二组、情报局、国防部第二厅都知道。

当时的木斯塘游击战士卡列降巴说："当时敌人有三种，第一是我们的敌人中国军队，第二是无形的敌人，敌人用眼睛、耳朵来侦测我们的事，我们可能摆脱了敌人的枪口，但并没有摆脱敌人的眼、耳、嘴，为什么没有摆脱？因为我们的一些事还是被发现了，因为一些偷听、奸细，我们的话还是被侦测到了。

第三的次要敌人是指台湾，当时有十三个部（以贡唐催成为首）他们不向西藏政府纳税，他们的钱全都是台湾给的，不仅仅这些，还有些喇嘛拿到钱后开始咒骂西藏政府，找麻烦，这样的事太多了。一九六三、四年开始，台湾大量的钱来，台湾还弄去几个西藏噶伦，在台湾成立了噶厦。

钱都是从贡唐催成和他的秘书直接单线联系，大家都知道这个钱是从台湾来的，知道他们干什么事，都是在为台湾效劳，因为拿的是台湾的钱，所以他们闹得很凶，所以十三部就分裂了。”

有关贡唐催成在藏人社会引发的风波一事，达拉朋措札西指出，贡唐催成是安多人，和他同乡的次仁才巴多杰是国民党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达赖喇嘛一到印度后，他们也跟著来到印度，因为他们两人的安排，噶伦苏康、嘉玛桑佩、格列活佛等人才先后到台湾。

嘉乐顿珠则提到，西藏和台湾也许有一些关系，因为当时青海、四川、藏区和国民政府主政时期曾有过接触，但共产党来了后，这个关系切断了，不过还是有些关系；当时西藏和美国根本没有来往。嘉乐说，在西藏发生的事是民间自发的，并不是为了响应美国，也不是为了响应台湾。

嘉乐说，那时候有一个问题是，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对西藏问题的宣传，有些地方和流亡政府意见不一致。嘉乐顿珠提到他从西藏出来后，就常劝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应该用国民党政府那种宣传方法。因为共产党一直说并不是西藏广大人民反对共产党，西藏广大人民非常拥护共产党，主要是反动三大领主－庙主、地主、贵族在反对他们，而且，西藏所有的抗暴都是美帝和国民党特务挑拨离间发动起来的。

但台湾在进行国际宣传时又说藏民也是为了反攻大陆，所有的藏民抗暴都是在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下发展出来的，这样的说法对藏人相当不利。嘉乐指出："国民政府这样的宣传和共产党所说的刚好吻合，等于是支持共产党对我们的谴责，但却与事实不符。因此我常要求说，我们很愿意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的帮忙，很愿意和中华民国政府合作，但宣传方面一定要调整。

我的工作是要让全世界的人了解藏族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另外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期间不是因为国民党，也不是美国人、印度人，也不是上面的贵族阶级领导的，完全是民间自发的，他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我希望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上应发表明显的声明，说藏族是自发的，是为了自由、民主、保护自己的宗教、固有的文化，这样才发动运动的。并不是国民党鼓励，或配合国民党政府反攻大陆。

国民党政府也难怪，因为在国际上来到台湾后，大陆的汉族很少有抗暴运动，都是藏区，我想情治单位、蒋先生也许想这是最好的机会，藏区就是为了反攻大陆的宣传等。

当然当时与国民党的情治单位有些关系，国民党情治单位可能训练了一些人，但是与我们毫无关系。我来过台湾好几次，因为蒋先生那时已经老了，不太管事，我就劝经国先生不

要这样。

一九六二年中印发生战争时，印度政府那时非常希望我能帮他们的忙，希望我能秘密到台湾，去沟通印度情治单位和台湾情治单位间的关系，我说可以，台湾我熟人很多，我一九五二年劝的事他们没做到，我再去劝一次，另外在一九六三、六四年我又秘密到台湾三次。我想台湾在藏区没做特别坏的事情，当时我曾和经国先生沟通两国关系，国民党秘书长唐纵、安全局局长陈大庆情报局局长叶翔之都在场。我主要向经国先生说，假如台湾政府能采取开明的立场，为争取自由民主的藏人向全世界呼吁，并且支持达赖喇嘛领导下的政府，总之不是谈独立而是讲事实，这样把中华民国政府的身分表明，那我们很愿意公开派代表来台湾台北设立办事处，与中华民国政府联系，保持密切的关系。

我在一九六三、六四年时已谈到这个问题，最后在外交部次长沈琦的家中，我和经国先生三个人吃了一顿中饭，决定了这件事。经国先生同意在我们离开十天后，他会发表这个宣言，即呼吁自由民主国家，支持达赖喇嘛。结果我离开十天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情治单位觉得不应发表这样的宣言吧！结果经国先生并没有遵守诺言，我们从那时起就断绝与台湾政府的关系，双方官方的任何关系都没有，一直到一九九一年才恢复。”

从美国国务院一九六八年的历史档案中，却有一封蒋经国与美国驻台大使马康纳在当年二月十二日会谈的备忘录，蒋经国并且在此次会谈中提到西藏情势。这份机密文件指出，蒋经国说，西藏情势令他非常关切，他说他从中华民国情报单位得到有关西藏内部有严重困难的报告，很可能因为食物短缺而雪上加霜。蒋经国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密切注意此项情势发展，依他判断，部分西藏异议份子可能会向印度求援，中共势必会对西藏进行更高压的钳制，如果他们无法获得援助，异议份子可能会被扫荡。

马康纳大使则向蒋经国表示，印度现在在国内也有难题，不太愿意采取可能激怒中共的作法。蒋经国表示同意印度不会如此做，然而，他觉得，这应该是可资利用的机会，他认为英国情报单位可能才更多有关西藏情势的资讯。蒋经国还建议，美国应该强化在在西藏的情报活动：“以期了解如何协助藏人完成独立”。

还有一个更机密的行动是，当时台湾政府曾招募流亡西藏青年，秘密来台湾接受情治训练，并计画在适当的时机将他们空投回大陆，以进行各项敌后活动。现在住在台湾的罗桑嘉措与丹巴，都是当时参加此一秘密训练的西藏青年，丹巴在保密了四十年之后，第一次透露了这个历史秘辛。

上有两次遭逢中国军队，真没想到能够逃出来，到了南方后丹巴心情稍微轻松一点，因为那里有四水六岭的人，然后到了印度边界时，印度军队要求藏人交出武器，这样丹巴就进入印度了。

丹巴在印度碰到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他们叫他蔡定中，他与部分西藏难民接头，并说可以去台湾接受训练，另外有几个人不是同一单位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情报局管道的，还有几个好像是安全局和美国情治单位合作的。丹巴说：“我先是在锡金修公路，那里有很多西藏抗暴军在修路，我故意谎报自己的年龄已三十岁，才能修路，在锡金要回西藏很方便，很多人于是都谎报自己的年龄。

蔡定中和我是一个家乡的，他是藏人，大陆撤退后到台湾，但因工作关系又到印度，在那里碰到我们这些同乡。我们逃到印度后成为难民，就聚在一起，他问我们想不想到台湾去，也提到接受训练的事，我们去台湾的证件都是这个人办的。

我在修路时有信来，要我们马上到噶伦堡，可能有办法到台湾去。到印度后我们马上去照相，很快就把照片寄给蔡定中，就拿到台湾入境证了。我们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的来到台湾。当时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一起来台湾的共有八、九个人。

罗桑是情报局安排坐船到台湾的，船票等手续是公家办的，我们是蔡定中买飞机票、拍照片先到台湾办入境证，然后坐飞机到香港再到台湾，另外有安全局找来的的人也是坐飞机

到台湾的。

我是民国四十九（一九六０）年四月十五日来到台湾的，到五十（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时，三个单位的西藏人一起到淡水（海）的一个训练班，这是国家安全局的干部训练班，三个单位的西藏人一起训练，一共是三十二个人。

从民国五十（一九六一）年五月到五十二（一九六三）年二月份为受训期间，一直都在接受训练。学的内容主要是打游击，训练时有一个翻译官张至中担任翻译。

我们来时心想回去的目的是抗暴，我是想如果训练好就回去，会有一些希望，大家来的时候都是这么想。

训练时，政治思想的课方面有时会说："中华民国是五族共和。"但并没有说过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不能独立等。

嘉玛桑佩是我们西藏抗暴军的副总司令，但当时他的年龄已大，不可能真的到西藏去抗暴，我们三十二个人是属于一个机构，是"川、甘、青、康边疆干部训练班"，训练的内容就是打靶、爆破（如何破坏桥梁）、汽车驾驶、山地训练（如爬山、过河）、跳伞训练、等于是特种部队的都训练过了。

天天带我们到海边教我们如何使用炸药、如何安装等。

张至中（汉人）以前在西藏地区是搞情报，在西藏住了好几年，会藏语，后来到印度，回到台湾，又到印度，在印度开个小饭馆做掩护，我们回台湾后他就负责翻译。

从民国五十（一九六一）年五月到民国五十二（一九六三）年二月，我们都住在淡海，三十二个人都住在一起，成员中有西康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的，没有西藏自治区的人，但我们并没有被赋予抗暴军的名称。我们的工作当时都是保密的，现在这个地方可能没有了。

原来台湾政府的意思是希望我们马上回去，去西藏也好、青海也好，西康、甘肃、四川都行，我们的目标正是这些地方，政府也这么想，计画也是这样。我们接受训练完后，并不是要住在台湾，是要马上回去的。

但后来情势改变了，西藏内部已经没有人接应，没办法回去了，所以从民国五十二年时就开始分配工作，有兴趣到哪个单位的就去哪个单位，反正回去的希望没有了。本来一开始有规定我们在台湾不能成家，后来没有办法才结婚。

我决定到台湾时，家人都不知道，一直到民国七十一年，我的家人才知道我在台湾，在这之前我是生是死他们都不知道。现在局势完全改变了，三十二个人中剩下没几个了，有些都已经过世了。"

目前已经在台湾定居、并且娶了台湾媳妇的丹巴说，他们三十二个人中没有人再回去西藏抗暴，他们藏人也曾问为什么不能回去，丹巴说："我的家乡有人说看到国民党的人，还把武器空投到家乡中，但家乡里面已经没有人，我们回去能做什么，回去的希望没有了。"

在台湾自知已无力支援西藏抗暴后，整个军事情报行动也渐渐淡了下来，原来被秘密招揽到台湾受训的，台湾也为他们找了个国文老师，开始教他们中文，并且安插他们到情报局等各个部门工作。丹巴说，民国七九（一九九０）年后这些藏人大部分都退休了。现在大约有三、四个还留在台湾，其他有的在国外，也有四个人回去大陆，丹巴则曾回甘肃藏人区探亲两次。

最后丹巴是从情报局退下来的，他神色黯然地说："我们到台湾，藏人对我们好像比对共产党还不谅解，我们来台湾也不是为反对西藏政府，主要意思还是要回到西藏继续打仗，那时蒋经国是训练班名义上的主任。很可惜训练后无处可用，退休的退休，死的死，现在已没几个人在台湾了。"

不过，虽然台湾在军事与政治上因为意识型态而成为西藏抗暴军的次要敌人，但在西藏人抗暴而后流浪印度、尼泊尔等异地的日子里，不管是基于何种理由，台湾也曾经伸出援手

救助西藏孩童，先后共有一百零二名孩子离开父母、被接来台湾，并被安顿在“西藏儿童之家”中。

这项政策最大的利益是，虽然这些藏童在印度、尼泊尔的父母只拥有难民的身分，但孩子来台湾后却立刻就可拿到中华民国国民身分证；当西藏难民在印度连担任公职的资格都没有时，理论上在台湾的藏人却因为有中华民国国籍而有当总统的机会。

根据当时负责这项业务的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顾问汤镇熹指出，当时西藏同胞在印度、尼泊尔的小孩没有机会学中文，印度、尼泊尔政府也不容许中文学校的存在，于是有人提出构想后便开始接孩子来台湾读书，而且人数不断增加。汤镇熹说，这些孩子主要是透过“印度华侨总会”会长叶干中、以及罗桑嘉措去寻找需要帮助的孩子。

罗桑嘉措是台湾情报局的藏族工作人员，曾经在情报局接受通讯、电报、炸药与策反等工作，孰料这些训练没有派上用场，后来却接受救总委托从事西藏儿童的辅导工作。因为救总没有人懂得藏语，于是会说中文的罗桑嘉措与妻子蔡嘉便开始协助救总进行救助工作。

罗桑嘉措说，这个构想是救总理事长谷正纲想出来要他去做的。谷正纲认为汉满蒙回藏本是一家，于是他先在中和自己家里成立西藏儿童之家，共有十三、四名孩子，救总每个月给每个孩子八百元的补助。

民国六十九（一九八０）年九月七日，在台北市虎林街的“西藏儿童之家”正式成立，一开始有十七名儿童搬入其中，以后孩子陆续增加，最多达一百零二人。民国八十（一九九一）年时，因为救总面临预算问题，蒙藏委员会也主动要求接办此一业务，因此从八十年起，这群西藏儿童的家长便从救灾总会变成蒙藏委员会。

只是，这一百零二个西藏小孩极罕见地在台湾长大，却深刻感受到这里并不是自己的家；一些已经长大的西藏小孩说，小学时有小朋友不解地问他们：“这里不是你们的国家，干嘛还留在这里？”有的孩子提到他们小时候被同学借钱，同学会说：“干嘛还你钱，我的父母都在缴税。”

有西藏孩子疑惑台湾人做事讲究关系，找工作还要问爸妈在做什么？有台湾人对他们四个字的名字很好奇，因此一些西藏人都有改名的念头。西藏儿童之家中只有少数人升上大学，辅导员吉美也理认为最主要原因是：“从小压力太大，根本书都读不进去。”

二十年来没有太多人注意，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不再是儿童。如今，原西藏儿童之家仅剩斑驳的招牌与空了的卧室，这群西藏孩子大部分仍留在台湾，不过，这些幸运来台的西藏儿童，只有少数人以求学为重，超过一半以上的人以国中程度就投入台湾激烈的就业市场。

根据蒙藏委员会现有统计，在一百零二名西藏儿童中，在民国八十六年九月间共有二十一人尚在就学，其中大专、大学生两人，高职教育日夜间部共十四人、国中生五人；此外，有十一人正在服兵役，二人在监狱服刑，一人定居美国，十余人在印度、尼泊尔与台湾间来来往往。另外，则有高达五十余人正在国内就业。

西藏儿童有了身分证后，多半不愿回去印度、尼泊尔，已经就业者更因为流动性极高，换工作时就跟著换居住的地方，变动性极大。因此仅有就学的十余人尚接受蒙藏委员会救助，一部分住在台北市中坡南路，另一部分住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中坡南路住户外挂著“西藏文化中心”招牌，杭州南路则悄悄收起西藏儿童之家的招牌，外表上全然看不出他们特殊的背景。

民国六十八、九（一九七九、八０）年对于西藏儿童人道的援助，固然有些政治宣示的味道，但仍有培植民族幼苗的若干善意，却因为来的都是小孩，所以也出现种种后遗症。杭州南路的辅导员郑惠娟表示，她从与孩子接触中发现，很多问题是因孩子太小就来台湾，有的孩子五、六年才回去一次，有两个姊妹家人的资料因为没有保存好，到现在无法与家人联络，她深觉太小就将孩子接过来实在造成了一些问题。

这些在台湾的西藏儿童没有父母照顾，和台湾社会完全缺乏脉络连系，多数无法适应社

会激烈的竞争，有些课业成绩低落，连带造成行为偏差。有的也出现国家民族认同上的问题，也有部分人不愿当兵，对社会的价值观不易确立。

超过一半的西藏孩子在学业仅达国中程度就快速投入就业市场成为这项救助工作最大的无奈。但西藏孩子辍学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台湾社会高度的物质诱惑曾经令这群孩子难以阻挡，也有孩子因此坚持打工而失学，让工作人员觉得非常无奈。

又碰上台湾泡沫经济膨胀、物质生活指数上升，儿童在西藏儿童之家出现各种偏差行为，管理上极为困难。原本是希望这些孩子在学业完成后能够到原居地服务，但现在孩子都散居各地，不愿回去了。一名五岁就来台湾的西藏孩子说，他是一个领有台湾身分证的西藏人，心里最大的希望就是毕业后在台湾赚钱，然后把钱寄回尼泊尔。

郑惠娟说，孩子最希望的是可以常回去，在台湾不太希望人家知道他们是藏人，孩子也会要求在班上不要提他们的背景。有的会在认识新朋友时，自己先取一个三个字的新名字。

现年十九岁、不愿透露姓名的青年说，在他九岁时进了救总的“西藏儿童之家”，现在才刚刚获准将父母接来台湾居住，如今他的中文说得比藏语好，他还记得自己的西藏人身分，但是别人问起他会说自己是台湾人，只是，西藏人的名字有四个字，看起来就像外国人一样，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他很希望可以改个名字。

一个西藏小女孩说，小时候她们经常要穿著藏服被拍照，无法拒绝，现在她们长大了，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同时，如果不是达赖喇嘛在一九九七年来台湾进行宗教访问，多数忙碌的台湾人可能不知道有西藏人在台湾的事实；甚至远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也不清楚，西藏人来台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之中，人数甚至直逼在美国、瑞士等自由国家的流亡藏人数量。

此外，随著藏传佛教传入台湾的热潮，西藏喇嘛来台弘法的情况也愈来愈热烈，目前平均一年就超过一千人次。

根据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陈又新指出，台湾西藏人目前登记有案的公民数共有二百四十六人，另外又有百余人虽然没有登记，但亦持有国民身分证。而更引入注意是，因为流亡藏人认为在台湾赚钱较为容易，因而亦有百余名西藏人以非法方式入境然后在台湾非法打工，过著与警察抓迷藏的日子。

蒙藏委员会藏族委员觉安慈仁却认为，没有身分的在台藏人约有两百五十人；他指出，这些人多是逾期居留，在台北县的各个邻近县市打工赚钱，很想让自己慢慢“台湾化”，进而取得在台合法居留权。

这些在台湾的西藏人人数极少，几百人的数量已经完全隐藏在二千万的四大族群中。而且，他们多数不会说中文，从他们四个字的名字结构很容易就发现他们是外来客。又因为他们在台湾多是从事工厂劳力工作，基层蓝领的工作型态让他们永远是社会沈默的角落。即使如此，与十余万流亡在印度、尼泊尔的西藏人相比，台湾仍是一个不错的新家，因此，到现在还有部分西藏人从尼泊尔购买假护照入境，目的就是想留在台湾打工赚钱。

已经持有身分证的仁增沙令指出，虽然他们有身分证，但是台湾的老板还是把他们当成外劳看，而且因为他们的名字不一样，讲话的腔调也不一样，但他们的薪水就比其他台湾人少。

藏人巴亚玛则是到台湾已经一年多以后才拿到身分证。他表示，在拿到身分证后终于可以过著不怕警察的日子，又可以随时回印度，以后又可能就在台湾长期居留了。

另外的藏人嘉欧就没有那么幸运，他来台湾已经三年多，但到现在还是没有身分证的黑户，也因此根本无法回印度探亲。嘉欧说，为了来台湾，藏人可从尼泊尔买假护照，以观光签证入境后逾期居留，有不少非法入境的西藏人都是以此管道蒙骗入关的。但他们现在都很希望可以在台湾就地合法化，因为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做台湾的公民。

然而，多数西藏人在台湾都面临语言上的问题，二十余岁的仁青沙令说，她很喜欢台湾，

回印度探亲时也会想念台湾，现在她会讲一点点中文，却完全看不懂中文报纸，但是她们已有身分证，也觉得自己是台湾人，台湾就像是自己的国家一样。

只是，仁青沙令说，每次当她说自己是台湾人时，别人就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她。

第十三章 藏独的来龙去脉

西藏问题在最近几年似乎成为美国好莱坞的时髦，第一部以西藏问题为主轴拍摄的电影“在藏七年”（台湾翻译为火线大逃亡），全世界透过好莱坞电影销售系统，都能欣赏到这部现实而敏感的西藏电影，就连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达兰莎拉，也透过内部使用的有线电视线路，让多数流亡藏人观赏到这部期待已久的电影，西藏问题也第一次以通俗电影的手法被带到全世界。

然而，正因为题材敏感，这部电影从一开拍就受到中国北京的强烈反对，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更大幅报导这部美国影片内容捏造事实，毫无真实性可言。报导中提到影片中严重歪曲中国官员形象与当初那段历史，并且为了抬高主角德属澳地利人亨利的角色，不惜贬抑西藏人，看了令人气愤。

了解西藏历史的藏人也明白电影剧情确有与真实不符之处，例如片中过度强调西藏人的落后原始，也未忠于西藏的历史真实，不过藏人不但不气愤，反而心存感激，关于电影中的历史谬误，他们都不计较，但是他们却特别注意到，观众们可以在这部电影中，从西藏人可以拒绝外国人入境一事，就可知道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甚至影片最后出现的雪山狮子旗的西藏国旗，更可看出西方人对“西藏独立”所采取的同情立场。而流亡藏人在现实中虽可在国外经常看到雪山狮子旗，但对于刚刚逃出来的藏人而言，内心更会发出强烈的震撼。

然而，这个令中国咬牙切齿的“西藏独立”概念，其实是近一百年来的事，也是西藏寻求自主化发展的重要转捩点。但，令西藏人怅惘的是，“西藏独立”虽激发出藏人足以自傲的民族意识，却也不断提醒著中国军队曾经两次大举入侵的痛苦记忆，前后两世达赖喇嘛还因此被迫流亡。现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前世－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廿世纪初年就曾经流亡印度，第一次向中国喊出“西藏独立”的声音。

如今，随著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十年的流亡岁月，更让“西藏独立”成为国际话题，无论是西方政坛或是好莱坞银幕，都听得到这个高原民族、在失去地平线后的无助呐喊。

半个世纪以来，西藏的宗教历史受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强烈冲击，而在他们流亡四十年后，政教合一的传统也面临最深刻的反省。更特别的是，藏族的民族国家意识恐怕是拜中国的刺刀与枪口之赐才产生的，在西藏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了解到，如果没有中国的入侵，就没有西藏政教领袖流亡的耻辱；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了亡国、失去家园的痛苦，在藏人世世代代的佛教诵经声中，根本听不到“西藏独立”的政治主张。

但目前中国对西藏主权归属的主张却不是这样，中国一再宣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究其立论，中国方面认为，西藏与中国除了自唐朝汉藏间的王室联婚建立起友好关系后，到了十三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明朝接替元朝后，当然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而清朝时代的皇帝曾经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与五世班禅，同时更确立“金瓶掣签”制度，实质掌握决定西藏转世灵童的地位。而且，在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大典时，中国中央都会派大员亲临监礼。

到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时，中央政府也一如前三朝般地设立蒙藏事务局，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后来则又于一九二九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而在十四世达赖喇嘛被选为转世灵童时，经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察看后，中央政府还特别同意免于金瓶掣签的申请，而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正式颁布命令，批准这

名年仅两岁的灵童为达赖喇嘛。

可以理解的是，即使历史上有部分证据可以说明西藏曾经是中国的属国，但藏人在情感上，多半不愿接受这样的诠释，甚至这些历史回顾在藏人的政治理解中，可以完全是另一种解释。藏人认为，历史上即使西藏曾对中国表现臣服，也仅属尊崇有礼之态，未必有主权归属之义。藏人这样的思想或许不见容于政治主权概念的解释，但藏人的确觉得要对中原的统治者客气些，却也不认为中原的统治者会干涉西藏事务。这些互相矛盾的政治概念却正是孤立于高原之上的一个政治真实。

对西藏人而言，在过去读经念佛的日子里，从来没有什么“独立”思想，而“西藏独立”思想的萌芽，则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流亡后才开始。

中国驻藏军队从一九 0 四年便与由印度北上的英军作战，战胜的英军进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逃亡外蒙古。几乎在此同时，中国军队也从四川进入西藏，由赵尔丰率领的满清新军攻城略地，占据了大部分康区。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军退出后准备返回西藏，但由于满清军队占领康区，又设立郡县直接统治，因此前往北京交涉，结果满清要十三世达赖喇嘛行臣礼，见皇帝要三拜九叩，为达赖喇嘛所拒绝，为此双方会面的日期一拖再拖，最后达赖喇嘛以单脚跪拜勉强赴会。

不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但回到拉萨还不到两个月，满清军队便跟著侵入，西藏人虽有抗拒，却终究不是中国的对手，满清政府占领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又再度逃亡，这次反而是在英国统治的印度中得到庇护。在满清与西藏间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后，双方至此成为仇敌。

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立刻从印度加尔各答发了七次打电报要求满清政府撤军，满清不予理会，同时宣布罢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和职务。由此，达赖喇嘛不再与满清交涉，西藏独立思想从此刻开始萌生。

西藏人认为，一九一二年是西藏从中国手中，争取到独立地位的重要时刻。一九一一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达赖喇嘛在印度噶伦堡发表声明：“此雪山之域为观世音教化之地，我根据历辈达赖喇嘛的规矩做为全部政教的主人而履行..。”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在拉萨的中国军队进攻色拉寺，遭到在拉萨的康巴人与寺僧的顽强抵抗，由此拉开了西藏僧俗驱逐中国军队的序幕，而僧兵更是作战的主力，最后中国战败。

随后，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派人来，并宣布恢复达赖喇嘛的名号与职务，但达赖喇嘛以“我就是西藏的统治者”予以拒绝。当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在一九一八年发表一份宣告，这份宣告甚至被西藏人视之为“独立宣言”。达赖喇嘛在宣告中提到西藏人应继续努力，赶走中国军队，又特别宣示中藏之间只有“檀越关系”，而非“从属关系”。同时还宣称：“西藏虽没有其他国家般的强盛，但却是一个符合教法、和平的自由国家，..不要忘了中国军队不是主人却强行侵占西藏”等主张。

由此可知，西藏第一次出现独立思想，正是满清军队入侵，第一次造成西藏“亡国”的时候起。从这时开始，西藏独立的概念才开始出现在西藏辞语中，不过仍仅仅为藏人精英所运用，一般民众尚无此政治启蒙。

护送达赖喇嘛逃亡的达拉朋措札西曾经想起一段故事，过去中国政府在西藏设有广播电台，当时分别以英文、藏文、和中文三种语言广播。由于当时达赖喇嘛还未正式掌权，摄政王有一次透过秘书把达拉找了去，说以后要多听中国方面的讯息，并且要加以研究，达拉也针对广播内容做了些报告，如中国在北方如何、在南方如何等，当时还是国民党时代，以后中国可能会有危险，西藏说不定也会被中国占领等。

但当时摄政王的反应是：“绝对不会，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护法神，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达拉说，由此可知，在当时西藏官员的想法中，早有“西藏独立”的概念，很早以前就有。但是西藏缺乏现代国际知识，就只是想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以为说独立就什么都

办得到，在当时是封闭的状态下，官员的思想也比较落伍，这是不可否认的。

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曾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我们在一九一二年取得完全独立时，我们满足于回到孤立。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独立，这对我们是一个如此明朗的事实，对外界却需要合法的证据。假使我们申请加入国联或联合国，在我们的危险来到之前，我们若向一些领导国家指派大使，我肯定这些主权标志会不成问题地得到接受，而我们此一危机的明显公义就不会被蒙蔽。"

达赖喇嘛说："现在，我们得学会此一痛苦教训，世界已小得不容任何人维持在毫无伤害的孤立里。"

此外，透过对西藏近半世纪抗暴史的回顾后，即可理解，"西藏独立"概念虽被发源于近百年前十三世达赖喇嘛逐出满清军队起，但"西藏独立"思想的普及于一般藏民，则是由近五十年抗暴运动所滋生。

当西藏精英领导者普遍存有独立概念时，一般普罗的国家观念依然十分薄弱。从拉萨抗暴起，主张"西藏独立"的组织数量极少，"西藏人民议会"是最主要的组织，而且都是由知识精英所组成。但直到一九五 0 年共产中国入侵西藏后，由于藏人的宗教与家园受到严重破坏，"独立"观念才普遍被激起。目前流亡尼泊尔的四水六岭战士恰成丹巴就说：

"说个心里话，当时我们年轻，并不怎么懂得独立，从我母亲那一代，就是帮政府收税的，税指的都是粮食，要晾。后来西藏贵族不理我们了，中央叫蒋介石的派了人来，又说不收税了，非常有计策的给我们很多的好处，让我们随心所欲，所以也不觉得要反抗。后来共产党来了，我们作战当然是为了独立，但独立是后来才知道的。"

另一四水六岭战士卡列祥巴也说，独立的说法在当时是想不到的，他的家乡先是国民党来了，但来了一下就走了，不骚扰也不理老百姓，对老百姓并没有太大的妨害。后来共产党来了，才感觉到自己的家乡不再属于自己，所以才开始打仗，才知道独立的道理。卡列祥巴说：

"原来没有人提西藏独立，是因为西藏本来就是独立的，我们的地方西藏政府不理我们，不派官员过来，国民党来一下就走了，我们都是自己过自己的。但那时西藏在金沙江以西是独立的，只有在五九年后才完全失去独立，所以要恢复独立。

拉萨失守后，西藏政府在家乡已经垮台了，这时要恢复自己独立地位的说法就上来了。"

"木斯塘游击基地"总指挥根益西则指出，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独立"这个名辞，但谈到家乡时，老百姓认为西藏方面要恢复原有的权利，至于独立，是老百姓到印度后，西藏政府官员和其他有知识的人告诉大家，人民才开始使用独立这个辞。

继西藏因抗暴滋生"西藏独立"的思想后，流亡印度的西藏政府除了透过达赖喇嘛访问世界各地以使西藏问题受到国际重视外，西藏政府也于一九六一年发表西藏宪法草案，以象徵国家主权独立。

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印度政府对流亡藏胞提供了人道援助，紧接达赖喇嘛也开始进行政治方面的布局，即在印度建立西藏流亡政府。然而，流亡藏人在政治上的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辛苦，到现在由达赖喇嘛所领导的流亡政府，依然得不到任何的官方承认。

国务院中央档案的机密文件中，提到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与副次卿詹森会谈中，提到达赖喇嘛近种目标是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同时，达赖喇嘛也央求美国政府重新检视其立场，并且鼓励印度对藏人采取政治、而非仅是人道的立场。

尔后，美国国务院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廿三日在拍发给美驻印度大使馆的电报中，正式就此事做出答覆；电报中指出，美国不愿意涉入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行动，电报中说："我方已经再度检视本身立场，并从我方观点作成结论，达赖喇嘛改变地位一事玩不起，事实上，改变地位可能将失去若干支持，若就我们与印度现阶段的双边关系，我方也无意向印度政府提议这项敏感的议程。"

美方还在这份电报中表示达赖喇嘛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应该对问题做全盘考量，美方认为，不论是从美方、印度与藏人角度来看，达赖喇嘛改变地位的实质利益非常少，无论就其与联合国、友邦、中华民国政府、或中共打交道皆然。美方更认为，此举可能大为不利，可能对承认中共的英国和瑞士的藏人办公室处境不利，并可能阻碍其他办公室的设立。但是，美国国务院仍然要求驻印度大使向嘉乐顿珠保证，美国政府依然会坚决致力于公道及和平之道，以解决西藏问题。

因此，藏人在流亡四十年间，西藏流亡政府更在美国的纽约与华盛顿、英、法、瑞士、匈牙利、墨西哥、日本、澳洲、尼泊尔、印度、台湾等设立了办事处，目的即是希望透过国际办事处得到支持。

然而，流亡政府虽然成功地将西藏问题推展为国际焦点，但是基于政治的现实，到目前为止，在政治上并无人承认或支持流亡政府，十余个办事处也只能巧立各种名目登记。

西藏外交部助理秘书长土丹桑佩说，流亡政府在美国的两个办事处是向司法部门登记，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承认这是西藏政府的办事处；在澳洲则是与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享有同等地位，属于半承认的政府；而在其他国家的办事处也都不被地主国承认，官方都不与办事处接触，但也不阻止流亡政府的各项活动。

流亡政府最新的一个办事处设立在台湾；一九九七年，流亡政府以“西藏达赖喇嘛宗教文化基金会”名义，在台北成立办事处，虽是一个向内政部登记的宗教团体，但同时也是达赖喇嘛在台湾的办公室。与其他国家经验不同的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李登辉总统，更在基金会开幕时亲自到场表示欢迎，这个善意表现为其他国家所罕见。

而且，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设有官方机构“蒙藏事务委员会”，每年均编列预算进行援藏事务，按理应有更多资源可以运用，但达赖喇嘛在台办公室却刻意回避这个机构，转而以宗教名义登记，由此更可看出西藏流亡政府与蒙藏委员会之间的裂痕。最主要原因，除了“蒙藏委员会”的存在即已假设“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外，蒙藏委员会在藏人流亡后，因为政治宣传以及金钱不当介入引发藏人社会反感，都是原因。

同时，在江泽民宣布达赖喇嘛必须接受“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作为双方谈判的两个前提后，“中藏关系”与“台藏关系”似乎处于冲突点上。针对这件事，达赖喇嘛在接受作者访问时也表示，在他的想法中，西藏与台湾之间只有宗教关系，因此他的第一次访台实为宗教之旅，未来也可在宗教关系上继续发展，但双方并无政治关系。

尽管如此，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丹巴才仁指出，流亡政府是一九五九年西藏政权的延续，做为一个政府，首先要得到人民的承认，到现在西藏人不管在那一个角落，都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他们唯一的政府。不过，藏人也了解到其他国家基于自己的利益，不能承认流亡政府是一个政府，而只是达赖喇嘛的个人机构。

世界上有许多的流亡政权、流亡者，有家归不得是他们最大的痛苦。在达赖喇嘛流亡将近廿年以后，从一九七七年起，中国才开始公开宣布欢迎达赖喇嘛以及逃亡的西藏人回去。一九八九年初，中国指出当班禅大师圆寂时，中共考虑到历世达赖、班禅互为师徒的历史宗教关系，经中央政府同意后，中国佛教会邀请达赖喇嘛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但中国方面说，达赖喇嘛拒绝了这项邀请。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八日，中国国家主席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记者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做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只有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以藉此表明有条件地欢迎达赖喇嘛回归的态度。

在此期间，中国与西藏流亡政府也不断透过私下管道，协议双方进行谈判的可能，达赖喇嘛也在此时提出派遣考察团前往西藏的提议。

于是，从一九七九年起，共有三支访问团到大陆进行访问。一九七九年八月，西藏流亡

政府五人考察团在北京停留二个星期，考察西藏四个月；一九八0年五月，两支考察团分别从印度前往西藏。但第二支考察团被中国以“挑拨群众造反，危及祖国统一”的罪名驱逐出境；另外第三支教育考察团则于一九八0年十月返回达兰莎拉。

一九七九年二月廿八日，达赖喇嘛派代表回国与中国接触时，邓小平在会见达赖喇嘛的代表时明确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回来，回来以后还可以出去。”对于中国与达赖喇嘛谈判的问题，邓小平说：“现在是以西藏是一个国家与中央对话、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来讨论处理一些问题？这是个现实的问题。”

但，邓小平说：“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一九八四年时，中国总书记胡耀邦也曾经公开宣布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回去，不过若现在不想回去，以后回去也可以……如果要做官，则在北京做，不要在西藏做。”

直到较近的一九九八年七月，当美国总统柯林顿结束北京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上海举行联合记者会时，江泽明回答记者问题时指出：“只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则谈判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从邓小平、胡耀邦、到江泽民的谈话可以了解，早从七0年代末期开始，中共就是以“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做为汉藏谈判主轴，这个主权立场至今未变。

无奈的是，政治现实终是遵循权力大小与弱肉强食等法则，因而，肩负著西藏前途的达赖喇嘛一直思考著西藏的未来，让人注意到的是，达赖喇嘛从过去一向坚持西藏独立的观念里，慢慢放弃独立主张，而改谈自治。

从七0年代末期开始，达赖喇嘛已经用“西藏人民的幸福”此一概念替代“西藏独立”，从此，在达赖喇嘛的讲话中，凡是有关西藏的前途时，都是一直强调“西藏人民的幸福”，几乎就已经避口不谈独立了。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一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华盛顿，提出了“有关西藏问题五点和平计画声明”，这份计画的五个基本部分为：

“一、将全西藏（包括康区和安多两个东部省分）转化为非暴力区；二、放弃威胁西藏人民作为“人”而生存之中国人口转移政策；三、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权与民主自由；四、恢复及保护西藏自然环境及放弃中国利用西藏生产核子武器及弃置核子废料；五、开始有关西藏未来之地位及西藏人民与中国人民关系之真诚磋商。”

更关键的是，达赖喇嘛在第二年、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演说，这次演说除了再一次强调西藏人与中国人间应举行认真的谈判外，更首次提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政策，同时，中国可以享有在西藏保持有限数量的军事设施的权利，这项设施必须完全用于防卫目的。

但是，西藏政府应该通过它自己的外事局发展和保持在宗教、通商、教育、文化、旅游、科学、体育等方面，以及其他非政治性活动的对外关系。同时，西藏应该参加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国际组织。

这个演说明白透露达赖喇嘛有关西藏地区“一国两制”的主张，继一九五一年十七条协议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雏型失败之后，为了带领流亡藏民重返家园，维系已经破败的西藏佛教，达赖喇嘛终于在部分流亡西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并盼望中共能回应他一国两制的主张。

因此，一直到现在，达赖喇嘛经常对流亡藏胞说：“五十年前，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有要求独立的权利。虽然，西藏人民从心里厌恶中国政府，但是西藏地大人少，若从资金、技术角度看，要靠西藏自己的力量发展很困难。因此为了西藏需要发展，便要和中国政府联合起来，由藏人自己发展文化，而军队、国防等涉及暴力的事就交由中国帮忙，如果真正这样，中国就不用担心西藏独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

达赖喇嘛说：“我们现在要解决西藏问题，就要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而在西方，基于对西藏问题的关切，多年来西方领袖也多次呼吁中共，应就西藏的未来

与达赖喇嘛进行谈判。一九八九年一月，中国与西藏流亡政府代表曾经在日内瓦进行会谈，并无任何结果。但在同一时间里，班禅喇嘛却在访问西藏期间，因心脏病发作圆寂；同年三月五日，拉萨发生一连三天的示威，拉萨随之宣布戒严；同年六月，天安门事件发生，中共以武装行动进行镇压造成民众与学生伤亡的不幸事件，引来国际间同声谴责。

同样在那一年的秋天，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抗议。

局势的变化令双方谈判难有突破，直到一九九三年，达赖喇嘛曾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共谈判，然后也曾与中国驻德里大使接触，但达赖喇嘛说，一九九三年八月是双方最后一次接触，从那以后，就再没有正式接触。不过却仍透过一些中国商人、欧洲人、美国人、还有一些欧洲政府，都一直与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保持间接联系，但这些间歇的接触都是非正式的，也未促成任何进展。

更重要的发展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最近的谈话，开始将"西藏问题"与"台湾问题"合流，中国政府当局并且多次批评达赖喇嘛访问台湾的行动是"藏独"与"台独"的结合。江泽民要求达赖喇嘛表态的做法令这位方与台湾建立友谊的西藏领袖非常为难。

针对此一敏感话题，达赖喇嘛在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三日接受作者访问时说："这个时候问题太复杂了，现在江泽民要我接受"台湾是中国一省"的条件，要求达赖喇嘛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省。而且，现在情况很难理解，江泽民说达赖喇嘛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但江泽民为什么要这样说，现在还不明瞭，按道理来说，达赖喇嘛和台湾没有关系，所以从直觉来说，好像是把我推到某种纠纷与矛盾之中。"

但是，为了即早与中国正式对话，达赖喇嘛却已宣布"无限期延期访问台湾"的立场。达赖喇嘛说，他第一次去台湾时，在宗教方面做出了有一定意义的事，觉得很有意义。但是从台湾回来后，中国就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指责。他当时就知道必须要注意中国方面的影响与反应，但由于中国愈来愈强硬，所以就宣布不去台湾了，这个问题早在江泽民与柯林顿没见面前，就做出了决定，但并不表示就此冷却与台湾的关系。达赖喇嘛说："由于最近几个月我们与中国的接触增加，也对中国政府有所期待，所以才宣布无限期延期到台湾访问。因为我真的很希望与中国政府对话，也把与中国交往和谈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到台湾访问一事会让中国政府很不高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不去台湾，因此才宣布无限期延期来台。

（达赖沈思......）根据我的愿望，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大陆与西藏的关系，这些最好不要掺杂在一起。西藏议题与台湾议题一定要分开。另一方面，西藏是在中国控制中，但是台湾不是，台湾有自己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台湾与中国有相同语言、文化，西藏则是完全不同的语言与文化，这当中有些相同、有些又不同，所以我想还是分开来谈比较好。现在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都关系到中国大陆，而且其中一个问题解决后都会影响到另一方。

一般而言，西藏问题应该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而台湾的问题比较复杂，但西藏问题指的不是要追求西藏独立与分裂，只不过是改变一下中国的政策。

我经常想，台湾有很多忠诚的好朋友，我是一个佛教比丘，在那边有很多对佛教感兴趣或信仰的，向他们做出帮助这本来是我的责任。如在高雄我在讲佛法时，当时天上下雨，但许多人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表现他们非常的重视，由于政治的原因使我的宗教活动受到了阻碍，这是非常遗憾，很让人痛心的。"

平时幽默如达赖喇嘛，却在中国抛出这一记变化球后令他内心充满无奈，达赖喇嘛从未想到，中国在"香港问题"解决后，竟会将最后的"西藏问题"与"台湾问题"牵连在一起，达赖喇嘛在接受作者访问时最后谈到："有时候连说实话都是不允许的，也没地方说，因为这件事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还关系到六百万藏人，现在我正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

此刻，"台湾问题"与"西藏问题"均处在未决的关卡上，就台湾问题而言，尽管台湾岛内民众为了统独论战争执不休，进而激发严重的国家认同矛盾，但至少还有台湾这块土地可

以安身立命；而对流亡藏人而言，同样也陷入统独两个观点的争执中，就算追究出百年来的独立意识均因中国侵略而起，是因为枪杆的压迫才产生独立意识，但流亡依然是难以改变的命运。

一九九七年藏历新年过完不久，一场流亡藏人在印度境内的游行活动，在走了几个月的历程后，终于抵达终点站－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沙拉。西藏人站在街道两旁热烈鼓掌欢迎，人人口中喊著藏语的“吉祥如意”，他们个个穿著藏服，胸前披著白色哈达，喇嘛头上也戴著写有“FreeTibet”的帽子。这五百多个僧侣与西藏人穿越印度各地，宣传西藏问题。

西藏独立一直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议题，虽然达赖喇嘛已经放弃了西藏独立的主张，但是西藏最大的政治团体“青年会”，至今却依然坚定主张西藏应该独立。

与世界其他国家青年会最大不同的是，成立已有二十七年之久的青年会，参加成员并不限于青年，只要是西藏人，为了西藏独立，都可以参加这个组织，因此在青年会中从十六岁到九十岁的人都有，成员包括男女老幼、僧人与尼姑都有，西藏流亡政府有不少干部在担任公职前都是青年会的会员。

但到现在，青年会却有若干的政治主张与达赖政府不尽相同，最明显的便是关于西藏独立的问题。青年会秘书长央金卓嘎提到，西藏政府对未来立场已经出现变化，但是青年会从一九七 0 年成立以来都坚持西藏必须独立。

央金卓嘎指出，达赖喇嘛是西藏人的国家元首，青年会绝对尊重达赖喇嘛，虽然达赖放弃了西藏独立的立场，但是达赖并没有要他们也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们也可以抗议、表示不满。她认为，达赖改变立场是从国家整体来考量，但是青年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则是从团体的角度出发。

有关“西藏独立”与“台湾独立”为中共所联想一事，央金卓嘎认为，台湾人有主张独立的权利，但台湾人至少有自己的土地，也偏居一处，相较之下，西藏独立却更为迫切。西藏人在西藏面临大量的中国移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反而变成少数民族，十三岁以上的妇女也被进行避孕或结扎，以控制西藏人口的发展。在印度的西藏人在别人的土地上生活，因为达赖喇嘛在这里，人心才会比较安稳。

央金卓嘎表示，在波士尼亚、以色列等土地上发生的悲剧，全世界都可以透过报纸、电视看到；西藏人所受到的苦难并不亚于他们，但全世界认识到这些的并不多。西藏文明正在面临灭亡，关于此点外界只有透过达赖喇嘛的访问而有一点点认识，很少人了解西藏人要求独立的紧迫性是远高于台湾人的。她更希望台湾人能了解西藏、认识西藏的苦难、支持西藏人民，现在正是西藏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候。

做为一个西藏青年，对于国家处境有何种感受？央金卓嘎说，她们这一代藏族青年都是在印度出生，没见过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国家，她们在流亡中成长，这一生是很不幸的。如果西藏人可以获得自由，她一分钟也不想待下来，马上就回西藏，不管别人怎么说，那才是她的家、她的祖国。

央金卓嘎说：“每天早晨一醒来，我就想到自己是一个流亡者，想到没有自己的祖国、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在这里寄人篱下，自己的同胞都在受罪，想到这些就很伤心，绝大多数青年都是这样的。”

央金卓嘎话没说完，就忍不住掩面痛哭，负责翻译的达瓦才仁也跟著难过流泪。这样的眼泪与委屈，说明了独立思想之于藏人是多么宿命与无奈。

不知当外界永远只在“西藏应不应该独立”的历史论证与意识型态上吵嚷不休时，可曾想到，此刻西藏人正在落泪？

第十四章 流亡者被放逐的悲哀

流亡后的藏人在别人的国家寄人篱下，目前多数流亡藏人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定居下来，西藏是他们朝思暮想、却又回不去的故乡。被放逐的悲哀，让流亡藏人感受到亡国之痛；而无法扭转的流亡命运，却在藏人笃信佛教的平静心灵中，掀起阵阵惊涛骇浪。

藏人洛桑诺布说："现在我老了，再也无力为民族效力了。"他说话时神色黯然，年岁已大的他，现在只能在老人院中等待佛陀最后的召唤。

而老人院另一四水六岭老战士洛桑更秋，原来是个和尚，却一生都在当兵，没想到临到老时却只能在印度做个流亡者，和尚没当成，仗也没打成。洛桑更秋难过地说：

"后来要在印度建立西藏兵营，我们在修公路时，然楚阿旺派人去兵营，我报上名了，共有八十个人一起入伍，一起被送到德拉东的藏人兵营中，说是要学习六个月，然后再送回西藏去。大家一听都高兴得鼓掌，总算等到机会，三年路算是没有白修，现在终于有机会去打仗了。这六个月大家学得非常刻苦，后来七个月、八个月一直等下去，随时准备出发，没想到整整等了廿年，但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我们还是一直等，希望有机会回到西藏打仗，人们都说我们有机会，印度教官每天问我们："你们想不想恢复自己的独立啊！想回去就好好练。"他老是这样说，老是埋怨说为了我们这些西藏人才在这里提供拳打脚踢，这些都是为了你们西藏。

我也觉得这是为了我们西藏，于是拼命学习。我在西藏就会用枪，后来开始学英式步枪，有很多种，子弹可以通用，我都成了教练。后来美国和印度关系好了，美国支援很多枪，我又开始学习美国的武器。美国和印度关系不好后，印度和苏联关系好，苏联的武器又来了，我又开始学习俄式的。后来印度又学习俄式的造了自己的步枪，我又学这些，什么都学会了但学会时人也老了，没机会了。"

目前流亡藏人在印度、尼泊尔、不丹都建立了不少藏人定居点。由于印度收留了约廿万的流亡藏人，不同省份都腾出了一些土地给西藏人，在南部的卡那塔卡省并且拨出了最多的土地，现在有很多西藏人聚集在那里。印度成为除西藏以外，西藏人人数最多的地方。

藏人流亡到印度后，首先就是要先活下来，但他们过去生活在海拔几千公尺以上的高原上，现在却突然来到亚热带燠热的地区，很快就死了很多人。而活著的却多数妻离子散，亲人在西藏还没有逃出来，而且生死不明，内心有著极大的痛苦。

流亡藏人身在异地，尽管达赖喇嘛声望崇隆，但流亡社会仍必须面临微妙的国际政治关系。几千年来西藏一直介于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间，这个地理上的宿命在印度收留藏人流亡政权后，三角关系更形复杂。

过去中国与印度从未发生战争，但自一九五九年中国在西藏进行军事镇压后，不久中国与印度便发生了军事冲突。一九六二年，印度对中共边境发动攻击，随后酿成激烈的领土战争，双方在战争中都是为了争取西藏的土地。目前双方在边境各布重兵，西藏流亡政权是两国间一个未决的难题。

印度北部的达兰莎拉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根据地，也是藏人社会中政治意味最浓的地方。由达赖喇嘛所领导的流亡政府，四十年来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安置流亡藏人。因为达赖喇嘛驻守在这里，更使得素有"小拉萨"之称的达兰莎拉，成为大陆西藏人民投奔逃亡的精神堡垒。

从西藏穿越喜马拉雅山到尼泊尔，然后再坐车到印度拜见达赖喇嘛，是很多西藏人此生的心愿，也是到目前为止西藏人最主要的一条逃亡路线，但这条路上却布满了西藏人无数的血迹。一九九七年过年期间，有一支二十七个人的逃亡队伍一路从拉萨过来，还没踏上尼泊尔的土地，就有两个孩子与一个女尼死在半路上，还有三个喇嘛因为严重冻伤已被送到医院做截肢手术。但即使天候、路况、尼泊尔士兵都是如此险恶，却依然无法阻止藏人来见达赖的渴望。

因为达赖喇嘛在这里，因此无数的藏人都想来到这里寻找国家的影子、活佛的爱！

一直到今天，依然每年都有不少西藏人陆续从西藏逃出来。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丹巴才仁提到，在尼泊尔，每年都会有几十个小孩在穷山僻壤中冻死，更多的人被冻伤，必须做截肢手术，逃亡者有一半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即使路程险恶，还是要逃过来。

尼泊尔接待站工作人员旦巴格桑也指出，根据他们的统计，平均每年逃出来的西藏人约有二千五百人。而他们吃饭及坐车到印度见达赖共七百五十元尼泊尔币的经费，完全由“联合国难民高专”支付。

而在达兰沙拉的藏人接待站内，陆续有一些西藏人进来借住。里面张挂著达赖喇嘛的照片，他们说这是达赖嘛让他们住的地方。一个持中国护照来印度的老藏人说，他花了四、五千元人民币才弄到护照：“为了要见达赖喇嘛，我已经等了三十八年了。”这名不敢说出真姓名的老藏人说，他还要回西藏去，里面想来的人很多，但有些人拿不到护照没有办法来，也有很多人虽然拿不到护照，就越山逃跑。

接待站中还有一对裹在棉被中衣衫破旧的老夫妇，他们来达兰沙拉的目的是探亲。这对还要回西藏的老夫妇说，他们持护照只能到尼泊尔，到印度中国政府是不给签证的。而从西藏到尼泊尔一共有十五个关卡，每一个关卡都要收钱，给钱后才会放人。老先生说，老太太已经离死不远了，在这之前，最后的期望是要来拜见达赖喇嘛，对藏人来说，这是临死前的准备工作。

达兰沙拉接待站代主任阿旺诺布指出，来到接待站的西藏人不论是在外表或肉体都疲惫不堪，也都受到很大的创伤。这里会免费供应他们食物，如果国外救济的衣服够多，就能每人都发。

在印度北部达兰沙拉已经略嫌窄小的街道两旁，有著各式小吃摊贩，忙碌的商人正是抵达印度的新逃亡者，从一九八八、八九年中国边境驻军撤守后，他们想在这里找一个新的家。

九五年时奔措跟著父母、一路通过雅鲁藏布江上游逃了过来，一过来首先就去见了达赖喇嘛，到现在都没有再回西藏的打算。但是，在印度的生活却是另一场艰苦。她指出，在这里只能靠做凉粉、包子过活，没有别的营生办法，每天的营业额大概是印度卢比五、六百元（一九九八年间，四千三百元印度卢比约等于一百元美金）而已。

也是街头小贩的才巴喇嘛为了生活也来做买卖，为了不让人认出，他戴了顶帽子好遮住自己的和尚光头。他说和尚也要自力更生，他从一九八七年非法来到这里后，一直到三年前寺院才帮他弄到一张合法的难民证，成为合法的居民。才巴喇嘛说，非法期间也没有人来查过，但是他还是觉得合法比较好。

藏人嘎嘎在一九九三年从西藏逃了出来，因为出来的晚，西藏汉人多了，他也会说简单的中文。嘎嘎说，文化大革命时，他的家因为是地主阶级，包括父亲、舅舅、哥哥等八个人都被打死，他自己也被劳改了十二年，现在在西藏已经都没有亲人了。

流亡也制造出西藏孤儿，在达兰沙拉西藏儿童村，就有不少的西藏孤儿。他们的父母不是过世了，就是还留在西藏，他们个人只身在印度，十岁的女孩白玛秋卓很小时父母就过世了，她也没有别的亲人。今年十三岁的蓬措久美为了学习英文与藏文，自己一个人留在印度。

问他是不是想妈妈？他想想后，点了点头。

而在学校内一个育婴房间，布置有很多破旧的洋娃娃，里面住的很多是西藏来的孤儿，这里的托儿所主任德迹著玛指出，她也弄不清明确的数字，只知道现在的西藏产生了很多的孤儿，她们在这里便尽量像个父母一样的照顾孩子们。另一个工作三十多年的阿玛措莫说，孤儿是各地送来的，因为这些孩子没有父母，她自己就装成父母，去尽到做父母的责任。

从西藏来的女尼丹增更桑流著眼泪控诉说，达赖喇嘛就像是她们的今生父母，孩子当然希望找父母，来这里主要是想见他，想接受他的教诲，路是不近的，但是她们都从西藏来到这里，而且不管是生是死，都要来依赖达赖喇嘛，而且，达赖也是她们来世的佑主。

西藏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多少罪？丹增更桑说，文革时她被指控是达赖反共集团的家

属，说她没有交待清楚，于是她就要经历太多的挨打与挨斗。现在她也已见到达赖喇嘛，算是此生有福气的了。但很多人却没有看到，西藏人是愈来愈辛苦了，现在在西藏还有很多人在监狱中，谁都应看到西藏人正在受苦，西藏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在一九八五年逃到达兰沙拉的洛桑德迹说，她能够出来感到很幸运，在这里因为有达赖领导，西藏人好像死而复生，又好像自己又活过来了。

也一样从西藏逃出来的普布喇嘛说，因为他知道很多西藏人的悲苦，所以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意义，在西藏因为寺院的喇嘛有名额限制，在寺院清理中，他被寺院赶出来，所以乾脆就逃了出来。苦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是西藏人而起？普布喇嘛说，在他自己身上，爷爷死在监狱中，奶奶饿死了，父母也受了很多的罪，别人的日子也是一样，他深觉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所以要追求有意义的事，于是他在二十二岁时出了家。

但是，他也觉得，这一切不幸的开始都是因为中国人的侵略，而他们在西藏，寺院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又逼他们去做超出人力的活，不给他们饭吃的也是中国人，他当然恨这一切，因为恨，所以他跑了出来。

西藏格西强巴加措表示，中共甫入藏时，刚开始还可以念经，但不久寺院的经文、天珠、宝石都慢慢地运到内地，到了文革期间，更开始大量摧毁寺庙与佛塔。摧毁的方式各有不同，但红卫兵与拉萨各学校联合，手上拿著标枪等工具，有的把佛像摔在地上，有的把佛像拉下来，或把经文放在地上踩、用脚踢，用各种方式摧毁。

而且，他们把东西分类，值钱的珊瑚、宝石都拿回去，不值钱的才摧毁。一个寺院中的佛像有的用铜、银做的就拿走，用泥土做的就不拿走。

强巴加措说，他当时是色拉寺的出家人，寺院旁有个大广场，他白天要劳改砍石头，做工完回去时发现色拉寺的经典全都被搬到广场，西藏人若不把经典搬出来，就会被捕、殴打。强巴加措难过的说，经典、唐卡都被红卫兵烧了，寺院都是烟雾弥漫，他看到这个景象心里很痛苦，但也没有办法。

经典烧掉后，变成农田上的肥料，强巴加措在寺院的寝室，钥匙都托别人保管，红卫兵来时也要了钥匙，他进去后经文佛像已被集中放在桌上，他们告诉强巴加措盲目崇拜没有用，要他好好为自己的前途著想，强巴加措说他必须摆出和他们配合的态度，否则后果无法预料。但为了抢救这些佛教遗产，因为白天色拉寺都被包围，根本无法出去，所以很多喇嘛就利用夜间两、三点时把佛像用布包著，晚上爬到山顶上挖坑埋著。

另外，有些法器强巴加措在做工时就把它们和工具放在一起，在路上碰到江河就丢到江河里，任它漂到那里就漂到那里，这样总比烧掉好。

强巴加措说，对于一个出家人来说，这些法器、经典、佛像都是很珍贵的，他有一本菩提道次的经论，舍不得丢掉，工作的时候就带著，又怕中共查户口时被别人发现，所以只得埋在工作周围的农田中，挖个坑埋著。但因农田土地湿湿的，经文都湿了，于是又得挖出来晒晒太阳。

但有的时候也得把经文放在家里，不得已就放在床底下，有的时候摆在枕头下，有的时候放在棉被内一起睡觉，所以心里上确实有很大的压力，若不是出家人根本感觉不到这个压力。就这样直到一九八零年，到目前在西藏还有这部经论，这不只是在我身上发生，很多喇嘛都有这样的经验。

在藏人流亡社会中处处可见大小不一的转经塔，里面放有佛经，西藏人从左到右旋转转经塔，好像自己又把经文念了一遍，但更重要的是得到佛的庇佑。

藏传佛教中的红色袈裟分开了俗与僧两个世界，虽然袈裟下依然露出属于男人雄壮的右臂，但却从此不得再留恋红尘。达赖喇嘛六岁就出家，佛教是西藏千年的文化传统，然而从远离高原的流亡岁月起，西藏的宗教传统一直受到批判，难免有人会问：“西藏人天天忙著念经拜佛，根本不管政治，如何让西藏富强？”

达赖喇嘛的看法却不是这样，他不认为这是西藏的缺点，相反地，达赖说：“西藏人的团结与勇气都是来自于宗教！”

西藏人天生是个小民族，六百万人分布在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么大的土地没有公路，但这个民族却从来没有分裂，最主要就是因为宗教的力量。

根据流亡政府统计，每年都会有数以千计的外国观光客到印度达兰莎拉，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来这里接近真正的藏传佛教，进而了解西藏文化。这时西藏人才慢慢发觉，过去西藏人跟著中国人跑，中国人又跟著外国人跑，但后来却发现外国人反而崇拜自己瞧不起的西藏文化时，才回过头来珍惜西藏文化的特殊性。

过去汉人一直对藏人的某些宗教文化风俗大表不解，例如在西藏人“天葬”的死亡仪式中，会由喇嘛在死人背上划上几刀，然后将死者的肉体“施舍”给动物吃，在中国人眼里却是死无完尸、碎尸万段；而西藏人鼓励孩子出家当喇嘛，在中国人眼里就算未必是绝子绝孙，也是子嗣无以为继、对不起祖宗的大问题。

但西藏人却普遍相信，出家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很多父母会鼓励孩子出家。来到达兰莎拉的这对老夫妇说，他们有一个女儿在止贡寺当女尼，还有一个儿子也在止贡寺出家。而三个留在家乡的儿子中，也有两个是喇嘛。老夫妇认为，年轻人当然还是当喇嘛好，他们一直很希望子女出家，现在孩子有这个机会弘扬佛法，不仅对今世有用，对来世更好。

流亡政府“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也提到，每个西藏家庭几乎都有男人出家当喇嘛。他的伯父八个孩子中，有两个儿子出家；他的妻子的哥哥也是喇嘛，而他自己的三个弟弟，全都是喇嘛。达瓦说，他与父亲冲突最大的问题，就是父亲一直希望他当喇嘛，父亲对他说：“你当再大的官，我都不稀罕，但如果你是个和尚，能穿著佛陀红色的袈裟，以后能够死在袈裟里面，那么我今生幸福，来生也幸福，即使是要饭也要把最好的饭送给你。”

因此，西藏政府即使被迫流亡，还是把保存宗教看成一件大事。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仲日巴克珠指出，逃出西藏后首先有一千五百人的僧团和女尼的寺院在不丹边境的巴萨一带散布宗教的种子，做为西藏佛教复兴的根据地。然后再开始于各地定点发展，如萨迦派、噶居派祖师便在印度南部建立寺庙，格鲁派也在印度南方的色拉寺建立据点，宁玛派则在印度南北建立遍知学院，最后是苯教也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附近建立总寺。

在流亡政府的图书馆内，就保存有极具历史价值的藏文版大藏经，以及部分佛学大师的专著。这些经文有的刻在木板上，有的则是手抄本。其中还包括有宁玛派最主要的经典伏藏，目前除了流亡政府的保存外，很多地方已经找不到了。

也因为这样，印度成为藏传佛教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而目前在西藏，因为各寺庙有严格的配额制，很多人想当喇嘛都没有机会，因此有不少人便逃到印度来寻求宗教上的皈依。三浪喇嘛就说，从一九九三年开始西藏禁止摆设达赖喇嘛的照片，一经发现就会被抓走，所以他们都不敢再留照片，但是却偷偷保留在自己心里。因为这样，所以在一九九五年五月时，他就下了决心要离开西藏。

一九九一年从西藏逃到印度的坦客塔喇嘛，十四岁就出家，他当喇嘛已有十六年的时间了。他认为，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能够当喇嘛是最好的，这不但是他的愿望也是每个人的信仰。他说：“人的世界是空的、无常的，会让人迷惑，像在做梦一样。”当喇嘛正是为了摆脱这些，以追求有意义的目标。然而，当喇嘛真的可以达到这些目的吗？坦客塔认为，佛教说，至少这是一个最好的途径。

阿旺尼麻九年前翻过喜马拉雅山逃到印度来，最主要的心愿便是当喇嘛。他说他的父母告诉他因为汉人不喜欢宗教，当喇嘛会吃很多亏，所以不要自己的孩子当喇嘛，但是他却和三个朋友一起逃了出来，现在四个人都在印度西部出家了。阿旺尼麻说，他很想当喇嘛，因为西藏人相信当喇嘛是人生最好的选择。

达兰莎拉小街上刚花十元卢比把长出来的黑发全部剃掉的若桑贲措也说，他十二岁时和

八个喇嘛一起逃出来，他觉得这一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当喇嘛是为了下辈子。

十五岁就出家的江永洛桑也认为做和尚是年轻人最好的选择，他出家已经四年了，但却认为最好可以先上学，有了一些学问后再出家。江永洛桑说，他也知道其他年轻人过的日子，也看到年轻人为钱忙，有的人去跳舞，但他并不羡慕这些，因为佛教有戒律，不允许高声唱歌、或跳舞。

坦客塔说，他偶而看到穿著时髦皮鞋和衣服的年轻人意气风发的样子，难免会有点羡慕，但回头想想："我是个和尚，有自己的意义，那些只是外表"，这样一想就好了。

若巴喇嘛九岁就出家，是在舅舅的带领下当了喇嘛，当和尚已有十八年。当被问到是否曾有俗念时，他发誓说凭著喇嘛起誓，他不会想去过其他的生活，也从来不想这些事。

虽然历史上宗教是西藏传统，当喇嘛是人生最好的出路，但最近有若干想法已出现转折，西藏的宗教传统最近不断受到批判。有些人开始担心，西藏人天天忙著念经拜佛，根本不关心政治，如何让西藏富强？还有人私下提到，过去宗教确实妨害了西藏的发展，只不过过去历史上可能是弊大于利，但现在却是利大于弊。

印度德里西藏难民村墙上，写有"拯救西藏"、"中国人滚出西藏，西藏是属于我们的"等英文字样，好几个年轻男孩聚在一起，他们都受了教育，但是却找不到工作的机会。二十二岁的索南说，这是他们年轻人的大问题，但是，他们却不会想去当喇嘛。

他们指出，在他们的社会中，有很多穿著僧衣做生意的喇嘛，喇嘛也有很高的素质，但是他们想做一个平常人，这样才可以尝试各种工作。其中的丹增库桑则说，他并不想当喇嘛，但仍想追随喇嘛的精神，因为佛教仍然是他衷心的信仰。

而在德里达赖喇嘛办公室任职的塔西旺杜认为，他从来不想当喇嘛，因为当一个俗人可以比当和尚做更多的事。他说政治与宗教是两条不同的路，而现在唯有政治好，宗教才可能有发展，因此他觉得政治已比宗教重要。

此外，西藏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是西藏人的国家元首，也是宗教领袖，是活佛转世，达赖喇嘛最近几年也经常提到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问题。达赖喇嘛说，一旦西藏人返回西藏，他个人将放弃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政教将完全分离。届时他将只做为一个宗教领袖，只管为社会谋福利的宣道工作，不再过问政治问题。

达赖喇嘛说，在未来西藏获得自由时，西藏也将按照世界潮流接受一些政治派别，他个人将完全退出政治。

达赖喇嘛虽已放弃西藏独立言论，改而强调"自由"、"民主"，多数藏人其实心里难免有些失望。但，秉持著对佛教最虔诚的信仰，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到现在还是所有藏人希望之所系。

尼泊尔的藏人接待中心只是一座简陋的砖造平房，门房墙上写有"FreeTibet"，里面十几张单人床平摆在一起，包括一个三岁的孤儿，睡在上面的都是从西藏翻山到达兰沙拉来见达赖喇嘛的西藏人。

三十岁的东珠原来是一个教生物的老师，他辞去了工作，带著老婆辛苦的越过喜玛拉雅山，一路上身上的钱都被尼泊尔士兵抢走了，走了四十天后，好不容易终于见到了达赖喇嘛。

争著要见达赖喇嘛的人实在人太多了，什么话也讲不了。见到活佛每一个人都哭了，达赖一个个轮流送佛像和一条红绳子做为护身符，然后达赖向大家说明他的民族路线与流亡机构的种种改革。当时好多人都哭了，达赖却笑著对大家说："在这里好好学习，想回去的就好好工作。"

要告别时，达赖喇嘛以其一贯的笑容说："将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赖喇嘛这样说，但这些不得不回西藏的人却一点也没有把握。脖子上系著红绳子的东珠忍不住叹息说："很辛苦，做一个西藏人。"